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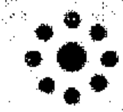
近世日本的日常生活

暗藏的物质文化宝藏

[美] 苏珊·B.韩利 著

张键 译





近世日本的日常生活

暗藏的物质文化宝藏

[美] 苏珊·B.韩利 著
张键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世日本的日常生活：暗藏的物质文化宝藏／（美）韩利著；张键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8
ISBN 978-7-108-03456-4

Ⅰ．①近…　Ⅱ．①韩…②张…　Ⅲ．①社会生活-史料-日本-近代②社会生活-史料-日本-现代
Ⅳ．①K31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70231 号

责任编辑　叶　彤
装帧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图　　字　01-2010-0750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海印刷厂
版　　次　2010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6.75
字　　数　160 千字
印　　数　0,001-7,000 册
定　　价　18.00 元

中文版序言

这本书能够被译成中文，我深感荣幸，因为在日本人的日常生活、宗教和文化里，有太多的东西源自中国。我曾希望能寻求到日本物质文化的中国之根，并将中日两国的生活标准作一番比较。然而读者最终会发现，纵观全书，只有两处涉及到了中国：一是在讨论人口模式的章节里，我提到日本的家庭模式与欧洲更相似而不是中国，但并未详述；另在最后一章，我也提到日本和中国的不同之处。由于我不会中文，咨询了一些美国的中国学者，他们又多无法为我提供详细资料，对中国和日本的比较研究也就只好流于粗浅了。我发现，日本的家族系统和中国迥然不同；在19世纪，日本的粮食亩产量要高于其他所有亚洲国家。但产生这些差异的根本原因何在，我只能臆测。

希望这本书能激发中国的研究者探索这些问题，也希望在这一领域已有所得的中国学者们能够有机会将研究成果介绍到全世界。

最后，向本书的中文译者张键君致以衷心感谢！

苏珊·B. 韩利
火奴鲁鲁，2010年

序 言

我从小就对历史产生了兴趣，因为我对古时候人们是怎么生活的非常好奇。如果生活的物质状况不同，它会如何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20世纪60年代早期，当我在大学里开始研究日本时，有两个疑点挥之不去。第一个是，尽管事实上日本和西方国家都经历了封建社会和工业化，二者有何不同？第二个是，日本在19世纪是否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其生活水平远远低于西方？多年过去，我发现这些疑点并没有消除，而且仍尚未纳入近世日本物质状况研究或者文化研究之中。

然而，60年代之后，日本和西方的学者们开始质疑日本19世纪的经济倒退究竟达到了何种程度，并提出证据证明，在整个德川幕府时代，经济都是增长的。我的第一个专业课题就是破解一个谜：如果当时经济是增长的，为什么日本人广泛实行流产和杀婴，一如人口学家所宣称的那样。我的答案是，日本人控制添丁，并不是因为他们赤贫，而是为了维持和改善自己的生活水平。他们有时采取像流产或杀婴这样的惨烈手段，但更多是以近乎家喻

户晓的社会约束来实现这一控制，比如一个家庭只准一个儿子结婚，在经济衰退时期晚婚，农村中如无足以维持一家人生计的土地则禁止新家庭的成立等。这些发现都收入了我与山村耕造合写的《前工业时代日本经济和人口的变化，1600—1868》（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7）一书中。

人口调查结果令我思考一个问题：德川时代的生活究竟是怎样一番景象？根据我所掌握的资料，在那些自主决定人丁数目的农家，人们是怎么过日子的？如果18和19世纪经济是增长的，当时的民生出现了什么变化？物质文化是否得到了改善？如果是，那我们何以认为明治时代之前的生活比同时代的西方落后？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来看，日本与早期的工业化国家尤其是英国和美国相比孰优孰劣？而这些问题的答案又能怎样改变我们的固有看法？

我很快领悟到，日常生活的研究是棘手的。记日记的人和史学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会去记录每天的流水账；一般很难见到某官僚将旅行见闻悉数收入游记，或者某市井主妇在日记中记下家人每次洗澡的烧水时间。由于这些资料都极其罕见，要研究日常生活，就要查找遍及日本的一切资料，也正因为如此，这些资料不能形成可以强有力地解说任一特定区域的证据。但同时，我也发现日常生活的研究非常有魅力。棘手，反成了魅力之一。

和任何撰述者一样，我喜欢视作品为私有之物。我很清楚，自研究之始，所有想法皆出于自己，来自于个人早期的调查。但后来我发现在世界各地，有很多人都在研究日常生活，从著述令人赞誉的西方学者，比如法国年鉴学派的费尔南德·布罗代尔和美国考古学家詹姆斯·迪兹，以及无数我在注释中提到的日本等地的学者。前辈的研究和思考，提出了许多问题让后辈去解答，很多时候，某一学者的问题又常常与他人不谋而合。

因此，虽然这一研究是我个人的成果，但同时我要万分感谢

许多提供资料帮助我的人。我的美国导师第一个建议我从事德川时代的人口调研，并鼓励我研究物质文化，还让我撰写了《剑桥日本史》卷四的一章："德川社会：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以及生活方式"（剑桥大学出版社，1991）。我对耶鲁大学名誉教授约翰·霍尔表示深深的谢意，他指导我、鼓励我，并为我树立了一个学者的榜样。

我的第一个日本导师是速水融教授。在他的指导下，我学习了历史人口学，并研读了《宗门改役账》——我用以研究德川时代人口的主要文档。如今我意识到，他和他在庆应大学的研究小组对我着手于"生活史"的研究，产生了多么重要的影响。

我尤其要感谢胁田晴子和胁田修教授，是他们从一开始就帮助我进行物质生活的研究。他们不但介绍并帮助我阅读了诸多资料，而且无数次带我在西日本和他们的私宅进行实地考察，所做的远远超过了仅仅是我的导师应该做的。他们负责了这本书1990年以《江户时代的遗产》之名初版于中央公论社。中央公论社的编辑岩田先生帮助并忠实支持了此书的问世，也予以致谢。尤其多谢指昭博教授，是他将此书译成日文。我的《江户时代的遗产》的日文版能在1990年获得上智大学颁发的表彰对东西方交流做出贡献的约瑟夫·罗根多夫（Joseph Roggendorf）奖，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出色的译文。

我的研究得以问世，也离不开众多同事亲友的帮助，虽然在此无法一一提名。感谢大阪大学的安场保吉教授的友好切磋，以助我推敲研究的着眼点并确定于近世生活标准方面。金泽大学的中野节子女士助我破解了德川时代的原始资料，尤其是一些日记。它们本便不是写来供他人阅读的，对一个20世纪的美国人来说就更难懂了。

特别感谢石毛直道教授、平井圣教授、大河直躬教授、鬼头

宏教授、桑原稔教授、白木小三郎教授以及小泉和子女士等日本朋友。他们带我参观了历史古迹和私宅，让我读到难得的史料，为我讲解菜谱、食品原料及古代艺术品。种种帮助，有许多他们自己可能都已记不得了，但对我的研究却极其重要。不胜感激田中绫子女士，自我1961年夏天到日本的第一周起，她就一直在帮助我理解日本。

完成这一研究的数年里，以下出版物出版了我的部分成果，我要一一予以致谢：《19世纪日本的高水准生活：事实抑或臆想?》，发表于《经济史杂志》第43期，第1号（1983年3月）；《物质文化：过渡中的稳定》，发表于《从德川幕府过渡到明治时代的日本》（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6）；以及《前工业时代日本的城市卫生》，发表于《跨学科史杂志》第18期，第1号（1987年夏）。第六章中的一些表格来自我出版于普林斯顿的书《经济与人口变化》（已绝版）。

我研究生历史课的学生们批评讨论了原稿，纠正了大量的疏漏之处，在此感谢他们所有人。艾米·威廉姆斯·米多顿牺牲她的工作时间为我制作了插图。我还要感谢加州大学出版社两位提意见的匿名读者以及几位合作愉快的编辑。

特别感谢《日本研究杂志》总编玛莎·莱恩·沃尔士女士，她自始至终编辑、评阅此作并与我磋商。最后一定要提到我的丈夫山村耕造，他是我最严厉的批评者，令我多次延缓了进程，但没有他的帮助，我的作品最终不可能有这么理想。

目　录

第一章　德川时代日本人的身体健康水平

在19世纪晚期实现工业化之前，日本人过得怎么样？最普遍的看法是，那时的日本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其生活标准低于工业化开始之前的西方各国。然而，尽管大多数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持此看法，研究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和物质文化的学者却大多不以为然。①我的研究主题，就是重新去看日本人在经济现代化和工业化之前，过得究竟如何。

日本在工业化前夕的德川幕府时代（1600—1867），城市已扩展到拥有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并发展成为文化和经济中心。观念、知识和商品从城市传遍全国各地。日本市民文化之所以能够

① 正如凯利和威廉姆森所说："分析近世日本采用得最多的模式认为，劳动力过剩的情况普遍……（这）意味着那些小型的'现代'部门的工人们得不到现代化的任何好处。其历史证据是什么？极端的节衣缩食是否是'传统'部门的农民和劳工促进日本发展的一种方式呢？"艾伦·C. 凯利与杰弗里·G. 威廉姆森《从日本的发展所学到的：一部分析经济史》（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4），第22—23页。

在17世纪末第一次兴起，又在19世纪早期再次繁盛，原因就在于城里人收入的增加。同时，农村人收入也增加了，这又使文化和商品能稳步地散播到乡间。17世纪早期，自给自足的农民尚占人口的大多数，但到19世纪中期时，即使在偏远的村落，人们也可以买到书、家具、糖果、鲜鱼、头饰以及各种小奢侈品了。早在18世纪初，上层武士集团中的一些人就已经抱怨市民比他们过得好，还模仿他们高贵的生活方式。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工业化前夕的英格兰。17世纪，普通老百姓所能消费的商品数量得到了显著的增长。②

前人对德川幕府时代的种种进步已有论述。但奇怪的是仍然有经济学家认为那时日本的生活标准很低，尤其是当他们已经知道，明治维新前存在着产生工业化的前提条件——比如农业的高产、全国范围内的商业化以及工业化所必需的机构和业务（经济的货币化，货币交换的银行雏形等等）。如果日本具备了工业化必需的所有前提条件——除了新科技，而这是可以借鉴别人的——那么我绝难赞同那种认为日本的生活标准很低的说法，尤其是面对如下事实的时候：19世纪中期日本的生活期望值比那些已经工业化的国家在工业化初始时期的生活期望值要高，且与同时代的西方不相上下。

问题是，明确形容出生活标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很困难，同时，在没有可靠数据或国内生产总值可查的时候，这也是极不可能的。明治维新前的日本就属于这种情况，因为那时日本很多日用品都并非交易品。即使曾被交易过，由于物质文化和现在完全不同，价格也很难与其他国家的产品相比较。用消费性商品的价格和数量

---

② 琼·瑟斯克，《经济政策与规划：前近代英国消费社会的发展》（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978）。

来对日本的生活标准进行比较研究，基本上是不可行的。

更需注意的是，经济学家在关注所谓的生活标准这一概念时，可能采用了错误的或者是不充分的度量标准。对经济学家来说，低水平的生活意味着低储蓄率，因为穷人将他们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用在了消费开支上面。储蓄非常重要，因为由之形成的投资是工业化的必要条件。既然日本人迅速地实现了工业化，同时又没有借贷太多的外资，那么他们的生活似乎起码已在一定的水平线上。③一般而言，家庭的储蓄率取决于他们收入的高低。而经济学家定义的生活标准通常显示出人们生活得有多优越，或他们有多少储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知道他们有多健康。

数十年来，西方学者一直在讨论工业革命是否直接导致了生活标准的提高，也就是说，工业革命是改善了民众的生活，还是使城里的工人们过得更糟了？最近有调查显示，答案并不简单。科斯塔和斯特克尔发现有确凿证据表明，在 19 世纪美国南北战争前夕，人民收入增加了，健康水平却下降了，而 20 世纪的健康水平上升速度才超过了收入的增幅。④那时健康水平究竟为什么下降了，仍留待讨论，但显然有经济学家已经意识到，即使是将收入的分配考虑在内，生活标准仍然不能作为衡量民众生活好坏程度的唯一标准。

收入，或者说个人对商品和服务数量的购买能力，并不能充分衡量民众的健康程度和生产力。它不能告诉我们民众受教育和机敏的程度，也不能告诉我们民众进行需长时间消耗体力和心智

---

③ 关于储蓄的重要性与日本工业化的关系，参考亨利·罗索夫斯基，《资本在日本的形成，1868—1940》（纽约：格伦科自由出版社，1961）。

④ 朵拉·L. 科斯塔和理查德·H. 斯特克尔，《美国健康、福利、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发表于《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关于长期发展的历史因素的研究手稿系列》之《历史第 76》（剑桥，麻州：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1995 年 11 月）。

的工作所具有的能力。换句话说，它并未告诉我们这些人有多适合从事与现代工业化经济相关的各种职业——从安装、操作设备，到设置和维护工业基础结构以保持其运作的各类工作：官僚、交通和通信系统等等。营养不良者和文盲根本不能胜任这些工作。经济学家们意识到，民众要成为劳动力，他们的质量和数量同等重要。即使是在19世纪，要运作一个现代化工厂，也与运作一个农场所需要的劳动力极不相同。工人们不仅需要掌握各种技术，还要具备长时间全神贯注工作的能力。社会在工业化以后，不仅需要提供劳动力以进行现代经济活动，还要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人力资本的投资形式包括教育、医疗、在职培训，[5]这些都从体力或技术上使劳动力的质量得到提高。一个靠农业维持生计的民族一步就能登天实现工业现代化，这在经济史上是根本不存在的事。

我研究的目的，不是提供一堆测量日本19世纪中期以前生活标准的资料，用一些连经济学家都尚无定论的数据和方法来估算日本为实现现代化工业需要多少资本。不如说我是为了要回答这个问题：除却对收入的考虑，从更广泛的层面上来看，日本人过得有多好？由此，我们可以更多地了解日本在工业化前夕和工业化早期的劳动力质量。有研究表明，在1870年以前，日本已拥有了受过充分教育的劳动力资源，[6]且明治时代（1868—1912）以来，更多的人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因此，我将致力于考察当时日

⑤ 加里·S. 贝克尔，《人力资本：以教育作为特别参考的理论和经验性分析》，第2版（纽约：国家经济研究局，1975），第9页。

⑥ 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工业化的成功需要至少40%的识字率。至明治维新时，日本基本达到了这一水平，而在明治时代，识字率更快速上升。参考 R. P. 多尔，《德川时代日本的教育》（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65）；苏珊·B. 韩利，《日本教育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见《神圣的诅咒：从历史学角度探讨愚昧与经济停滞》，克拉拉·尤金尼亚·努内兹与加布里埃尔·托特拉编（马德里：联盟大学，1993）。

本人的身体健康水平。这不仅仅取决于收入数，也需要参照很多其他的指标和因素。

身体健康水平包含的很多因素，今天都被置于生活品质的讨论范畴之内。⑦然而，生活品质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在近年来的学术讨论中被赋予了宽泛的、哲学性的意味，既包括一些客观性因素，也包括一些主观性的因素。⑧与之相反，“身体健康状况的普遍水平”虽然是个比较笨拙的用词，却拓宽了调查的范围，同时又能使计量依然客观。因此，这一概念具有双重优点：它不仅能更好地测出人们生活好到什么程度，而且就近代社会而言，其估计也比“生活标准”更稳定。我认为，对德川时代的日本来说，物质文化是身体健康水平的根基，因为物质文化显示出消费的特征和模式，而这反过来又决定了民众的身体健康。这些方面的研究不仅能回答经济学家的问题，也能更清楚地了解德川时代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

本章首先讨论的是，为什么仅凭“生活标准”不足以显示出人们的生活有多好，也不足以分析实现工业化的前提条件，更绝不足以进行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我用身体健康水平的概念取而代之，而且我将证明，这个概念可以被严格定义成一种重要的量度。接着我将解说我的资料——物质文化，并分析，为什么考察消费能让我们同时对生活标准和身体健康水平都作出更好的估计。然后我会对德

---

⑦ 我要感谢牛津大学的安・瓦斯沃，是她向我建议（生活品质）这一术语。在这里“身体”被包括在内，是因为健康这个概念既涵盖了幸福，也涵盖了身体状况，但我并不想对生活的主观感受作出什么评测。

⑧ 阿玛提亚・森最初认为，生活标准的概念是从经济学中发展出来的，之后他补充分析了生活品质。后者不仅涉及到民众有多少钱，还包括了寿命、保健、教育、工作类别、政治和法律权限、自由、家庭及其他关系———张构成民众幸福感和充实感的因素的无止尽的清单。参考阿玛提亚・森等，《生活标准》（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7），以及玛莎・努斯鲍姆与阿玛提亚・森，《生活品质》，（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993）。上述清单中各项见于后一本书的第 1 页。

川时代日本人的健康水平及其意义给出一个假设。接着，我将以德川时代的史料初步论证我的观点，并对后面章节的内容略加介绍。

“生活标准”是一个经济学术语，指可消费产品和服务的数量；它被表述为货币学术语的形式，是人均收入的一种度量法。计算一个国家的生活标准，即是按人口计算国内生产总值（GDP）[9]——一个国家的产品和服务的总价值。因此，人均收入是一种平均收入，它来自两种总合统计量：总收入和总人口。虽然表述笼统，但由于它能从常规所搜集数据的统计中获得，而且它既能为制定政策提供信息，又能对经济表现进行国际化的比较，因而被证明是适用于现代国家的。

经济学家一致认为，生活标准作为一个指标，其精确度取决于计算它的数据的精确度。人口数必须是准确无误的。如果存在着大量的漏算，生活标准会比实际的显得更高。然而在现代国家中，更多的问题来自对 GDP 的计算。即使在今天管理高效的发达国家中，仍有部分收入是未报的，要么因为此部分不易被量度，要么纯属漏报或根本不报。例如，不可能对隐性收入进行计算，因为没人会想要上报甚至去计算自家院子里种的蔬菜的价值，或诸如为让邻居帮忙修下水道而送他一个自己种的苹果这种交易的价值。无偿的家务活及其他家庭内部服务的价值从未被算进 GDP；只有当一家人需要雇人照顾孩子或打扫房间时，相应劳务的价值才会被计算在内。人们常常为了偷税漏税而漏报收入——隐瞒小费和现金付款，工厂也会想方设法篡改账本。简言之，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地下经济，而这其中的收入是永远不会被算进

---

⑨ 国内生产总值（GDP）是指一个国家内部所有产品和服务量的总数，而国民生产总值（gross national product）同时要考虑到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德川时代的经济基本上是闭锁的，因此采用 GDP 最为适宜。

GDP 的。在今天的工业化国家中，这种地下经济的规模是无法忽视的。

如果发达工业国家在计算 GDP 时尚且存在问题，那么显然，一个前工业化国家就更不可能会有多少可靠的估计了。这样的国家既未计算过国内生产总值，而且由于经济尚未完全货币化，政府又缺乏现代化的政治和管理能力，所以也算不出来。德川政府很难对稻田和农产品进行估价，甚至从未试过定期征收商品税。最初这种困难是出于现实和观念的原因，后来就归咎于政治上，更确切地说是管理上的无能为力。

如果在国家间进行比较，生活标准就会越发难以计算，而当涉及到完全不同的文化和历史时期时就更成问题了。即使我们可以精确计算出日本和别的国家比如英国的生活标准，19 世纪中叶也好，或者两国工业化以后的某个类似时期也好，要比较又该从何谈起？由于德川时代日本没有任何重大国际贸易，因此也不存在汇率，而汇率正是我们可以初步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日本的经济是如此闭锁，以至于到 19 世纪中叶以前，银对金的比率是 5:1 或 6:1，而西方是 12:1 至 15:1。即使在今天一些具有相似消费形态的国家，国际汇率也不能准确反映出国家间生活标准的不同。要判断出某种收入在另一个国家、另一种货币形式下价值几何，我们必须将商品和服务市场分门别类进行细致入微的估测。

以人均收入来衡量生活标准所面临的一个更大的问题是，人均收入无法告诉我们收入的分配情况。马克思主义学派批评新古典派经济学家经常忽略了收入分配的重要性，在这一点上他们是正确的。对新古典派经济学家来说，收入的分配是由所有的经济参与者（企业家、资本提供者和劳动力）在他们合作生产全部产品和服务时所作的贡献决定的，因此，这些经济学家无法说明

改变收入的分配如何能造福整个社会。一般认为，如果经济在发展，新增的这部分经济所形成的收入会向下逐层渗过所有收入不同的阶层，那么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从中获利。可见，相对于马克思主义学派之注重分配，新古典派在分析时考虑的核心因素是发展。

这就是说，此类经济学家往往避免规范性判断，这种心态使他们专注于经济的发展而非分配的“公平性”，其结果就是，他们对储蓄的数量（可使用的资本）比对消费的形式和特征更感兴趣。由于富人往往比穷人储蓄更多，在一个经济体中，收入分配不均可能促进资本的增长，而收入分配相对平均的话则不然。对这些经济学家来说，收入的分配和消费（以及决定收入和消费水平的生活标准）的重要性仅仅在于对储蓄的影响，而对身体健康水平的影响则是无足轻重。不过，马克思主义学派的论点同样存在问题。他们将民众按照阶级进行分类；当等级分明而森严，却不再能反映各自的经济地位时，他们的分析就遇到麻烦了，而德川时代后期恰恰属于这种情况。

尽管生活标准是个重要的概念，它在衡量民众生活的好坏程度时仍然显得力不从心。生活标准告诉我们的仅仅是人们平均有多少收入，而且还只是可知或可估计的收入。它不能告诉我们人们的营养水平、生活的清洁卫生状况、疾病的流行程度以及对自然资源的利用程度。通常的假设是，生活标准越高，经济就越发达，民众就过得越好。然而，这三者的关系并不是这么简单。在较早的年代，生活标准虽然很低，但民众可能具有较高的健康水平。而到后来，生活标准可能上升了，可是早期工业化的一系列问题也随之而至，比如污染、城市人口拥挤以及膳食失衡。

有时候，生活标准和健康水平的高低甚至可能呈反比。一个社会也许会出现生活标准的上升，但却同时面临着疾病危险的增

加和卫生条件的恶化，导致健康状况反而变差的情形。在19世纪晚期，买得起精白大米的日本人比以前多得多，人们往往用这种更昂贵的粮食来代替便宜的糙米。他们的收入增加了，因此，根据前文所述的定义来看，也就是说他们的生活标准上升了，然而就是这些民众，此时却因缺乏维生素B而常常患起脚气病来。据报道，明治时期甚至有皇室人员因脚气病而死，这说明生活标准最高的那群人为营养不良和疾病所困，而低收入的日本人因为吃粗粮杂粮反倒没事。与之相似，“二战”后，很多美国人都吃得起昂贵的、肥瘦均匀的牛肉，而心脏病患者也越来越多了。较高的生活标准并不一定就意味着较高的健康水平。

上述现象并不是偶然的。像这样收入增加却导致健康水平恶化的例子，可谓不胜枚举。当英国发明了冲水厕所或曰抽水马桶时，那些能够安装这种设备的家庭看上去是清洁了许多。可随之而来的是，他们不但饱受有害气体之患，而且每个人不论贵贱，都因流入泰晤士河中的下水道污水而遭殃，因为这条河是伦敦的水源。这种情况直到该设备得到进一步改良以后才好转。另一个例子是19世纪的高级时尚。买得起束胸和紧身衣的女人多会为那些买不起的人所羡妒，可实际上，光是行动和呼吸困难已经危害了穿着者的身体健康，无数闻名的“女人的烦恼”也冒出来了。在任何社会里，人们都会被城市的高薪所吸引而趋之若鹜，可是他们在城里虽然赚得更多，生活却往往拥挤、肮脏而不健康。

然而，有时候生活标准的涨幅很小，却可能带来健康水平的大幅提高，或因资源的重置，生活标准并未上升，健康水平却上升了。例如，某家辟出部分山地农田来种红薯作粮食，膳食因此更营养了。在燃料昂贵时，有些人把开放的火炉换成封闭性好的烘炉。后者需要的燃料较少，因而可以省下钱来作他用。新的木

工技术的传播，使人们能用低品质的——因而也是廉价的——材料建起高品质的房屋。这些，都发生在德川时代。

也许会有经济学家反对我的观点，认为健康和安乐并不是衡量生活标准的重要因素。在探讨一个社会如何、又为何能实现工业化时，他们认为重要的一点是，收入达到一定水平（最好是在增长）就能使社会积累和创造财富。大众的安康，只是很久以后才成为诸如经济学家罗伯特·W. 福格尔和他在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组的考虑对象。而当经济学家将他们的视线从可量化的标尺转移到品质上时，大多数人的考察都仅仅局限于技术层面的讨论。[10]

我认为，要实现工业化，不仅要具备充分的劳动力供给量，而且要劳动力足够健康，受到足够的教育，从而能够任职于新式工厂，运用新技术，服务于管理机构，成为银行家和通讯专家，打理与工业经济建设有关的所有事务。经济学家谈到劳动力时，太偏重于量度单位的角度，因此认为日本进入20世纪早期时拥有过剩的劳动力。然而，如果工人的数量是唯一决定因素的话，日本工业化时期的工资结构向双重化发展——大工厂技术更好、受教育更高的员工领高工资，而小工厂的低技术工人则领低工资——就失去了意义。

既然我不能精确地计算出生活标准，而且生活标准不能告诉我们日本人有多健康或过得多好，我提出一个新的度量法：身体健康水平。在这里，身体健康水平的定义是生活标准加上正面或负面的“品质因素”。请注意，我并没有否定生活标准的概念。毋

---

⑩ 当经济学家开始使用所谓“发展方程（growth equation）”来分析资本、劳动力和科技是如何促进工业经济的发展时，他们发现劳动力的作用被低估了。要纠正这种低估，只能靠“调整”关于劳动力的数据——考虑到人力资本，即教育和技术水平的作用。

宁说，我将它纳入了一个新的、能够提供新信息而且更易估测的度量法。我所说的品质因素，是指在一个环境或社会里，没有被算进收入，但是在衡量身体健康水平时必须考虑到的因素。[11]虽然"品质因素"这个词和经济学家的"客观因素"（externality）有重叠之处，但品质因素是一个比生活标准要广泛的度量标准，而且与客观因素不同，有些品质因素的价值可由市场来决定。同样的，品质因素和非市场化交易（未进行商贸，因而在衡量人均GDP时也未被包括进去）也有重叠之处。

有些品质因素是可以量度的，虽然并不是以收入的形式。所以，我没有称其为"性质"，因为性质这个词意味着不能被量化。我们可以测量出一个负面的品质因素，比如污染的供水，或一个正面的品质因素，比如急速、纯净的河流。还有一些品质因素的例子，比如营养的质量和水平、疾病的发生率、普遍的身体素质、平均每户的儿童人口、受抚养者（年幼或年老无法工作者）的百分比、住宅的大小和质量、可获得的供热类型以及生活中影响身体健康的许多其他方面。

这些品质因素与收入相关联，并受其影响，但真正决定身体健康水平的，则是正面和负面因素的合力。如果一个社会的正面品质因素大于负面因素，那么身体健康水平便高于生活标准，反之，则生活标准高于健康水平。我认为，德川时代的日本应属于前一种情况。

---

⑪ 在1985年的泰纳讲座（译者注：Tanner Lectures，探讨人文价值问题的国际知名论坛，始于1978年）上，阿玛提亚·森对生活标准提出质疑：如果一种人的收入比别人略高，从而可以购买和消费更多的食品，然而却因更高的代谢率和寄生虫病导致健康下降，那么这种人的生活究竟有多好，通过生活标准这一概念是否能显示出来？阿玛提亚·森，《生活标准》，第15页。身体健康水平这一概念却要说明这种差别：收入略低的人，尽管因其低收入而具有较低的生活标准，身体健康水平却比上述收入略高者更高。

我的观点如下：当收入与日俱增时，消费也会增加，但并未达到收入增加的相应程度，因为收入越多，人们收入中用于储蓄的数量越大。然而，如果资源得到了充分利用，住宅和卫生设施齐全，人们就鲜有可能接触到病菌，膳食也将是平衡的，那么健康水平的提高则应大于收入的递增。而在另一社会，收入增加了，人们却转向不健康的饮食，那么身体健康水平的上升率则并不如收入的增长率。如果人们已经在膳食中获得了充分的蛋白质和脂肪，却仍继续取肉类和奶制品而舍蔬菜，因而造成不健康的营养失衡，这就有可能产生上述后果。另外，民众的健康水平这个概念，是以大部分人的变化为前提的，因为它是指一个社会整体的健康水平，而一个社会的生活标准有可能会因为一小撮权贵或农场主的暴富而出现上升的现象。在这时，用生活标准来看，就会显示出升高，但民众从总体上来说，状况却并未变好。如果我们总是去看平均情况而忽略了差量即收入分配，我们便会被引入迷途。

我的研究取证于德川时代的物质文化。在这里，“物质文化”是指民众日常使用或消费的物质对象，绝大多数都是人造或天然的，具有某种用途。⑫我关注的是那些基本的东西：衣、食、住以及附带的诸如清洁和卫生等方面。日常生活用品显示出对资源的利用、科技的水平、人们是怎么做饭的、住在怎样的房子里，以

---

⑫ 虽然物质文化可以指“对某一特定社区的……精神信仰的用品的研究”，正如儒勒·戴维·普朗在《事物中的意念：物质文化理论和方法的介绍》一文中所定义的（《美国的物质生活，1600—1860》，罗伯特·布莱尔·圣乔治编，波士顿：东北大学出版社，1988，第 18 页），这个词其实含义广泛、使用普遍，所以我倾向于采用布罗代尔的“物质生活”一说。但这个因布罗代尔而著名的用语对我来说也有一个问题，就是涵盖面太大了。我也没有布罗代尔所论结构的形象或模型。参考费尔南德·布罗代尔，《日常生活的结构》，《文明和资本主义》卷 1：《15 至 18 世纪》（纽约：哈珀与罗，1981）。

及舒适度、清洁度和健康——一句话，就是他们是怎么过日子的。本来这并不是量化的研究，因为大部分现存的信息都不宜量化。但是，根据这些来进行跨时代或跨文化的比较是非常合适的。两个国家的膳食可能很不一样，但对其成分的分析却揭示出二者在营养上的异同之处，而且当信息充分时，我们还可以估计出卡路里的摄取量。如果能够获取量化证据比如说人口的统计数字，我们就能够通过比较两个时代或社会的寿命和死亡模式来评估健康状况。

物质文化为健康水平方程式的每一个自变量都给出了答案：生活标准和正负面的品质因素。对经济学家来说，生活标准等同于收入，而收入等同于消费加储蓄，所以研究物质产品就意味着我们关注的是这个方程式的消费和储蓄方面。由民众消费的产品所造就的物质文化，以物质对象的形式体现了他们的消费，然而也能精确地显示出他们所享受的服务，因为，举个例子，有豪宅和复杂的厨房设施，就可能需要佣人。并且，由于房子是一个家庭所拥有的最贵的东西，它就相当于这家人的大部分家产，而且往往与其全部家产的变化一致。因此，已买下的房子就代表着过去的储蓄。

如果只需要考察消费和储蓄这两方面而不是收入，我们就不必估算出未上报的、不明的收入数目以及市场之外所提供的服务。很多人试图通过收入计算出生活标准却为此精疲力尽，他们遇到的诸多问题也在此迎刃而解。生活标准可以根据收入或者是消费和储蓄计算出来，而健康水平，则只能是通过分析消费和储蓄所得到的材料，亦即物质文化来测出。用来支付房产的收入和储蓄的数目仅仅揭示出价钱方面的信息，而房子本身的种种数据却告诉我们，人们拥有多大的空间、建筑的质量如何、用的什么资源，做饭、供暖、清洁卫生的设施都是什么以及房子有多贵。我并不

主张用这类证明来取代精确、现代、量化的数据，但这远胜于仅凭假设来胡乱猜测。

根据对物质文化的分析，我认为生活标准和身体健康水平在整个德川时代，即17至19世纪，都得到了持续的提高，尽管其提高的速度在各个时段并不总是相同，二者也并不完全一致。提高，是由于经济的发展、技术的普及、重大新食品的问世、服饰和住房上的种种改进、18世纪早期人口的稳定增长，以及政府对城市的供水和垃圾处理系统的设置和规范。由于市民的收入增长比武士更快，久而久之，收入分配就越来越均衡了。到明治维新前夕，日本人的生活标准已经和一个世纪前工业化前夕的英国差不多了。虽然在19世纪60年代，日本人的平均收入并不如18世纪的英国人那么高，但我认为，至少他们的身体健康水平已经和19世纪的英国人不相上下，而那时日本尚未开始工业化，英国则已经是个工业国家。无疑，其健康水平更不会低于英国刚开始工业化的时候。

由于日本在德川时代的锁国政策，发展出的物质文化和生活方式与别国都大为不同，与西方工业化中的国家相比更是如此。日本人在整个工业化的进程中，都更偏爱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而这部分得益于政府对进口消费性商品的限制令。若非如此，则其政治和经济变革不可能这么从容不迫。当政府、社会系统、经济以及相当多的公共生活看上去都在日新月异地变化时，日本人日常生活的稳定性，帮助他们安然度过了动荡的明治时代的新旧交替期。

然而，明治时代早期的物质文化不仅使健康水平发展到足够高，而且其住房形式和某些基础设施，例如下水道排污，在一个世纪以后仍被使用着。此时，日本人的身体健康水平已经高到可以提供健康并受完备教育的劳动力，并赖以建设出一个工业国家

的程度。对旧有生活方式的偏爱则意味着，这个国家可以利用本身那一点点资源和外汇来建设现代经济。同时，守旧又搞活了本国的工业。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有助于提高收入水平，这样一来，即使各阶级内部没有多少变化，至少在阶级与阶级之间，物质文化和生活方式更加趋同。对一个理论上等级森严的国家，如此程度的趋同超过了人们通常的设想，而这又反过来造成社会的活力，促进了一个现代国家和经济的诞生。

我的初步论证，首先说的还是生活标准，一是因为生活标准是身体健康水平的一个重要方面，另外本书也不打算另辟章节对此进行专门讨论。长期以来，学者们都普遍认同，在工业化开始之前，17 世纪日本的经济已经有了史无前例的发展。到 17 世纪早期，其时天下太平，德川幕府建立了稳定的统治全国的政权，经济因此得到持续发展。技术上的创造发明、农业以及人文组织系统，在前一个世纪都已兴起，此时更扩散到全国。新的工程技术的运用，完善了灌溉防洪和土地再开发规划，大幅增加了可耕地面积。地主和耕农之间的新“合同”生效，从而使耕农对他们的土地和庄稼更加自主，同时由于契约仆役和农奴人身自由的逐渐增加，耕农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另外，由于没有战争、大饥荒和政治变动的危机，17 世纪的日本史无前例地投入到了经济发展当中去。⑬

农业的发展使农村人口得以增长，同时也为激增的城市人口

---

⑬ 参考山村耕造，《回归统一：日本经济的发展，1550—1650》，见《德川时代以前的日本》，惠特尼·霍尔，永原庆二与山村耕造编（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1），第 327—372 页；永原庆二与山村耕造，《改变统一的进程：16—17 世纪日本科技的进步》，见《日本研究杂志》14，第 1 期（1988 年冬）：77—109；托马斯·C. 史密斯，《现代日本的农业根源》（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59）；苏珊·B. 韩利与山村耕造，《日本前工业化时代经济与人口的变化，1600—1868》（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7）。

提供了支持。政府对武士的种种控制措施鼓励了城市的发展，到1700年，城市人口已经增加到大约占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⑭这为日本经济的商品化奠定了基础。至17世纪末，都市的富裕使文化以京都和大阪为中心繁荣发展起来。虽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认为日本的经济和人口在18世纪和19世纪是停滞的，但大多数研究德川时代的学者却发现有可靠的证据表明，当时仍在持续发展，尽管速度要缓于17世纪。

如果经济在发展，而且发展速度超过了人口增长，根据前述的定义，那么生活标准就提高了，也即民众的平均收入增加了。18和19世纪尤其属于这种情况。当时幕府指导进行的人口调查显示出，从1721年调查开始至1846年最后一次调查，市民阶层的人口在2600万左右浮动。⑮如果在德川时代的后半期人口并未增长，那么，即使经济发展速度很慢，仍会使生活标准得到提高。我们所掌握的收入和消费方面的资料证实，当时的生活标准确实有所提高。

尽管现存数据在内容、时间和空间上都很有限，放在一起看却有力地证明了实际收入的上升。⑯速水融查看了某些关东农村的"奉公人"也即佣工的薪水，得出结论：从17世纪早期至19世纪早期，薪水的涨幅要大于商品价格的涨幅。⑰佐野阳子发现，在1830年至1894年间，江户的木工薪水有所增长，虽然由于一些意

---

⑭ 政府对武士的控制措施包括参勤交代体制，即大名轮流到东京赴任，且每个大名在地方上只许拥有一座城堡。吉尔伯特·罗兹曼在《清代中国和德川日本的都市网》（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3，第6页）中估计，日本当时有1/10是城市人口，但关山直太郎在《近世日本的人口构造》（东京：吉川弘文馆，1958，第239页）中认为，城市人口占到12%。

⑮ 幕府所撰图表参考关山《近世日本》第137—139页。

⑯ 参考韩利与山村《经济与人口变化》，特别是第4—7章。

⑰ 速水融，《日本经济史一观》（东京：东京经济新报社，1968），第165—166页。

外事件而有诸多波动，比如30年代粮食连年歉收，50年代末安政地震后东京的重建。[18]斋藤修发现，随着商业和制造业的发达，工资水平上升，导致土地的有效租赁下降。[19]这意味着工薪者和耕农等的实际收入增加了，而且有资料表明，这不只发生在最先进的地区比如畿内，也发生在最落后的地区比如北部的东北。生活在德川时代的人们完全注意到了收入的上升。一个今天秋田县地方的村长在1825年写道："村里的每家人无一例外都于农闲时养蚕，所以挣了更多的钱。"[20]

关于消费的现存资料同样证明了我的论断，即整个德川时代的生活标准在提高。日常生活中人们买了什么和用了什么？一些极好的例证来自西日本经济较发达的地区之一——冈山县境内。在16世纪和17世纪初的若干年里，农村居民从逐村叫卖的小贩那里购得他们需要的东西。1655年，县政府禁止了这种买卖，理由是农民们花了太多的钱购买无用之物。然而彻底的禁止被证明是令人不满的，于是叫卖业办起了执照，所卖商品也有规定，1666年只有11种东西可以卖：渔网、鱼干、盐、干海藻、茶、菜籽油、柴禾、木制戽斗、篮筐盖、船桨以及农具。随着需求——无疑也包括公开的违禁——越来越多，又有些新的东西被准许贩卖。到1705年为止，有31种物品已在此列，包括陶器、棉布、菜锅、饭锅、草席、纸、扇子和规尺。[21]

---

[18] 佐野阳子，《东京1830—1894年建筑工作者实际工资的变化》英文系列第4卷（东京：庆应大学产业研究所，1963）。

[19] 斋藤修，《从德川后期至大正前期农业变化的长期趋势》，见《社会经济史学》39，第2期（1973年6月）：170—189。

[20] 托马斯·C. 史密斯，《日本前工业时代农场家庭的双重雇佣》，《经济史期刊》29，第4期（1969年12月）：709。

[21] 安藤精一，《近世农村商业的研究》（东京：吉川弘文馆，1958），第125—128页。

到18世纪中期为止，冈山人民的需求高涨，以至于农村市场发生了巨变。早期的小贩是以城下町为根据地的，而今周边城镇大为发展，不仅可以供给农村的需求，甚至开始牢牢占据了城下町的市场。到18世纪末时，村庄对商品的需求量已经大到可以自开店铺了。1813年，大井村的一个店铺贩卖纸、墨、毛笔、锅、针、烟管、烟草和烟草袋、茶壶、各种容器和盘子、醋、酱油、豆酱、盐、面、海草、酒、点心、茶和茶杯、"煎饼"（米饼）、谷物、油、蜡烛、头油、头绳和发夹、棉布衣物、毛巾、足袋（袜子）、鞋类——包括"草履"、木屐和"草鞋"[22]，丧葬用品以及"其他日常必需品"。村里还有店铺销售各种各样的食品和农需品，比如农具和肥料。[23]

可见，很大一部分民众的生活标准得到了提高，而这又证实了收入分配更加平等。武士越来越难以给属下发放具有竞争力的薪水，商人们抱怨单单有高薪不足以雇到员工，而乡间的大地主们则为无力把佣工留下来给自己种田而发愁，因为对这些佣工来说，还有其他更诱人的选择。山村耕造揭示出，在德川时代，侍奉幕府的武士能够维持一份稳定的实际收入，多是以幕府的各种政令为靠山，但很多侍奉大名的武士则由于地方财政日渐虚弱，大名又"借用"属下的薪金，收入每况愈下。然而，无论是幕府的武士还是大名的武士，他们的实际收入都并未增加，而且，由于很多武士家族都无力满足随从们加薪的要求，他们至少得面对生活质量的下降。到德川时代结束时，很多武士和平民们一样在大名的城堡里当低等下人，而很大一部分低级武士都受雇于乡镇

㉒ 译者注："草履"（草编拖鞋）和"草鞋"（草编凉鞋）都是稻草制成，不同的是草履没有后跟，类似于今天的人字拖，适于休闲穿着，草鞋有后跟，适于长途跋涉。

㉓ 安藤精一，《近世农村商业的研究》（东京：吉川弘文馆，1958），第95页。

企业或类似机构。[24]

在武士——占人口不过百分之七到百分之十——的收入或保持不变或每况愈下的同时，大部分其他日本人则享受到了生活标准的提高。[25]日用品销售的日渐普及以及理论上被称为财富效应的现象共同证实：总产量的增长使绝大多数日本人都有所获益。显然，如果一个农村的大多数村民对商品的需求量并未达到让店铺赚钱的程度，这店铺就不会建起来。对现代亚洲的食品工业的一项重大研究表明，收入中的“触发点”——也就是人均收入的一个飞跃——往往在人们的消费转移到一种新型的商品之前发生。相对于廉价商品如糖果，昂贵耐用品的消费更符合这一特征，但它对基本的食用类商品同样可以成立。[26]

如果日本的经济在整个德川时代都持续发展，人口数量稳定，或者只是从 18 世纪开始有非常缓慢的增长，生活标准得以提高，那么，为什么对日本工业化前夕人均收入的较可靠估计结果竟是如此之低？据南亮进估计，日本在工业化开始时（1886）人均 GNP 只有英国在相应发展阶段（1765—1785）的 60%。[27]据安格斯·麦迪逊估计，1870 年日本的人均 GNP 只有同年英国的 25%、美国的 36%。[28]西川俊作极为批评这种以人均收入来估计 19 世纪日本的做法，甚至对购买力平价学说（PPP）——经济学家对生活

---

[24] 山村耕造，《武士收入和工商企业的研究》（剑桥，麻州：哈佛大学出版社，1974），第 131—133 页。

[25] 武士占人口的比例因地而异，在极少数地方可达四分之一，但一般来说估计是在 7—10%。新见吉治，《下级士族的研究》（东京：丸善，1965），第 63—64 页。

[26] 《经济学家》1993 年 12 月 4 日，第 15 页。

[27] 使用库兹涅茨（Kuznet）方法估计得出。南亮进，《日本经济的发展：一个量化研究》（亨德米尔斯：麦克米伦出版社，1986），第 13 页。

[28] 安格斯·麦迪逊，《日本和 USSR 经济的发展》（伦敦：乔治·艾伦与昂温，1969），前言，第 6 页。

标准进行跨国比较的一种方法——也不以为然。[29]虽然采用 PPP 是凭汇率来估计人均收入的上策，但以 PPP 来推断旧时代却是个严重的错误，因为这种方法是基于 20 世纪的价格和商品的种类比例。即使是用它来看当下的经济，实际人均收入也和估计的有所出入，国际市场上还存在着很多非贸易商品。而且，这种方法也考虑不到一种文化领域内部的文化倾向或趣味变化。

我对上述所有估计方法与结果都持高度怀疑态度。首先，如前所述，直到 19 世纪末以前，日本的经济基本上都是与世隔绝的，这当然说的就是日用品。其次，日本的日用品与西方有很大差异，而且与 20 世纪 60、70 年代也有不同。再次，很多商品和服务都难以查考，因此也无法作为估计因素计入。由是观之，上述那些计算固然有趣，但所得出的结果就远远无法告诉我们民众的生活实情，而如果各自任意以某种方法去估计，最后很可能结论混乱。[30]

以一个佃农在 19 世纪 40 年代的预算为例，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分析这样一个收入和支出的个案，情况也是很复杂的。[31]尽管只是个佃农，此人在德川时代经营着一个很大的机构，而这无疑说明了他为什么会保持着详细的账本。这个农民种的稻米，一部分自己消费，一部分出售，一部分则用作交换。现金收入特指金、银和铜，其相对价值因年份、季度而波动。[32]他预算中的生意花销

㉙ 西川俊作，《日本经济成长史》（东京：东京经济新报社，1985），第 217—221 页。

㉚ 如果一定要对工业化开始时的日本人均 GNP 给出一个估计以和同时代的其他国家相比较，我赞成安场保吉所说：“总之，日本人的生活标准并不一定比工业化之前的英国低太多。”《工业化前日本的生活标准：日本从何等水平出发？一个评论》，《经济史期刊》46，第 1 期（1986 年 3 月），第 224 页。

㉛ 《柳庵杂笔》，引自小野武雄，《江户物价事典》（东京：展望社，1980），第 132—136 页。

㉜ 参考 E. S. 克劳科尔与山村耕造，《德川时代的货币系统：1787—1868》，见《经济发展与文化变动》18，第 4 期（1970 年 7 月），第 1 部分。

和家用开销没有分开记账，因为这两部分被看作是一体的。这位农民的主要庄稼是稻米、大麦和白萝卜。[33]他一公顷稻田大约收成102蒲式耳的米，其中四分之一给地主交租，另外四分之一用来付土地税。他有半公顷旱田，从中收获25000个萝卜，拿去卖了赚的钱，即使是算上肥料和赶集的交通费，仍然数目可观。

如果这位农民把现金收入兑换成金子，大概会有12两，差不多是一个京都木匠收入的一半。这位农民的现金收入中，2两用来买盐、茶和油；1两买柴禾；2两买农具和家具；1.2两买衣服；2两用作社会义务需要，比如节日和葬礼；1.2两雇佣人；1两用作意外的社会义务。只有极少的一部分用来买吃的，因为家里自己种菜，而且这些菜都不载入农产记录。房子不交租金。

由这些资料，我们了解了这位农民生活的大量情况，尽管他的实际收入究竟有多少仍是个未知数。虽然他自己种吃的，却极大地参与了市场经济。他是个佃农，但有足够的现金收入，可以将四分之一用于社会义务，而且他还雇了佣人。由于没有记录显示他是否会拿出一些钱买鱼，又因为他必须花钱买足量的柴禾，意味着他难以到树林中去以别的途径摄取蛋白质，所以这人很有可能以吃蔬菜为主，从豆类和谷物中摄取蛋白质。到1840年为止，他都在买衣服、农具和家具。这哪里是个自给自足的农民！

浏览收支表并不能告诉我们人们过日子的真相。真相，更多地来自物质文化，尽管大多数的物质文化资料都不是量化的。我们可以考察房屋平面图、房屋测量表、日常生活器物、日记、笔记以及各种政府文件。旅行者的信件和笔记可能会非常有用，这是由于他们经常将日常生活的细节记载下来，而当地人就不会如

---

[33] 关于本段和下一段中展示的这位农人的预算资料，参考小野，《江户物价事典》，第132—136页。

此，因为那些都太过平凡，毫无记载价值。和任何史料一样，所有这些记录都须慎用，因为其中会有偏颇、不确，或个人色彩。但这些资料所提供的丰富信息，补充了我们对收入和生活标准的了解，跨国比较也会更到位。

各种史料表明，在德川时代，住房得到了明显的改善，这在第二章会有详述。房子修得更好了，而且从一些分散的资料来看，大多数房子变得更大了。一个重要证据是，更多人家能够铺设地板，而不是只有一地烂泥。到 19 世纪中期，很多村民都有榻榻米（铺地面的灯心草席子），而几乎家家都至少有木地板。造型不规则、构建颇原始的一居室或两居室虽未绝迹，却不再清一色地都是这种房子了。资料显示，人们不仅买得起越来越多的日常消费品，而且无论是村长还是佃农，都存钱修了更好的房子。

从住房的风格、服饰、食品和奢侈品种类，我们看到，德川时代日本的物质文化对资源的利用是高效率的。新式的房型由武士开始兴起，继而被平民效仿，住起来更加健康舒适。同时，他们使用不可再生资源比如巨木的时候也越来越少，而更多地用易于再生的资源，比如地面的灯心草席、以次生林木锯成的木板和木桩。和西方的裙袍相比，他们的服装材料实在是极尽节省之能事，一整块布用下来，绝无浪费之处，而且一件衣服可适于任何人穿着，不需重新剪裁。日本人还食用极其野生的植物和海洋动物，欧洲人难以望其项背。奢侈品并不像西方那么多，但是他们只以几枝花或单个的艺术品来展示。结果，民众有了较高的身体健康水平，但比西方达到同样的身体健康水平所用的资源和所需的收入要少。这些都在第三章有详述。

日本人有较高的身体健康水平，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比较健康。虽然吃肉的人不多，大多数人也不是每天都有鱼吃，但他

们从植物尤其是大豆和谷物中摄取蛋白质。多数人都吃不起多少精米，而他们所吃的米和其他谷物中的营养比作主食的白米所提供的要更多。作为谷物的补充，红薯和各种蔬菜是他们更喜爱的食物，这就和大吃面包、人造黄油的英国工业区工人及其家庭天差地别了。根据已知数据算算他们吃了多少卡路里，结果显示，19 世纪中期日本人的营养水平对于他们的身材来说已经足够了，尽管身高也部分取决于营养。然而，日本人的生活方式之所以健康，也因为比起 19 世纪中期的欧洲或美国，他们更讲卫生。那时，桶浴已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人们习惯饮茶，因此喝的是煮沸过的水，而且他们仔细地将排泄物收集起来作肥料。在城里，供水系统和垃圾处理由政府调控，基本无人乱倒大小便制造污染，因为大小便可以卖给农民赚钱。第四章和第五章将讨论日本人健康、卫生的生活方式。

与已经工业化的英国或正在工业化的美国相比，日本人有多健康？幸而人口统计记录尚存，我们可比较死亡率，否则上述问题恐怕会难有定论。根据人口统计，我们可以认为，工业化前夕日本人的寿命和工业化一个世纪以后的英国人不相上下。这些记录同时也表明，身体健康水平在德川时代得到了提高。这并不是巧合。人们显然是以能保持或提高生活标准的方式来进行家庭建设的。对此的论证见第六章。

我之所以想要探讨工业化之前日本人的生活标准和身体健康水平，主要是为了和工业化过程中和之后的日本人生活，以及 19 世纪的其他工业化国家作比较。第七章和第八章的主题即在于此。第七章讨论的是，尽管舶来品声势浩大，从德川时代末期到明治时代，生活方式和物质文化却依然如故。这期间主要的变化是德川时代种种武士文化的继续普及，其中最重要的例子就是住房。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住房的变化意味着，德川时代的生活

方式为工业化时期因袭传统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且又能吸纳变革。

第八章比较了德川、明治时代的日本和同时代的西方，以及二者各自工业化初期时民众的身体健康水平。这两项比较的结论是，日本人的身体健康水平比我们预想的要高，而与日本相比，西方的大多数民众身体健康水平则比我们预想的要低。如果我们比较日本和其他工业化国家在工业化初期时的物质文化、身体健康水平以及资源利用，就会毫不奇怪为什么日本人能和那些国家一样顺利工业化了。纵观其走过的历史道路，我们对日本“二战”后的生活方式和物质文化一样不会吃惊。此时的日本人取用了西方的种种生活样态，但还保留着传统之道。而日本人今天面临的许多生活方式和物质文化的问题，比如现代下水道系统的缺失和住房的匮乏，都是拜德川时代的传统所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近代的体制太好，现代化成了不必要之物。这些也是第八章要探讨的内容。

生活的物质面貌成为人们行为的背景。我们的环境，自然的也好人造的也好，与日常生活如此密不可分，以至于很少有人去思考它在如何塑造我们的生活方式，影响我们的社会关系，左右我们的时间安排，形成我们的世界观，改变我们的行为。历史的许多决定性因素都从日常生活中产生，当这些因素为历史学家所忽视的时候，他们写的任何东西都将是扭曲的，或至少是片面的。因为，民众如何应对他们的物质环境，决定了战争的结局和将会发展出怎样的经济以及他们是将因饥荒和瘟疫而大批死亡，还是繁荣昌盛，人丁兴旺。更多地了解德川和明治时代物质生活的面貌更能让我们从整体上理解日本的历史。有些历史学家甚至注意到德川幕府时代最后数年的粮食歉收，或是 1855 年那场摧毁了江户至少 14 000 所房子的地震。据我所知，尚未有人分析过传统的

生活方式是如何促进了明治时代的国计民生，或者和日本20世纪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有什么关系。本书的研究并不是要解答日本历史上的那些宏大的问题，只希望能为解答前述问题提供有意义的线索，也藉此来讲述日本人曾经怎样生活，以及他们的传统物质文化和生活方式怎样发展的有趣故事。

第二章　住房和家装

中世纪的房子在欧洲到处可见，有些是石砌而成，更多的是木造的巨型多层公寓楼，一栋栋盘踞在德国等地的城镇之中。在日本，有确切年代的最早的住宅是1607年建的，但除此之外，17、18世纪的仅有寥寥数处尚存于世。①在最可能保留有老住宅的地区，1700年以前的房子也不过只剩下了一两座。一个1600年时已经有1500万至1800万人口的国家，为什么三四个世纪之久的住宅却如此稀少，而更老的则根本绝迹了？

以往的解释是，由于日本植被丰富，建房使用了可再生资源和可伸展材料，例如木头、竹子、茅草，而且在一个易于地震、火灾和遭受潮湿气候之害的国家，要想让房子长存于世是不可能的。甚至有人认为，日本人视住宅如家具，是耐用消费品，而非永久财产。②然而与之矛盾的是，很多木造的寺院建于若干世纪以

① 大河直躬，《民家》，见《近世Ⅱ／近代》，《日本的建筑》卷5，伊藤延男等编（东京：第一法规，1976），第80页。

② 藤森照信，《传统住宅与日本人的生活观》，见《日本回声》17，第4期（1990年冬）：72；《传统住宅再观察》，见《国际交流》，第53期（1990）：第79页。

前，例如修建时间为8世纪早期的法隆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建筑之一，至今保存尚好。真正的原因并不在于日本的气候特征或建筑材料，而是16和17世纪在日本发生的经济、社会和技术变革。

在没有全国范围的统计的情况下，要记录国家和个人财富、经济增长以及生活标准的变化殊非易事，但一个极好的考察途径就是住房。房子是绝大多数人拥有或使用的最昂贵的物品，要改造一个房子，必须花费大量的时间、劳动和资金，并且，住房所蕴含的信息多过德川时代任何其他的物质文化因素。

住房是德川时代财富增长最有力的证明，因而也见证了人民健康水平的提高。17世纪开始，房子修得更耐久，已经可以传给下一代，质量上乘，有的甚至可以住到20世纪末。建筑技术的变革加上财富的增加，让那些并非官僚精英的人也构筑起可长久居住的家。房子越修越好，家装和其他用品便有了讲究，第一就是寝具。人们开始设法保存他们的家产，反映出他们对物质的渴求。

在德川时代最初的一百年里，巨变在日常生活中几乎处处可见。和平，再加上新的农业技术和商业的发展，导致了经济的发达和人口的增加。土地的相对价值上涨，而劳动力则贬值了。③为了要让人口膨胀的耕农承担一些种田的风险，契约佣工变身成了佃农，得到小块的土地耕种。这些人现在可以自由结婚成家。有许多小型住房涌现出来，尤其是在更暖和的日本西部，而且自此以后直到该世纪末，人口增长之快，可谓史无前例。④贸易繁盛，市镇兴起，新的平民群体汇聚在城里，坐拥着他们从未感受过的

③ 山村耕造，《日本和英国前工业时代土地所有的模式》，见《日本：一个比较观察》，阿尔伯特·M. 克雷格编（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1979），第285页。

④ 苏珊·B. 韩利与山村耕造，《日本前工业化时代经济与人口的变化，1600—1868》（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7），第43—45页。

富裕，一个崭新的城市手工业者和商人阶级的文化生长起来。[⑤]

这些新的生活方式大多起源于15和16世纪，部分来自室町幕府精英的物质文化，部分是由于战国时代的纷争以及大名和统一者们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实力造成的技术发明和物资的发展壮大。具讽刺意味的是，战争往往有助于造福人类的事物之产生——拿破仑军队为保存食物所发明的马口铁罐头盒就世所共知——而16世纪的日本也一样会发生这种情况。然而，室町时代精英和战国的大名斗争发展出来的物质文化，仅仅造福了一小撮人，直到德川时代，和平和经济的增长，才使这些文化普及到日本的广大民众中去。经济史学家一直在争论德川时代经济发展的程度、经济增长的速度以及经济发展的总量如何，但研究日本物质文化的学者发现，日本人生活的变革是由于17世纪以来财富的增长。[⑥]由于日本和欧洲在19世纪中期的生活标准并不一样，更由于日本当时尚未工业化，我们往往低估了日本在德川时代的生活水平。

平民的住宅被称为“民家”，它们见证了普通大众的财富水平和生活标准的提高这一重要历史趋势。建造民家的风格和技术都是15和16世纪发展起来的，随着家庭财富的增加，人们买得起建筑材料和工具，也雇得起专业木匠来修更大更优质的居所，这些风格和技术就得到了普及。最早的民家或许在当时很另类，但它

---

⑤ 关于论述这一史实的英语文献，参考托马斯·C. 史密斯，《现代日本的农业根源》（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59）；E. S. 克雷格，约翰·W. 霍尔与托马斯·C. 史密斯的文章，发表于《近代日本制度史研究》，约翰·W. 霍尔与马吕斯·B. 杨森编（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8）；山村耕造，《回归统一：日本经济的发展，1550—1650》，见《德川时代以前的日本》，惠特尼·霍尔、永原庆二与山村耕造编（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1）。最全面的日文资料可参考8卷本《日本经济史》，梅村又次等编（东京：岩波书店，1988—1990）。

⑥ 宫泽智士，《近世民家的地域性特色》，见《建筑》，甘粕健等编，《讲座日本技术的社会史》卷7（东京：日本评论社，1983），第154页；大河，《民家》，第81页。

们是德川时代主流住房风格和以后几百年建筑技术的先驱，能够保存至今，除了本身修得经久耐用以外，更归功于人们的维护有加。

民房建筑最重要的新方法，大概应该是引入使用基石。日本早期的住房是以木柱而不是墙作为支持物。在17世纪以前，都是将木柱直接置于地面，潮湿的气候会由地面腐蚀这些木柱。新发明的方法是将木柱置于基石上，以防止木头直接触地，同时也使房子的框架具有了柔韧性，因为木柱在中等地震之下可能移动但并不会断裂。看上去很自然也很简单的一个步骤，却需要合适和成型的石头，而只有在16世纪修筑大型城堡的技术得到发展以后，这种石头才大量可得。

17世纪民房建筑的另一个发明是采用了更厚实、更优质的材料，在木柱之间放置支架，以及出现敷设了灰泥墙粉或木板的墙壁。越来越多的门是木制的而非竹片或竹编而成，并能整片滑动，而不是上下开合。木地板逐渐比泥土地面更为普遍。⑦简言之，住房越来越坚固，不仅质量更好，也越来越舒适，因为人们坐在了地板上而不是泥地上。这些发明提高了身体健康水平，也体现了生活标准的上升，因为新的或改进了的材料和技术要么造价更贵，要么需要新工具，甚至二者兼具。

17世纪以后所建的房子比以前更对称。一些17或18世纪早期的房子显然是在以前的房子翻修或从原地移走时在旧址上新造的。早前的房子，建的时候是将木柱直接置于地面，而且通常比

---

⑦ 日语文献中有不少对当时建筑新方法的记述，包括伊藤，《日本的建筑》卷4和5；平井圣，《日本住宅的历史》（东京：NHK 书系 209，1986）；白木小三郎，《住家的历史》（东京：创元社，1978）；桑原稔，《住居的历史》（东京：现代工学社，1979）。英语文献参考伊藤郑尔，《日本的传统家庭建筑》（纽约：威瑟希尔/平凡社，1972）；川岛宙次，《民家：乡村日本的传统住家》（东京：讲谈社国际，1986）。

后来的房子要小。令人吃惊的是，由木柱的位置来看，这些早期住宅的造型很不规则。在德川时代的民家产生之前，普遍的情况是柱与柱之间间隔不均，导致房屋的形状参差不齐。而后来的房子各处角度一致，柱与柱之间距离相等，具备了民家和其他传统类型日本房屋的种种特色。⑧

17 世纪的民家显然是先进技术的产物。这些技术在当时风行全国，但其实都发端于战国时代。以前史学家往往忽视了战国时代经济发展后产生的技术进步，而正是这种进步，使 16 世纪的政治经济系统成为可能。⑨为了修城堡、开矿以制造兵器、在河流上建水坝生成灌溉系统以供给其领地，战国的大名们积极支持和鼓励技术上的发明创新。在开矿和琢石上的进步使 16 世纪的地方精英得以修筑石头城堡，而且也使 17 世纪那些并非统治阶级的人们能够用基石建造他们的房屋。交通、雪橇、运输重型货物的平底船以及运载石头的技术都得到了发展，基石因此得到了广泛的使用。

在战国时代木建筑所采用的最重要的新技术当中，有“木割”这种建筑手段，从中国进口的大型锯子（“大锯”或“大锯挽”）和在一块大的木头基座上置一铁刃所制成的刨子（“台刨”）。⑩尽管“木割”法极其复杂，简单来说，就是指主柱的直径即为计算该结构的大部分其他部件的基本值。这种建筑手段要求相当大的运算量、对所用木材的熟悉以及切割和抛光木材的技术。对这些

⑧ 参考宫泽《近世民家的地域性特色》一文中第 167 页所示从京都到神奈川的实例。

⑨ 永原庆二与山口啟二主编的 8 卷本《讲座日本技术的社会史》系列（东京：日本评论社，1983—1985），标志着对日本技术的历史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⑩ 16 和 17 世纪的技术发展在永原庆二与山村耕造的《改变统一的进程：16—17 世纪日本科技的进步》（《日本研究杂志》14，第 1 期［1988 年冬］：77—109）中有所总结。

技术手段的指南产生于15、16世纪，在1608年首次出版[11]，这意味着新技术已经发展到了足以记录成册的程度，也意味着人们需要得到指导，从而使之更易传播开来。一种新型住房随之产生了，而住这种房子的不仅有武士精英层，也有平民。修这种新型住房，需要精确的测量法、平直的木板和木柱。

有资料表明，在16世纪，一些地方修房子时已经大量采用了这些新技术。越前地方（福井县）一乘谷的城下町曾于1573年被信长烧毁。这片地区之后变成了农田，然而在“二战”后此地被发掘出来，人们发现大多数房屋在主柱下面都有基石，柱子都是方形，而且柱与柱的间距都是规则的。没有使用砖瓦，但有大量的金属装置，例如拉门所用的配件，各种型号的钉子、锁、插销以及门掣。幸存下来的室内装饰品都显示出极其精湛的工艺。[12]

但据幕府对其直辖乡村——大多数都位于日本中心部分——住房所作的调查，到1644年，很多房屋的柱子下面都还没有基石。[13]新式房屋建筑总体来说是随着日本经济的日益发展而得到普及的。因此，采用这些新方法修成的民家在畿内出现于17世纪中期，而在中部、关东、中国和四国地方则要到17世纪后半期。从17世纪末期至18世纪早期，民家开始出现在东北和九州地方。[14]由于气候不同，可得到的建筑材料各异以及文化上的差别，各地民家呈现出不同的地域特色。然而，17世纪以来，不同地方的民家在造型上显出惊人的一致，这无疑是由于新工具和木工技术很

---

⑪ 这部专著题为《匠明》，为平内吉政与其子正信所撰。参考永原庆二与山村耕造，《改变统一的进程》，第90—91页。

⑫ 朝仓史遗迹调查研究所，《一乘谷》（福井：朝仓史遗迹调查研究所，1981），特别是第33和47页。

⑬ 大石慎三郎，《近世社会的成立》，见《土地制度史Ⅰ》，北岛正元编，《体系日本史丛书》卷7（东京：山川出版社，1975），第34—35页。

⑭ 宫泽，《近世民家的地域性特色》，第154页。

多都来自于东亚大陆然后普及到全日本，而不是在日本本土产生的。可是，某些建筑史学家一味强调屋顶风格、室内平面图和横梁构架的地域差别，常会忽略或低估全国房屋建设的共同之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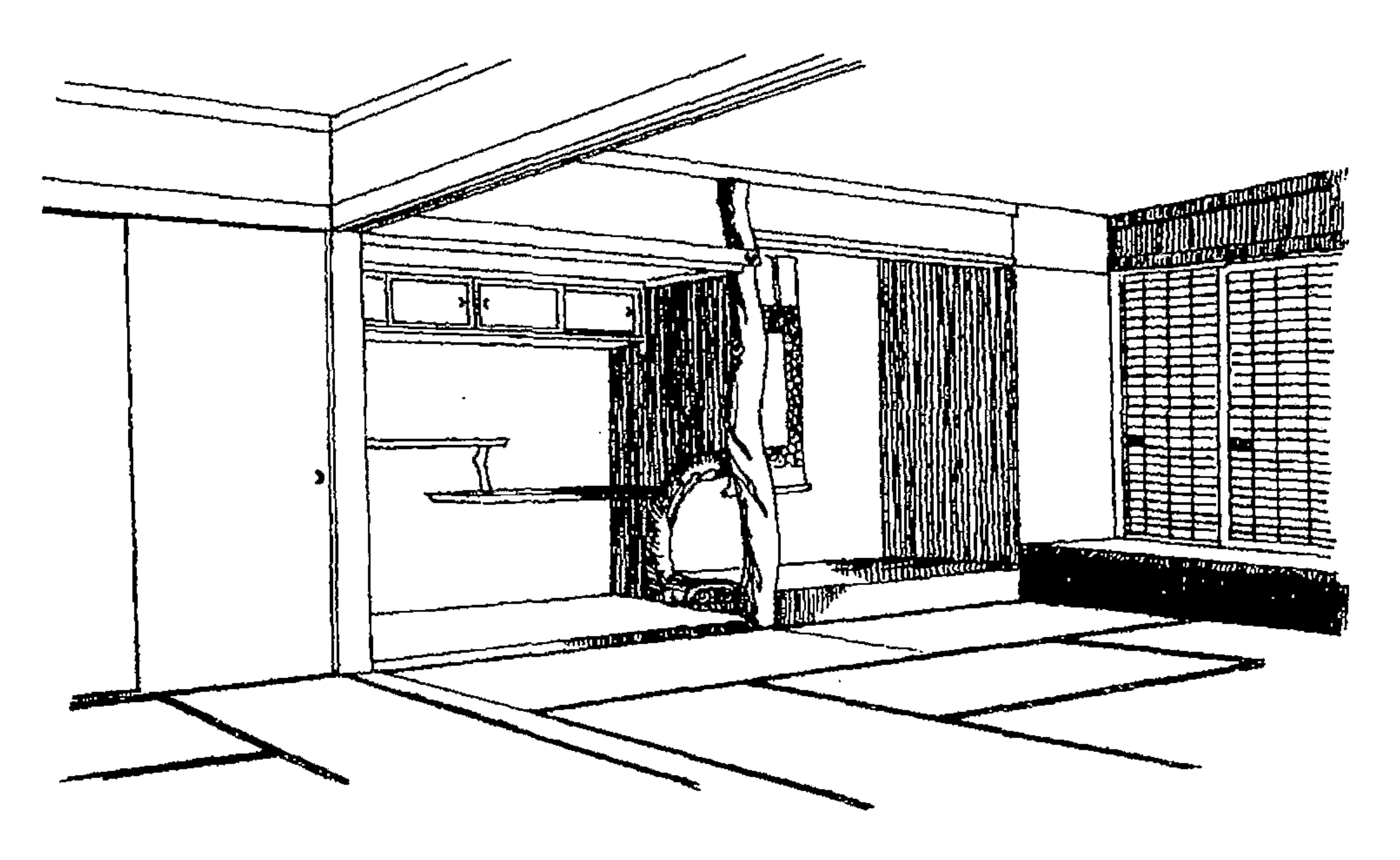
从16世纪末期的室内平面图来看，此时一个房子被分为两大部分：起居间和工作间。即使是在精英的豪宅中，工作间也通常是土铺地面——叫“土间”。⑮起居间最初和工作间同为一室；对于平民的家来说，只有当住房大到足以一分为二时，这两者之间才出现了界线。最穷的穷人住在土铺地面上，用一个低矮的屏风将起居区与工作区隔开，将毯子之类东西盖上草席，置于起居之处，使之坐卧舒适。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铺上了地板，先是用木板或竹编的细条，当他们有钱后，便用起了榻榻米。

在德川时代早期，富有的平民修起了民家，而武士的住宅则按照室町时代末期的“书院”风格所造——虽然这两种风格同样都是16世纪技术发展的产物。书院风格是武士精英和寺院从平安和镰仓时代的宫廷风格发展而来的。⑯除了置有“书院”也即嵌入式案头——书院风格名称的由来，这种建筑还包括了“床间”（陈列艺术品的龛）、“违棚”（装饰用的多排橱架）、玄关（正门）、榻榻米（灯心草席所铺地面）、“襖”（拉门）以及“障子”（拉窗）。庭园是书院风格特色的一部分，因此，通常会有一个“缘侧”（狭窄的木走廊）加上“障子”和“雨户”（可拉动的木制外门），以便天气好时敞开房间面对庭园，而在雨天则可以将室内保护起来。

---

⑮ 在林木茂盛的山村，往往没有“土间”；在白河村，例如大川，几乎没有任何“土间”。《民家》，第85页。

⑯ 参考平井圣，《日本住宅的历史》，英语文献参考桥本澄夫，《书院风格建筑：日本封建宅邸》，H. 马克·翟顿编译（东京：讲谈社国际，1981）；伊藤郑尔，《书院风格建筑的发展》，见《室町时代的日本》，约翰·惠特尼·霍尔与丰田武（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77）。



19 世纪具有书院元素的正厅。

书院风格满足了武士们举行正式会议和拥有接待室的需求，也实现了他们想要更舒适生活的愿望。进入德川时代，书院风格开始盛行于统治阶级的官府和私宅，并在 17 世纪前半期被广泛采用。越来越多的住家开始模仿茶室也即“数寄屋”那种较为休闲的式样，但依然秉承着书院风格，其主要特色保持不变。这种风格的房屋和早期的民家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为了抵挡风雨以及保护居住者不受潜在的野兽滋扰和他人的掠劫，会被严密地围起来。书院的支撑物用得更多的是木板而不是原木，也因而节省了木材。另外，天花板、拉门以及嵌入式装饰元素，都更讲究工艺的精良。书院设计也意味着，一方面有技术的劳动力成为建筑业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对难以替换的自然资源例如古木的需求在减少。

民家比以往百姓的住房更宽敞，德川时代的豪宅同样也比旧时代统治阶级的要阔绰。到 17 世纪时，精英们家中的房间已经全

都接合在一起，因此都在一个室内平面图上，而不是像早期的“寝殿”风格一样，屋与屋之间以走廊相连。建筑上的创新使房子可以修得更宏大，各间屋又能用同一片屋顶，而且我怀疑，发展这种技术的目的在于它能更高效地利用空间和建筑材料，还有可能提高供热的效率。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在 1657 年江户的明历大火之后，⑰大名府邸的重建形式是一个大的书院式房间紧挨着一个小的书院式房间，而不是像以前那样一个接待室加一个书院式的房间，二者各有屋顶。并且，更流行的是将正式的接待室修成一排，而不是以前的双排。⑱所有的武士，无论地位和收入水平如何，都很容易采用并活用这种建筑新风格。这些人如今汇聚在大城市和城下町中，难以按早期的寝殿风格来修自家的房子，因为寝殿风格要求巨大的空间，而只有高高在上的宫廷贵族们才具备这样的条件。⑲

武士以新式“数寄屋”风格来建房，不仅是从全日本现存的老宅中得出的结论，而且 18 世纪中期的津轻藩（青森县境内）对武士住房曾有过勘查，结果完全证明了这一事实。在弘前这个城下町，勘查出共有 1189 座住房，尽管其中只有 797 座具有完备的说明，包括楼层平面图、室内平面图以及各个房间的名称，各个门、厕所、井、栅栏的位置，室内设置何物——障子、榻榻米、种种装饰品，是否内装水槽，以及其他很多细节都被标注出来。在标出了细节的这 797 座住房中，80% 都有“座敷”（最正式的会客室）；66% 有“广间”（会客室）；而且 53% 都有一个玄关。只有 18% 没有任何正式待客的房间，这样的房子肯定属于最低等的

---

⑰ 译者注：明历是后西天皇年号，为 1655—1658 年。大火发生于明历三年正月。
⑱ 平井，《日本住宅的历史》，第 162 页。
⑲ 关于武士住房更详细的研究，参考佐藤巧，《近世武士住宅》（东京：丛文社，1979）。

武士，他们既不需要也没钱招待衣冠楚楚的客人。房子越大，正式的会客室就越多。这很自然，因为在武士中，地位和收入是直接相关的。虽然书院风格在一个世纪之前就已经规范化了，在这个地方上的府城，大多数会客室里可见的装饰物只是一个“床间”。不过在那时，榻榻米很明显已成为这一地区所有武士家中的标准设施。⑳

在现代化之前的市镇，空间小这个难题，使这些主要交通手段靠步行的地方兴起了密集型房屋，住的人既有城市平民也有武士。从中世（译者注：日本约12世纪末至16世纪末的时期）的画卷可以看到，小型店铺和住家在街边鳞次栉比，房舍之间以及街道与房舍之间，都没有多余的空间，㉑这一传统更被延续到了德川时代。因为房子正对主要街道的一面对商家来说至关重要，城市住家的典型式样是：若干建筑为一个街区，商家的店铺狭长地罗列于大道两旁，而劳工和类似人等则租住在小房子中，通常为一居室，房子所在的长形建筑被称为“长屋”，也就是日本式的多户分租廉价公寓。商家的房子无论大小，往往都有个临街的店面用来做生意，家人和佣工就住在店面后方，仓库则在更后面。在京都，土铺地面的厨房区位于一侧的过道上，这条过道被称之“通庭”，直通后面的仓库。但在江户，通常是没有这种过道的。这些建筑的修建方法和设计因素与民家所采用的是一样的，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市民仿效武士建房，也与“数寄屋”愈加趋同了。不同城市的住房有着显著差别，包括居住区域的布局、房子的平

---

⑳ 羽深久夫，《论宝历年间津轻藩弘前城下的武家住宅的外观》，《生活文化史》，第12期（1987）。

㉑ 参考藤岛亥治郎，《日本的建筑》（东京：至文堂，1966），第114页，以及胁田晴子与苏珊·B. 韩利，《发展的规模：15和16世纪日本的城市》，惠特尼·霍尔，永原庆二与山村耕造编，《德川时代以前的日本》。

均面积、榻榻米的标准大小等，但是所有房屋都具有共同的元素。[22]

由此可见，到17世纪末的元禄盛世（1688—1704），明显存在着至少三种住房。首先，随着新工具和技术基本遍及全国各地，在精确的测量下，建筑质量得到大飞跃，平民的民家造得越来越结构精良，适于久居。其次，越来越多的武士以“数寄屋”茶室风格建房，其中的一个典范就是德川幕府早期所修的桂离宫。这一风格显示了一种新的开放而明亮的建筑，到19世纪晚期，这种建筑成为现代日本住房风格的样本。第三，都市的住家变得密集起来。即使是有钱人的豪宅，所有的房间也都是在同一片屋顶下，而不是像早期一样四处摊开。大多数平民的房子都形状狭长，因为临街面租费不菲。而下级武士也住在类似的房子里。为了在很小一块地上建更大的房屋，在得到许可时，人们会造两三层的阁楼，即使不被许可，他们也巧花心思开拓出更多可使用的复式空间。尽管如此，很多日本人仍然住在类似于中世时期的那种简陋的房舍里。然而，由于中世晚期建筑和技术的发展以及17世纪经济的兴盛和生活标准的提高，追求更好的住房质量就成为各阶层家庭的普遍趋势。

巧合的是，也正是在17世纪，日本的乡村住房和我们在欧洲和英国所见到的开始变得截然不同。[23]中世纪英国和日本德川时代

---

[22] 在关于德川时代城镇和城镇住宅结构的数百部专著中，可参考西山卯三总编，观光资源保护财团，《历史性街道事典》（东京：柏书房，1981）；古泉弘，《挖掘江户》（东京：柏书房，1983）；阵内秀信与板仓文雄等编，《阅读东京的街道》（东京：相模书房，1981）；CDI（通信设计所）编，《京都庶民生活史》（东京：鹿岛出版会，1973）。大阪和江户住房的不同，从宫本又次编的《大阪研究》（大阪：清文堂，1967）中所收的宫本又次《从享受角度看大阪和江户》一文可见一斑。要了解江户19世纪中期的住房情景，最好的方式是参观东京的深川江户博物馆。

[23] M·W. 巴利，《英国农家村舍》（伦敦：劳特里吉与基根·保罗，1961），第3—20页。

的房屋都主要为木房，也都分为两个部分——起居和工作区域，在起居区的中央都有一个炉床。烟火飘升到屋顶，都是通过茅草或山墙尖的窟窿排出。由于房子同是为了保护人们不受大自然和野兽的侵袭，并且缺乏玻璃或其他相应的遮蔽窗户之物，都只有很小的窗洞引入光线和空气，因此内部也往往很阴暗。地面通常就是房子最下面的一层土。在日本，也有将起居部分的地面提高几英尺的，而在英国，如果房子地下还挖了牛栏或者仓储间，地面也会高出三英尺。在东西方世界，早期人们都是挖出房子来穴居，因此，一个中世的日本人会相当理解中世纪英国农家的习俗和在房子中央设置炉床的道理。中世纪英国普通人家的房子都很小，最穷的穷人只有一间屋，大多数人也就两间，而且家居设施也很匮乏。这些在同时代的日本人看来也一定是不足为怪的。

尽管日本人的住房日益改善，但我认为，其基本精神的变化是小于西方的。日本人一直坐在地上而不是改去坐椅子，即使在他们买得起木地板甚至是榻榻米以后也依然如此。如果有火炉，也依然是在房子的中央，冒出来的烟也还是循着屋顶的山墙尖排出去。然而在欧洲，一个很大的创新是“火和烟被罩在壁炉和烟囱里，从而能在大堂上面修第二层楼，并分成数间用作卧室”。㉔上述看法都有些过于简单化了，但我们往往强调19和20世纪日本和西方生活方式的差异，而在更久远的年代，当日本和西方尚未来往时各自如何，我们却不去比较。实际上，那时候这两个地方的生活要更加相似。

有一种倾向是将德川时代看作两个半世纪的统一化时代，因为是同一个政府执政，而且17世纪建立起来的社会和经济机构大

㉔ 理查德·L. 布什曼，《美国的优雅：人，房子，城市》（纽约：兰登出版社，1992），第109页。

部分在19世纪仍然保留着。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将德川时代划分为两阶段：17世纪经济、人口的快速发展期和随后一个半世纪的停滞期。然而，从物质文化的角度看来，日本人在德川时代后半期不但没有中止发展，反而变得更为繁荣，尽管发展变化的速度不如前半期那么快。这一观点已经被一些经济史学家以现代经济分析法证实。㉕

两处位于飞驒（今岐阜县境内）的宅第就是17和18世纪之间住房变革的一个例子。野首家的房子是典型的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建筑，给人以封闭之感。窗户很少，除了有些一英尺见方的小洞。房子在当时算是很大了，而且在土地面上置有两个"围炉里"即火炉。卧室和会客室是木地板；没有榻榻米。与之相对，建于1751年的若山家的房子，是让木工在底层铺了一层地板；房子的其余部分则是由村民修起来的。有好几间屋子都铺着榻榻米，其余各间基本上是木地板。即使在民家里面，这家的风格也可谓相当豪华了。房子足有四层楼那么高，可供家人在高处养蚕，房中还有浴桶，并特别辟出一间供着佛塔，比别处高出数英寸。两家人的富裕程度无法相提并论，但显然在这一个半世纪里，建房的风格和质量都发生了变化。㉖

住房在德川时代的后半期持续得到改善。从18世纪的后半期到19世纪的前半期，全国各地的民家都发生了一个显著的飞跃。㉗人们修得起更大的书院风格的房子，便越发无视幕府和许多大名

㉕ 在过去数十年里，很多能证实这一观点的研究都已发表出来。具代表性的是岩波书店的《日本经济史》系列。参考卷1：《经济社会的成立，17—18世纪》，速水融与宫本又郎编（东京：岩波书店，1988）。

㉖ 这两座房屋目前都坐落在岐阜县飞驒的高山民族村，在飞驒高山民族村所编《飞驒的民家》（高山：飞驒高山民族村，1987）第45—46页和第3—8页都分别有说明。

㉗ 大河，《民家》，第81页。

对平民住房的大小、风格和装饰的禁奢令。他们保留着开放式的火炉，或是换成炉台用来做饭而不是取暖。越来越多人家的地板铺了榻榻米，但房内大部分地方仍然不置大件的家具。房子在功能上越来越迥异于欧洲的样式，尽管在外观上，比起一两个世纪前，日本的民家和瑞士、德国以及欧洲其他地区的农家越来越相似，但就功能而言它们在更早期实际上更为接近。[28]

房子确实是越来越大了，并且，尽管我们的资料来源比较分散，从已知的楼层平面图可以看出，房间数越来越多，总的楼层空间也越来越宽敞了。到德川时代晚期，住房的平均面积已比17世纪要大，虽然这并不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从很多方面来说，尾张（爱知县）的小菅谷村在17和18世纪的发展情况是一个典型例子。[29]在这个地方，从1646年到1684年，住房的数量从56所增加到60所，同时房子的平均大小从7坪增加到8.3坪。[30]但在1684年到1734年间，住房的平均大小降至7.4坪，而村中住房数量升至70所。分析了其中5年的数据，我发现唯有1734年，一个家庭的平均人口是超过了5人的。看起来该年的生活标准并不像是有所下降，毋宁说由于居民削减了仆人或佣工数，或房子总体上又变挤了，家眷越来越多，导致仆佣们都变成了佃户并自立家门。这一趋势造成了住房数增加，出生率上升，人丁也前所未有地兴旺。整个德川时代，只有这一段时间出现了这种兴旺。

小菅谷只是一个很小很孤立的例子，但它显示出，住房的大

㉘ 布鲁诺·陶特，《日本的住房和民众》（伦敦：约翰·吉福德，1937），第105—107页。

㉙ 速水融，《近世知多地方的住宅和家族形态》（发表于第52届社会经济史学会年会的论文，1983），第7—9页。

㉚ 1坪等于3.954平方码。一张榻榻米大约是长2码宽1码，具体大小因地域不同而略有出入，所以，1坪就相当于两张榻榻米大小。（1码=0.9144米，1平方码=0.8361平方米。——译注）

小因经济地位之不同而有所差别，而且按照现代的标准来看，房子平均都很小。另一个可以证明17世纪房子都很小的是对建房大小的若干限定。1656年，在武藏野（邻近江户）一个新开垦出来的地区，管理该地的长官就新移民所能建房的类型颁布了特令。住房的合法面积视家庭成员多少而定。一对夫妇的房子只限于7坪，而一个有4到5口人的家庭则可以有11坪。㉛

从我们所掌握的19世纪的住房资料看来，要下结论还为时尚早，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那时的住宅，不仅房间数增多，房子越来越宽敞，而且每个家庭的人口减少了。在冈山，平均每户的人数从18世纪早期的7口降至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5口。人口下降的最主要原因在于人均所生育的子女数量有所减少，低至3或4人。㉜然而，由于每个家庭在其生活周期里人口都会变化，除了房子刚修好的那一年可以按照人口数规定房子的大小，在其他时期则根本不可能如此，而且这种规定实际上好像也并未实施过。

幕府发布了若干住房规定，迫使平民把房子修得风格简单，并且符合他们自身的地位。和幕府一般性的住房禁令相反，各地大名的规定则具体许多，虽然由于地方不同，其内容也各异。在会津地区（福岛县），住家的大小（按跨度测量）由这家人的田产量来决定。在越后的村上地区（新泻县），1740年颁布了一条规定，禁止农民给自家的房子添造厢房。虽然农民需要一个大的“土间”用来干农活，政府认为他们并没必要拥有“座敷”这种正式会客室，因此，除了村长，通常任何人都不得在家设立“座敷”

㉛ 木村礎，《农民生活的诸相》，见《生活史》2，森末义彰、宝月圭吾、木村礎编，《体系日本史丛书》卷16（东京：山川出版社，1969），第207—208页。

㉜ 苏珊·B. 韩利，《德川时代四个村庄的家庭和出生率》，见《东亚史中的家庭和人口》，苏珊·B. 韩利与阿瑟·P. 沃尔夫编（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5）。

间。为避开这条禁令，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修一座房子，从街上看过去仿佛是个干农活的作坊，内里却以“数寄屋”或改良的武士住宅风格弄一个会客室。[33]

事实证明，平民们非常擅长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通常，支撑房顶的主柱之间的距离要受房主的身份地位限制，[34]但农民还是可以把房子造得很大，他们的手段，是将严格意义上属于屋顶悬挑部分之下的空间也纳入室内。由于大多数房子的屋顶都很高，这样就可以新开辟一整间屋出来，同时又使房子的大小仍然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城市里规定住房不得高于一个半楼层，但居民们想出对策，他们修的房子，从前面看是一层半，但房顶自临街面大幅度向斜上方倾斜，这样，房子中后部的二楼就变成了一整层。在金泽市内、中山道上的木曾奈良井、整个京都地区等无数城镇里，仍然可以见到这种风格的住房。[35]大众如此轻视法规，当权者肯定是注意到了的，但即使在尚存于世的德川时代的老宅中，还有如此多的房子和当初建造者的社会地位不相符合，这个事实说明，在商业发展和收入上升的大环境下，官府除了镇压最严重的暴力犯罪，对这些事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

关于德川时代最后两个世纪住房变化的资料中，有一份幕府对栃木县住房所作的调查报告，内容极为详细。幕府将军要到日

---

[33] 白木小三郎，《日本的民家：其形成和传承》（由作者私人出版于1984年），第4—5页。

[34] 用身份地位来作限制的动机不一，上可藉此保护贫乏的资源如深山老林，下可维持阶级间的差别，并且，让下层人民专注于生产而不是消费，会尽可能多地增加税收。

[35] 金泽市的例子，参考金泽市教育委员会编，《旧东之廓》（金泽：金泽市教育委员会，1975），特别是第86和90页；丰田武，《金泽图屏风》（东京：文一总合出版，1977），特别是第84和143页；以及金泽教育委员会编，《金泽的历史性建筑，金泽市文化财纪要》，第57期（1986）：51—54。木曾奈良井的例子，参考奈良井国立文化财研究所，《木曾奈良井：街道调查报告》（长野：长野县木曾郡楢川村，1976）。

光去一趟，随从的大队人马必须沿路找房子住宿，为了确定哪个村子最适合安置将军的这些随从们，当局对各村的住房进行了调查。调查范围内有 13 个村庄，除了有两个村靠近今市外，大多数在宇都宫附近。调查包括了房子的实际楼层平面图，并对其大小、房间的功能以及地板状况都一一作了记录。[36]

栃木县的资料清楚地表明，仅凭建筑学家等人描述的住房变革模式，或者那些最终成了住宅博物馆的样板房，又或者个别村庄的若干房子，就贸然对历史下结论，是非常危险的。幕府的调查告诉我们，要以这 13 个村庄的个案来推断各地住房有什么流行趋势，并不完全可靠。一个叫田中的村子的居民在 1823 年拥有一居室住房的百分比，较一个世纪前的 1712 年三分之二多的村子都要高。在 1823 年的野泽村，有的人家仍然是两栋独立的房子——工作区域和厨房位于不同的屋顶之下，虽然这绝对比不上我们在 18 世纪早期的三个调查实例中看到的那样盛行。在整个西日本和本州临太平洋一侧沿岸，将住宅建成两座独立的房子一度颇为常见，但最终，这种风格还是只保留在了这个国家的最边远地区。[37]

然而，考察栃木县在这两个世纪里住房的发展后，我们仍然可以总结出某些大致方向来。首先，从总体上来说，住房面积是在与时俱增。在最早的那三个调查实例中，每个村都有一居室或者二居室的房子。有 12% 到 47% 的住房是属于这两种情况。然而，后来只有 1823 年的田中村还有一居室的房子，而该年已有三个村子不复存在着一居室、二居室甚至三居室；所有的人家都是三居室再加一个“土间”。在这些村里，住房的平均大小是 20 坪，比 17 世纪的要大，虽然按照一般标准来看还是比较小。如果栃木县

---

[36] 栃木县教育委员会事务局文化课，《栃木县的民家》（栃木县教育委员会，1982）。

[37] 川岛宙次，《民家：乡村日本的传统住家》，第 165—166 页。

人口发展的趋势和日本大部分地方一样的话，那么，在家庭越来越小的同时，房子是越来越大了。

另一个趋势是，越来越多的人家只有一个房顶而不是两个。在18世纪早期对栃木县的调查中，更大一些的住家都有两个房顶，“土间”通常就占了一个。调查中没有哪户人家是四间屋共有一个房顶的。然而在1750年以后，只有1823年的野泽村有些住房是将“土间”另置于一个房顶之下。日本寒冷多雪的地区，房子往往更大，起居处和粮仓通常共用一个房顶，或者两处的房顶是连接在一起的，而西日本温暖地带的房子直到德川时代后期，工作间和厨房才和其他部分分隔开来。日本中部住房的变化是：低收入阶层的一居室或二居室小房子和有钱人的双房顶豪宅，都比旧时更为扩大，同时所有的房间共有一个房顶。随着乡间的生活标准得到改善，四居室（有四个大小相同的方形房间）旁带一个“土间”的房子遍及全国各地。[38]

虽然大多数平民的住房按现代的标准来看都比较小，较之同时代英国农民和城市工人的房子，或者美国17世纪殖民者的家和18、19世纪的小木屋，几乎没有理由认为日本人的房子更小。北美拓荒者们的居所是典型的一居室木屋，最多也就是加了一层阁楼的二居室。在英国，18世纪的务农者住在一居室的农舍中，有些附带着披屋。到19世纪，很多英国工人可以指望住上半独立的房子，其中两间屋为一楼，另两间为二楼。一个园丁的理想住宅是有两个房间，长22英尺宽9.75英尺，但在19世纪中期，很多低收入民众仍然只有一间屋可住，屋内的地面还是泥土。[39]

德川时代的日本人不仅建造了比以往更昂贵和耐用的房子，

---

[38] 大河直躬，《民家》，第101页。

[39] 约翰·伍德福德，《房舍的真相》（伦敦：劳特里吉与基根·保罗，1969），第15、35页。

而且从健康的角度来看，生活质量也更高了。地板铺设状况是最能显示生活质量变化的标志之一。一些量化研究再次提供了有力证明。有一份幕府在备中地方进行的一项详细调查，目的是为了确定当地的住房是否适于士兵居住。在86个调查对象中，有33个合格。那些被视为不宜士兵居住的房子都未设榻榻米，仅有草席铺在地上，并且毫无疑问，绝大多数不合格房都太小了。到幕末时期，此地每户有田且年产量为2石（10蒲式耳）以上粮食的人家，家中都是榻榻米；有些农户没那么多田，也铺了榻榻米；但一分田也没有的，则没铺榻榻米。因此，除了最低收入者，一般人家中都铺有6张以上的榻榻米，而且，显然这已经成为农家的标准地板。㊵

从生活标准的角度来看，意义深远的是，越来越多的人买得起较贵的新房子。这类房子不仅材料造价更加不菲，而且对木工手艺的要求也远甚于仅供遮蔽风雨的陋室。德川时代的平民不但把房子造得更加舒适牢固，而且还追逐着武士精英的风格。京都1729年的一份文件中记载，30年前，老百姓家里的地面是土铺的，人就坐卧于铺开的草席之上，然而如今，他们不仅用上了木地板，而且仿效武士装了天花板和榻榻米。㊶最高当权者和儒学家之流抱怨平民模仿他们这些上等人是东施效颦——在家中设置“拉门、天花板、唐纸障子㊷、榻榻米席子和蚊帐”。㊸自德川时代中期以来，日本

㊵ 藤泽晋，《论幕末期农村不同阶层住宅构造》，见《冈山大学教育学部研究收录》第21期（1966）。

㊶ 宫本常一，《民众生活样式的变迁》，见《岩波讲座日本历史》第23卷，家永三郎等编（东京：岩波书店，1972），第127页。

㊷ 译者注：“唐纸”原指从中国进口的制品，后也包括日本本土的仿制品，色泽晦暗质地厚重，用这种纸制成的障子（拉窗），称为唐纸障子。

㊸ J. R. 麦克伊万，《荻生徂徕的政论著述》（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62），第44页。1788年，幕府高官松平定信颁布了一项法令，禁止忘记本分的农民生活奢侈。儿玉幸多，《近世农民生活史》（东京：吉川弘文馆，1957），第185页。

各地颁行了数不清的禁造武士风格住房的法令，这正印证了一个事实，即很多平民修的房子都超过了他们的实际身份地位。

德川时代的平民和武士们变本加厉大造又新又贵的住房的同时，也大肆购买起各种消费品来。由于19世纪的日本并不像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那样时兴将家具摆满四壁，而且日本传统室内装潢讲究的是嵌入式装饰和家具的极简化，所以我们大可不必追问19世纪的传统日本住宅里到底有多少东西，正如我们也根本不用去想像，17、18世纪的西方住宅里到底没有什么东西。㊹

德川时代商品的繁盛并非仅仅由富人独享，千家万户寻常老百姓也受益不少。人们储存手段的发展便能证明这一点：放置衣物的"箪笥"（柜子）、放置各种杂货的仓库，以及"押入"（放置床上用品的嵌入式收纳橱）。到19世纪末，用来储存各种家居用品的容器为人们所需求，而且这些容器事实上已成了除收入最低者以外家家户户都很常见的东西。这一现象表明，日本民众拥有的物品数量普遍增加并需要贮藏起来了。对物品的需求和贮藏越来越见多，很好地见证了个人健康和生活标准的提高，因此，我要在下面细细道来。

"箪笥"在接近17世纪末的时候兴起，18世纪得到普及。㊺它的发展恰好和经济繁荣的第一次高峰同步，这也显示出，越来越多的人拥有的衣服多得一时穿不完，用不上的杯盘碗筷都闲置起来，还有无数的小东西，比如文具、商务用纸、缝纫器材、化妆品等等。此外也有用储物箱的。用箱子说明人们时常将东西四处

㊹ 例如，对17和18世纪康涅狄格州的威瑟斯菲尔德地方的遗产清单所作的一项调查显示出，家具明显有所增加。在17世纪40年代，平均每户人家拥有的椅子数不到一把，但到了18世纪90年代，增加到将近16把。凯文·M. 斯威尼，《康涅狄格威瑟斯菲尔德1639—1800年间的家具和家庭环境》，见《康涅狄格文物研究》第36期（1984），第10—39页。

㊺ 小泉和子，《家具与室内意匠的文化史》（东京：法政大学出版局，1979）。

携带，而且箱子也适合于坐船之类。并不是说在这之前没有储物的容器存在——一种叫“柜”的橱柜已被使用了数个世纪——但是巨型并装有轮子的或是设计成可置于楼梯之下的大“箪笥”则显示了农民和市民们财富的新水平。事实上，人们要储存的东西真是太多了，以至于生出了五花八门、名目繁多的收纳柜：书箪笥、茶箪笥、随手箪笥、服装箪笥、药箪笥、账箪笥、“押入”式衣物箪笥等等。[46]最常见的有一种巨大的装有四个轮子的柜子，叫做“耐久车”，放在房子正门旁边，这样如果有严重火灾，便可以将贵重的东西用轮子推出去。1657年的明历大火在江户烧了三天三夜，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一名职员扎查利亚·瓦伽纳尔目睹了这场火灾。他看到许多人试图推着这些有轮子的巨箱逃难，以至于街道堵塞，为了逃出大火，最后瓦伽纳尔和他的同事们不得不爬箱子上房顶。[47]

平民们拥有了太多的商品以后，箱柜已经不够用了，便修起了仓库。在一些城市里，火灾常常会毁掉整个城区，这种仓库尤为必要。一个建造精良的仓库经得住大火，可保护家中贵重物品不受破坏。仓库并不是什么新事物，正仓院大概是最有名的一个，而在奈良时代，单单骏河地方据记载就已有208座仓库。到了16世纪，不但有钱人家都有仓库，很多不那么有钱的民众也有。这些仓库不仅被寺院和当铺、批发商之类生意人用来保存档案，也是平常人家放置时令装饰用品的地方。伊藤认为，正因为仓库的兴起，有日本特色的住房才得以形成：在房中，装潢几近于无，家具和其他家装用品在需要时才摆设出来，这就使居住者可以随

---

[46] 这些分别是：文具柜、茶道用具柜、士家女眷装小东西的小柜、装衣服的柜群、药柜、账目柜，以及壁橱里的衣物柜。

[47] 泰·海尼根和清子·海尼根，《箪笥：日本传统细木家具》（纽约：威瑟希尔，1981），第21—23页。

心所欲地变换各个房间的功能。[48]显然，在这种生活方式中，必定设有一处地方，可以把不用的东西收藏起来。

大量史料间接证实，在德川时代尤其是 17 世纪，仓库的数量有所增加。1500 年时，泥水匠尚且是最低贱的工种之一，但随着他们在修筑城堡的工程中担当起重要角色，继而又在德川时代成为仓库建设不可或缺的一员，他们的地位得到了提升。在江户，大约到 1730 年时，泥水匠造出了新型的仓库，防火能力较之以前大大加强，他们的工钱也变成了木工的三倍。16 世纪中期，在江户河渠两岸存货是一个严重问题，政府因此鼓励大家修建仓库，对该类施工全面解禁。这些仓库避免了将木材和其他货物露天放置以引起火灾，而一排仓库本身就具有防火的功能。

仓库不仅在 17 世纪江户重大火灾的记述中被频频提及，而且在那之后，为了防火，人们更是大造特造。有一种观念是，不管怎么样，城市建筑总归会被焚毁；我们也许应该正视这一现实，房子不用修那么坚固，把家里的钱和值钱的东西放在一个好仓库里，或者放在郊外用以火灾之后重建家园的木材堆栈当中。建仓库并不仅仅是为了存储闲置商品货物，在德川时代，这也是一种重要的地位象征。正如井原西鹤所描述的：“第一，要有米数袋；第二，要有两层楼的住宅；第三，要有三层楼的仓库。”[49]

传统的日本住宅通常没有装备西方那种储物橱。但西方人睡的是床，并且床上用品常年就铺在床上，而日本人睡的是地板。如今，人们白天把被褥收在壁橱里，可是在引进这类柜子作家装之前，他们是怎么做的呢？答案也许是：那时他们几乎没什么需要存放的床上用品。人们睡觉时，将衣物铺开盖在身上，而白天

---

[48] 伊藤郑尔，《仓：日本仓库的设计和传统》删节版（西雅图：马德罗纳出版社，1980），第 16、27、76、82、75 和 38 页。

[49] 同上书，第 38 页。

他们就穿着这些“睡袍”。当平民开始分隔他们的房子时，那个离门最远且不靠窗的角落，就被他们用作储物间兼卧室，常被称为“纳户”。在我们这些现代人听起来很怪——而且觉得冷——的是，直到德川时代开始很长一段时间以后，大多数人才穿起那种我们概念中的睡衣睡觉。“纳户”的地板是木制的，三面环墙，在第四面的门口则有一道很高的槛。它往往是房中最小的一间。夜里，大家都挤在这样一个地方，众人的体温可让人好受许多。为求暖和舒适，人们将稻草和田野里其他的残穗——在有的地方是海草——铺在木板上，而当天气实在太冷时，1835 年富山—新泻一带的民众就会在炉火边和衣而睡，或是睡进稻草袋，一对夫妇睡一个袋子。[50]

17 世纪，当棉布被广泛使用以后，涌现出越来越多床上用品之类的东西。[51]有钱人家接触到真正的床上用品后，一个新的需求产生了：他们要在白天有一个地方可以放置这些东西。早期的很多床上用品都是为客人和重要人物准备的，因为这些人不可能和家人一起挤在“纳户”里睡觉，而客厅或者说起居室日间是要作各种他用的。[52]要把被褥放到仓库里去，并不是个现实的办法，因此就需要在家中辟出一个储存空间来。这样，在德川时代的后半期，有钱人家逐渐有了壁橱。最初的壁橱是嵌入“纳户”或者说卧室墙里的柜子；后来在修房子的时候，就将其纳入了平面设计中。通常壁橱大小相当于一张榻榻米草席的面积，中间有个架子将其一分为二，并以拉门开关，这就是说拉开一扇

---

[50] 小川光阳，《寝所与寝具》（东京：雄山阁，1973），第 170—171 页。

[51] “夜着”（睡衣）和“蒲团”（被子）直到 17 世纪上半期才成为众所周知的词。

[52] 西方人的传统是将床放在客厅和起居室里，然而日本人的传统里床是不存在的，而且在他们的铺着榻榻米的小房子里安床也并不现实。床被引进现代日本居室，只是在他们开始建造西洋式房间以后。

拉门，很难说是有个橱柜还是另一间屋存在其后。尽管这种“押入”壁橱是所谓传统住宅的一部分，实际上它出现的时期较晚，只是在日本人有了厚实的被褥和其他需要存放的东西以后才问世的。

如果哪位经济史学家为了精确地估计17世纪早期至19世纪中期的变化而去看量化数据，那么他对上述史料定会极为不满。但从整体来看，尽管这些史料多琐碎不经，却证实了我的假设：历经德川时代，日本人的个体健康水平得到了提高，生活标准也随之上升。而这更证实日本的经济不仅在17世纪，而且在18和19世纪都得到了发展。

令人吃惊的是，研究日本建筑和家装的专家都相信，他们所观察到的德川时代的住房变化确是源自于经济的增长和与之相应的个人健康水平的提高。这些专家并未接触过经济史学，关于德川时代经济是否发展、如何发展这类问题，也不在他们的研究范围之内。例如，宫泽智士认为，民家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出现，是由于农村生产力的提高，农业技术的传播和日本家族系统——“家”的形成，使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改变。在日本各地，民家的发展都是紧随着当地经济的进步而发生的，也正因为如此，最早的民家出现在京都和大阪附近的最先进地区。[53]

大河直躬发现，从16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这三百年里，民家的面积和建筑手段都有显著的发展，而这些发展是“以财富的积累和大众生活的改善为背景的”。[54]白木小三郎认为，德川时代中期以来，大阪一带发达地区形成了新的生活环境，最主要的原因是经济的飞升超越了以物易物和封建这两种机制，因此富商对

---

[53] 宫泽智士，《近世民家的地域性特色》，第154页。
[54] 大河直躬，《民家》，第81页。

修建茶室风格房屋的禁令嗤之以鼻。按照他的说法，我们必须从平民经济实力的角度去看民家。[55]小泉和子，一位日本家具和家装的专家，发现了如下规律：

“在日本历史上，一个时代的特权阶级所拥有的任何东西，都会在下一个时代被较低的阶级所追寻并最终获得……到18世纪末……城市商人们享受到了他们在昔日闻所未闻的幸福生活……婚礼家居的讲究甚至已经流传到平常百姓家，尤其是在西日本……这些家居品如今不再是上流社会大婚的炫耀物，而是为满足婚后一辈子的日常需要。典型的物件包括柜子、箱子、篮子、镜子和镜架、衣架、化妆盒和针线盒。”[56]

简言之，在德川时代，天平开始倾斜，本来武士和其他少数人的收入和财富凌驾于一般老百姓之上，现在贫富则较为均匀，大都市平民和乡间的大地主富裕程度和很多武士比起来已不相上下，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57]虽然以几乎所有的标准来看，很多日本人在德川时代末期还只能说是穷人，但物质文化的发展，即使只是泛泛观之，已经可以证明：不仅整个日本都致富了，而且富起来的越来越多是平民。从消费方面看，住房的面积、材料、工艺和装修都显示出质量的提高，也就是说，由于人们有更多的钱讲究家居，生活标准上升了。

住房和装修的实例表明，日本人修房子日益注重装潢，房子质量因而更为提升，不但如此，住房的改善也使大众普遍生活得更健康。地面抬升让人远离湿冷的泥土，还可令地板下的空气流通。地面所铺的竹片和木板之间都有空隙，这在夏季气候闷热的

---

[55] 白木小三郎，《住家的历史》，第9—10页。

[56] 小泉和子，《传统日本家具》（东京：讲谈社国际，1986），第164、172、173页。

[57] 山村耕造，《武士收入和工商企业的研究》（剑桥，麻州：哈佛大学出版社，1974），第120—133页。

西日本，会使房中更为凉爽舒适。建筑新技术让房子在冬天充满阳光，并且常年都有新鲜空气，在较温暖潮湿的地区尤其受到青睐。封闭型的房屋除了大门以外只有少数几个窗口，与之相比，由书院式改造出来的家居风格，则用拉门代替了不可移动的墙壁。正如莫尔斯指出的："房子的一整面都沐浴在阳光和空气之中了。"[58]

高高的地板、开放的新式房屋并不是人人都可以有的。书院风格的拉窗、走廊、拉门这些莫尔斯形容的开阔通风的屋子所需要的条件，只有富裕人家才消费得起。然而，17 世纪早期，泥地尚且是日本的普遍现象，到了 19 世纪，则不再如此了。在幕末时期备中地区（冈山郡）的西川村，所有人家都铺了地板，虽然耕地拥有量最少的农户仍然买不起榻榻米。[59]收入较低的家庭，房顶陡然倾斜，没有屋檐，四壁自然是泥敷而成，也没有开放式的后门。这样的房子空气流通和日照都很差，因为没有后门就意味着整间屋是封闭式的。收入越高的家族，后门越大，房间越多，环境也越健康。1712 年至 1842 年间枥木县 13 个村庄的例子也说明，随着住房的日益扩大，房中不仅遍铺地板，榻榻米也越来越多，而且事实上所有的家庭都有四个以上的房间。19 世纪 70 年代爱德华·莫尔斯访问日本时，称在所有中产阶级——即富裕程度处于中等者——家里，除了厨房和浴室，每个房间都有榻榻米。

床上用品的改进尤其标志着身体健康水平上升了。这意味着人们在冬天可以睡暖和觉，生了病的人能得到更好的照顾，也不

---

[58] 爱德华·S. 莫尔斯，《日本人的家和环境》（1886；再印刷，路特兰，佛蒙特：查尔斯·E. 塔特尔，1972），第 7 页。其他人也有类似说法，包括亨利·T. 芬克，《莲：日本的时间》（纽约：查尔斯·斯奎伯纳子弟出版社，1904），第 45 页。

[59] 藤泽晋，《论幕末期农村不同阶层住宅构造》，第 37—55 页。

需和大家抱作一团来取暖，从而避免了疾病的传播。被褥不但增加了生活的舒适度，也必然延长了人们的寿命。

正如栃木县等地的例子所示，并不是每个人的生活标准和身体健康水平都会提高，但在比较17世纪和19世纪中期的住房和家装之后我们看出，人们普遍更加富有，物质文化也更为健康了。

第三章　资源有效型文化

19 世纪日本初开国门，很快来了些西方人。他们发现这里的生活方式和本国很不一样。有些人，比如爱德华·莫尔斯，为之倾倒；另一些人则深感不适。19 世纪 80 年代到过奈良的休·威尔金森发现，他所住的旅馆“只是一个单薄的木头架子，装着极薄的木板做成的拉门，纸糊的墙……房子的装修实在微乎其微，和我们概念中的舒适，也相差甚远，没有满屋的桌椅、床、盥洗台、五斗橱、水槽、或是穿衣镜”。[①]莫尔斯评道：“美国人肯定会觉得很难将这种建筑称为家，因为如此多的家居条件都不存在——没有他们熟悉的门窗；没有阁楼和地窖；没有烟囱，而且屋里没有壁炉，当然也没有常见的壁炉架；没有常年封闭的房间；至于家具，则没有床和桌椅板凳——至少乍一看是如此。”[②]

---

① 休·威尔金森，《阳光明媚的土地和大海：“锡兰”号旅行见闻》（伦敦：J. 莫雷，1883），转引自休·科塔齐，《维多利亚女王时代人物在日本》（伦敦：阿斯隆出版社，1987），第 249 页。

② 爱德华·S. 莫尔斯，《日本人的家和环境》（1886；再印刷，路特兰，佛蒙特：查尔斯·E. 塔特尔，1972），第 7 页。

食品也令西方人为之蹙眉。幕府将军给额尔金伯爵（Lord Elgin）的遣日特使的赐宴，在俄理苑（Laurence Oliphant）眼里，不过“是些泡菜”。俄理苑尝遍了送来的所有食物，最后“奉劝今后的任何访日人士，对本人吃过的这些东西，务必敬而远之”。③还有些记载以或调侃或抱怨的口吻反映了洋人遇到的诸如沐浴、睡觉、鞋履等各种生活问题。日本人也深刻意识到了他们和西方的生活是多么不同，以及洋人们在这里感受到的麻烦。井上十吉1910年写道：“我们的房间在西方人看起来空空如也，对那些常住欧洲公寓楼的人来说，也很不舒服；然而以日本人的观点来看，所谓的欧式风格那种大肆装修的房间里，家具泛滥，带着太多的古玩店或博物馆色彩，反倒不妥。”④

两种迥异的传统各有不同的物质文化，在19世纪后半期，二者之间的决裂可谓空前绝后，一场激烈的文化碰撞发生了。西欧和美国人正在进行工业革命，由于可以生产便宜的商品以满足大众市场，家装风尚应运而生，居室中充斥着家具、艺术品及其他装饰，以至于绝无半点空白之处。衣裳都是精工细做，女人的一袭裙子要数尺布帛，食物则以肉类为核心，淀粉、根类蔬菜和奶制品比重很大，至少在英美是如此。

同时代的日本，由于将别国的影响“锁”在了门外，情形就大不一样了。日常生活不但没有西化，反而彻底地本土风格化，甚至那些原本在数百年前来自中国的东西也不例外。⑤当日本人沿

---

③ 俄理苑，《1857、1858、1859年额尔金卿中国、日本出使记》（爱丁堡：W. 布莱克·伍德，1860），转引自休·科塔齐，《维多利亚女王时代人物在日本》，第254页。

④ 井上十吉，《东京家居生活》（1910；再印刷，伦敦：KPI有限公司，1985），第41—42页。

⑤ 若干学者对此已有所论述。例如，龙村谦，《日本的和服》（中公新书120）（东京：中央公论社，1966），第77页；加藤英俊，《再论锁国时代的意义》，《日本研究杂志》7，第1号（1981年冬），第85—109页。

着有自己特色的全盘锁国之路愈行愈远时，西方则以工业生产的日用品取代了旧时代的手工业产品。由于西方的物质文化在技术上更为先进，日本人和西方人便都心照不宣地以之为标准来衡量19世纪的日本文化。又由于日本的物质文化与西方是如此不同，而它所遵循的原则在很多地方又都与西方背道而驰，于是就被看成是有缺陷的文化，甚至那些对日本青眼有加的西方人也如此认为。

然而，如果我们从西方技术之外的角度来看日本的物质文化，就会发现它并不是那么差。和今天一样，在19世纪也有很多西方人赞美日本住宅的艺术气质，虽然他们对席地而坐感到别扭。他们可能很欣赏筵席的精美，即使大多数食物都不对他们的胃口。撇开审美方面不说，如果我们不以商品的数量和建造物的耐久性，而以物质文化所提供的生活品质来衡量的话，日本到19世纪中期时也并非情况不佳。日本人致力于实现的是这样一种物质文化，它以经济有效的途径利用资源，来维持大众的身体健康。

在任何前现代文化中，交通工具都有限，舶来品在日用中几乎不见踪迹，于是人们必须发展出一种就地取材的物质文化。19世纪末之前的日本就是如此。而由于16世纪开始兴起的商贸自17世纪便因锁国而严重中断，德川时代尤其出现了这种现象。德川时代的人们明白，因进口被禁，除了个别例外，他们只能依赖于自己岛屿上的动植物为生，而且也不能离开这个国家。或者用一个日本人的话来说，他们看自己的这个岛国，正如今天我们看这个地球一样，注定是生活的全部环境。⑥

由于那时的日本人在长期内以最合理的方式，而不是在短期内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他们得以在较小的土地上保持着密集的人口，且靠着这片土地自给自足。千年以来，日本人一直充分地

⑥ 入江隆则，《日本创造的新文明》（东京：讲谈社，1992），第150页。

利用了他们的资源。正因为他们能智慧地利用资源，又幸而未曾遭受过瘟疫这类传染病灾难，到18世纪中期时，在这个国家3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人口已达近3000万，而其中占地约五分之一的北海道岛尚且人烟稀少。与之对比，法国面积53.4万平方公里，住着约2450万人，而英国1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近600万人口，人均占地面积几乎都是同时代日本的两倍（法国每平方公里46人，英国44人，日本是80人，如果不算北海道，则达100人以上）。⑦不仅如此，日本的可耕地只有15%，而反观英国，则有约50%的土地是适于农耕或放牧的。

但如果说日本的土地大片都因过于陡峭而不宜耕种，那么气候和土壤则弥补了这一不足。日本人有无数可再生而肥沃的资源用来建设家园：木头、芦苇、稻草、竹子、树皮以及其他天然材料。这些材料不但唾手可得，而且轻便，因此比砖石类建筑更抗震。最基本的建筑材料是木头，用于造梁柱——房子的框架。它也可用于墙壁、天花板、房顶、地面，以及作为最后修整和装饰性的元素，但很多其他材料也是如此，而这些材料比木头更易入手。农民种植灯心草用以制造榻榻米，种植芦苇用以盖屋顶，还使用田野里产出的废弃物，比如稻草和谷壳，来造墙和铺在地上的草席垫子。粘土和石灰被频繁用于墙壁。因此，人们能做到将房子代代翻新。在日本这种潮湿气候下，房子又是木头和其他天然材料建成的，翻新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通常也是必要的。

促成建筑物类型转变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适于造栋梁的好木料在渐渐稀少。平民的房子以前采用原始森林的巨木，在19世纪，

---

⑦ 法国和英国人口的估计出自迈克尔·安德森，《西北欧人口变化，1750—1850》（贝森斯托克：麦克米兰教育有限公司，1988），第23页。日本的人口估计请参考苏珊·B. 韩利与山村耕造，《日本前工业化时代经济与人口的变化，1600—1868》（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7），第3章。

框架则变得较为轻型。其实到 17 世纪中晚期时，随着经济的日益繁荣和统治阶级的需要，修起了城堡、高官豪宅、富民的大庄园以及其他大型建筑，森林减少，上乘的木材已经逐渐匮乏。另一个威胁日本林地的因素是对燃料需求的日渐增加。为了解决优质木材匮乏所日益加剧的忧患，地方和幕府各层政府颁布了禁止滥伐森林的法规，大多数山林得以免于被砍伐成秃峰。其他措施还有植树造林、封林禁伐，并新创了一种叫做“割山”的规定来鼓励人们爱护树木。“割山”是指将林地的通常是很长的一段特定时期分给某些家庭，激励责任方去保护树林以便自己能使用林木，并将这些经济上的福利世世代代传递下去。[8]

尽管 17 世纪经济和人口的急速增长使日本的森林大遭砍伐而似乎走向了生态灾难，17 和 18 世纪早期施行的对策则将政府的利益和个人利益有机结合起来，最终有效避免了灾难的发生。[9]于是大型民宅的修建有所减少，因为所需巨型实木随着资源阻绝而难以得到。然而，新的建筑技术使用的是成木。建筑风格一变，健康水平随之提高。将房子分成隔开的若干间并各自有天花板，屋内会暖和许多，而且也更易于装潢，平民因此开始采用武士庄园书院风格的种种元素，房子也就更为美观雅致了。

虽然缺少家具尤其是椅子令西方来客感到不适，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还是发现了其中的好处。屋里没什么大件，意味着房间虽小，却比有椅子时可容纳更多的人，房间功能又可多变，起居

---

⑧ 关于森林问题和相应措施，参考康拉德·图特曼，《绿色群岛：前工业时代日本的森林》（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89）。

⑨ 17 世纪，在政府严格规范森林法规的同时，植树造林的习俗和一木多用开始发展起来，租林的合同也要求防止毁林并鼓励更新。更典型的一点在于，政府和农人分别使用林地的细则是：管理者保留对大型木料的使用权，而农人却用矮小林木作柴禾和肥料。关于一木多用，参考前注书的第 2 部分。

室在晚上可以是卧室。而且房子的装修比西方也要便宜得多。[10]那些批评日本人居室空荡荡且家具太少的西方人，是从西方的角度在看问题，他们在很多地方都忽略了什么才是最重要的。西方人关注的是他们自身传统在日本的缺失，而不是如何去看待另一个传统，以及久居于此的人们在这一传统下的生活是如何地安适，而这传统在当地的气候和住房条件下正是更为经济有效的。

日本的房子之空，和西方房子那种家具全无的空，并不是一回事。正如小泉和子指出的，在其他国家被视作可移动的家具，在日本的传统里，则往往固定为房子的一部分。[11]榻榻米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在平安时代，榻榻米本来是用于卧坐的可移动席子，后逐渐被固定在房中，先是作为人们起坐之处的敷设之物，后来就铺满了全屋。书院建筑中的搁架和桌子也是如此。还有折叠屏风，本用于分隔房间，后成了拉门。储存被子的橱柜和橱架，德川时代就成了固定的壁橱。甚至室内装潢也固定化了。日本人不像西方用分散的门窗来装饰错落的空墙，他们设计的基本精神决定了“床间”（龛）及其他固定物位于何处，并且，隔板、隔墙和柱子成为房中主要的装潢要素。一个日本式房间的框架被造好后，除了随季节变化在“床间”添设相应的饰品，或增加几个垫子供起坐之外，就已经完全可以入住了。

传统的日本家具，并不像西式住宅的家具那样沉重，尤其迥异于19世纪时的西方家具——衣橱，有四个角柱的床、梳妆台、餐具柜、沙发、全家围坐的餐桌，诸如此类。与之相反，日本的家具都是易于移动的，因此可随着季节或功用的不同而加以变化。现在，一个传统的房间可以很容易从二人起居室变成可容八人的

---

⑩ 莫尔斯，《日本人的家》，第114页。

⑪ 小泉和子，《传统日本家具》（东京：讲谈社国际，1986）。

餐室，或单人卧室。除了储存用的大柜子以外，家具往往都轻盈小巧——没有沙发和椅子，人们坐在垫子上；没有大木床，人们习惯于在白天将被褥折叠收纳起来；针线盒、化妆架、灯烛和取暖设备都是可移动的。由于人们都坐在地上，家具就不一定要有腿，即使有，也不过数英寸高。这样，就完全可以把家具都收起来，或者不断变换它们的位置，而且家具材料的利用也更合理化。

德川时代的日本人也不怎么用大型餐桌。家家户户分陈着若干小桌子和食盘，其种类和风格因社会等级不同而各异。那些过得起优越生活的人，就不用在一口锅里吃饭，而是把食物分盛在不同的托盘里，盘子附以矮脚，离地数英寸高。有的托盘下有抽屉，人们饭后可以将碗筷杯碟从托盘中清空，置于抽屉内以便下次就餐使用。一家人个个各有这样一套餐具的话，久而久之自然就非常卫生。但在最下层的百姓以及青楼之中，碗筷通常是大家轮流共用的。在有着开放式平炉的农家，一家人习惯围坐炉边，共同分享架在火上的锅中之食。在一个缺乏树木而房屋空间狭小的国家，这些使住宅多功能化的习俗就既节省资源，也节省空间。⑫

这种风格的住宅和家装之所以得到发展，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日本属于世界上不时兴坐椅子的文化传统之一。事实上，在现代以前的世界上的任何地方，椅子与其说是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家具，都毋宁说是一种特别之物。我们把椅子视为西方文化的主流特色，因为看到过很多埃及法老和希腊罗马王公贵族坐椅子的画面，但大多数人其实并没有椅子可坐。如果要坐下来，他们就坐在坐凳上，所谓坐凳，要么是床，要么是板凳，很多坐上去都不是那么

⑫ 石毛直道，《餐桌文化论》，《现代日本的家庭与餐桌》，石毛直道与井上忠司编，《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研究报告别册》16号（1991），第18—22页，以及附录。

舒服。在欧洲中世纪，椅子并不是为了让人舒舒服服地坐着，而是象征着权威。因此，在密集的家具和合乎人体的椅子兴起之前，从没有人会觉得坐在一件家具上比坐在地上更舒服，除非家里养了什么牲畜——而日本人是不在家里养牲畜的。⑬

在中世纪，西方人和日本人对家的使用方式在本质上并无太大差别。在两地的古代住宅中，装潢都很少见，一间大屋子里可以举行多种多样的活动。在西方，家具也多是可移动和易于拆卸的，这正和日本一样。城里的房子被分隔为工作间和起居间，两部分都很宽敞。尽管服饰及其他习俗很不相同，生活方式却不然。魏滔·黎辛斯基认为，直到17、18世纪，欧洲才开始出现舒适家居的观念，⑭恰恰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日本的普通老百姓纷纷住进有榻榻米的房子以便能惬意休憩，而同时的欧洲人，则开始往椅子上放起了靠垫。

在欧洲和日本，家居设计的新风格都开创于经济繁荣时代。而后来之所以背道而驰，是由于在欧洲，除了舒适之外，人们关注的是不断增加物品和家具的数量。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越来越多的人家居的舒适度都更上了一层楼，但家里也充斥着越来越多的床、桌子、椅子，更有小摆设、架子、桌布之类。与之相反，17世纪的日本，经济的繁荣伴随着人口的剧增和资源的压力，随之产生的富裕使人们不但去高效利用资源，而且以此为美德，并长期保持着以简约为奢华的风格。

虽然技术和经济的进步让德川时代的很多人都住上了新风格的房子，这些新风格本身其实都可以追溯到平安时代。那些有着“舞台般光洁的木地板和柱子”的房子，就体现了平安贵族的“寝

⑬ 魏滔·黎辛斯基，《家》（纽约：维京企鹅，1986）。
⑭ 同上书，第90—107页。

殿”风格。屏风、门帘、榻榻米在房中随处可见，根据场合不同而随机应变。传统把这叫做“室礼”，意思是“摆设物件以创造出一个可供某种特定活动的房间之行为”。小泉和子认为，虽然从中世纪到德川时代，住房的风格由“寝殿”风变为“书院”风，“室礼”这一习俗却延续下来，而正是这种习俗使日本人的房屋在功能上如此多变。⑮

家具可移动和坐在地上这两大传统，使日本人发展出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即使在最奢华的时候，也依然是注重节约资源的。这至少部分要归因于禅宗的影响，但无论根源如何，其结果都是产生出一种精英的生活方式，而它对资源的损耗比欧洲那些富有的精英们的生活方式则要少。实际上，应当注意到，即使是“奢侈”这个词，在日语里和英语里的含义也是不同的。日语的“奢侈”既指英文中的“奢华（luxury）”，又有英文“浪费（waste）”之意。行为“奢侈”既意味着“极尽奢华”也意味着“挥霍无度”，如今这个词就是铺张浪费的意思，而英文的“luxury”却从来不是在说铺张浪费。木头是基本建材，也是柱子等装潢和架构部分所需的主要材料，而在德川时代，越来越多的墙和地板以木材辅以榻榻米、纸制拉门或墙粉筑成。从功用、装饰，抑或是炫耀财富的角度来讲，家具都没什么意义。人们并不将全家所有的艺术藏品都展示出来，而是依照时令或场合，将某一具代表性之物悬于龛内，并伴之以一两件其他东西，比如花瓶。关注的焦点就落在那件具代表性的东西上面。这家人以之为傲，于是将它展示给客人。家里的每样藏品可能都很华贵，但只有独赏其中的一件，而不是将别的东西也罗列出来争奇斗艳，才更能体现出奢侈

⑮ 小泉和子，《传统日本家具》，第11页，以及《家具》（东京：近藤出版社，1980），第18—21页。

的精髓。这种以清寂行奢侈的作风在很多传统艺术形式中都得到了体现，而德川时代的有钱人正是非常热衷于这些艺术形式。

体现这种清寂式奢侈的一个例子便是花道。在欧洲，插的花越多，就越显得奢华。数量是判断质量的主要标准。相反，在日本，现代花道（“生花”）据称起源于15世纪中期，它仅以少量的花来创造出一件作品。这种艺术形式具有精深的传统，于种种要素中赋予了象征性的意义：每一元素，每一枝或每一朵花，都是与众不同的。这和西方以庞大数量凑成大花束形成了鲜明对比。从经济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一个“生花”作品仅需很少的花枝而不是一大束花就能完成。对西方来说，一个精致的日本插花所需的材料似乎不过是家里的一小簇花而已。德川时代，商人开始采用这种艺术形式来优化他们的生活方式，花道逐渐普及到平民当中，其内容就更加简化，以至于在一个作品中，主要只插有三枝花，而不是早期的七或九枝。人们喜好西式传统的花团锦簇也好，还是日本传统之注重于单枝花的个性也好，都取决于自己的文化背景和品位。但可以客观地说，日本人为增进室内艺术氛围，创造出了一种精美的艺术形式，而且创造这种艺术形式的手法，经济而节约。

舒适家居在德川时代是与节能齐头并进的，这尤其体现在对暖气的使用上。的确，在中世纪，无论是西方还是日本，家家户户的供暖都是低效的，因为他们都将开放式火炉置于正房中央。大量的热气蹿升到屋顶，房子里乌烟瘴气。后来西方兴起了壁炉，令安全性大大加强，而且发展出煤炉，减轻了烟雾的问题，然而，壁炉却并未能更有效地解决室内供暖问题。日本人保留了在屋中央安置开放式火炉的做法——这就是“围炉”。人们环坐于炉子四周，可以同时取暖的人数比以前更多了，而热气和烟火可以烘干和保存悬挂在椽上的东西，甚至能保护茅草屋顶免于腐烂和虫害。

随着人们在家中装上了木地板，“围炉”被移到一间铺了地板的屋子里，于是人们可以更舒服地围坐在炉边，做饭、吃饭、干活或聚会。⑯

即便新的技术发展起来，供热可以变得更高效了，西方人依然固守着他们的烤火原则。他们创造出更高效的壁炉，后来又有煤炉，最终出现暖气炉来加热室内的空气，让居民感到暖和。无论是用木材还是煤，这种类型的供热方法都要消耗大量的燃料，而在人口高度增长的17世纪的日本，燃料变得较为匮乏，它因此成为一种昂贵的东西，人们无力购买这些燃料来烧暖气。

为了节省燃料，日本人发展出一种供热手段：以暖和人体而不是室内空气为基本原则。他们还最大限度地利用天气和气候来为大家提供一种舒适的氛围，而不是与外界环境划清界限。一直以来有种说法：那些由厚重的石墙砌成的封闭的欧洲式房屋是冬天住的，而开放的日本式房屋则是夏天住的。但这只说对了一部分。一间屋子如果只有加热器或壁炉来供暖，在距热源较近的范围内都会有寒意，而且在夏天，厚石墙会使屋子在天气好的时候都有一种令人难受的潮湿阴冷；一座封闭的房子在不透风的情况下，会热得令人窒息。与之相反，德川时代在日本人气看涨的居家之道是：夏天，充分地利用微风；冬天，充分地利用太阳。气候恶劣时，关上所有的拉门拉窗，房子便会形成一个个小而舒适的空间，而天气最坏的时候，拉上防暴风雨的木门即可。

为了精打细算地使用稀少而昂贵的燃料资源，人们发展出一些可以不浪费燃料就能暖和身体的方法：“火钵”（一种开放式加热器，烧木炭），“行火”（在一容器内盛热木炭以暖脚或暖床），

---

⑯ 铃木解雄与高桥真弓，《水槽，围炉和灶》，《生活文化史》第8期（1985年8月），第30—34页。

还有“炬燵”（一种小型加热器，置于桌下，上敷一棉被以保暖）。这些加热器用的是木炭或煤，所以非常省燃料。[17]有奈良时代制造的火钵至今仍存于世。但这类加热器只能让坐在旁边的人暖暖手，仅限于权贵们使用，只有他们才消费得起造这种防火容器所需的金属。直到德川时代，战国期间已有的采矿技术在经济繁荣的条件下大为发展，火钵才走进了寻常百姓家。到德川时代末期，制陶业也发展很快，已经可以不用金属就能造出火钵来，这就进一步普及了火钵的使用。火钵能放在屋里任何地方，因此客房就能经年得到利用，只需要一些木炭就行了。便携式加热器用的是木炭，格外方便不说，还可以放在被子下面，所以可用于夜间暖床。木炭加热器的保暖时间比一瓶开水要长，又不会泄漏，但又不一定非要用不易燃材料不可。

由“围炉”和“行火”的传统，衍生出各种各样的“炬燵”。此类加热器要么是低于地面的火床，这样人们可以像坐在西式餐桌边一样身居其侧，要么就是放在地上的一套加热器组合。无论如何，在桌子上铺棉被，都将德川时代人们室内生活的舒适度提高到了一个新台阶。“炬燵”可以让大家能更惬意地进行安静的室内活动和安心干活，而这些是感到冷的时候无法或难以进行的。可移动的火钵或“炬燵”可以放在房中阳光明媚之处以便最大限度地利用光能。这些供热措施与书院式建筑相结合，就能让大型住宅终年得到充分的使用，也促成了一种新型的生活方式：招待客人可以和家庭内部活动分开进行，家人也可以互不干扰地作息。这个例子说明了发展节能技术同时可以使人生活更为舒适，提高

---

⑰ 各地木炭加工厂的发生发展，木炭生产的技术进步和木炭市场的发生发展，都已有了翔实的记载。参考樋口清之，《木炭的文化史》（东京：东出版株式会社，1962）和日本木炭史编纂委员会编，《日本木炭史》（东京：全国燃料会刊，1960）。

人们的健康水平。

燃料越来越稀缺，在人口最密集的平原地区尤其如此，因此，人们保存燃料的手段越来越多。有一种可以节省两种燃料的发明是，将一口锅置于“围炉”上方的一个铁圈之上，这样锅就不会直接接触到火。这样不光是以土锅取代贵重的铁锅来做饭，而且也不用大火去烧那悬挂着的整个铁锅，而是在铁圈下保留小火即可。烧木炭既比直接烧木头更节省资源，而且木炭载运起来也更方便，对这种新型炊事方式来说，木炭已足够了。⑱

日本人依赖木炭的程度，看看木炭在经济中担当了多么重要的角色就可以明白。木炭在史前时代就被使用，有证据表明可溯及绳文时代（译者注：约公元前 1 万年至公元前 4 世纪）。到德川时代，木炭的质量有了显著的提高，碳的比重增大，意味着燃烧时间更持久，温度也更高。⑲到 17 世纪早期时，日本的各个地区都自行出产木炭，不但有专职的制炭匠人，普通的村民在冬天都要加工木炭。由于有这么多人生产木炭，我们无法知晓其总产量，不过到德川时代末期，每年有多达 238 万“俵”（稻草编的袋子）木炭被运往江户。⑳一些地方经营起木炭业，零售木炭通常是要交税的，有些地方则允许部分免除木炭税。从各阶层民众的预算可以看出，木炭是他们所有预算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对大多数人来说还包括柴禾。一个经商的十口之家每年的地租费是 24 两金子，食物 30 两，木炭和柴禾则有 12 两。一对夫妇的收入约为 7 两的话，1 两便被用于燃料。而一个每年实际收入 30 两的武士会在木

---

⑱ 关于厨房的发展，参考荣久庵宪司，《厨具的历史》（东京：柴田书店，1976）和神崎宣武，《话说厨具》（东京：筑摩书房，1984）。

⑲ 由于日本式房屋远远没有西式的封闭，故并无窒息之忧，而且当木炭被置于封闭式加热器内时更是如此。

⑳ 这些稻草袋的大小依地域和时代有所差别，但一“俵”约合两蒲式耳，即约 19 加仑或 72 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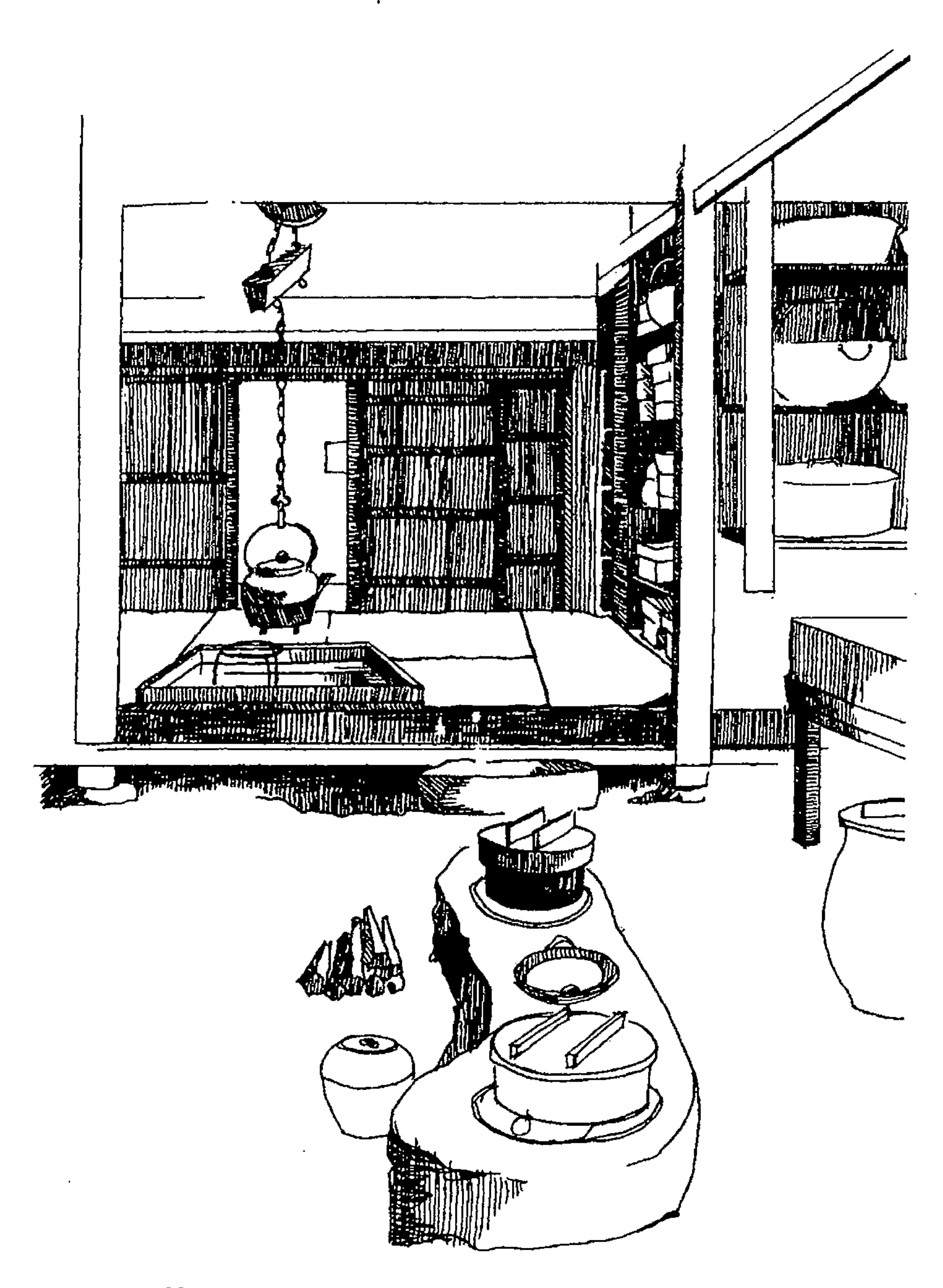
炭上花掉 4 两还不止。[21]

住在暖和地带和城里的人开始用“灶”。“灶”是一种炉子，传统以砖、石、土制成，在上方开口，内置一种叫做“釜”的锅。由于它是封闭的，仅对锅直接加热，比起开放式加热器来就更能有效利用燃料。但木炭生的火太小，不能烧饭，所以这“灶”还得用柴来烧。“灶”的发明，逐渐使炊事活动——引起火灾的一个重大隐患——从家里铺着木地板的起居间移到土地面的“土间”。在日本气候温暖的西南以及燃料稀缺的京都、大阪一带也即畿内地区，人们都改用“灶”了，而那些只用“围炉”的民家则仅限于日本北部和中部山区的多雪地带。[22] 这不仅因为木柴在暖和地方更易得到，而且因为要度过漫长的寒冬，较冷地方的人家就需要一个“围炉”来取暖。现存的“民家”大多是有钱人的住宅，所以很多都既有围炉又有灶。

燃料的日渐短缺，以及随之出现的“灶”之类炉子的发明，对日本人的膳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灶”通常有不止一处放锅的地方，比在“围炉”上炖煮，烹饪手段更复杂。米面可与汤和蔬菜分开来做。这种新的烹饪方式已是很节省燃料了，然而收入较低的人省起来更甚。很多人家开始一天只烧一次饭，那些租住一居室的城里人做的饭常常少得可怜。这样，某种店铺涌现出来：专营外卖食品供人们买回家吃——德川时代的速食品厂家。

㉑ 参考樋口清之，《木炭的文化史》，第 8—29、89—125 页。关于“1 两”价值几何，幕府制出“小判”，即 1 两黄金，此为江户以及幕府辖地的价值标准，在 1700 年，它合 60“文目（或称匁）”银子，而银子是江户的日常货币。到 19 世纪，按日取薪的务农者年收入约 360 文目，也就是相当于 6 两金。即使在大阪，此收入也可买 5.5 石米。参考韩利与山村，《经济与人口变化》，第 118—125 页。

㉒ 铃木与高桥，《水槽，围炉和灶》。在所调查的民家中，作者发现 87% 的围炉位于有木地板的屋内，而 87% 的灶位于“土间”。



19 世纪的一所住宅，其“土间”有“灶”，起居间有“围炉”。

不但各种烹饪方法是节能的，而且吃的东西本身也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极其匮乏的资源。在德川时代早期，除了统治阶级顶层之外，将土地辟为猎场的做法统统都已绝迹。人们经常引用佛教禁吃荤腥来证明日本传统膳食缺乏动物蛋白，可是，中国人也多信佛，但又大开荤戒，所以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吃肉减少而人口剧增，同时农业对土地的全面需求使畜牧业难以为继，似乎并不是一种巧合。尽管佛教禁止食用四条腿的动物，那些有钱打猎的人还是会吃野生禽类，而流离失所的下层人民传说连生肉都吃。可见，人们放弃吃肉的原因，与其说是佛教的禁忌，毋宁说是由于农作物种植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百姓的饮食口味和森林野地的保留就只好退居其次了。

不过，吃肉的日本人还是不少的。绝大多数人并不饲养禽兽，而是尽量捕捉那些容易寻获的野生动物。凡是觅到任何一种活物，他们都会吃掉。江户城刚刚建好的时候，大量人口突然涌入导致了食品的短缺。结果，武士和普通市民一样在冬天里吃狗肉。并非当地在闹饥荒，而是这已成为一个见惯不惊的习俗。16 世纪末和 17 世纪到过日本的西方人留意到，在京都和江户城，温顺的野生兽类和禽鸟可轻而易举被人大量捕获，送上餐桌。㉓政府在那时或之前都从未颁布过禁止吃肉的法令。㉔ 关于荤腥的讨论虽然并不是本章的中心议题，日本人吃肉这件事却与他们不吃肉的普遍说法有出入，而他们不吃肉是因其宗教这一推断也是站不住脚的。一切史实只是证明了一件事：日本人尽可能地利用了所有潜在的食物资源，但并不是以牺牲农作物为代价。农作物收获后直接供给人民，余下的才用作饲养供少数上流人士之需的动物的饲料。

㉓ 原田信男，《历史中的米和肉》（东京：平凡社，1993），第 258 页。

㉔ 同上书，第 92 页。

然而，幕府1612年颁布了一条法令，禁止杀牛以及出售自然死亡的牛。该法令不仅施行于幕府的辖地，而且下达到所有大名的领地。幕府此举并不是出于宗教上的考虑，而是为了防止大量消耗牲畜，以保护和增长农业生产。禁令推翻了那种认为日本人以前不吃肉的说法。㉕ 事实表明，德川时代日本人吃肉是肯定的。出版于1760年的《名产诸色往来》一书，罗列了江户的麴町所卖的各种肉类，其中包括：野猪肉、鹿肉、狐狸肉、狼肉、熊肉、獾肉、海狸肉、猫肉和野狗肉。吃这些东西的人不光来自那些只敢偷偷摸摸开荤的中下阶层，就连幕府将军也曾收到彦根地方（滋贺县境内）送来的贡礼——置于味噌（豆酱）汤中的牛肉。仙台地方（宫城县）一位名叫橘川房常的名厨师曾建议以牛肉为底料来煲汤。18世纪早期以来出版了很多书，内有如何给病人进补牛肉的方子，或是如何烹饪肉食和猎禽以使其味道"绝美"。德川时代的后半期，过度狩猎致使野鸟越来越少，鸡和鸡蛋就炙手可热起来。1875年时，一本叫做《万法料理秘密箱》的书描述了103种做鸡蛋的谱子，包括一种在蛋黄内烹制蛋白的方法。㉖

到了19世纪，卖肉的铺子昌盛起来，吃肉在江户越来越风行，据一位叫山田Tose㉗的女士记载，连矜持的武士都要买肉吃了。市面上的肉大多是野生的：野猪、熊、狼、獾、狸、松鼠，还有猴子肉。反对吃肉的人谴责肉铺里飘出的气味难闻，还有很多人不愿意承认他们吃肉的事实。言及吃肉，人们便用委婉的说法，野

㉕ 加茂仪一，《日本畜产史》（东京：法政大学出版局，1976），第189—190页。

㉖ 松下幸子，《江户时代的料理材料和烹饪法》，《食与食空间》，日本生活文化史学会编《生活文化史》（5）（东京：雄山阁，1984），第44—46页。

㉗ 译者注：日文名为"山田とせ"。

猪肉通常被叫做“山鲸”，而鹿肉则叫做“枫”。[28]寺门静轩的《江户繁昌记》描述了19世纪30年代早期江户的繁荣景象，书中一节就专门讨论了“山鲸”，开头一句话便是：“凡肉最宜佐以大葱”，半揶揄地刻画了江户人吃肉的模样。[29]

还有比在这个繁华的都城吃肉更彪悍的事情。据官方记载，19世纪时长州这个地方曾有人从事猎物交易，交易内容包括熊、野猪、鹿、兔、獾、猴子、野鸡、鸭子、鸽子及其他鸟类。17个村子里出售鸡和鸡蛋。[30]这证明猎物交易在当地是被许可的，而且也很普遍。交易的价值并不能显示出究竟曾经进行过多大规模的狩猎活动，因为还有相当多的东西已被猎户和其他一些人消费掉而未被登记下来。

西日本的武士比其他地方的更爱吃肉。有的日本人还会饲养家猪卖给住在江户和长崎的中国人和朝鲜人。萨摩地方的人爱吃猪肉，还因此出了个“萨摩汁”——一种传统的猪肉汤。在19世纪50年代，很多江户人都知道萨摩藩的打工仔要养猪，部分留给自已吃，部分拿去卖。[31]然而，大部分日本人似乎还是不常吃肉，而且肉类肯定不是他们的基本膳食。[32]史料表明，并不是天天都有人买肉卖肉和吃肉，只有在某些时候，肉才会出现。随着人口和耕地的增长，狩猎愈加罕见。究竟是什么人吃了多少肉，吃得有多频繁，都无可查考了，但打猎吃肉的行为，在这片土地上肯定昙花一现过。

---

[28] 加茂仪一，《日本畜产史》，第209页。

[29] 安德鲁·马科斯，《肉与土豆：〈江户繁昌记〉中的两节》，见《中日研究》4，第2期（1992年4月）：第7—26页。（译者注：原文为“凡そ肉は葱によろし”。）

[30] 后藤良子，《论从〈防长风土注进案〉所见之天保期长州藩主要的食用性兽类和鸟类》，见《山口大学教育学部研究论丛》38，第2期（1988）：第19—29页。

[31] 加茂仪一，《日本畜产史》，第194、210页。

[32] 同上书，第195页。

以所需的土地和饲养用粮的数量来看，肉类其实并不是很高效的蛋白质资源。在德川时代，为人们提供了无穷无尽的蛋白质资源的，是海洋。而给海产消费造成障碍的，无非只是海边到内陆的交通问题。在内陆地区，蛋白质的主要来源是豆类。平均每亩豆类的卡路里含量要比动物肉高得多。豆腐和其他豆制品也是德川时代人们蛋白质和钙的主要来源之一。

与欧洲相比，野生植物在日本的使用要广泛得多，包括蕨、牛蒡，甚至可以算上饥荒时人们吃的各种草根树皮。海洋出产的绿色植物比如海草，晒干了也可多用，或入汤，或入茶，或入药。

但日本人的主食还是大米和其他粮食。大米是人们的最爱，但日本并不能产出足够多的大米供每个人作主食。大部分城里人多半吃大米，而大部分乡下人吃米和其他杂粮的混合物。[33] 人们爱吃米，是因为喜欢它的味道，但亚洲各地均爱吃米，也可以说是因为稻米更适宜于人口密集的国家。稻米的产量与播种量的比值比北欧的主食——谷类要高。据估计，17 至 18 世纪的欧洲，麦田收获的 20—25% 需要保留作第二年播种用。[34] 经计算，日本在近代技术下产出的稻米只有大约 1—2% 是留作播种的。稻米的产量非常高，加上人们为增产做出了种种努力，在耕作上投入密集的劳动，因而，土地相当地高产。最大限度地利用土地，是人口持续增长或在人口密度已经较高时保持不降的重要原因。[35]

节约资源不仅表现在住和吃上，还表现在穿上。17 世纪时，

㉝ 鬼头宏，《江户时代的米食》，见《历史公论》第 89 期（1983 年 4 月）；西川俊作，《粮食消费：长州的个案》，见《过渡时期的日本》，马里厄斯·詹森与吉尔伯特·罗兹曼编（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6）。

㉞ B. H. 斯利切尔·范·巴斯，《西欧农业史：500—1850》（伦敦：爱德华·阿诺德，1963），第 382 页。

㉟ 佛兰西斯卡·布雷，《稻米经济》（牛津：巴兹尔·布莱克威尔，1986），第 3、15 页。

所有阶级的正装和便装都以“小袖”衣为基本装束，“小袖”的样式正是西方人说“kimono”（和服）这个词时所想到的那种日式服装。“小袖”在18世纪被广泛穿用，所以人们就把它叫做“kimono”，泛指衣服。它本来是一种内衣，后来，人们就在雨衣或正式袍服之类的外衣里面直接穿上这种衣服。[36]



穿“小袖”和服的妇女：左为一商人之妻，身着丝绸；
右为一劳动者之妻，身着棉布。

---

[36] 关于“小袖”变革的英文论述，参考丽萨·克里菲尔德·达尔比，《和服：时尚文化》（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93），特别是第32—57页。

和服的制造是将一匹很长的长方形布料裁剪成八块；同种款式每个人都可以穿，无论男女老幼。布料寸寸可用，绝不浪费。而一匹西装面料哪怕用得再省，要做成合身的衣服，总有些毫无用处的剩料。另外，一件衣服最后总要浪费些面料。唯一的例外大概是女人的半裙，但半裙所要求的材料要比和服多得多，因此基本上不可能像和服那么节约。要穿上一件和服，不需要纽扣或其他什么配件，一条"带"（束在腰间的带子）就足够了。这就是说，穿一件和服时，可按高矮胖瘦自行调整衣服大小。与之相反，西式服装每件只有一个人穿得合身。如果那人长大了或胖了，衣服就不再合身，一般也就再找不到谁能穿它了。通常二手的衣服都是要重新修改的，而在一件旧衣服上，多半都会显露出再加工的痕迹来。

日本人做一件衣服，不仅将一匹布料全部用上绝无遗漏，而且所用布料的绝对量也很少，尤其是女人的衣服。在整个19世纪，典型的美国女性穿的半裙的周长越做越大，从40年代的126英寸（1英寸=2.54厘米），50年代的170英寸，到60年代的190英寸。时髦的长裙可以大到250英寸，单单下半裙就要7到8码长的料子。一条简单的日常半裙，面料有6至8码长，攒至腰部做成一条腰带，虽然不难缝纫，可要算上面料的纺织，一条裙子得花上3到4个星期才能做好。到19世纪70年代时，像《哈珀斯》这类杂志都附有服装剪裁的插页兼说明，但人们照做起来却极其复杂，很多都遗憾地失败了。即使是随便一件家居穿的褂子，比如说孕妇装或招待客人时穿的便装，都要10码的料子，足足28英寸宽。[37]

---

[37] 贝蒂·J. 米尔斯，《棉布的编年史：得克萨斯州妇女和她们的时尚，1830—1910》（拉伯克：得克萨斯科技出版社，1985），第19、65、68页。

与之相反，传统的“小袖”和服，是由一匹长度合适的布料制成。“一匹”叫做“一端”或“端”，大约合14英寸宽，10至12码长。现在一“端”布是1150厘米长，刚好12码半多一点，但在德川时代通常要短一点，且因地而异。[38]然而，在每个地区，一“端”布料的成品都是尺寸合宜的，人们可以很方便地买到他们自己做一件“小袖”刚好所需要的布量。这样，做任何一件“小袖”的料子都不过是19世纪一个美国妇女最简单的一身衣服所需要的一半，既省料，又省时。

日本人的着装在很多其他方面也要精简节约得多。由于基本的款式老少咸宜，妇女们很容易就能学会将日常衣服裁剪为所有家庭成员都能穿的大小。“小袖”的长度是以穿衣人的身高为标准的，但又额外长出一截，可在腰部折叠于腰带下面，使衣服长短合适。通过调节折叠处，高一点矮一点的人都可以不加改动就穿其他人的衣服。小孩的衣服会留出一些空间来以备长身体，既不用担心孩子长不到那么大，也不用担心尺码改小了。

另外，日本服装不需要熨烫。好的丝质衣服在洗之前会拆成几部分，洗后再铺平晾干，使之看起来质地紧致；日常穿的棉质衣服晾在竹竿上，让阳光透过竹叶直接晒干。洗衣服的时候把衣服先拆成几部分，洗完了再重新缝起来。这固然麻烦，但在燃料紧缺的日本，就比用熨斗熨烫更为高效，而且好的日式外套多半不会像西方的服装那样频繁换洗。西方和日本的服装究竟哪一方更节省时间，或许尚待商榷，但毋庸置疑的是，日本的服装更为节省资源。

日本人还发明了一种非常有用而且节约资源的毛巾，叫做

㊳ 任何缝纫教科书中都有此类资料。例如，参考内藤道子改编，《新被服》（东京：学习研究社，1993），以及片山芳子等改编，《高校被服》（东京：实教出版株式会社，1986）。

“手拭”。在德川时代以前，“手拭”就是一条未加漂染的亚麻巾，但在德川时代，人们更爱用棉布，棉布也做得越来越好看，日常生活中的其他一些棉制品比如内衣就是如此。不但出现了各种花色纹样和印染工艺，有的“手拭”甚至是扎染的。“手拭”的宽度大约是13英寸，但人们喜欢在毛巾上有不同的设计，所以其长度根据布料的样式而有不同，直到幕府统治时代开始之后，才将标准长度设为3英尺（1英尺=0.3048米）。[39]

由于“手拭”就是一块长方形的布料，它可被用于任何地方，头巾、发带、毛巾，或者盖在食物上防苍蝇和灰尘。打湿了，可用作洗脸巾，拧干了还能擦干身体，尤其是在洗了热水澡之后。它小到完全可以塞在任何一个角落里，又薄到能在日本这种潮湿的天气下快速风干。用旧了，还可以作抹布。“手拭”大为风行，以至于人们以之作为节日礼物互相赠送。虽然在西方也有一种用途颇多的大手帕，比起“手拭”来，还是大为逊色的。

日本人不仅衣服和毛巾比西方人省料，还重复使用所有的东西。当棉布被广泛使用以后，实际上所有用旧了的布料都可以被利用作各种他用：尿布、抹布及其他家居用布。19世纪80年代住在日本的爱丽丝·马伯·培根注意到，日本人“只要残布尚存，衣裳都被反反复复地重新裁剪、印染，再制成新的来穿”。[40]虽然西方人在条件允许时也会重复使用衣料，但量体裁衣意味着一件衣服仅对某个人合身，要改成适合另一人穿，对西方人来说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西式服装不但有衬裙、窄袖、扣眼、腰线之类的细节，还有各种零碎儿，例如折边、口袋、线缝，这些都不可

---

[39] 今野信雄，《江户的洗浴》（东京：新潮社，1989），第69—70页。
[40] 爱丽丝·马伯·培根改编，《日本的女孩和女人》（波士顿：豪夫顿，米福林公司，1902），第18页。

能像和服那么容易进行改装。

和世界的其他地方一样，日本也有二手服装贸易。[41]到德川时代中期时，江户已有很多旧衣铺，在富泽町，每天黎明时分还有卖旧衣服的早市。二手服装贸易一度极为兴隆，有人甚至会偷衣服去卖，因此在1724年，幕府曾试图关闭这个市场，但商贩们说服幕府取消了这道禁令，因为这项贸易太重要了，予以取缔是不现实的。之后，买卖仍然被允许，但仅限于白天进行。到18世纪末，二手服装批发商涌现出来，他们在江户买下旧衣服，再卖给整个关东地区和东北的民众。在北方，能买到旧的棉质服装更如雪中送炭，因为北方不能种植棉花。在关西也兴起了一个繁荣的二手服装市场，而且交易量巨大。到1841年，已经有了4个主要的二手服装批发商，其年销售额超过5.5万两黄金。单是最大的那位批发商的年销售额就高达2万两。[42]和服尺寸都是统一标准，所以二手服装是很容易卖掉的。再看西方，也有旧衣服买卖，有钱人家的衣服同样颇为值钱，据说在维多利亚时代，甚至有人从小孩身上扒衣服去卖。在这一点上，当时日本人和西方人一样善于废物利用。

日本的鞋履同衣服一样也是统一标准化的。基本的鞋是一种凉鞋，在大脚趾和其他脚趾之间系上带子来持住脚板。穷人和旅行者穿木屐或者草鞋，这两种鞋不但很容易就可以用乡间的材料快速制造出来，而且可以互相混穿别人的。所以，制造这些鞋就用不着像制造西方的靴子一样考虑型号和款式。草鞋穿不长久，但是很便宜，而且也不难买到，要么自己也可以再做几双。这类鞋不能像靴子一样给脚提供保护，但人们也不会因鞋子不合脚而

---

[41] 参考唐纳德·伍德沃德，《“从剑到铧”：前工业化时代英格兰的废物回收利用》，见《经济史评论》，第2辑，第38卷，第2期（1985）：第175—191页。

[42] 伊藤好一，《江户梦之岛》（东京：吉川弘文馆，1982），第26—28页。

饱受拇囊肿或鸡眼之苦。[43]

既然衣服很贵，围裙就普及起来，日本如此，西方也是如此。但在日本，通常男人干活时穿得很少，浑身上下只系一条腰布，女人夏天干活时也会打赤膊。而同时代的西方，人们穿得严严实实，尤其是女人，如果被人看见没穿衣服将会无地自容。裸体在日本并不是什么很羞耻的事，比起东亚其他国家例如印度尼西亚或朝鲜，日本人对此要无所谓得多。[44]日本炎热潮湿的夏天显然影响了人们穿衣服的态度，久而久之，即使衣服较少他们也能过活。即使是那些穿着精纺又染了色的织物的富人，也仍然遵循着服装尽量标准化的原则，将浪费降至最低限度。"小袖"和服做出来人人都能穿，也意味着大家可以互相交换衣服，互相借来穿，互相处理二手衣，或者死后衣服不需改动就传给别人穿。欧洲到中世纪之后就走上了量体裁衣之路，但日本人的服装一直保留着这种标准化的特色，直到人们开始穿西装。[45]

当然，并不只有日本人才节俭。现代化以前的社会里，但凡物质昂贵，人们多会省着过日子。现代化以后的社会里，省吃俭用的人甚至是大多数。在撰于1828年左右的《美国的节俭家庭主妇》一书中，作者介绍了怎样将被子里填塞的羽毛翻新，怎样用绿茶复原褪了色的丝绸，怎样巧用发硬了的面包片，并告诫人们不要扔掉东西，"如果这东西可能还有哪怕一点用处，无论是多微不足道的用处"。作者查尔德女士坚称，要节省每一根线，不要因为抹布脏了就扔掉，肥皂水可用来浇花。她说的这些例子也很容

---

[43] 各种鞋履、雨衣以及用稻草等可更新材料制成的日常物品的例子，参考长仓三朗，《飞驒的民具》（高山：高山史，1981）。

[44] 野村雅一，《重塑日本人的身体》，见《具体化的文化》，迈克尔·摩尔曼与野村雅一编，《国立民族学研究》（大阪：国立民族学博物馆，1990）第27期，第260—261页。

[45] 同上书，第267页。

易从日本人勤俭节约的传统智慧中找到，正如井原西鹤和本·富兰克林写的那些故事一样。㊻

明治时代的日本和美国妇女都注意到了日本的生活方式在时间上的高效率。爱丽丝·马伯·培根评论道："在一个住宅里，没有家具，没有地毯，没有小摆设，没有镜子、相框或者什么需要勤拂拭的玻璃，没有炉具，没有需要常清洗的窗户，大部分烹饪都在户外完成，也不需要疲于追逐最新时尚，于是女人需要做的事情少得不能再少。"㊼与培根在1888年至1889年同住一栋房子的津田梅子也表示赞同："一个日本人的房子需要操心之处真是比一个外国人的房子要少得多。"㊽但培根也承认，日式房屋还是有需要操心的地方：被子和蚊帐晚上要取出来白天又要收进去，同时每天都必须做一些清洁工作。

诚然，每个社会都有勤俭节约和巧用资源的例子，但我们常常可以发现，日本人和其他亚洲人更加节俭，也比西方人更能有效利用有限的资源。一个例子就是，亚洲人做的茶杯一般是不带把手的。用不惯的人会觉得不舒服又不好使，但不可否认的是，制造一个光溜溜不带把的茶杯要快速高效得多，因为造个把手既费时又易坏，还更费料。同样，筷子造起来很容易，也不需要用到贵重的材料。㊾因为食物上桌时已经切好，筷子可以夹起来，几乎没有人必须用餐刀来吃东西，厨房里的那把厨刀就已经解决问题了。我们甚至可以认为日本式的内衣都要比西方的节省资源。

㊻ 《美国的节俭家庭主妇》为丽迪亚·玛丽·查尔德婚后第一年所著，也就是1827年。该书由波士顿的卡特和亨第出版公司出版，极为畅销，到1832年已再版12次，1980年出版了其摹本。例示见第1、8、12、13、15、19页。

㊼ 培根，《日本的女孩和女人》，第17—18页。

㊽ 一封日期为1883年2月11日的信函，引自古木宜志子等编，《阁楼来函：津田梅子与她的美国母亲的通信》（纽约：威瑟米尔，1991），第40页。

㊾ 筷子是木制的；即使是那些没有上漆的筷子也能使用多年。但这里并不包括当今日本餐馆使用的一次性筷子。

日本人直到德川时代才开始穿内衣，而所谓的内衣就是：男人穿的腰布由一条长布条制成，女人则身裹一件叫做“腰卷”的单衣。日本人之所以有此习俗，可以说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标准低于西方，但也就证明了这些习俗使他们在较低的生活标准上具有了同等的甚至是更高的健康水平。

在经济繁荣再创新高的德川时代，庶民文化第一次兴起，人口基数本已甚高，此时更进一步大增。17 世纪的日本人于是便遵循着中世时期节约资源的俭朴风尚，而不是像欧洲那样新生出一种富得流油的文化。虽然日本人吃野生动物，但肉类并不是他们蛋白质的主要来源，而且后来猎物断绝，便转而以高效利用土地来获取更多资源，而不是去从事畜牧业或饲养业。这个解决办法很是节省资源，因为豆类结合谷类——尤其是米——是获取人体所需蛋白质的一种上佳途径。我们可以认为，日本人降低了他们的生活标准，是因为如此转型实属经济需要，但并未以健康为代价。

德川幕府解决资源有限问题的措施，使日本人能够利用最少的资源，尽可能地使用天然或可更新材料来实现一种高度的文明。由于这些措施，形成了一种社会观念：人们不以炫耀排场，而以精心设计来表现美和奢华。引人注目的不是琳琅满目，而是一枝独秀。即使有钱人也依然追寻着这一精神，把他们拥有的大量东西储存在仓库里，只于适合欣赏时取出其中寥寥几样。德川时代的物质文化可以追溯到中世甚至更早。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物质文化沿袭的并不是东照宫神社或狩野派绘画那种华丽的风格，而是书院和水墨画风格。这并不是说当权者和巨贾们都以铺张浪费为耻，而是指社会的基本精神是节省能源、资源以及废物利用。如此一来，较之全民崇尚铺张浪费，大众可以享受到更高的生活标准和文化。将奢华定义为俭朴清寂，更多人便能拥有较高的健康水平。

第四章 健康的生活方式

奢侈、舒适、生活质量这些概念都很主观，随着文化的不同它们的定义也有差异，但是影响人类的种种物质文化则可以较客观地观察到。物质文化对健康的影响，是一个大大逾越了文化范畴的要素，尽管此要素并不完全游离于文化之外。本章考察的是德川时代衣、食、休息、沐浴的种类和品质如何影响人们的健康，并与西方进行比较。

食

物质文化中最容易测量的一类就是饮食，但正因为如此，在数据缺乏的情况下，它也是最难下定论的。我们可以测出饮食的数量和质量——卡路里和营养价值。然而，我们很难知道谁今天都吃了些什么，而要了解一个世纪甚至更早以前的人吃的东西更是难上加难。更麻烦的是，人们并不经常记录日常生活的流水账，这当中自然就包括吃了些什么。有些日记对生活中的其他方面——尤其是社会活动——都会详加记载，但却对饮食生活绝口不提。当然，就算

人们交代了他们必吃的东西，也不一定实话实说。口述史料告诉我们，人们很难记得他们通常都吃什么，而如果我们根据交谈的结果来构造一个大概的饮食模式的话，它与农作物产量或食物销量所显示出的粮食消费模式也极不相合。人们能记得在某一特别的社会活动时吃了些什么，但却记不得三天前的晚饭内容。

由于史学家在德川时代的日本人究竟消费了多少米饭这一点上尚存分歧，要了解他们的饮食状况就更为棘手了。尽管大米被认为是人们的主食，据今存的两份史料证明，很多，甚至可以说是大多数日本人都穷得吃不起大米，所以不得不用他们认为较次的米来凑合。一是某份常被引用的文件，就是著名的1649年告谕。在这份告谕中，幕府劝诫农民在收获时节不可将大米留给家人食用，而是屯起来以备今后之需。不能吃大米，他们就得吃蔬菜、小米和其他粗粮。也不可购买大米酿造的米酒。①另一份史料是写于享保年间（1716—1736）的一项报告书，书中称在种植稻米的平原地区，农民通常把大米做成一种叫“杂炊”的粥来喝，但山区的农民就只在新年的头三天里吃得起这种饭。②不过，正如鬼头宏所指出的，③必定有人会吃光了所有的大米，而在18、19世纪，大米的产量增长得比人口更快。④而且如果人们不吃大米，政府又有什么必要下令规劝大家呢？

显然，大米在德川时代是被广泛食用的。大米是17世纪早期

---

① 《庆安御触书》，渡边实解说，引自《日本食生活史》（东京：吉川弘文馆，1964），第244页。

② 田中丘隅，《民间省要》，引自鬼头宏，《江户时代的米食》，见《历史公论》第89期（1983年4月）：第43页。田中丘隅最初是地方官吏，后入幕府，所著《民间省要》出版于1721年。他是一位敏锐的观察家，对关东地区十分熟悉，其言论细致而具见地，广为后人引用。

③ 鬼头宏，《江户时代的米食》，第43页。

④ 菊池利夫，《新田开发》（东京：至文堂，1964），第223—225页。

的主要粮食，因此，政府以大米作为地区面积大小、武士薪水和税收的度量单位是很方便的。两个半世纪以后的1874年，大米在所有农作物当中占的比重是63%。⑤今存的数份德川时代部分地区的农产品和食品消费统计材料中，有一份来自1840年的长州。根据农产品和人口来看，大米约占其当年粮食消费的53%。⑥不过，在德川时代的任一时期，日本人究竟吃了多少大米，取决于人们的社会等级、收入、生活地区以及收成状况。

任何人，无论属于哪个阶级，只要买得起大米，都爱拿它作为主食。日语里把一餐就叫做一顿“米饭”，其他的东西都被视作配菜。尽管面包历来是西餐的核心食物，西方人甚至用“一起掰面包吃”来表示聚餐，但有钱人改善了就餐习惯以后，面包却不再是主角，这点和大米在日本的情况很不相同。对亚洲人而言，大米与其他粮食相比，在烹饪和口味上具有各种优点。泡在大量的水里煮它不会变形，和别的食物混起来也很不错。一家欧洲人吃饭时，除了主餐的粮食以外，通常还要喝浓汤，汤的内容也往往很纯。他们很少将主食与其他食物混在一起烹饪，除了牛奶。与之相反，在日本，一锅饭里以一种或若干种粮食——通常包括了大米——为基本，其他东西，特别是蔬菜，则会在烹饪过程中酌情加入。

随着经济发展，收入增加，农民们吃的大米越来越多，米磨得越来越好，米质也越来越精。在17世纪，人们吃的是半精米。这种米看起来较白，但是保留了部分的麸。17世纪末时，发展出一种工艺，可以完全去外壳而保留麸。精白米被看作是最上等的米，城里人多半吃这种米。但吃得起精白米的人往往会缺乏维生

⑤ 《明治七年府县物产表》，引自鬼头宏，《江户时代的米食》，第44页。

⑥ 西川俊作，《粮食消费：长州的个案》，见《过渡时期的日本》，马里厄斯·詹森与吉尔伯特·罗兹曼编（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6），表4。

素 B，也因此，脚气病就成了著名的“江户之患”。江户那些得了病的伙计们发现，当他们回到乡下以后，病就好了。但直到 20 世纪早期，这种病的病因才得以揭晓。⑦

在任何近代社会都很少出现仅以某一种粮食作为主食的现象。这么做不仅不能合理利用人力和自然资源，而且该粮食歉收时也会造成广泛的饥荒，因此非常危险。欧洲的很多地方在 19 世纪都曾受到土豆枯萎病的影响，但这只在爱尔兰引发了全面饥荒，就是因为有太多的爱尔兰人摄取营养几乎全靠吃土豆。德川时代的日本人吃各种粮食，大米只是他们最爱的一种，大麦和小麦位居其次。日本人还一直在吃日本最古老的粮食——粟和黍，这两种都属小米，还有如今已被认为不宜食用的一种禾草——稗。还有人吃荞麦和高粱，以及史前时代的人就吃的坚果、树根和各种块茎类食物。

从一份史料可以清楚看到人们吃的是些什么东西。这是幕府将军的一位名叫丹羽正伯的医生在 1734 年所作的一个全国性调查报告。这个报告的目的是为了知道纳税人都在吃什么。调查发现，在信浓（长野县），为了尽可能地保证高产，因地制宜种有多达 20 种稻米。不仅如此，人们还种了很多其他的粮食，包括荞麦，高地上还种着豆类，以及芝麻、罂粟、各种萝卜等。该调查显示，人们还会吃一些我们一般认为不可食用的东西，包括蚱蜢、马栗子以及野生植物。由信浓的史料也可以看出，人们的膳食随季节变化而有不同。这取决于他们干了多少活。在农务繁忙的时节，

---

⑦ 明治时代的日本海军在长期远洋航行中，减少膳食里的大米，增加副食，从而降低了脚气病的发病量。这是在脚气病的病因揭晓之前的事，虽然他们已经知道这种病是由膳食引起的，而且只流行于常年吃大米饭的国家。参考路易斯·列文顿·西曼，《日本真正的胜利：沉默敌人的征服》（伦敦：西德尼·阿普雷敦，1906），特别是第 13 章。

人们吃的饭更多。然而，由于该研究在农村中取样有限，看起来信浓地区人们的膳食并不因家庭地位的不同而有不同——主人和仆役吃的都差不多。[8]

在16世纪以及整个德川时代，许多新型食物传入了日本，同时此前几个世纪已经传入的食物更进一步得到了普及。一些指导农民培育优质农作物的手册前所未有地印发出来并广为散播。宫崎安贞所著的《农业全书》（1697）介绍了如何种植胡萝卜及其他新食物，包括土豆、青豆、玉米、红辣椒、南瓜、西瓜、菠菜，大多来自美洲，德川末期又引进了花生。[9]

对日本人来说，新传入的食物当中，最重要的就是薯类了。薯类在16世纪从南美同时传入欧洲和亚洲。[10]一般认为红薯和土豆都于1605年传入日本。起初日本人的反应和欧洲人一样：种植薯类是因为它们的花好看，至于块茎部分则拿来作饲料。到了17世纪后半期，日本西部的人方才开始食用薯类，最终它变成一种万能的食物。

日本饿死的人数大减，红薯功不可没。1732年，九州地方因蝗灾农作物歉收，但萨摩和长崎的死亡率都很低，因为人们为了活命，纷纷改吃红薯了。红薯与大米不同，可在高地种植，而且每亩红薯产生的热量比几乎所有其他农作物都要高。这种新型农作物抗饥荒的特性遂为日本各地人士注意到。备中（冈山县）的一位地方官不遗余力地宣传红薯的好处，以至于得到个“红薯老

⑧ 塚本学，《为了生存的智慧》，见《农村生活文化》，塚本学编，《日本的近世》卷8（东京：中央公论社，1992），第288—292页。

⑨ 渡边实，《日本食生活史》，第191页。关于专著《农业全书》的详情及其对德川时代农业的影响，参考托马斯·C. 史密斯，《现代日本的农业起源》（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59），第88—92页。

⑩ 土豆传入日本的情况，见渡边实，《日本食生活史》，第246—249页，以及安达岩，《日本食物文化的起源》（东京：自由国民社，1981），第257—259页。

爷”的绰号。1734 年，从萨摩藩主岛津氏处传来的红薯种子在上野（群马县）和下野（栃木县）进行了实验性播种。《红薯记》一书记载了如何种植红薯。此书颇为畅销，以至于在 18 和 19 世纪分别再版了一次。红薯不但可能是日本 18 和 19 世纪人口保持稠密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也可解释为什么西日本的人口比其他地区增长更快，尤其是那四个对颠覆幕府起到推波助澜作用的藩——萨摩、长州、土佐和肥前。

人们吃什么，又是怎么烹饪食物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可以使用的工具和技术。⑪在整个德川时代，随着地域和时间的不同，人们的工具和技术各异，而这些变化也带来了膳食上的变迁。传统采用的烹饪手段有两种：在围炉上架一口锅或在灶上做饭。靠围炉做饭的人家，都喜欢吃一锅杂烩，适时将不同的食物放入锅中烹煮。这和英国的一锅煮非常相似。英国的做法是以麦片熬粥，或将数袋食物放入沸水中，然后大家分而食之。买得起灶的日本家庭就可以做更复杂的饭菜，包括把米饭或面食与汤、菜分开来做。到德川时代，灶已在城镇广泛使用，特别是在燃料稀缺昂贵的关西地区，而围炉则盛行于较冷的北方。⑫

如今人们烹调主食的方法是将精米蒸熟，这种较新的技术和灶的使用有关。蒸饭法和相应的设备在德川时代中期逐渐得到发展，但直到一个世纪以前才最终完善并普及。最初，人们采用两种方法蒸饭。一种和现在一样，在开始蒸的时候就加入不多不少的水，米将液体完全吸收时饭便蒸好了。另一种方法是一开始加入比最后所需更多的水。在蒸的过程中，将多余的水倒掉，剩下米在锅中蒸熟。第一种方法更麻烦一些，因为必须要精确地测好温度，米开始蒸时

---

⑪ 关于厨具和烹调手段，荣久庵宪司的《厨具的历史》（东京：柴田书店，1976）有极好的阐述。

⑫ 同上书，第 71—72 页。

要慢火，蒸到一半，转大火，但到蒸好前都不可掀开锅盖，还要让米在锅中再静置一阵。这样做出来的饭极易糊锅，因此比用围炉架锅煮面花的功夫要多得多。显然，只有精英和有钱人才有如此做饭的人力物力和时间。然而这种蒸饭法的人气逐年上涨。由此可见，大众的生活标准和营养水平无疑在提高。

直到德川时代中期以后，日本料理才真正因烧饭方法的改变而脱胎换骨。在京都和大阪以本地料理闻名的年代，人们认为江户根本没有美食。这种情形逐年有了改观，尤其是酱油之类的调料和香辛料被广泛使用以后。到 17 世纪末，普通老百姓开始在午后大约 1 点左右时吃第三顿正餐，叫做“中食”，也就是“中间吃的一顿饭”的意思。随着城市发展，出现了最初的餐馆。渐渐地，主打某一特色料理的各种铺子涌现出来，从天妇罗油炸食品店、面馆、鳗鱼店，到甜品店和在晚间售卖小吃和饮料的推车。“茶屋”也即高级茶座发展成为餐馆，连穷人有时都会去那里吃面。很明显，人们有更多的钱用来买吃的，即使是那些租住小公寓屋无法做饭的人，也可以吃得饱又吃得好。⑬

到 19 世纪，无论贵贱，很多人都出去下馆子，以至于政府一度试图对此加以限制，但未遂。19 世纪中期，在江户，寿司店和荞麦面馆比其他任何类型的餐馆都要多。1860 年，来自纪伊（和歌山县）的一位高级武士写道，江户处处都是餐馆：荞麦面馆、按碟售卖食品的馆子、卖“汁粉饼”（小豆馅饼）的铺子比比皆是。纷至沓来的游人不仅在这些地方吃饭，还把全国各地的饮食知识带到这里，又把他们在江户见识到的东西带回家乡。凡对当时下馆子潮流有所记述的人，都注意到两个事实：第一，人们下

---

⑬ 关于厨具和烹调手段，荣久庵宪司的《厨具的历史》（东京：柴田书店，1976）有极好的阐述。见该书第 164 页。

馆子的前提条件是他们的富裕程度上了一个新台阶；第二，下馆子热给餐饮发展带来了很多好处，比如新的食品就藉此被传播开来。⑭

食谱的出版，也显示出德川时代大众的身体健康和财富达到的水平。人们不再忧虑是否吃得饱，很多人吃得都是花样百出，还想知道各种料理方法。同时代除了中国，日本是亚洲唯一出版过食谱的国家。最早出版的一本食谱应当是1643年的《料理物语》。⑮到德川时代晚期，市面上传阅着的食谱已多达一百多本，这些书的改编版更是不计其数。每十年之内出版的食谱总数都反映了这期间的经济形势。在19世纪早期，即繁盛的文化—文政年间，食谱出版达到了顶峰。⑯在18世纪，食谱的重心已经从实用转向了单纯的美食欣赏。⑰有钱人家的厨师会尝试一些异国风味的新调料，比如19世纪开始传入日本的桂皮。显然，很多人收入大增，足以消费，也乐于尝试形形色色的美食。

始于中世纪的传统一直是日本料理的基础，德川时代料理的发展也是基于这一传统之上的。⑱在室町时代，禅寺的料理风格在民间传播开来，成为人们根深蒂固的吃饭方式，此时也就被视为日本料理的发生发展期。世人开始接触到豆沙包、羊羹、豆腐等斋食。茶逐渐成为全国性的饮料。⑲随着市场和盐业的发展，鱼可

---

⑭ 三田村鸢鱼，《江户的衣食住》（东京：青蛙房，1957），第10—93页。渡边实，《日本食生活史》，第214—224页。
⑮ 平田万里远，《日本料理的心》，见《江户料理百选》，福田浩与岛崎富美子（东京：2001年社，1983），第224页。
⑯ 原田信男，《江户后期的料理书》，见《江户料理百选》，第238页。
⑰ 同上书，第232页。
⑱ 关于日本料理发展史概况，请参考渡边实，《日本食生活史》。据渡边论述，日本料理在镰仓和室町时代兴起，而在17、18世纪臻于完善。
⑲ 茶在奈良时代传入日本，后被禁饮。镰仓时代，人们再次开始饮茶。渡边实，《日本食生活史》，第126页。

以被保存很久然后在整个西日本进行销售，特别是那些大城市和重镇。日本人开始吃多种蔬菜，同时城市周边的菜地也越来越多了。产生这一需求部分是由于寺庙里盛行的素食——“精进料理”大受欢迎之故。

调料作为传统日本料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兴起于室町时代，虽然那时候的调料和现在的还很不一样。酱油在室町时代中期尚未出现，但16世纪中晚期的记载表明，那时它已被广为使用了。当时的酱油是如何制造出来的，我们如今只能臆测，但是既然酱油意味着“豆酱的油”，豆酱即味噌，那么最初的酱油就是制造味噌时产生的油滴。随着制造味噌方法的日渐改进，真正的酱油产生了。从味噌里造出的其他调料被售卖消费，渐渐的，味噌本身也成为一种纯粹的调料。米酒、糖和醋也日益用于料理当中，绿芥末（日本山葵）、芥末、姜、胡椒之类的调料被广泛使用。所有这些调料里，只有胡椒是西方舶来品，由欧洲人在16世纪传入。[20]

室町时代晚期，从主要菜式、调料，到进食的工序组合，传统日本料理的所有基本元素都出现了。德川时代料理的变革，主要只是在烹饪上更加精益求精，以及出现各种流行饮食的更迭。当然，腰包鼓了，天天食不厌精者已大有人在。味噌和酱油得到普及的重要意义在于，用它们拌饭吃可以全面摄取到蛋白质，虽然这也会令饭更咸。人们摄入豆类，不仅通过味噌和酱油，还有豆腐。在山珍野味这一蛋白质资源近乎枯竭的时候，[21]别的资源出现了，而且还比猎物肉更容易行销各地。

由于地域差别、收入差别以及资料的缺乏，我们不可能推断出德川时代所有日本人的标准膳食是怎样的。也许很多人一直吃

---

⑳ 渡边实，《日本食生活史》，第149—150页。

㉑ 关于吃肉的问题，参考第三章。

着与若干世纪以前一样的东西，用的是同样的烹饪手法。例如，15 世纪时，本州最北方的居民主要吃“稗粥”，据说德川时代仍然有人吃这种饭。住在低地的人们，因为很容易种植稻米，就把米都做成粥来喝；在火上悬锅熬粥不费吹灰之力，还可以加入绿色蔬菜和其他调味品。大米通常是将粗粮糅合在一起的“浆糊”，因此用大米就能将杂烩混成理想的一锅饭。通常加一些时令蔬菜，就可煮一锅什锦菜饭。这种饭一天只会吃一顿。据东海道沿岸川崎地方的饮食记载，另几顿饭吃的就是些米汤了。在江户周边的武藏野，德川时代中期以后的膳食据说主要是粗粮，通常是三分粟米和七分大麦。㉒

另一种重要的食物是某种未经发酵的面饼。曾经到长野地区旅行过的铃木牧之（译者注：德川时代后期的儒商）在 1827 年写道，当地的早饭和晚饭主食皆为一种稗谷做的“烧饼”。长野—山梨地方逢年过节时会用这种烧饼招待客人，这一风俗一直到“二战”以后都很闻名。烧饼是将面粉置于炉中以文火长时间烘焙而成。从中亚到南亚都有吃未经发酵的面饼的传统，烧饼就是其中一种。这一传统直到今天尚有迹可寻，例如过年时人们会吃一种“煎饼”，即烧米饼。德川时代的另一主食叫做“水团”。这是一种圆形饺子，状如犹太人吃的玛索面丸子（matzo balls），以沸水煮食。这“水团”可以用任何东西制成：荞麦、玉米、土豆或者小麦。㉓

一说起传统日本料理，我们想到的就是汤和蒸米饭、数碟配菜外加泡菜。这是在人们培植精米以及厨具和蒸饭的技术进步以

㉒ 田中丘隅，《民间省要》，转引自木村础，《农民生活的诸相》，见《生活史》2，森末义彰，宝月圭吾，木村础编，《体系日本史丛书》卷 16（东京：山川出版社，1969），第 201—202 页。

㉓ 大塚力，《和食的成立及其进步——以近现代为中心》，《生活文化史》第 9 期（1986 年 3 月），第 19 页。

后才慢慢发展起来的。即使一个武士家族，日常吃的也就是大米饭混粗粮，配菜是鱼，主人的菜会加些别的内容，但也不过是汤、泡菜，其余家人和下人或许会有些煮蔬菜。冈山地方一名叫香川真一的下级武士在1830年至1860年间的日记里写道，在他年轻时，全家吃的饭都是大麦加大米，一碟蔬菜或豆腐，然后就是味噌汤。一个月里最多有四五顿会吃鱼。后来访问祖母家，他吃到了纯粹的大米饭，一直念念不忘，因为实在太好吃了。[24]

另一名武士在19世纪60年代写道，他日常吃的包括汤、泡菜和“茶渍”（茶泡饭）。如果一顿饭有豆腐、煮蔬菜、一个鸡蛋或一些低档的鱼，他就感觉已经吃得很不错了。[25]显然，德川时代末期的武士最喜欢吃的东西，在今天看来肯定是些粗茶淡饭而已。在佩里与日本签下打开国门的条约后，一位日本高官访问美国，并留下了他的旅行见闻。他写道，返日途中，所有的味噌汤在离开纽约30天后都吃光了，他们就以腌萝卜佐以小片鲣鱼干代替之。人们聚在一起，说的都是吃；一回到家，大家最想吃的是一顿有味噌汤和泡菜的饭。大塚力认为，这种搭配在20世纪最终成为一餐日本膳食的标准内容。[26]

另一方面，旅馆和节日盛会保留了很多关于食品的记载，同时，精英和富人们享受的美食让我们得出结论：一部分人吃的可谓山珍海味，至少他们不时会有此口福。德川时代中期在米泽地方，一小撮村政府领导班子在秋收后召开大会，会上吃了以下东西：腌三文鱼、金枪鱼、豆腐、鲣鱼干、章鱼、鲱鱼子、鲱鱼

㉔ 这位武士所描绘的自家的饭菜通常叫做“一汁一菜”，也即一碗汤加一碟蔬菜类配菜。一般认为“传统”日本家常便饭就是这些内容。谷口澄夫，《幕末肥前藩下级武士的生活》，见《吉备地方史》13（1954年12月）。

㉕ 渡边善次郎，《巨大都市江户缔造了和食》（东京：农山渔村文化协会，1988），第85页。

㉖ 大塚力，《和食的成立及其进步——以近现代为中心》，第20—21页。

干——都是在附近镇上买的——鸡蛋、滑子菇（一种可食用的蘑菇）、加吉鱼、豆干、鲇鱼、辣根，等等等等。[27]很多东西人们平时肯定不会吃，也不可能拼成如此一桌盛宴，但这些菜都是买得到的，农民们也有足够的收入在节假日去买来吃。那时糖还是一种奢侈品，人们只会买一点点，但在德川时代中后期，就连较贫穷的北方居民也买得起糖，而且也确实会去买糖吃，这倒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现象。[28]

幕府有位低级官员是个美食家，他在1856年的日记里，将自己出差到江户以北地区时沿途所住旅馆里的菜单一一记下。[29]进奉给这位官员的餐饮和今天日本的传统旅馆里所提供的大同小异。如果分量也差不多的话，那么当时的旅客们足以吃饱了，唯一可能摄取不足的是维生素A。但人们在家里还要吃红薯、大南瓜、小南瓜以及各种绿色蔬菜，这些应该能平衡他们的膳食营养。

除了极个别例子，目前尚存的德川时代以来的大量日记里面，吃喝占的篇幅都很小。日记主题一般集中在工作和社会关系上，而只有在涉及到极特别的或者是社交的场合时，吃喝才会被提及。但凡有提及之处，其内容和菜式对今天的日本人来说都颇为耳熟。一个在金泽的农业机构任下级秘书的名叫梅田的小市民，在1864年至1868年一直记日记。日记里很少言及吃喝，一旦有所讨论，都是关于赴宴的。在1865年的一次公差途中，他将每个盘子里上的菜都娓娓道来。在一个“茶屋”里所吃的午饭包括一小瓶酒、一块鲽鱼肉、一碟煮蔬菜、米饭和茶。晚饭是煮白萝卜佐以一点

㉗ 木村础，《农民生活的诸相》，第204页。

㉘ 森嘉兵卫，《日本僻地的史学研究》卷I（东京：法政大学出版社，1969），第524、536—540、572页。

㉙ 速水融，《从幕末期〈检见日记〉所见的旅馆饮食》，见《历史公论》第73期（1981年12月），第80—87页。

黄尾鲕鱼调味、白萝卜味噌汤、两片黄尾鲕鱼佐以紫苏、魔芋丝以及两只虾。他将一路所有的吃喝内容都如此这般记下。但我们从日记里无法看出，这样的饮食对此君究竟是家常便饭还是非同寻常。不过，这一趟多半比他平时的吃喝要丰富些，味道也恐怕是更好，否则他也不会在日记里一一写下来。[30]

有个当铺老板娘名叫阿峰，她在1791年至1825年间写下的一些日记尚存于世。日记里的话题集中在社会关系上。大量家务有佣人为她做，包括大部分下厨工作，而且看起来她好像对吃没什么兴趣。她提到她曾吃了碗茶泡饭（她美其名曰“御茶泡饭”），多半因为那是她自己做的。其余触及吃喝的地方都是请客，收到某张仅限食品选购的礼品券，或者事关应酬。[31]能写日记、同时也有时间来写日记的人，不会属于饥饿的或者要自己做饭的阶级。

虽然记日记者即使在粮食歉收的年月也并没饿过肚子，他们有时还是会流露出一些对其他饿肚子的人的关注。川合小梅是一位在和歌山县的学习馆教书的儒生之妻，丈夫是入赘的。她写了将近40年的日记，直到1876年才封笔。也就是说，日记的年代涵盖了发生大饥荒的天保年间。1837年，她在日记里记录了自己日常生活的种种细节，尤其是来往的客人和物件的出入情况。显然，她的日子并不因当年的灾变而变得窘迫，虽然她提到丈夫的俸禄大米变卖了多少价钱，还提到这一年物价的波动。日记还提及大阪爆发的大盐平八郎暴动，但只是以和访客们聊天的形式讨论到的。她说起垂死的乞丐，还说很多居民都已沦为乞丐——这意味着同时存在施舍得起的富人——但她们一家倒是因为歉收而致富

---

[30] 若林喜三郎编，《梅田日记》（金泽：北国出版社，1970），第84页。

[31] 《日录》，《和歌山市史》卷3，和歌山市史编纂委员会编（和歌山：和歌山市史编纂委员会，1975—1992）。

了，因为米价大涨，靠高价卖米赚的钱，夫妇俩就买得起一些以前不敢问津的东西了。尽管他们对外出租了一套房子，日记里从未提到过租户们生活得不好或是收租金有什么麻烦。这本日记所描述的天保大饥荒给人的感觉完全迥异于官方那些关于民不聊生的记载。㉜

金泽藩的一位中级武士寺岛藏人也曾讨论过1837年危机时的饮食状况。因为他在农民支持者中属于有头有脸的大人物，那一年便被流放至能登半岛的一间"小屋"里软禁起来。他有两名侍从随身，这一事实说明此人过的仍然是武士派头的生活。㉝他写日记，而且大概由于无事可做，日记详细记载了每天吃的是什么，农民送了些什么给他尝鲜，家人捎来了什么，诸如此类。1837年夏天，他一天吃三顿米饭，每顿一般要吃两碗半或三碗，菜还不重样，虽然吃的内容其实相当简单：米饭，梅干加糖，早上有味噌腌的咸菜。他一天大概至少要吃一次鱼，甚至更多。饭菜大多是家人送来的。他还一直写信告诉他们，自己什么也不需要。他说，自己和正在经受饥荒的村民们住在一起，那些人吃的都是诸如一种叫做"Igo"的，用糙米掺和切丁的块茎类和较硬的海草做成的更经济实惠的饭。㉞

尽管发生了饥荒，能登岛民仍然送海鲜、竹笋和本地特产给藏人吃，同时，藏人虽然深深地同情农民，却从未把家里捎的副食转送给他们，因为料想他们不会喜欢吃。㉟藏人自己会向他们要一些特别的调料，比如芝麻、罂粟、芥末和胡椒，但在当年的农

㉜ 川合小梅，《小梅日记》，东洋文库256（东京：平凡社，1974）。

㉝ 若林喜三郎主编，《岛物语——寺岛藏人能登流刑日记》（金泽：北国出版社，1982）与《续岛物语——来自寺岛藏人流刑地能登岛的信》（金泽：北国出版社，1985）。

㉞ 若林喜三郎编，《续岛物语》，第31页。

㉟ 寺岛藏人的原话是"视味噌与粪便无异"，同上书，第243页。

历八月，此处乡下已经断米，人们吃的都是豆子、白萝卜、蔬菜和野草。他屡屡提到那个听来的故事：母亲外出讨饭数日，回家后发现孩子们都死了。然而，城里人并没有断米，只不过他们在米里加了切丁的胡萝卜头或者白萝卜[36]——虽然热量少了，实际上营养倒可能更丰富了。

仅凭轶闻是难以评估民众整体的营养状况的，虽然这不是唯一的资料来源。评价近代日本人营养水平的两种主要方法参考的都是农产品的地区价格，所以我们获得的是平均数值，而并不一定和某家某户或某个人有关。这类估计也忽略了人们自己种地自己吃的情况，而自给自足的东西是从来不会有价格的，数量又肯定相当可观。令人遗憾的还有，现存数据资料只包括了19世纪的部分时期，显示的是明治维新前后数十年的营养水平而已。

最宏大的一项课题是根据1874年的史料对岐阜飞驒地区进行的研究。[37]该史料包括了168种土产食品和销入当地以及从当地外销的食品。通过将当地拥有的食品按照总人口和一年365天来进行细分，我们大致可以窥探在1874年里，“平均”每个当地人能获得多少营养。

对飞驒地区的这项研究显示出，人们膳食上严重依赖大米和小米，这样便导致某些维生素和矿物质摄取不足，尤其是维生素A和C、钙和铁。食物多多少少还是缺乏蛋白质，盐分却很高。分析当地一所寺庙记录的居民主要死因，就可知这样说不是没有道理的。据载，主要死因有难产（缺钙是原因之一）、脑中风（和盐分

---

[36] 若林喜三郎主编，《续岛物语》，第31、45—46页。

[37] 对这一地区的膳食进行的研究详情，参考藤野淑子，《明治初期山村的膳食和营养：通过分析〈斐太后风土记〉》，见《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研究报告7》，第3期（1982年9月），第632—654页。

摄取太多有关）和瘟疫（营养水平低会使病情恶化）。然而关于飞驒地区的这项估计仅限于山区，同时研究者们也承认，其实有些食物内容并没有记录在案，例如糖果、蛋类、海藻类、菌类，还有人们在山上采摘的野菜。这些东西想必会提高他们膳食中维生素的摄取量。由飞驒地区所获得的资料，研究者们估计当地人均每日所摄取的热量约为1850卡路里。

另一项研究是在长州地方进行的。[38]西川俊作测定，在19世纪40年代，当地人均每日从主食里所摄取的热量是1663卡，来源包括大米、大麦、小麦、荞麦、大豆、红豆及红薯。从营养上来看，当时的长州人摄取蛋白质多是靠吃谷类和豆类，尤以谷类为主，80%的蛋白质都是从这里获得的。上述测定由官方的数据得出，因此有可能低估了实际的水平。并且这还没包括蔬菜、海产或其他一些未被统计的食品。尽管这些未曾考察到的东西也许不会有太高的热量，但每人每天平均会多摄取数百卡是肯定的。山口县1887年的数据显示出，当地人均每日从主食所摄取的热量是1902卡。由飞驒和长州的情况可见，两地人均每日热量的摄取量应该是很接近的。

日记、游记、地方记载和零星的资料不能概括全国人民吃饭的详情，也不能凭此断言当时日本人营养状况肯定良好，或者肯定比17、18世纪的欧洲人好。飞驒和长州人摄取的热量估计值按照今天的标准来看仍然是很低的，但对当时人的个头来说，大概已经足够了。19世纪末，日本军队的平均身高是162厘米，即刚好5英尺4英寸。[39]据马西姆·利维巴茨估计，假定那时人的身高和体重值都比今天要低些，“若干世纪以前，人均一般摄取2000

㊳ 西川俊作，《粮食消费：长州的个案》，第436—437页。
㊴ 《日本帝国第九统计年鉴》1890年，转引自西川俊作，《粮食消费：长州的个案》，第439—440页。

卡热量的话，大家就可算是吃够了，至少能量是不成问题了”。[40]另外，孩子和老人吃得相对少些，就给成年男子省下更多的口粮。即使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世界上吃得最饱的地方之一，成年女性每日热量的建议摄取值也不过是1800卡至2000卡，老人则只有1500卡。

不过，我们不应拿德川时代的膳食和今天的作比较，而应参照工业化以前的其他国家。欧洲人很大程度上也是依靠谷物类粮食来摄取热量和营养的。在19世纪晚期的英国，普通工人甚至几乎不吃肉，除非你是一家之主。人们只在重大节假日才开荤。[41]16至18世纪英国农村穷人的主食是“面包，通常由大麦制成，有时也会是小麦、燕麦、黑麦，或者杂粮（小麦和黑麦的混合）”。农人也吃蔬菜、牛奶、奶酪和猪油，肉是难得吃几回的。[42]可见，除了不吃奶制品而以豆制品代替以外，日本人吃的在内容上和欧洲人大概并没太大差异，虽然烹饪和调味方法有天壤之别。事实上，一直有人怀疑亚洲人的吃法从很多方面来说都比欧洲人要好：一个在19世纪中期到过中国的英国人发现，中国的劳动人民用茶叶佐餐，比苏格兰农夫和英国水手都要有营养。他认为，中国人通常吃的不过是米饭、蔬菜和少量的蛋白质，可对这些人来说，早饭浓汤加牛奶，下一顿啤酒就面包，晚间还享用腌牛肉加饼干的轮船大餐，反而根本就填不饱肚子。[43]

---

[40] 马西姆·利维巴茨，《人口和营养：欧洲人口统计史论》（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1），第27页。

[41] S. 米查姆，《别居：英国工人阶级1890—1914》（伦敦：泰晤士与哈德逊，1977）。

[42] J. F. C. 哈里森，《大不列颠平民史：从诺曼征服到今天》（布鲁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85）。

[43] 罗伯特·福琼，《与中国人住在一起：内地，沿海和海上》（伦敦：约翰·默里，1857），第42—43页。

以当时人的体质来看，他们需要吃什么，而实际吃的又能满足多少这种需要？对此，事实上营养学家掌握的资料很有限。这也成为讨论德川时代膳食的一个难点。我们看一下福井县的一座禅寺——永平寺的僧人们的实际膳食情况，就会明白这类信息的不足。永平寺自若干世纪以来一直吃素。僧人们每日人均摄入1200卡热量。早饭是一碗玄麦粥、泡菜，以及芝麻和盐制成的调料。午饭是大麦米饭、味噌拌蔬菜。晚饭与午饭相同，只不过多了一碟煮蔬菜。没有肉、鱼和奶制品。

由于这些和尚每天吃进去的热量只有普通人的一半，他们是怎么保持身体健康的呢？这成了一个谜。初入此寺的新人在头两个月会迅速消瘦，双腿浮肿，但从第三个月起就会恢复体重，又变得容光焕发。研究过永平寺僧人的医生无法对此现象进行解释，只能下结论说在这些僧人的体内实现了某种和谐。和尚们吃的都是古来的日本人吃的那些东西，身体还这么好，于是我们不难得出结论：既然德川时代大众的饮食与这些僧人差不多，那么他们的身体很可能比摄取了更多热量的外国人更好。[44]

不少营养学家认为，德川时代的料理可能比明治维新以后的新一代食品要更健康。我们概念中的“传统”日本料理就是白米饭、茶、味噌汤、泡菜、几碟蔬菜、鱼、一点肉，通常以酱油调味。白米饭缺乏维生素B，同时喝茶也有“危及人体硫胺素（维生素B1）水平”之虞。[45]钙和人体的关系至今扑朔迷离，但有研究表明，钙的流失与其说和钙本身的摄取有关，毋宁说更多和蛋白

㊹ 石川直文，《营养六分够，精神饱满的修行餐》，见《朝日新闻》1990年7月29日，第14页。

㊺ 此问题是在泰国的研究发现的。泰国农村至今仍然盛行脚气病。维柴·坦派齐，“硫胺素”，《营养评论之今日营养学知识》，第4版（纽约：营养基金，1976），第146页。

质的摄取有关。对成人而言，蛋白质摄取量越大，从人体排泄出的钙质就越多，与摄取了多少钙倒没太大关系。“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蛋白质、磷、氟，以及荷尔蒙……都会影响到钙的代谢”，并由之产生骨质疏松症。[46]味噌、泡菜和酱油的盐分都很高，可导致高血压，并且是罹患中风和心脏病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随着生活标准的提高，人们渐渐不再只吃杂粮饭加蔬菜，喝白开水或偶尔一点茶，而是转向所谓的“传统”日本料理，从身体健康水平的角度来说，倒可能意味着一种倒退。收入多了，有些人就吃得起更多的花样，膳食也越发精良；但另一些人，尤其是城里人，吃的却会越来越有限。与欧洲的情形一样，我们对此很难予以定论。在第六章分析长寿时，我会再次讨论营养这个问题。

衣和寝

德川时代平民的生活之所以更加健康，营养改善并不是唯一的原因。最显著的进步之一是，棉制品成为所有社会和经济阶层的日常用品。棉布冬暖夏凉，柔软可洗，必然降低了全国皮肤病和瘙痒的发病率，是内衣和便装的理想材料。以棉花填充的衣服比前人穿的所有类型的衣服都要暖和。随着棉布的普及，被褥兴起，这就意味着，人们晚上不必在小屋里关起门窗抱作一团也能睡个暖和觉了。

棉花在14世纪末15世纪初传入日本。棉布首次得到广泛使用，是在战国时代作为士兵们的战袍。[47]棉布在舒适度和耐用度上都比以前的材料上了一个新台阶，于是，中国大陆舶来的这种新式纤维立刻吸引了人们的视线。棉布大受欢迎的另一不容忽视的

㊻ 海伦·M. 林克斯维勒，《钙》，见《营养评论之今日营养学知识》，第232—239页。引用部分见第239页。

㊼ 永原庆二，《新·棉花以前诸事》（东京：中央公论社，1990），第72页。

原因在于方便清洗。尽管丝绸仍是有钱人的首选衣料，他们更爱以舒适易洗的棉布来做便服，比如睡衣和夏装。低收入的人以前穿的是亚麻、皮革、纸，或以其他材质凑合，但无论从保暖性、舒适性或可洗性来看，这些都不是理想的衣料。棉布流行后，普通老百姓是最大的受惠者。

棉制品在德川时代早期有多风靡，可以从当时日本国内的棉花贸易实录中得到印证。我们确实不清楚日本人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本土种植棉花的，但据永原庆二研究，在德川时代早期，棉花买卖已颇成气候。大量记载表明，当时在很多地方都有棉花种植和交易，尤以畿内为先。1697 年写就的《农业全书》罗列了主要的产棉地区：河内、出云、摄津、播磨和备后，均位于日本中部。1714 年，在运往大阪的物资中，棉花的价值仅次于大米。棉花和棉线成为除大米之外国内最重要的商品，远远超过了油菜籽、沙丁鱼干、酒、木材或靛青。[48]

棉制品在德川时代的大众生活中究竟占据了多重要的地位，从冈山地区可以略窥一二。在那里，棉布制造已经发展为主要的产业。该县的儿岛地区，种植、加工和纺织棉花的规模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到 1823 年，村官试图遏制棉纺业，因为干这行报酬太高，大地主们都留不住农民来耕田了。到 1840 年，藤户地区的村民平均每家有一台纺织机，有的有三台之多。19 世纪早期以来，村民们建立了“问屋”（批发商组织）将本地产棉制品营销到外地去。这时，小仓地方生产的“小仓织”也闻名全国。[49]

棉花遍及全日本以后，被褥床品也发展起来。镰仓和室町时代以来，所谓被子，就是指“座蒲团”。在 1592 年，首次出现了

---

[48] 永原庆二，《新・棉花以前诸事》（东京：中央公论社，1990），第 130—193 页。
[49] 《冈山市史：产业经济编》（冈山：冈山市役所，1966）；小野武夫，《日本近世饥馑志》（东京：学艺社，1935）。

把“蒲团”称作被子的说法。但究竟这“蒲团”指的是被褥，或不过是一种睡衣？语焉不详。不过17世纪20年代以后，“蒲团”出现日频。那时正值棉布人气大旺，自此以后，棉花越来越被用于制造被子。[50]

棉花的普及，与人们使用两个词语大有关系，一个是“夜着”（睡衣），一个就是“蒲团”（被子）。这说明，睡衣和被子的风行，和棉花的风行是密切相关且同时发生的。[51]19世纪日本被褥的样式表明其来源于睡衣。在德川时代。被面的形状像一件“小袖”和服，有袖子还有领口。这种造型的被子在关西地区甚至“二战”以后都能见到。较早的时候，所谓被褥，即为一条单被，一侧有个袖子，睡觉的人将身体裹在被子里面，袖子放在被子上。武士睡觉原则上要腾出右手，也就是要把手放在身体上，可见，这种风格的被子本应为战争时期所用。据说德川家康睡的就是这样的被子。[52]当然，穷人是睡不起这么奢侈的被褥的，但对那些有钱人来说，有了被褥，就是暖和了全家，晚上也就不用在“纳户”里蜷缩着保持体温了。老弱病残有了被子保暖，身体会好很多，再者，大家不再相拥而卧，也就减少了细菌的传播。有了被子，人们就可以在家里的任何地方睡觉，也就不用局限在“纳户”里，从而避免了纳户里因铺着稻草、空间闭塞造成的虫咬和湿气。不过，如果所谓变革只是以棉布替代稻草，将棉布在纳户里铺一天一夜的话，由于棉布也会吸收湿气，同样是不利于健康的。即使是到了19世纪中期，很多日本人仍然以稻草或其他东西铺床。但即便如此，他们睡觉时也多是穿着棉布衣服的。

---

[50] 小川光阳，《卧室与卧具的历史》，《风俗文化史选书》卷7（东京：雄山阁，1973），第146—170页。

[51] 同上书，第150页。

[52] 同上书，第170页。

棉花的普及在欧洲和在日本是同步的，同一世纪传入，之后同样广泛流行。不同的是，欧洲北部的国家不得不从南方国家输入生棉花，而也就是这些北方国家——还有美国——发展出加工生产棉制品的技术。日本所做的，则是在此后将这些技术借鉴回来。棉花传入欧洲，使可清洗的内衣得以出现，舒适度和卫生度都大大提高，在日本也是如此。棉布不但手感更为柔和，还可以沸水高温消毒和杀菌。

洗　澡

如果说欧洲人用沸水烫洗的是他们的衣服，日本人"烫洗"的则是他们自己，至少在西方观者的眼里是如此。[53]洗热水澡在德川时代成为日本人生活的一部分，虽然我们尚不清楚这究竟是如何、从何时开始风行的。由平安时代的文学资料可知，10、11 世纪的贵族并无此习惯，然而到了 18 世纪，有关沐浴和沐浴事宜的话题如此之多，显见已是遍及各地的风俗。首次提到公共浴室是早在 14 世纪 20 年代的祇园。[54]我们尚不清楚公共浴室是什么时候流行起来的，但在 17 世纪早期对江户有过记述的三浦净心写道："大街小巷都有公共浴室"，很便宜，他认识的人个个都去那里洗澡。[55]

到了德川时代，人们普遍享用起各式各样的"风吕"（对所有类型沐浴的总称）来，从蒸汽浴到坐在热水里浸泡全身的桶浴都有。[56]文学作品里，对洗澡的描述屡见不鲜：《东海道中膝栗毛》

---

[53] 爱德华 · S. 莫尔斯，《日本人的家和环境》，第 202 页。

[54] 落合茂，《洗的风俗志》（东京：未来社，1984），第 71—72 页。

[55] 中村和伯编，《江户资料丛书——庆长见闻集》（1614；再印刷，东京：新人物往来社，1969），第 160—161 页。

[56] 值得注意的是，绝大多数日本人并不是每个人单独用一个浴桶洗澡；在公共浴室，热水大家共用，在家里则是轮流用。所以，这种洗法不如单人沐浴卫生，但倒可以让更多人洗得更勤。

里的主人公喜多八洗了一次“五右卫门风吕”（一口大铁锅，里面放上木头底板用来坐在上面）；俳句里有对洗澡的描写；在井原西鹤的作品里，也时有关于洗澡的文字。最能说明当时公共浴室盛况的，是对“钱汤”——公共浴室——种种规则的记载。之所以建立“钱汤”的规章制度，一是由于公共浴室数目众多，二是由于这些浴室开始藏污纳垢，与许多社会问题和犯罪脱不了干系，正如古罗马的大浴室造的孽一样。18 世纪 90 年代，江户规定禁止男女共浴，因此公共浴室只好每月划分出不同的日期让男女分别入浴。函馆（北海道）1854 年下令浴室必须要有一名守卫，以防入浴者的衣物被盗，而且虽然准许男女共浴，还要派一名公共浴室行会里的人确保浴室维持风纪。函馆的公共浴室每天早上 6 点开门，晚上 8 点关门，一年例行关门两天。[57]从法律制度、文学作品、浮世绘版画、游记、建筑和城市档案以及趣闻轶事里显而易见，到了 19 世纪以后，无论尊卑，人人都经常洗澡。[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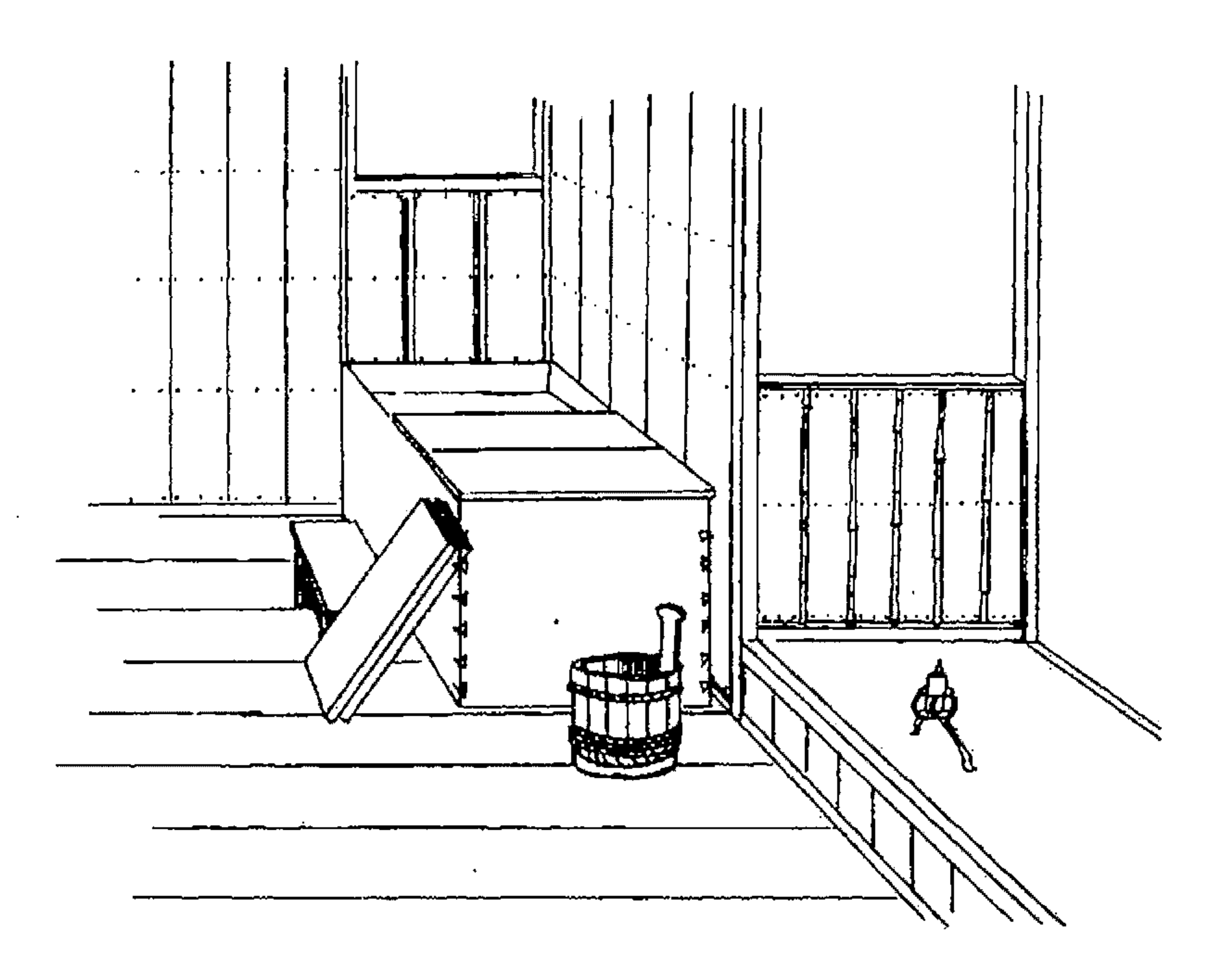
德川时代中期以来，人们不仅成群结队去公共浴室洗澡，而且还在自己家里安装浴桶。前文提到过的那个当铺老板娘阿峰就在日记里记下了她在家里洗澡的日子。她于 1791 年农历五月的初一、初四、十四、二十四、二十六和二十七日，六月的初二、初三、初四、和初八在家洗澡。当年九月，她在日记中写道，自己于初二、初四、初六、初八、初十、十四、十六、十八、二十三、二十五、二十七和二十九都在家洗澡，而且二十日还为家人烧好了洗澡水，但并未注明本人当天是否也曾洗过。[59]

---

[57] 谷川健一等编，《日本庶民生活史料集成》卷 15（东京：三一书房，1971），第 57、823 页。

[58] 今野信雄，《江户的风吕》（东京：新潮社，1989）。

[59] 参考《日录》中相应日期的日记内容。



木浴桶：从墙壁另一侧的下部加入燃料将桶内的水烧热。

德川时代的洗澡方式可谓五花八门，因此当诸如阿峰这些人说洗了个“夜澡”时，有时并不那么容易知道那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澡。在早期，洗澡似乎就是蒸汽浴（“蒸风吕”），那时的浴桶也结合了热水和蒸汽的双重功能。然而到了19世纪晚期，最普遍的洗澡方式就是入浴者将身体整个泡在热水里，热水是在桶里直接烧的。不过“蒸风吕”还是很常见。在萨摩藩，直到明治末期，公共浴室仍然保留着两种洗澡方式，一种是热水，一种是蒸汽。[60]游记、日记、法令条文、小说和其他史料里的记载表明，德川时代末期，洗澡已经极为普遍。在江户城内，19世纪早期时经营着大约600多座公共浴室，这些浴室都规模宏大，而且人满为患。[61]人们视洗澡为每日的功课。在旅行者的笔下，洗澡这事也并不少

---

⑥⓪ 谷川健一等编，《日本庶民生活史料集成》卷12，第354页。
⑥① 落合茂，《洗的风俗志》，第75页。

见，但他们的兴趣更多在于行走各处乡里时所见到的种种别样的洗澡方式。

对洗澡情形的描绘不少，但我们始终还是不了解它的发展轨迹，究竟有多少人洗澡，洗得有多勤，洗的又是什么澡。比起穷人来，有钱人自然是更可能也更有办法享受到正经的“风吕”，那些住在温泉附近的人也比其他地方的人更爱洗澡。而我们将日本的洗澡风俗和同时代的西方作一比较的话，就会清楚地看到“风吕”在日本的重要性，以及日本人洁净到了什么程度。

在明治维新时期，洗澡已经是全体日本人民的日常功课。而19世纪中后期以来，英国只有少数人家里有浴室。就连有钱的英国人都不会在家修建单独的浴室，他们更乐意让仆人备水伺候着，在卧室的壁炉前洗一个完全隐私的澡。但这样一来，就得在卧室装浴缸，要小心洗澡水不要弄湿了地板，还得先在楼下的厨房烧好水，再一罐一罐地送上楼来。洗完澡后，又得把水搬回楼下，澡具统统收起来。洗个澡是又慢又累自不必说，所以人们往往退而求其次，只洗部分澡——洗脚、擦澡、只洗脸和手。19世纪工人阶级窄小的家里，洗澡只是偶一为之的事情，通常是为准备过安息日，星期六晚上在厨房的壁炉前洗一次。17、18世纪，人们根本就难得洗澡，如今能够这样，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之前，一个人通常只洗三次澡：出生时、结婚前和死后。[62]

在西方，浴室和固定的浴缸直到19世纪末才问世。是美国人设计出将马桶、盥洗台和浴缸置于同一间屋里的结构。[63]著名建筑

---

[62] 简·C. 尼兰德，《我们自己温暖舒适的炉边生活》（纽约：阿尔弗雷德·A. 诺普夫，1993），第143—148页。

[63] 魏滔·黎辛斯基，《家庭简史》（纽约：维京企鹅，1986），第164页。

学家安德鲁·杰克逊·唐宁早在19世纪中期发表的一张室内设计平面图里就出现了一间“浴室”，但在他设计的许多面积不大的小别墅的平面图里，就既找不到浴室也看不见盥洗室。[64]甚至到了19世纪90年代，美国城市里的公寓楼尚且不设浴室，可想而知，住户们洗澡用的必定还是那些洗完了就从壁炉边移走的浴缸。[65]穷人的条件还要差得多。他们一群群挤在数间屋子里，根本就没有可以单独洗澡的地方——尤其是当时世风以裸体为耻，就更不可能如此了。

西方或日本在近代时人民的卫生标准大概如何，我们固然不会全无头绪，但要细察却难处颇多。要将二者横向比较一番，同样是不容易的。但史实告诉我们，日本和西方国家的个人卫生标准虽然千差万别，总的来说，二者至少具有同样的水平，而且日本很有可能比西方更高。

在19世纪以前，洗澡在现代欧洲文化里无足轻重，也不存在特别为洗澡而设的浴室。即使到了19世纪，洗澡设备也属劳民伤财，是富人专用的享受。反观日本，此时所有的富人以及大量的平民百姓都拥有浴室。同时代和以前的西方文学中，压根儿就没有提到过低收入家庭和寄居出租屋及公寓里的人们是用什么洗澡的。相反，洗澡在德川时代之前的日本就已经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了，德川时代早中期以后，大城市就出现了价钱便宜公道的公共浴室。16世纪到过日本的外国人都对富豪家里的浴室印象深刻。耶稣教传教士陆若汉（João Rodrigues）在描述日本的清洁设施时就对其一尘不染大书特书，认为日本人的清洁水平比他的家乡更高：“洗澡的习俗遍及整个亚洲……然而日本人比任何别的民族更

---

[64] 安德鲁·杰克逊·唐宁，《维多利亚时代的别墅居家》（1842；据1873版复刻本，纽约：多佛出版社，1981）。

[65] 大卫·P. 韩德林，《美国人的家》（波士顿：李托，布朗公司，1979）。

甚，不仅由于他们日间洗澡频频，而且他们视浴室为圣洁之处。”[66]

但也有另外一面。明治维新十年以后，伊萨贝拉·博尔德来到栃木县的日光地区游览。令她意想不到的是，那里的山村格外地脏。不过，即使是在那么脏的地方，当地人仍告诉她，“他们一周总会洗一次澡”。博尔德对日式沐浴并没有太好的印象，因为“一家人轮流洗澡不换水，公共澡堂里一群人共用一池水”。她还认为，肥皂不够，光搓根本洗不干净。[67]然而，在西方，有多少生活环境如此之差的人每周都会像这样净身呢？同是这位伊萨贝拉·博尔德，也曾报道过一些科罗拉多人住在废弃房屋里，九年后便被驱逐无家可归，以及在一家污浊不堪的芝加哥旅馆令人作呕的遭遇——这些比起她在日本的经历可都要糟糕得多。[68]

在明治时代早期访问过日本的西方人大多来自中产阶级和富裕家庭。他们每周都要洗澡，住在庞杂的维多利亚时代风格大宅中，吃得极好，对诸多事物，尤其是何为得体、文明和健康，都颇有见解。也就是这些人，对日本客栈里的跳蚤大惊小怪，对日本料理毫无好感，觉得日式房间光秃秃很不舒服。然而，在他们的记述中，大多从未将日本人和他们自己国家处于类似生活环境

---

[66] 耶稣教士陆若汉，转引自耶稣教士迈克尔·库柏编，《他们来过日本》（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65），第221页。

[67] 伊萨贝拉·L. 博尔德，《未经探索的日本诸相》（纽约：G. P. 普特南父子出版社，1881），第171页。

[68] “我往下走，找到一间陋室。墙的一端已经垮掉一半，窗户都是窟窿，除了两把椅子，两个散乱的木架子和几张铺着稻草的床外别无家具。隔壁的小屋有一个炉子，几条凳子和桌子，是他们做饭吃饭的地方，家里就这些了……他们都睡在树下，天黑以前把稻草搬出去作床铺……我睡的是地铺，还从河里打了一桶冰凉的水。”伊萨贝拉·L. 博尔德，《岩石山里一位女士的生活》（纽约：G. P. 普特南父子出版社，1900），第43—46页。她对芝加哥一家旅馆的描述同样非常凄惨。伊萨贝拉·L. 博尔德，《英国女人在美国》（1856；再印刷，麦迪逊：威斯康辛大学出版社，1966），第149—150页。

的民众进行比较。西方人不喜欢吃日本料理是因为他们吃不惯，而不是因为日本料理不卫生。令伊萨贝拉·博尔德无法下咽的食物、无法下脚的住处，并不在日本而在美国。关键在于，食、住和卫生条件与当今工业社会相比，具有多样性；那些对别国生活条件掩鼻退避三舍的旅行者，往往对本国社会里大众恶劣的生活浑然不觉。尽管和西方存在着很大不同，但日本在物质文化和生活条件上显然都并不低于西方。

摆在面前的半杯水，是半满还是半空？立场不同，看法也不同。我们看生活标准和身体健康水平的时候也是如此。在德川时代，很多人住在幽闭、潮湿又很不健康的房子里，总是吃不饱，穿得也很寒酸。由这些我们固然可以得出当时的日本人过得确实苦的结论。然而，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毋宁说他们的身体健康水平在这个时代得到了提高，已经可以与同时代甚至 19 世纪的西方相提并论。除了饥荒年以外，大多数人都并没饿肚子，而且从未有过百姓羸弱无力，农业和商品经济随之受影响的现象。衣着、清洁、床铺和住宅的舒适度都有了质的飞跃。至于这些发展究竟是如何影响到人们的健康水平的，我将在后面几章分别就卫生、寿命和幸福生活的其他人口指标加以分析。

第五章　城市卫生与身体健康

1877年11月24日，东京，R. W. 阿特金森在日本亚洲学会会员们面前宣读了一份关于“东京供水”的报告。他和自己在东京大学的学生一起，检测了东京供水系统若干部分的取样中存在的有机物质，取样处包括神田系统、多摩系统以及地面水。正如他向学会会员解说的，有机物质的存在是“与下水道物质交叉污染”的一种表现，①因此，有机物质含量越低，水质就越好。该调查显示出，东京供水系统中的水在水源处异常接近纯净，但取样水距水源越远，尤其是地面水，则似乎越会出现污染。在一个以木管

① 阿特金森检测了东京供水系统不同地点的水，检测内容包括固体、氯、氨、氮等的存在。当时还不可能检测细菌或阿特金森所谓“微生物”的情况，但科学家可以对水中的有机成分进行化学检测，而存在有机物表明这些水与下水道未经处理的污水曾有接触从而可能致病。R. W. 阿特金森，《东京的供水》，见《日本亚洲学会纪要》7，第1部分（1877—1878），第90、96页。数年后，O. 科歇尔特对东京的井水进行估测，得出结论：自流井是很适用于东京不通自来水地区的一种供水手段。在对东京供水的评估中，他甚至比阿特金森有更多赞誉之词。O. 科歇尔特，《东京的供水》，见《日本亚洲学会纪要》12，第3部分（1884）。

输水的近代系统中，水质出现污染是毫不奇怪的。令人吃惊的是阿特金森最后的结论：在明治维新刚过十年的东京，供水竟然要比伦敦的干净。毕竟，他是在将一个刚开始使用现代技术的城市的供水系统与欧洲最早实现工业革命的国家的最大城市中的系统进行比较，而后者用的是金属管道，以及可能是当时最先进的技术！

我们大概可以这么认为：19世纪中期日本的卫生与西方不相上下，甚至更好。今天，良好的卫生总是和工业化国家较高的生活标准联系在一起，但19世纪的史实告诉我们，情况未必尽然。在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在1861年死于伤寒，而据研究，这种病是由于下水道排污欠佳所造成的感染所致。因下水道和垃圾处理不完善，供水系统污染，霍乱、伤寒及其他因环境肮脏而传播的细菌性疾病都在美国、英国、法国及其他许多西方城镇一度肆虐。虽然饮用水的水质在18世纪中期的英国已成为防疫要点之一，但直到19世纪中期，当人们发现霍乱在伦敦的传播和供水问题有关时，才真正开始采取行动改善供水。伦敦供水安全的最终实现，则要到1921年。[②]与之相比，在德川时代的日本，城乡的供水和污水处理方法总的来说都是有效和较为卫生的。通常认为，城区的清洁卫生有问题，人口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然而日本的城市规模发展如此之快，超过了任何西方城市，同时疾病发生率也较低，以至于早期的西方旅日者都感到不可思议。

日本德川时代的城市化进程在20世纪前是史上无出其右的。1590年时，江户尚且是一群围绕在一座城堡周围的渔村，到18世纪早期，则已发展成人口大约100万的都市。1700年，欧洲最大

② 安妮·哈代，《18和19世纪伦敦用水和公共健康的探求》，见《医学史》28(1984)，第250—282页。

的城市——伦敦，人口57.5万，只有江户的一半。江户的面积与当时中国最大的城市——北京相比，也是不相上下甚至更大。日本的城市发展不只限于江户和另两个大都市——大阪和京都，还包括了几十个城下町。这些城市自16世纪以来纷纷兴起。此外还有若干港口及其他一些早期城镇。到18世纪末，日本人口已占世界的3%。据估计，当时全世界有数万个城市，在这些城市人口中，日本人占8%。按照这一标准来算，1800年，日本总人口中约有10%是城里人，一些学者估计甚至要更多。③

日本城市何以能保持如此高的人口数量呢？在德川时代后半期，城市人口的比例从未因政治动荡、经济危机、农业歉收或疫病而大幅减少过。在近代所有大城市——伦敦和我们已知的德川时代的诸城市自然都在其中——出生率都要低于死亡率，要保持人口数量只能靠不断流入新移民。而在日本，当一个地区的城市人口出现递减时，便会因邻近城镇人口的增长而得到弥补。④在岐阜县的高山地区，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很低，且死亡率往往低于出生率，仅在天保年间的死亡危机期曾显著攀升。⑤虽然高山地区是靠移民来维持人口增长，当地的死亡率却和周围的农村差不多。⑥

---

③ 大石慎三郎，《巨大都市江户的人口是怎样的?》，见《历史与人物》110（1980：76—81）；E. A. 里格利，《伦敦对英国1650—1750年社会和经济变革之重要性的一个简单模型》，见《各社会形态下的城镇》，菲利普·艾布拉姆斯与E. A. 里格利编（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78），第125页；G. 威廉·斯金纳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7），第29页。

④ 相关史实参考托马斯·C. 史密斯，《近代的经济增长：日本和西方》，《过去和现在》第60号（1973年8月）：第127—160页。

⑤ 佐佐木阳一郎，《飞驒国高山的人口研究》，见《经济史中的人口》，第37届社会经济史学会会议报告（东京：庆应通信株式会社，1969），第106页。

⑥ 关于日本各地死亡率，参考苏珊·B. 韩利和山村耕造，《日本前工业化时代经济与人口的变化，1600—1868》（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7），特别是第8和11章。

德川时代诸城市中，凡有人口减少，与其说是由于城市死亡率上升，倒不如说是经济发生变化所致。

我认为，日本与其他国家的天壤之别，在于卫生水平。即使具备了其他所有供给及服务设施，如果难以维持健康的居住条件，要令城市规模如此之大，住在城里的人口比例如此之高，并且令这种情况持续若干世纪之久，都是根本无法设想的。而江户、大阪和京都没有现代化供水和排污系统，主要靠人力或船运来输送垃圾、废物和粪便，但在整个德川时代，都保持着巨大的人口数量。西方保留了大量关于供水和卫生问题的史料，尤其是19世纪开始以技术手段解决卫生问题以后。日本的资料要少得多，部分原因可能就在于日本人并未遭遇过西方人面对的那些麻烦。但在法令法规和政治议题中，江户的供水排污系统和大阪的粪便处理系统的情形还是屡屡跃然纸上的。

在选定江户作为幕府所在地时，德川家康发现，建立完备的供水系统是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于是他任命一位叫大久保藤五郎忠行的旧臣建立一个新的供水系统。1590年，大久保来到江户，勘测后作出规划。他着手创建的系统规模是如此宏大，又是如此成功，简直可以和古罗马的相媲美。⑦

江户的位置虽然在战略意义上十分有利，大部分城区却位于近海的低洼湿地。可饮用水最初是从池塘和地下泉获得，但由于地下蓄水层很深，井也都挖得很深。第一个完工的系统——神田系统，是从城东名为井之头的地方的泉中取水。水主要经由露天的水沟运到城市地界，然后在市内转入地下水道或木管。神田系统长达41英里，有3663根支管从主水源取水，再传送至城中各处。在某些地点，系统会增高水压以将水输送至不同水平面，不

⑦ 樋口清之，《江户》卷4（东京：芳贺书店，1968），第233页。

过由于神田系统的设计原则是为了将水送至城中海拔较低的区域，让水自然流动往往就可以了。这个系统的问题是，井之头的出水量很有限，而且如果泵水太多，水质就会差——水变得浑浊。到17世纪中期，该系统已经不能充分满足这个日益发展的城市的需求，于是一个新系统在1652年开始启动。[⑧]

第二个系统从多摩川取水。该系统长达50英里，比神田系统更大，输水量也要多得多。多摩川系统将水运至江户城的四谷门口，穿越近27英里，让将军首先得到供水，接着再运到麹町、四谷、京桥和赤坂这些周边地区。系统刚建成时，水量足以供给全城，还能灌溉江户以西的武藏野乡村地区的水稻田。然而，随着城市的膨胀，不得不减少灌溉农田的水量。

多摩川系统被证实是不够用的，其原因并不主要在于水量不足，而在于城市向外扩张以后，将水运至高地就成了一个难题。另一个促使江户继续修建供水系统的重要原因则是江户频发破坏性火灾，而城中建筑多为木制。1657年的明历大火，将大约三分之二的城市毁于一旦，死难者数以万计。于是，一道政令下来，将市中心的人口密度加以削减，同时很多武士府邸和寺庙迁往市郊，在城中辟出空间以供火灾避难用。新建了4个供水系统——本所、青山、三田、仙川——均以多摩川供水，并且从属于前两个主要的系统。这些新系统看起来不能完全满足需求，到19世纪中期，江户又以原来的神田和多摩川系统作为主要供水系统了。由于此时神田系统也部分从多摩川取水，这条河就成了江户的主要

---

⑧ 关于江户供水系统的诸描述，见于堀越正雄，《井和水道的故事》（东京：论创社，1981）；鲭田丰之，《水道的文化：西洋和日本》（东京：新潮选书，1983）；伊藤好一，《江户的水道制度》，见《江户町人的研究》卷5，西山松之助编（东京：吉川弘文馆，1978），第283—308页；樋口清之，《江户》卷4，第231—247页。

水源。

在江户建设供水系统的19世纪这一百年里，工程技术日益精良。17世纪早期，城外最普遍的管道还是水沟。神田系统用红松木制成的方形管道作为地下水管，而其他早期系统用的是另外的木材、石头、泥土和竹材。到多摩川系统建成时，设计该系统的技工采用了三角测量技术，从而有助于解决因地面高低不同而产生的问题，做出的测量也“惊人地精确”。[⑨]虹吸管被用于将水从多摩川系统的管道中送至高处的江户城。系统越新，越多以管道代替开放的沟渠，因此后期的很多系统都是埋在地下的。

政府不仅负责建造江户的供水系统，同时也严密地规范其使用。个人禁止直接从主系统取水，除非此人系高级武士，通常是大名或将军的高级侍从。在水管系统中修有水井，公众就从井中取水；按规定，人们在离家最近的井中打水，而不是在最近的水管上自行接水。通过这一控制，就保证了水流充足和系统的合理维护。

在江户，全天24小时都有充足供水，且极少出现停水，以至于城中并无应急储水设施。多摩川系统给江户输送的水量确实十分可观，以至于人们用多余的水在新宿御苑修了一座瀑布。明治初期，当惠比寿啤酒公司刚刚成立时，就从这个建于两个世纪以前的系统中取水。[⑩]由此可见，东京这个城市继承了一个水量够足、水质纯净的供水系统来为它早年的需求服务。阿特金森在19世纪70年代的供水质检，就证实了这一点。

不但如此，江户的供水系统设计得也非常出色。19世纪末对该系统进行现代化翻新时，主要的改造不过是将木管换成不易损

---

⑨ 樋口清之，《江户》卷4，第244页。

⑩ 鲭田丰之，《水道的文化：西洋和日本》，第32页。

坏的金属管而已。因此，当一个建于17世纪的系统在两个多世纪后转变为基于现代技术的新供水系统时，就还能保留它一直的特色。修建这样一个大规模而又稳固的系统必然少不了卓越的工程技术。从渠道和工地清除的垃圾竟都是以篮子或草席拖走的，可见其一斑。

如果把江户的供水系统和欧洲最大城市的相比会怎样？在江户修神田系统的同一时期，伦敦也造了“新河”，但1613年伦敦将泉水引入城中的成功，却无法和同时代的神田系统相提并论。在伦敦，大多数水管都在地面上，还得雇看守来防人偷水。伦敦扩建后，供水越发不足，但伦敦并没有江户那样的良策。水管可以越来越多，但供水量却跟不上，于是到了18世纪中期，伦敦人的打水时间一天只有7个小时，一周只有三天。与之相比，江户的水管并不强大，但是都埋在城里的地下，而且供水量是充足的。⑪

显然，江户是一个特殊的例子。它的供水系统与城市设计同步开始，而且下令、建造和买单都是这个国家最强大的政治势力一手包揽的。因此，江户的供水系统比其他所有城市的都要高级得多。不过其他城市的供水虽然不如江户，也都各有建设。16世纪晚期以来若干城下町涌现以后，为给町人提供饮水，越来越多的供水系统建造起来，不仅在日本中部，而且边远地区比如九州南端都是如此。1650年以前，为今天的滋贺、兵库、大分、广岛、三重、香川和鹿儿岛县所在城市输送饮用水的系统就已建好，更多的系统在17世纪晚期到18世纪也陆续建造起来。此外，还有无数灌溉工程，既提供了饮水，又提供了灌溉用水。⑫京都和大阪的取水都在很大程度上来自日本最大的湖泊——有“天然巨大水库”

⑪ 鲭田丰之，《水道的文化：西洋和日本》，第32—34页。

⑫ 堀越正雄，《井和水道的故事》，第97—99页。

之称的琵琶湖。[13]和农村一样，在大多数城市里，河流和井成为主要的取水处。

然而，并不是说日本现代以前的供水系统是完美无瑕的。任何供水系统都面临着一个重大危险——人类垃圾的污染。但由于种种原因，日本城市的主要供水系统并未遇到令人发指的下水道污染问题，又一次胜过了曾遭此厄运的伦敦和巴黎。由于日本主要岛屿均以山地为多，河流便短而湍急，因此水往往很纯净。并且，大量的尤其是台风季节的降雨，也有助于河水奔流，就不会出现因河道缓慢迂回所产生的污染。但是，日本水质好并不仅仅由于地理上得天独厚，更重要的是，人们不会将粪便倾倒在河中污染水源。江户供水的水质甚高，就是这个缘故。

日本和西方在处理废水问题上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在日本，大家并不认为人类排泄物是一文不值的“糟糕”之物——也就是那些我们会出钱让人搬走的东西——而是一种颇具实用价值的产品。日本城市里的粪便长期被用作肥料，西方国家虽也有此举，却远不及日本的程度。随着日本人口增多，可耕地数量有限，为供养越来越多的人口，土地使用日益密集，加上动物粪便和其他肥料较少，这就意味着人类粪便作为肥料的价值远远超过了西方。简言之，用经济学家的话来说，人类粪便具有“上佳”的实用价值。

远在江户建立之前，大阪的粪便就被周边的农村用作肥料。大多数粪便被集中后运到船上，然后分送至附近村落的港口。由于运到埠头上的粪便量巨大，发出恶臭，怨言时生。德川时代的地方官留意到了这些抱怨，但最后说：“运肥料的船不可避免会进入运茶的或其他船只使用的港埠。”[14]在德川时代早期，人们将农

---

⑬ 鯖田丰之，《水道的文化：西洋和日本》，第 97 页。

⑭ 胁田修与小林茂，《大阪的生产和交通》，《每日放送文化双书》卷 4（大阪：每日放送，1973），第 127 页。

产品用船运至大阪，以之交换城里的粪便。但随着鱼和其他肥料价格上升，粪便也随之增值，光靠蔬菜等农产品已经买不下来了。到18世纪早期，大阪地区新增了很多水田，肥料价格飙升，以至于粪便必须要用银两来购买。

屎尿的价值是如此之高，以至于其中不同成分的所有权竟分属不同的群体。在大阪，住宅居民大便的所有权属于房东，小便属于租户。人们认为大便更有价值，因而要价更高。一般来说，10户人家一年大便的价格超过了1两半黄金，刚好相当于19世纪早期一个农民的月收入。由于人类屎尿如此值钱，一套房的租金就会视租民人数多少而有所调整，住的人越少，租金就越贵。⑮

随着大阪在17世纪的迅猛发展，到该世纪中期，市政府发现必须介入并建立行会以保证粪便处理的正常运作。到该世纪末，周边的农民已经联合起来谋求垄断大阪各区日益昂贵的粪便的购买权。粪便收集权和定价的纷争终于爆发。1724年夏天，山崎和高槻这两个村庄（位于京都和大阪之间）的村民为了争夺城里粪便的收集地盘大打出手。城里的行会和农村的帮会之间也起了争吵。同样的事件在附近的河内和摄津地方也有发生，表明这类冲突并不仅仅局限于大阪一地，也不是孤立的。⑯

在大阪的三个主要城区，邻近的农村拥有居民大小便的收集权，但他们既不能、也不愿收集所有的小便。他们不要的小便就由"小便掮客"收走。随着小便掮客日益涌现，官司也便层出不穷。这些掮客最后也成立了自己的帮会。1772年，他们向大阪官

⑮ 尽管小便往往比大便含有更高的氮和钾，特别是可用作粮食残余物转化为腐殖质的催化剂，但较之大便更不易运输和储存，大概就是因此而更便宜。大便的价格参考渡边实，《未开化部落史之研究》（东京：吉川弘文馆，1965），第297页。黄金的价值换算见山崎隆三，《江户中期的物价动向与经济变动》，见《历史中的物价》，原田敏丸与宫本又郎编（东京：同文馆，1985），第78页。

⑯ 胁田修与小林茂，《大阪的生产和交通》，第128页。

府交钱建立了一个“株仲间”（基于股份所有权的行会），同时拥有了司法权和定价权。然而，那些留给街边路人用的尿桶里的小便的收集权则归一个叫渡边的贱民村落所有。尽管小便的卖价比大便便宜，小便收集权的斗争同样无休无止。间或有人企图从渡边村手中夺得这个权利，但无论别人如何蓄意破坏尿桶，如何挑衅和利诱他们出卖收集权，村民还是坚持保卫了他们在整个德川时代的垄断地位。[17]

大阪到18世纪中期时，粪便显然已经是一种极具实用价值的商品，以至于其所有权、垄断和垄断权都有专门分配，而合法帮会和行会的建立也得到了认可，同时价格也是由这些组织规定的。大小便的价格大涨，以至于收入低的农民难以买到足够的肥料，偷窃粪便的事迹也开始见于记载，尽管这很冒险，因为被捉到后会锒铛入狱。

从官方史料来看，江户的粪便纠纷并不像大阪那样严重，但要解决垃圾清理的问题，政府还是得插手。江户的垃圾除了粪便以外有四种：家居垃圾，大部分应为厨房垃圾；丢弃于街边和臭水沟里的垃圾；漂流在水上的渣滓——城壕、河流和港湾里的；火灾后的废弃物。此外，由于江户拥有充裕的供水，就意味着同时要排走大量的水，这也是此地废水处理的一个棘手之处。[18]

江户对垃圾的规范在17世纪中期开始出现。当时，关注的焦点并不是垃圾中转这件事本身，而是如何解决街道、公共场所和阴沟日益严重的垃圾堆砌问题。这被视为市政府分内之事。与此同时，与粪便处理有关的问题也引起了官吏的注意。1648年该市下令将各河沿岸的大小茅厕尽皆关闭。此后半个世纪，该条例一

---

⑰ 渡边实，《未开化部落史之研究》，第292—299页。另参考大阪市编，《大阪市史》卷1（1911—1915；再印刷，大阪：清文堂，1965），第866—868页。

⑱ 林玲子，《近世的尘芥处理》，见《流通经济论集》8（1974），第72—86页。

再重申，而且加上了其他一些要求，这表明对这个要求垃圾处理更讲卫生的新规矩，江户市民的适应一定是迟缓的。⑲

从这些规定还可以看出，德川时代早期江户的粪便需求量并不高，无数潜在的肥料都被浪费了。然而，随着江户周边菜地的商品经济化，这座城市在日用消费方面对外地的依赖越来越少，粪便的需求量也就增加了。江户粪便的市场是方圆 10 英里以内的农村。到 18 世纪上半期，如果忽然中断了某农民的粪便供给，对他来说简直就是天降横祸，因为可替代的东西是难以找到的。1725 年，由于一场大火烧毁了大名尾张德川家的城堡，多摩地区附近某村的村长失去了肥料供给的源泉。直到城堡重新修好之前，村民都一直饱受歉收之苦。

为了得到江户各地区的粪便，村人都签有契约。通常各大名对他们的权限约法三章，按照市场需求来确定收集价格。例如，一桥大名在 1742 年将他城中的粪便权出售给多摩地区田无村一个叫半兵卫的，卖价是每年年底支付 1500 个大白萝卜或 2000 个中白萝卜或 2 两现金，支付方式由半兵卫自选。每年，这家大名以竞拍收集权的方式来自定卖价。每个大名的规矩也有不同，有的是一年分两次付钱，价格更是高达 6 两金以上。⑳

粪便涨价以后，有生意人便谋求于江户闹市街边放置尿桶，借此收集小便，但诸般申请统统被拒。江户是政府所在地，比起大阪，官员更多地要考虑到市容，而且街道狭窄不利运输，以及屎尿气味不佳，都是问题。在 1789 年有一份别具创意的申请，要

---

⑲ 关于江户垃圾处理的详情，参考伊藤好一，《江户的垃圾，下水和屎尿的处理》，见《日本的封建都市》卷 2，丰田武，原田伴彦与矢守一彦编（东京：文一总和出版，1983），第 431—455 页；川添登，《从内面所见的都市》（东京：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82），第 152—190 页。

⑳ 伊藤好一，《江户的垃圾，下水和屎尿的处理》，第 449 页。

求政府允许以酱油桶和酒桶盛尿，这样就可以减少表面上的尿臊味。众申请人认为，把路人的小便都收集起来，必会令肥料大增，那么其他肥料的价格就会下降，农民就可以使用更多的肥料，获得更大的丰收，最终从总体上降低商品价格水平。[21]

正如安妮·沃特霍记载的，和关西地区一样，在关东，粪便也是宝贝，农民为其购买权总是争抢不休，还拉帮结派以图成事。收集、分销和定价粪便的冲突同样存在。并且“到19世纪晚期时，要求得到粪便就意味着农民有时要竞相开出好价钱，还要送礼给地主，以换取清空茅房的权利”。[22]关于旅行者欲以自己的粪便赚钱的故事也有不少：他们会随身携带一个便器，用自己的小便换取食物或钱。地方上的居民会用过路人赚钱，就像京都郊外曾经发生的那样：农民发现，在前往热门郊游地——岚山的途中，他们可以为有钱女人提供收费厕所。[23]到19世纪50年代，在前往江户的路上，沿途都有茅房，农民们由此从旅人身上获得肥料。弗朗西斯·霍尔描述过：“一个接一个的桶塞于东海道边，令人叹为观止。这些都是尿桶。桶被清空的次数很勤，以至于旅人们几乎闻不到桶中物的臭气。”[24]

在粪便法规出笼的同时，对其他类型垃圾的处理也有了细则。到1655年时，江户人按规定要将垃圾废品丢弃至江户湾的永代岛，而不是扔到河里。在1655年至1665年的10年间，垃圾处理政策逐渐有了成效：每个城区都建立了废品收购站，垃圾运输则承包

---

[21] 伊藤好一，《江户的垃圾，下水和屎尿的处理》，第445—446页。

[22] 安妮·沃特霍，《农村网络：总代理和江户粪便的销售》，见《日本文化志丛》（*Monumenta Nipponica*）43，第3期（1988年秋），第296页。

[23] 李家正文，《厕史话》（东京：六兴出版社，1949），第316—328页。

[24] 1859年11月29日星期二的日记，出版于《美国人眼中的日本：弗朗西斯·霍尔游记，神奈川和横滨，1859—1866》，F. G. 诺特艾尔费编注（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2），第82页。

给专业人员，费用各区自理。废物从各区的收购站载入船中，再运到永代岛上。虽然这些措施最初是为了保持河渠在商业和交通上的畅通，结果却在城外诞生了江户城的一个正式垃圾场。这些措施在此后两个世纪里都一直行之有效。㉕

永代岛被构造成垃圾场后，最终，在江户东边的沼泽里形成了一片新陆地。其他一些垃圾填筑地也发展成了农田，因此垃圾处理在江户变成一个非常赚钱的行当。到19世纪20年代，从江户中转垃圾的承包户至少有80个，如此兴旺的原因部分在于一些正式组织也就是"株仲间"的成立，对此起到了促进作用。现在，城里人只需要将他们的废品丢弃到各区的收购点，并向承包人支付中转和运输至最终处理场所的费用即可。各区是按照居民家宅的正面长度和地点对收费进行估算的，那么实际上就成了民众支付的一种房产税。至于租户在不在估算范围内，则因区而异。㉖

众多河道和壕沟穿流于江户，这座城市最终需要解决的问题落在了下水道和废水处理上面。从所颁布法令条文的数量上来看，最主要的问题与其说是修阴沟，不如说是如何制止人们将垃圾倒进河道和城壕，具体要求是：各户在自家门前屋檐下修筑下水道。这些水沟将街上和屋顶的雨雪溢流以及生活废水都集中起来。沟约一英尺宽，数英尺深，部分为石片掩盖以防人掉入，在许多城市至今仍然可以见到，包括今日东京的郊区。考古发掘将东京下水道沟渠网络的精致展现于世。有些居民小区，说得好听点叫做密集的劳工住宅群，说得不好听点就是贫民窟，但即使如此地方也一样有很好的阴沟系统。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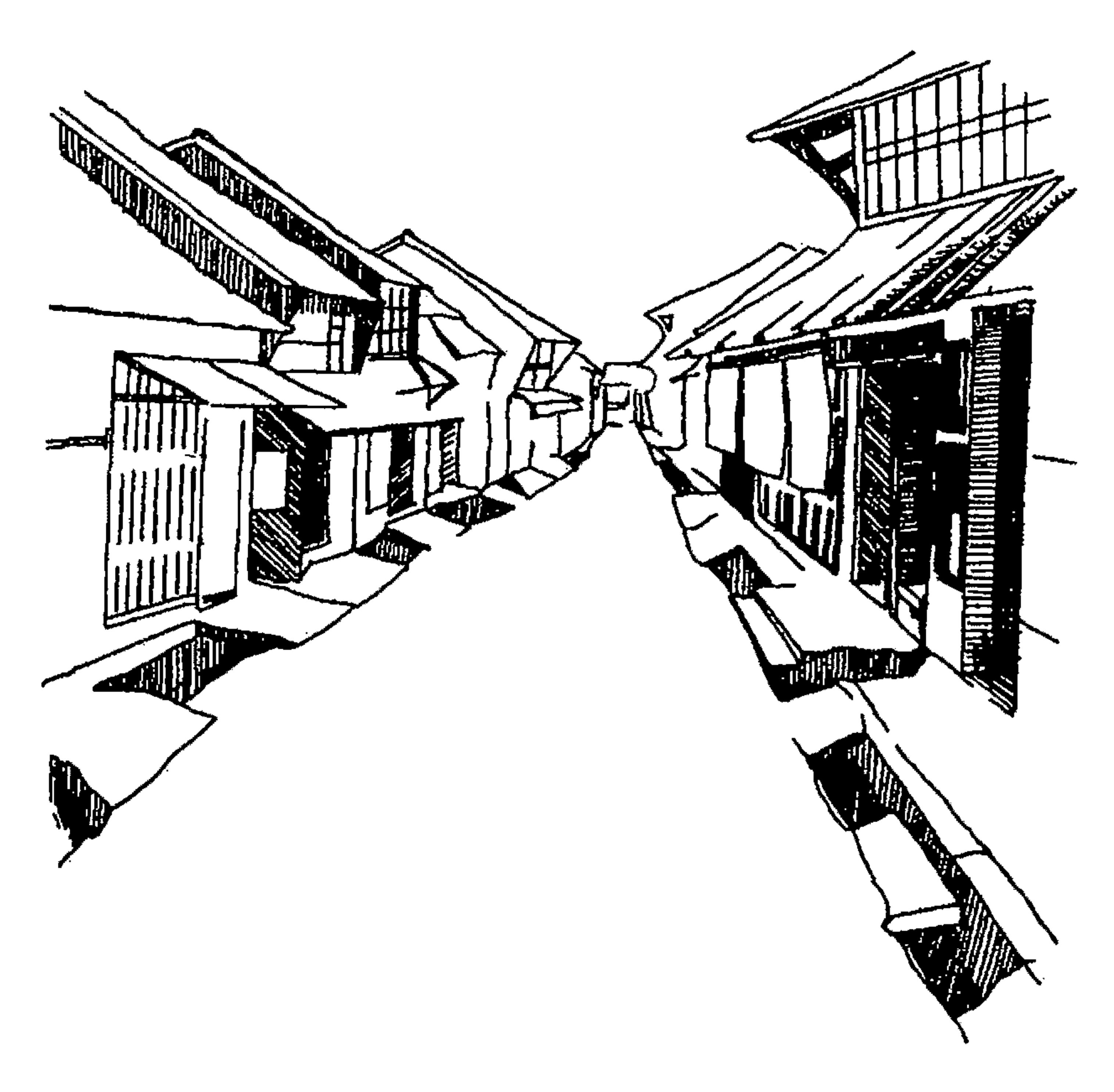
在日本的城市里，并不只有江户和大阪注重有序处理废物和

㉕ 伊藤好一，《江户的垃圾、下水和屎尿的处理》，第431—436页。

㉖ 林玲子，《近世的尘芥处理》。

㉗ 古泉弘，《挖掘江户》（东京：柏书房，1983），第64—74页。

保持水陆路干净畅通。大多数城下町连主干道都较为窄小，约24英尺宽而已，但这些道路均是“维护得极好，且一尘不染”。对公共道路的维护都有详细的规定，违者会被告发。以鸟取地方为例，街道必须清洁，之后再洒水（以减少呼吸道疾病的发生）。在平户地方，政府下令，所有的桥梁、水沟和河道都要及时修缮、维护和清理。为贯彻实施这一规定，地方官会经常性地前往视察。“必须无处不洁。”光从这些政令就可以看出，德川时代的城市官员将清洁卫生视为头等大事之一。[28]



某市镇街边的阴沟。

㉘ 村井益男，《封建制的成立和都市形态》，见《生活史》卷2，森末义彰等编，收入《体系日本史丛书》卷16（东京：山川出版社，1965），第128页。

从17世纪中期直到19世纪中期，从垃圾处理、供水量以及水质方面来看，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日本的城市卫生要好过西方，城里人因而拥有了一个更健康的生活环境，而我们对城市人口规模和存活率的实测结果恰好证明了这一点。日本的城市生活之所以比西方更洁净，除了人们历来重视以外，还因为他们没有养什么家畜。最终在设置和维持城市卫生的标准上起到了重要作用的，则是政府。

如前所述，日本和西方最大的不同在于：人类排泄物在日本的经济价值远甚西方。由于屎尿被谨慎收集起来作为肥料，生活用水从水源到城市终端的全程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西方那样的污染，人们行走在马路上或身处废品丢弃点时也不会接触到垃圾。相反，西方人自古以来靠的就是在地上挖个诸如化粪池之类的坑来处理人粪便，直到今天，这对供水的防污都是一个威胁。即使到了19世纪80年代，英国的剑桥仍被描述成“一个没有下水道的、河流遭受着污染的化粪池城市”。在19世纪，“许多城市用同一种方式应付粪便处理问题，莱斯特城就是典型。在19世纪中期，该城市有几乎三千个露天化粪池，占地约1.25英亩（1英亩约合6市亩，译注）。”直到世纪末，这个镇终于用上了粪桶系统，这才给粪便在深土里的渗透画上了句号。㉙还有一些西方城市的市民将卧室里的夜壶从窗口倾倒于马路上，行人过街时还都得小心不要踩到马粪。伦敦部分市区的街道直到18世纪早期才有露天的阴沟在城区间流淌。㉚

“新大陆”的街道也没好到哪里去。在1857年，有人形容纽约的街道是“臭气熏天、令人作呕的垃圾堆。有的地方垃圾甚至堆成了山，

㉙ 安东尼·S.沃尔，《险象环生的生活：维多利亚时代不列颠的公共健康》（剑桥，麻州：哈佛大学出版社，1983），第73—74、95页。

㉚ M.多萝西·乔治，《18世纪的伦敦生活》（纽约：哈珀与罗出版社，1964），第67页。

简直可以用堵塞交通来形容”。[31]法律规定，街道的清洁由附近的住户负责，但人们对垃圾熟视无睹，要么就是将垃圾扫成一堆便搁置数天不管，于是重又一盘散沙。雇人当清道夫也无济于事。有个办法是不再将垃圾集中，而是拿来喂猪。不光纽约，其他美国城市也让西欧游客感到恶心，比如路易维尔和辛辛那提。[32]尽管匹兹堡在1807年通过了一项法令，对“在大街小巷乱扔动物尸体、垃圾、有毒液体或其他任何恶心物品的人处以罚款”，但直到19世纪30年代，当霍乱威胁到这个城市时，人们才真正开始关注马路上的破烂。[33]

而在整个德川时代，江户的西方来客都发现，这个城市的街道足以和欧洲的媲美。一个1609年来到江户的人看到，马路又宽又长，比他在西班牙见到的要好得多，而且路面都很干净。“很难想象，这些马路居然是有人在行走着的。”在19世纪，阿礼国（Alcock）看到，江户城及其近郊的街道都维护得极好，与西方不相上下，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几乎从未遇到过因路有垃圾堆不得不绕道而行之事，而这在亚洲其他地方和欧洲都是屡见不鲜的。[34]

英国人发明了抽水马桶，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城里人大小便的问题，这已毋庸赘述。然而，最初这套系统与其说是解决了许多问题，不如说是带来了更多问题。首先，它既需要一个可以安全运来大量水的供水系统，又需要一个可以安全运走大量废水的下水道系统。抽水马桶刚发明时，伦敦人将大小便冲入泰晤士河，

---

[31] 戴维·W. 米歇尔转引自劳伦斯·H. 拉尔森，《19世纪的街道清洁：对污秽和沮丧的研究》，见《威斯康辛历史杂志》52，第3期（1969年春），第239页。

[32] 拉尔森，《19世纪的街道清洁：对污秽和沮丧的研究》，第242—243页。

[33] 约翰·达菲，《猪，狗和肮脏：早期匹兹堡的公共健康》，见《宾夕法尼亚历史传记杂志》87，第3期（1963年7月），第297页。

[34] 伊藤好一，《江户的梦之岛》（东京：吉川弘文馆，1982），第45页。译者注：Rutherford Alcock（1807—1897），即阿礼国爵士，英国外交官，1859—1865年任驻日公使。

以为家里这个烦恼终于可以一冲而光了。几十年了，他们没有意识到，肆虐全城的传染病之所以猖獗，都是拜抽水马桶所赐，因为臭水被冲到了泰晤士河上游，而此城又从其下游取水。更糟糕的是，下水道的缺陷导致阴沟里形成毒气并上飘进房子里。盥洗池都是固定在卧室内部的，于是人们只好采用一种相当原始的办法来应付：晚上把这些水池都盖上。[35]

其他国家也未能免遭厄运：迟至1849年，才有约翰·H. 格里斯科姆医生对曼哈顿岛极不健康的卫生状况进行了描述："三万个化粪池星罗棋布，令空气中弥漫着恶臭。"[36]斯通评道，即使在引进了供水系统以后，各城镇的卫生状况依然恶劣。直到1850年左右，在设计合理的下水道取代了化粪池以后，情况才有所好转。[37]同年，平克尼对巴黎的评价是，在下水道处理和供水之间"有一条快捷得令人吃惊的连接"。"这个城市的部分取水来自于主要的下水道汇集处——塞纳河。取水地点大多位于河里下水道出口的下游。绝大多数其他水源也只能说是稍好一点。"[38]

日本人的废水处理系统并不是完美无缺的。人粪便被用作肥料时，往往存在着污染的危险——将病菌带到食物中，以及由农田溢流或屎尿的存储和运输不当造成供水污染。人粪便在西方有

㉟ 托马斯·麦克恩，《人口的现代增长》（纽约：学院出版社，1976），第125页。

㊱ 约翰·H. 格里斯科姆，《空气的使用和滥用》，第3版（纽约：雷德菲尔德，1854），第183页，转引自梅·N. 斯通，《管道安装的悖论》，见《温特图尔资料》14（1979），第292页。

㊲ 斯通，《管道安装的悖论》，第284页。欲闻其详，参考乔·A. 塔尔等，《水与垃圾：反思美国1800—1932年间的废水技术》，见《技术与文化》25（1984），第226—263页。乔·A. 塔尔，詹姆士·麦卡尔里与特里·F. 约西，《城市废水技术的发展和影响：水质控制之概念的变迁，1850—1930》，见《美国城市的污染和改革，1870—1930》，马尔顿·V. 梅洛熙编（奥斯丁：得州大学出版社，1980），第59—82页。

㊳ 戴维·H. 平克尼，《拿破仑三世与巴黎的重建》（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58），第58页。

时也会被卖作肥料，但大部分还是浪费了。大都市在装上了下水道或者说废水运输系统以后更是如此。到 19 世纪末时，西方有人也提倡用阴沟水灌溉农田，但公共卫生官员以及普通大众对用大小便作肥料有着根深蒂固的偏见。他们“坚持认为未经处理的废水让农人身处潜在的感染当中，田里生长的蔬菜也会携带‘危险的病菌或其他寄生虫’，尽管并无真凭实据”。[39]事实上，亚洲人并不是将粪便直接倾倒在农田里，而要存放一个月，因为大家都知道直接用未经处理的粪便施肥是危险的。[40]

杀死各种病菌必须要有一定温度和一定时间的结合才能实现，但具体如何结合则说法不一。另外，肠道病毒对水的污染要到何种程度才一定会在人群中产生传染，科学家对此也无定论。在亚洲和西方历史上都曾有过不少以粪便或废水施肥而导致疫病爆发的记载。我们今天要判断两百年前对屎尿或肥料的处理是否安全，是很困难的。“然而，很大一部分与下水道有关的疾病都是由于用未经处理或处理不当的下水道废水、淤泥和粪便给农作物施肥，人们又生吃这些农作物造成的。”[41]还有至少两项研究表明，“肠道病毒的主要传播手段似乎是直接的粪一口传播”。[42]

尽管前现代时期人们的清洁卫生标准不易估计，上流社会却总是留下了很多史迹可寻，我们可以藉此在不同国家之间做出一番比较。精英们的清洁状况和个人卫生习惯固然不能代表整个社会，但

---

[39] 乔·A. 塔尔，《从城市到农场：城市垃圾与美国的农民》，见《农业史》49（1975），第 610 页。

[40] F. H. 金恩，《四千年的农民》（1911；再印刷，以马忤斯：罗代尔出版社，1973），第 193—215 页；雷吉纳·雷诺兹，《洁净与神圣》（花园城，纽约：双日出版公司，1946），第 253 页。

[41] 威利·D. 博格与保罗·B. 马什，《下水道垃圾蔓延的传染病危害》，见《环境质量杂志》7（1978），第 7 页。

[42] G. 博格（1966）与 J. W. 莫斯利（1972）的研究，转引自上注，第 3 页。

却反映出那个社会的最高标准应该是怎样的。例如，在17和18世纪的法国，“卢浮宫、凡仙或枫丹白露的某些地方简直已经沦为茅房”。一豪门管家写道：“在院子里、楼上的过道、门背后，差不多每一个角落里，你都可以看到一坨坨大便，闻到一阵阵难忍的臭气，这些都是众人每天解决内急的产物。”㊸反观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在日本居住过的耶稣会教士陆若汉的记述：日本人——

“为客人提供的是非常洁净的厕所设施，坐落于离房间较远的僻静之处……厕所内部一直纤尘不染，还放着一个香盘和裁好了的厕纸。厕所总是清新无臭，因为每当客人离去后，扫厕所的人便会将其彻底清洗一番并撒上干净的沙子，如此便仿佛从未使用过一样。厕所旁会有一大罐清水和其他洗手所需之物，因为无论贵贱，他们都有大小便后洗手的习惯。”㊹

两个世纪以后，法国的情形已不复如此原始，但下水道问题和供水污染的存在表明清洁卫生方面的痼疾依然未除。在19世纪中期的英国，即使是皇室人员都难免遭遇下水道处理不力的恶果，正如前面提到过的阿尔伯特亲王的悲剧所示。而在19世纪70年代的日本，美国来访者爱德华·莫尔斯发现，“上流人士私宅”的厕所“比起我们自己的伟大国家的许多有钱人家里的厕所……要舒服得多，危险也要少得多”。他的描述和陆若汉非常相似，只是没有提到客人每次如厕后会有下人及时清理，而是“每隔几天会轮流有人来打扫干净”。吸引莫尔斯的不仅是日本厕所的洁净，还有他去过的人家里厕所装修工艺的精巧。他所描述的还并不是大富之家，也不是穷人

㊸ 弗兰茨·丰克—布伦塔诺，《法国的旧体制》（伦敦：爱德华·阿诺德出版公司，1929），第156页。尼古拉斯·德拉·马勒是韦芒多伊伯爵（Comte de Vermandois）家的管家。

㊹ 耶稣教士陆若汉，转引自耶稣教士迈克尔·库珀编，《他们来过日本》（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65），第22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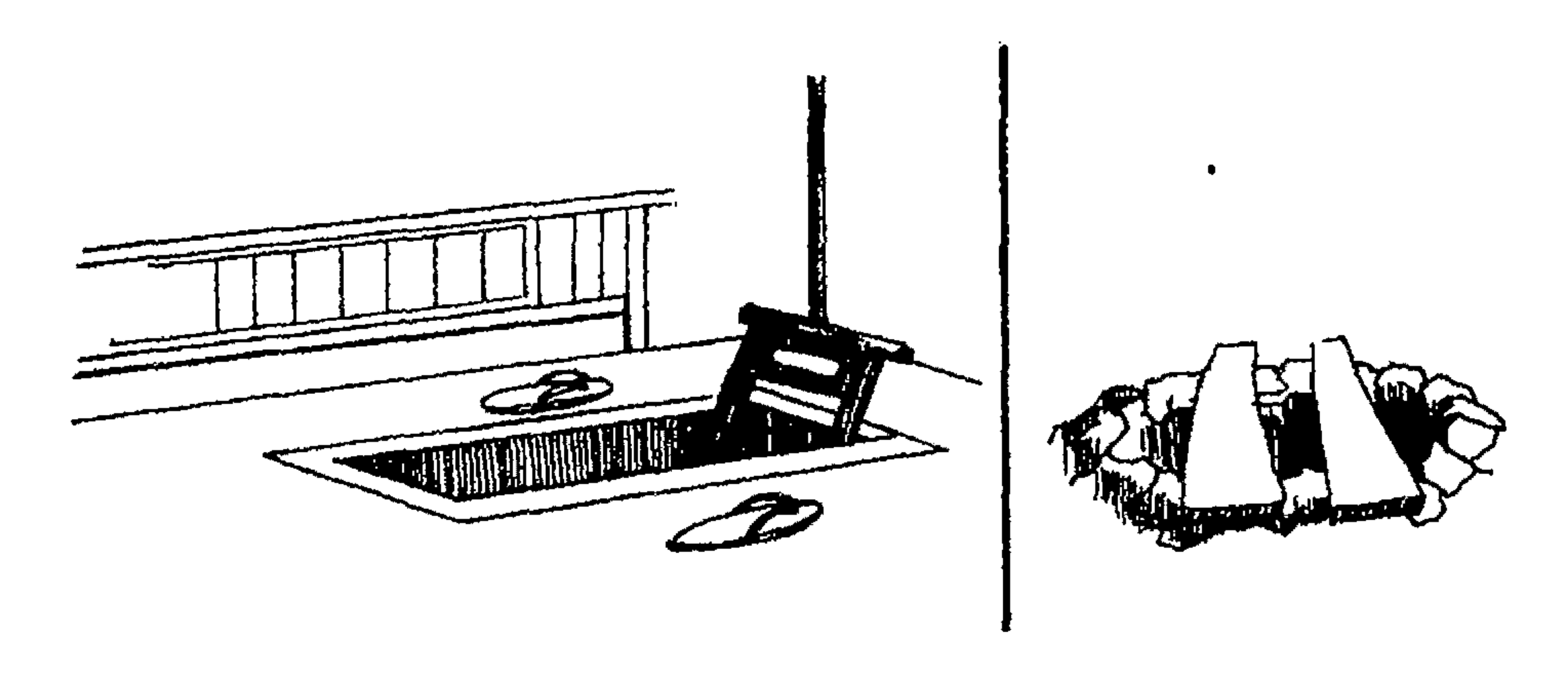
寒舍，而只是他在日本延长居留时住过的一些普通人家。[45]

城市手工业者、农民和穷人家里的厕所设施固然不会那么精美、洁净和卫生，但从一些至今尚存的遗迹可以看出，普通百姓厕所的基本精神和上等人是差不多的。农民和低收入者甚至比有钱人更乐于收集他们的“副产品”用来卖钱或换东西。农户的厕所往往都在家门口、“土间”或户外另起一屋。如果这家人比较有钱，有一间“座敷”或者说会客室，也会修一个厕所在会客室边专供客人使用。一般来说，厕所的位置都便于人们劳作时使用，因此不用脱鞋，也不用进到家里。为了能将大小便分别收集起来，便坑设有两个，一个是长方形的，人蹲在上面大便，另一个用来小便，有时也修成和大便的一样以便女用。便坑材料多为木质，但小便坑有时是瓷的。

在乡下，厕所有时是危险的地方。很多都是在小棚子里挖一个坑，上面横放两块板，人蹲在板上。由于没纸，就用小棍子擦屁股。不但小孩，连大人都容易掉进坑里。在城里的贫民窟和拥挤的租民区，每个街区都会有一些公共厕所，离这些厕所较远的小公寓居民们平时就不会被臭气和肮脏影响到。然而，住户多，厕所数少，又多为木造，液体会渗透进去因而难以洗净；一个小区的公用井与厕所也往往相距不远，甚至就在旁边。与前人所述以及今日尚存的上流社会厕所之洁净和设计之精巧相反，在经济等级的最低端，厕所都是臭烘烘而令人毛骨悚然的。[46]不过，比起那些不把人体排泄

㊺ 爱德华·S. 莫尔斯，《日本人的家和环境》（1886；再印刷，路特兰，佛蒙特：查尔斯·E. 塔特尔，1972），第228、231页。也请参考安东尼·S. 沃尔，《险象环生的生活：维多利亚时代不列颠的公共健康》，第127页；爱德华·S. 莫尔斯，《东方的厕所》，见《美国建筑学家和建筑新闻》39，第899期（1893年3月18日），第170—174页。

㊻ 厕所遗迹可在许多对外开放的古建筑、露天博物馆和一些私人住宅中见到，比如飞騨的高山地区。关于厕所内部设施，参考山田幸一，《便所的故事·话说建筑史》（东京：鹿岛出版会，1986），以及阿木香等，《日本厕所博物志》（东京：INAX，1990）。



19 世纪日本最好的厕所和最差的厕所：左为城市里的一间室内厕所；右为一贫穷地区乡村寒舍的室外茅坑。

物视为商品的国家将其保留在渗漏的化粪池里或是冲进河道的做法，日本人收集大小便用作肥料之举的确卫生得多。

日本人之所以有条理地收集大小便，赚钱并不是唯一的动力，他们用很多风俗和信仰来巩固这一行为。由于厕所这地方既阴暗又往往令人不悦，大家就需要一个神来保护他们上厕所，同时，排泄物又需要用作肥料，于是人们就让“厕神”来帮助他们获得大丰收。他们像敬别的神一样敬这个厕神，年末时，厕所里也要摆上新年的装饰。在有些地方还有一个习俗，一家人坐在厕所前的一张草席上，向厕神简短祭礼，每人吃一口饭，象征着领受了厕神的恩赐。[47]

如果一个厕所供了个神，经过了装潢，人们还在它门前就餐（就算是走过场），那这个厕所肯定要尽可能地保持干净才行。人们认为厕神容貌绝美，孕妇为了生漂亮宝宝，会请求厕神赐予宝宝一个“高鼻梁”，如果是女儿，就要一对酒窝。然而，如果女人把厕所弄得很脏，据说生出来的孩子就会又丑又不幸。[48]对新媳妇

㊼ 山田幸一，《便所的故事》，第 72 页。
㊽ 同上书，第 75 页。

们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洁厕动力呢！

这些习俗的存在，并不意味着粪便污染在日本是绝迹的，只不过比西方要少得多。日本人还养成了各种习惯，让他们在水不干净的情况下不生病。他们习惯喝烧开的水，通常以茶的形式来喝。这个习惯16世纪到过日本的外国人就曾记载过。尽管其他国家的人也喝茶和别的热饮，唯有日本人此举引起了他们的注意，说明不喝脏水的人在日本远多于很多以水作为第一饮料的西方国家。[49]

日本人通常吃熟食，但泡菜除外。不过泡菜是用盐腌过的，所以就算用粪便施肥时有污染，大家吃了一般也不会生病。一家人各有一套碗筷和茶杯，互不混用，所以即使洗碗不彻底或是用冷水洗都没事。在外面吃东西经常都是用手拈，餐馆里的筷子也多是上了漆的以便清洗，而且和西方人用刀叉不同，吃的时候筷子是不沾嘴的。到19世纪中期，就已经有用一次性筷子的了。[50]

不仅如此，日本人还有很多关于"脏"和"干净"的说法。这些说法都能追溯到神道教对污染的观念当中去。神道所谓的玷污多具有仪式意义，但至于什么是污秽，什么是纯洁，

---

[49] 习惯因地因时而异。茶，在18世纪马萨诸塞州的迪尔菲尔德是如此昂贵，以至于人们只得"沉湎于酒精"。迈克尔·D. 与索菲·D. 寇，《18世纪中期马萨诸塞边远地区的饮食》，见《东北饮食》，皮特·贝纳斯与简·M. 贝纳斯编（波士顿：波士顿大学，1984），第41—45页。另一面，在旧时的南方，"作为南方夏日暑热中的天然之物，水，是最受欢迎的饮料"。乔·格雷·泰勒，《南方的饮食和参观》（巴吞鲁日：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出版社，1982），第43页。

[50] 迈克尔·库珀，《他们来过日本》，第198—199页；迈克尔·库珀，《日本这个岛》（东京：讲谈社国际，1973），第163页；恩格尔伯特·堪普佛，《日本史以及暹罗王国见闻，1690—1692》卷3（格拉斯哥：J. 麦克勒斯父子出版社，1906），第238—240页。虽然鱼生在德川时代开始大热，尤其是在大城市，但那时通常会将鱼半腌后再吃，并不像今天这样一片片生吃。鱼都是从海里捕捞的，不会受到肥料污染。关于德川时代的饮食习惯，参考渡边实，《日本食生活史》（东京：吉川弘文馆，1964），第190—269页。

人们想到的却是污染和干净这两种实际状态。任何与洪水、死亡以及疾病相关的东西——比如生孩子、月经、和病人或死人接触以及葬礼——都被视为不洁，而且人们曾忌讳参与宗教仪式，禁与外人来往，甚至葬礼结束回家后如未净身也被视为不洁。盐、水和火都被视为万物的净化剂，因此既被用于宗教仪式，又被用于除垢净身。对净化的重视并不为日本专有，在整个亚洲都可以见到，但日本却尤为强烈，并且持续至今。对肮脏之物的回避虽然有些迷信的意味，但肯定避免了很多细菌或病毒感染的机会，而且抑制了疫病在日本的传播。日本人平时在迈入任何高出地面的地板时都必会脱鞋，上完厕所要洗手，这些都是出于热爱清洁之故。[51]如前所述，在德川时代，勤洗澡成了一种普遍的习俗，当棉布普及之后，百姓也开始定时洗衣服了。[52]

虽然家庭的卫生习惯要靠个人自觉遵守来实现，公共卫生却还要仰仗政府之力。日本街道能保持得如此干净，供水如此充足优质，主要原因就在于德川时代存在着对民众强大的控制力。[53]两个因素加强了政府的控制。首先，武士阶级存在的理由，就是统治日本，同时武士以新儒家学说作为统治依据，此学说明确主张：统治者即为仁者，是对被统治者负责的，同时也是道德上的楷模。事实上这不仅是统治者本身对自己的严格要求，被统治者也会如此告诫他们。其次，到18世纪时，武士作为统治者已经超员，政

---

[51] 石毛直道，《住居与住生活》，见《日本人的生活》，梅棹忠夫编（东京：研究社出版，1976），第29页；H. 拜伦·伊尔哈特，《日本人的宗教》，第2版（恩西诺：狄金森出版社，1974），第7页；大贯惠美子，《当代日本的疾病和文化》（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4），第24页。

[52] 落合茂，《洗的风俗志》（东京：未来社，1984），第71—85页。

[53] 约翰·W. 霍尔，《德川日本的阶级统治》，见《日本研究杂志》1，第1期（1974），第39—49页。

府膨胀，更产生了无数繁文缛节和众多笃行这些繁文缛节的官员。[54]

我们从江户的治理当中，就可以看到这个施仁政而又励精图治的政府取得了怎样的业绩。全城被划分为若干的町，即为村庄大小的地方行政单位，政府以之牢牢控制广大市民。在城里较大的交叉点处，设有类似于今天的警署的机构，不仅监控违法犯罪活动，而且要确保水管没有漏水，街道保持清洁。市政府还把住在城里的流浪者派上了用场。这些人清除马路上的动物尸体，搬运死人，干一般人不愿干的活，周围有什么可疑的东西还要报官。19世纪晚期，江户变成东京尚不到10年，莫尔斯在评论这个焕然一新的城市里的贫民窟时都语带赞赏，自在情理之内。"在东京，大街小巷罗列着一排排极其简陋的棚屋。这里住着最贫困的人。在日本人眼里，这些地方是邋遢不堪的，可是和基督教国家的几乎所有城市里那些龌龊悲惨得令人发指的贫民窟相比，日本的贫民窟可说是很洁净了。"[55]

最后需要看到的是，日本人似乎并不像西方人那样应对人口密集化问题。当时日本的公寓不过两层楼高，并不像欧洲通常有七层。江户的劳工往往全家挤在一套一居室的公寓里，屋子大约9英尺见方，外加一个小的储物间、鞋库和厨房。一个街区的租户共用厕所和水井。但无论这些人家有多拥挤，他们住的并不是层

---

[54] 艾文·施纳，《仁君与良民：德川时代日本的叛乱和农民的觉悟》，见《德川时代日本人的思想》，奈地田哲夫与艾文·施纳编（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8），第46页；山村耕造，《武士收入和工商企业的研究》（剑桥，麻州：哈佛大学出版社，1974），第47—48页。

[55] 爱德华·S. 莫尔斯，《日本人的家和环境》，第5—6页。参考田村荣太郎，《町人的生活》（东京：雄山阁，1966），第194—197页；原田伴彦，《日本封建都市研究》（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57），第438页。当然，在欧洲也有例外，比如17世纪的荷兰人就有洁癖。参考西蒙·栖柯玛，《富人的尴尬》（纽约：阿尔弗雷德·A. 诺普夫，1987），第375—379页。

层叠叠的高楼，也不像那时的欧洲人会住地下室。地震随时都会发生，建筑物又都很轻，故杜绝了高楼的存在，而且各地政府禁止将施工计划交给任何行事鲁莽之人。[56] 日本从 16 世纪开始就能维持巨大的城市人口数，既得益于良好的卫生条件，也因为日本人拥有实行大规模工程计划、安装各种供水和废水处理系统以及监督其执行所必需的操控能力。

事实上，灾难性传染病的确绝缘于日本，这令人不可思议。鼠疫从未波及日本，而霍乱仅在 19 世纪蔓延全球时染指过这个国家。寄生虫和肠道感染——那些从口而入、通过食物和水污染传播的疾病——往往都只局限于某地区而不会四处扩散。这种情形在以粪便作肥料的社会是可以预料的，德川时代的日本也不例外。这也能解释为什么 1 到 4、5 岁的儿童死亡率相对较高。[57]刚断奶的孩子极易染病，但要是没有夭折，他们的抵抗力就会增强。然而，事实上在江户、大阪、京都等只有一个水源的城市，却都没有遇到过猖獗的传染病，表明这些城市一定普遍拥有良好的供水。[58]

本章集中探讨的是城市卫生，但在农村情况是差不多的。日本的农村是“不存在垃圾问题的”。[59]村民要么将垃圾烧了作燃料，

---

[56] 罗伯特·希格斯和戴维·布斯发现，在 19 世纪 90 年代的 17 个美国城市里，“人口密集化对每个城市死亡率的影响都确凿无疑，统计结果惊人”。《19 世纪 90 年代美国大城市死亡率的差异》，见《人类生态学》7（1979），第 353 页。也请参考田村荣太郎，《町人的生活》，第 198—199 页；西川幸治，《日本都市史研究》（东京：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72），第 250 页。M. 多萝西·乔治，《18 世纪的伦敦生活》，特别是第 2 章对伦敦的生活有形象的描绘。

[57] 要注意的是，此年龄段的死亡率在 19 世纪美国诸城市和乌克兰的奥德萨是很高的，原因据称是“夏季痢疾”。在修建了水管和全城的下水道系统以后，奥德萨市的死亡率在 1891 年至 1893 年里降至 2.54%。西方的这些城市在供水等系统改善后的死亡率仅比 1773 年至 1871 年间日本高山市的死亡率低一点。

[58] 安·鲍曼·简妮塔，《现代早期日本的传染病和死亡率》（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7）。

[59] 伊藤好一，《江户的梦之岛》，第 14—15 页。

要么用来作肥料，具体处置视垃圾性质而定。由于牲畜和家禽未被广泛养殖，加上野生动物少之又少，村民自家的粪便就成了重要的肥料来源。德川时代中后期，另一条获得肥料的途径只能是购买粪便，本人的粪便当然就很珍贵了。水井和其他水源必然存在着一些污染，但由于一点一滴的潜在肥料都是大家渴望收集的东西，污染便被控制在最小限度。城里人爱清洁讲卫生的种种习惯也为农村人所有，而且农村人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比起拥挤的城市，他们住的地方人烟稀少得多。

人们对旧时的日本特别是日本城市具有如此高的卫生水平这一点如此漠视，是因为当时的卫生系统用20世纪的标准来看不可避免是落后的。在1985年，只有34%的日本社区拥有现代化下水道系统。可笑的是，在一个叫做“多摩川上水”的镇里，居然一直就没有接通过下水道。[60]甚至在“二战”之后，日本人仍然用粪便作肥料，于是从不回收人类排泄物的西方人就视其为一种落后行为。正是由于旧时代这种处理大小便的方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马桶和下水道在日本的现代化反而延迟了。安装马桶、修建下水道系统运走废水，对日本人来说并非燃眉之急，也就不会斥巨资去大兴土木。旧时的垃圾处理系统固然抑制了当地的现代化进程，公共卫生设施也不是十全十美，然而，今天的日本人却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平均余命（life expectancy，又称预期寿命）都要长。

---

[60] 苏珊·希拉，《大部分日本住宅仍然缺乏美国住宅的那种舒适》，见《纽约时报》，10月30日，1985，第1、41页。

第六章　人口模式与幸福生活

人口统计反映的不仅仅是人口的动态，也能在很大程度上揭示出一个社会的生活标准和健康水平。死亡率越低，平均余命越长，该人群的身体状况就越好，而身体好坏是判断健康水平最重要的因素。人们有多少孩子、如何或者说是否想要控制自己家庭的规模，加上人口变化的其他一些数据，合起来就能很好地说明这个社会的生活标准如何。18 和 19 世纪的日本这些方面的资料非常丰富，尽管其中多有不全而又散布于全国各地，但的确有迹可循，尤其是和世界上其他地区比起来保存情况要好得多。这些资料表明，前现代时期的日本人努力地维持并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标准，他们的身体健康水平也并未显著落后，至少不比 19 世纪的西方国家差。

单就物质文化进行考察是不可能穷尽德川时代人口的所有资料的。在过去几十年里，已有无数关于乡村、寺庙、地方和全国现存数据的研究。其中研究最宏大也最细致的当属日本历史人口学研究的先锋学者速水融，我们这些分析德川时代人口的都是他

的学生。我本人早期就德川日本人口的史料作过调查，下面我就把自己发现的结果作一总结，同时也介绍一下他人对该时期身体健康水平问题的相关研究。①

除了地方上的一些详细资料外，我们对德川时代整个日本人口的普遍趋势也有所了解。17世纪德川幕府建立时，人口大概在1500—1800万之间，到1721年增至2600万，按照前现代的标准来看，无论如何都算是神速了。18世纪时，人口增长开始稳定。1721年至1846年间进行的11次普查表明，人口一直稳定在1721年的水平，在2600万上下波动。然而在19世纪中期最后三次调查那段时间，人口再一次大增。② 对这一趋势，标准的说法是：统一之后百年的和平和经济发展导致人口迅速增长，而随后由于一系列饥荒和经济停滞，便一度稳定不前。至于19世纪人口何以再次大增，则鲜有人探讨这个问题。

我们似乎不应如此过多地聚焦于全国性的笼统数字上面。其实日本各"国"也即各个地方省份的人口趋势，看上去倒是很不一样的：有些地方，特别是日本西部，在1721年至1846年间出现了显著的人口增长，而另一些地方，尤其是东北部，人口则在减少。关山直太郎总览全国数据后将其归为10大区，各区的人口统计呈现出与早期学者们所见的"停滞不前"全然不同的结果。③（表1）在这10个区当中，有7个在18到19世纪中期出现了人口增长的态势。而那3个没有增长的，分别是关东地区（包括江户

---

① 苏珊·B. 韩利与山村耕造，《日本前工业化时代经济与人口的变化，1600—1868》（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7）。

② 速水融，《人口变化》，见《过渡时期的日本》，马里厄斯·詹森与吉尔伯特·罗兹曼编（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6），第280—317页。关于幕府调查数据，参考关山直太郎，《近世日本的人口构造》（东京：吉川弘文馆，1958），第137—139页。

③ 关山直太郎，《近世日本的人口构造》，第140—141页。

表 1　全国各地区人口数据

	1721	1750	1756	1786	1798	1804	1822	1828	1834	1846	1872
						人口					
近畿	4,670,033	4,448,801	4,564,235	4,420,791	4,366,789	4,336,934	4,484,457	4,531,450	4,470,692	4,366,456	4,658,247
东海	2,327,483	2,373,803	2,341,660	2,307,949	2,328,850	2,340,929	2,499,632	2,476,024	2,474,591	2,482,265	2,685,141
关东	5,123,704	5,047,356	4,974,910	4,375,736	4,350,366	4,295,684	4,242,779	4,343,872	4,171,388	4,438,478	5,173,959
东北	2,840,489	2,680,389	2,644,638	2,368,641	2,442,069	2,473,097	2,559,841	2,626,021	2,632,438	2,520,333	3,485,935
东山	1,598,066	1,603,262	1,642,740	1,663,333	1,695,651	1,694,168	1,758,098	1,889,418	1,827,581	1,774,446	2,038,457
北陆	2,155,663	2,160,541	2,212,937	2,108,381	2,269,448	2,307,745	2,511,300	2,598,219	2,640,834	2,534,477	3,299,551
山阴	703,439	739,143	768,487	787,647	834,850	844,253	895,253	913,711	933,309	877,994	985,184
山阳	2,023,970	2,037,582	2,073,351	2,139,958	2,214,555	2,223,509	2,351,744	2,425,217	2,464,624	2,433,799	2,896,074
四国	1,523,131	1,562,283	1,607,486	1,661,501	1,702,560	1,760,526	1,863,253	1,896,948	1,932,849	1,943,146	2,416,143
九州	3,074,829	3,165,370	3,213,637	3,226,255	3,237,145	3,299,697	3,396,302	3,422,274	3,449,732	3,468,045	4,972,576
合计	26,065,425	25,917,830	26,070,712	25,086,466	25,471,033	25,621,957	26,602,110	27,201,400	27,063,907	26,907,625	33,110,825
	1721	1750	1756	1786	1798	1804	1822	1828	1834	1846	1872
						1721 年人口的百分比					
近畿	100.00	95.26	97.73	94.66	93.50	92.87	96.02	97.03	95.73	93.50	99.75
东海	100.00	101.99	100.61	99.16	100.06	100.56	107.12	106.38	106.32	106.65	115.36
关东	100.00	98.53	97.95	85.40	84.96	83.84	82.81	84.78	81.41	86.63	100.98
东北	100.00	94.36	92.10	83.39	86.00	87.07	89.04	92.45	92.67	88.73	122.72
东山	100.00	100.34	102.80	104.07	106.07	106.01	110.01	118.24	114.33	110.11	127.56
北陆	100.00	100.22	102.65	97.81	105.28	107.05	111.86	120.53	122.50	117.57	153.06
山阴	100.00	105.06	109.25	111.97	118.85	120.02	127.28	129.89	132.68	124.81	140.05
山阳	100.00	100.67	102.45	105.43	106.77	109.88	111.21	119.81	121.79	120.25	143.09
四国	100.00	101.97	104.92	108.45	111.76	114.91	122.32	123.81	126.15	126.82	159.66
九州	100.00	102.95	104.51	104.93	105.28	107.32	110.44	111.30	112.20	113.78	161.72

资料来源：关山直太郎，《近世日本的人口构造》（东京：吉川弘文馆，1958），第 140—141 页。

原书缺页

令人吃惊的不仅是大多数样本中出生和死亡率的总体平衡，还有这样一个事实：日本的出生和死亡率一直都较低。“二战”后许多非西方国家的出生率超过了千分之四，可日本却不是这样。[5]在日本大多数地方，死亡率同样也不高，除非某些地区某些年明确出现了死亡危机，比如19世纪30年代大歉收后40年代早期发生的情况那样。但即便在那时，死亡率也并没有高过20世纪那些闹饥荒的国家。

较低的出生和死亡率就产生了较高的平均余命。尽管今天我们所掌握的关于德川时代平均余命的样本都零散来自于日本各地，许多内容还是告诉我们，在前现代社会里，日本人活得惊人地久。表2和表3给出了若干农村和高山市某区的一些平均余命样本。有些样本也许并不能充分反映该地区的实情（例如在表3中的西方村，1782年至1787年间的女性平均余命竟是75岁），不过取样的村庄记录都很忠实可靠，因此数据本身应是精确的。很多看上去很显著的变化基本上可以肯定地说是由于样本较小所致，但突然出现的剧减还是能反映出德川时代曾发生的重大死亡危机。这其中引人注目的就有18世纪80年代天明年间的大饥荒（西方和下汤田）和天保年间的大饥荒（藤户和高山）。尽管如此，和歌山地方的4000个样本均处于深受粮食接连歉收的打击的一段时期，但男女的平均余命都仍然超过了40岁。可见在正常时期，平均余命肯定远远不止40岁。西方村的情况就证实了这一点。有意思的是，样本越大，显示出的平均余命就越高，聚居于太平洋沿岸更发达地区的人口尤为典型。

---

⑤ 美国人口普查局，《世界人口：1977，世界各国和地区近期人口估测》（华盛顿：美国商业部，1978）。

表 2　德川时代日本部分地区居民的平均余命

村或城市（现在所属县）	时间段	平均余命				
		基准年龄[1]	男性	取样数量	女性	取样数量
横内村(长野)	1671—1725	2	36.8	226	29.0	144
	1726—1775		42.7	253	44.0	97
饭沼村(岐阜)	1712—1867	2	41.8		39.7	250—375
纪伊国 14 个村庄(和歌山)	1780 和 1790 年代	8	44.6		42.2	约 4,000
浅草中村(岐阜)	1717—1830	1	46.9		50.7	120—284
下油田村(东北)	1773—1778	初生	35.1		30.3	1773 年 664
	1773—1778	1	44.2		39.5	
	1808—1813		26.7		30.1	1808 年 561 in 1808
	1808—1813		37.3		39.3	
神户新田(爱知)	1839—1869	2	33.2	137	31.6	138
高山(岐阜)	1806—1810	平均死亡年龄	39.2		39.6	1842 年 2,681
	1811—1815		49.5		42.8	
	1831—1835		43.1		41.7	
	1836—1840		38.8		39.8	
	1841—1845		37.1		32.9	

[1]：年龄均按史料记载，通常以日本式的“虚岁”法计算。下油田村及浅草中村的平均余命因此做了相应调整。

资料来源：横内村：速水融，《近世农民的历史人口学研究》（东京：东洋经济新报社，1973），第 204 页。饭沼村：速水融，“东浓—山村的人口统计”，《研究纪要》（东京：德川林制史研究所，1969），第 278 页。纪伊国：速水融，《纪伊尾鹫组的人口趋势》，见《研究纪要》，第 347 页。浅草中村：罗伯特·Y. 恩与托马斯·C. 史密斯，《18 世纪日本农民家庭与人口控制》，见《跨学科史学杂志》卷 6，第 3 期（1976 年冬），第 418 页。下油田村：由该村的宗门改账算出。神户新田：速水融，《德川时代日本尾张国神户—新田某村的人口分析，1778—1871》，见《庆应经济研究》。卷 5（1968），第 68 页。高山：佐佐木阳一郎，《飞驒国高山的人口研究》，见《经济史中的人口·第 37 届社会经济史学会大会报告》（东京：庆应通信，1969），第 112 页。

表3　平均余命估计

九州地方寺院记录中的居民的中位数存活年龄计算（卡兰与彼得森）				
		新宫寺		51.45
		西念寺		49.81
		教安寺		42.61
		泉福寺		45.96
应现寺（飞驒）记录中的居民1岁时的平均余命表（简妮塔与普雷斯顿）				
		男性		女性
1776—1795		40.98		41.23
1796—1815		44.39		41.39
1816—1835		46.06		42.23
1836—1855		43.29		42.67
1856—1875		44.69		43.60
1876—1895		53.35		49.92
藤户村与西方村居民1岁时的平均余命（亨利与山村）				
	男性[1]		女性	
藤户（冈山）				
1800—1805	50.9	(49.0)	59.1	(59.2)
1805—1810	52.1	(52.3)	58.1	(60.3)
1825—1830	48.4	(58.7)	47.9	(55.1)
1830—1835	43.6	(46.8)	40.9	(44.7)
平均	48.8	(51.7)	51.5	(54.8)
西方（三河—爱知）				
1782—1787	50.9	(51.0)	75.3	(75.3)
1787—1792	40.6	(46.0)	46.3	(51.6)
1791—1796	40.5	(44.2)	56.1	(60.6)
平均	44.0	(47.1)	59.2	(62.5)

[1]：括号中为0—4岁群体的平均余命。

资料来源：阿尔纳·卡兰和乔·彼得森，《德川时代福冈县的饥荒与人口》，见《日本研究杂志》10，第1期（1984年冬）第57页。安·简妮塔与萨缪尔·普雷斯顿，《中部日本两个世纪里的死亡率变化：以某寺院记录为史料》，见《人口研究》45（1991），第433—436页。苏珊·B. 韩利与山村耕造，《日本前工业化时代经济与人口的变化，1600—1868》（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7），第222页。

这些数值在今天看来似乎很低，但西欧直到19世纪前半期才达到了这个高度。在1800年左右，有的西欧国家的平均余命是35至40岁，这比起前两个世纪已经是相当高了。在1755年至1756年和1816年至1840年间的瑞典，男性的平均余命从33.2岁增至到39.5岁，女性则从35.7岁增至43.5岁。丹麦1835年至1844年的女性平均余命是44.7岁，英格兰和威尔士1841年是42.2岁，法国1817年至1831年是40.8岁，荷兰1816年至1825年是35.1岁。[⑥] 据联合国计算，西欧19世纪男性平均余命的合成数为：1840年39.6岁，1860年41.1岁，1900年48.9岁。据估计，女性的平均余命从1840年的42.5岁上升到1900年的52.1岁。此时的西欧，平均余命才赶上了德川时代的日本。[⑦]

学者们普遍认为，欧洲19世纪的平均余命比17和18世纪要高，是因为在19世纪以前，饥荒和传染病导致了极高的死亡率。19世纪明治维新50年前的日本也有同样的现象。那个年代因饥荒频发而闻名，其平均余命和工业化初始及主要死亡危机结束后的欧洲非常接近。人们之所以认为日本旧时的平均余命一定落后于欧洲，是因为20世纪上半期时事实的确如此。然而，所有史料证明，德川时代的情形完全相反。

作为一个前现代国家，为什么日本的平均余命会如此之高，经济如此振兴，人口总体上又能如此稳定呢？答案是复杂的。在17世纪，当经济在和平的环境下开始发展后，人口迅速增长。相对于劳动力数量，土地变得稀少，大地主发现如果避免了土地监管的成本并降低农民工钱的话，自己会很赚。由于究竟给农民多少工钱很难

⑥ 约瑟夫·J. 斯彭格勒，《人口因素和现代早期经济发展》，见《代达罗斯》97，第2期（1968年春），第441页。

⑦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老龄化及其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纽约：联合国，1956），第54页。

先算好，地主就让他们做了佃农，但依然保持着雇佣关系，以保证在农忙时期有足够的劳动力为自己下地。不过，农民现在自己有地可耕，就没理由逃往他乡了，于是生产积极性高涨，产量也就增加了。他们成了佃户，不再世代为奴，婚姻就能自主，事实上他们也这么做了。17 世纪人口因而大增。[8]

关于劳动力的制度安排的这一变化，其最重要的后果，是产生了"现代"式小家庭。在家族和农场劳动力这两种意义上，小家庭都成了基本单位。[9] 耕农有了经济动力，而恰恰在这时国家也开始谋求经济发展，于是农人们发现和种田有关的法令极大地迎合了自己的需要。耕种是密集化的，而且在灌溉田里种稻米条件更好，现在一个小家庭里的成年人就完全能种好自家那一小块地，甚至比一大群人种一大片田还要高效。在 17 世纪的农业条件下，多一些人下田所获得的增产还抵不上家里其他没下田的人干的活。也就是说，边际产出量是很低的。因此，如果一个农民家里人多，负担就很重，得喂饱更多张嘴，而这些嘴又干不了什么活。内藤二郎曾计算出，1772 年冈山县沼村的家庭新增劳动力导致了边际效益递减，但正如我们看到的，日本其他地方农民的情况似乎也符合这一规律。[10]

政府也不愿人们拥有大家庭，因为一家人口多，就要将所有的农产品消费掉，从而有可能限制税收。经济原因已经使人们不乐意建立大家庭了，政府又颁布法令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倾向。在很多地方，政府禁止将土地分给多个继承人，不让一个农业单位四分五裂各自独立——爱尔兰在 19 世纪土豆歉收的大饥荒之前正

---

⑧ 山村耕造，《日本和英国前工业时代土地所有的模式》，《日本：一个比较的观察》，阿尔伯特·M. 克雷格编（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1979），第 276—323 页。

⑨ 托马斯·C. 史密斯《现代日本的农业根源》（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59）。

⑩ 内藤二郎，《本百姓体制的研究》（东京：御茶之水书房，1968），第 168 页。

是发生了这样的事。可见，此时的日本人开始实行了长嗣继承制度。原则上固然是长嗣继承，但在实际操作上把它叫做单一继承人继承制度应该更确切。德川时代形成的所谓“家”的家族系统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个集团单位。这个单位是经济意义上的，是为了生产而存在的，是存在于全体成员之外的一个实体。这个实体的存在是长期的，理论上也和任何成员的生死没有关系。但在困难环境中，一个社会团体会土崩瓦解，“家”却靠自己的神圣性得以保持不倒。同时，一家之主有义务保证家里香火不断，节约管理全家资源（并尽可能地增加之），还要尊崇祖先。

在这一系统中，一家之主需要一个继承人来继承家业，但他极不情愿有很多孩子，因为孩子多了只会消耗家财，却并不能为这个家未来的建设添砖加瓦。在前现代，这两种意愿会起冲突，因为死亡率较高，一家必须要有若干子嗣才能保证至少会有一个活下来延续香火。

领养在日本很早就被视为续香火的另一条途径。这样，一个家庭即使孩子有限也不会有断子绝孙的危险。如果没有儿子，就领养一个男孩入赘作女婿；如果所有的孩子都夭折了，就领养一个儿子或女儿来续香火。领养是如此屡见不鲜，1775 年至 1863 年在冈山县藤户村的 105 户世传两代以上的人家里，有 53% 都曾领养孩子来继承家业。[11] 这比供职于幕府的上层武士的领养率要高出两倍不止。[12] 英国人认为领养是一种“欺骗”行为，因为在英国，要延续家业，必须要让有血缘关系的亲属来作继承人。在其他文化当中，比如印度，一个家族也是不愿考虑领养孩子的，因为他

---

[11] 关于此村和本章引用的其他诸村的资料均来自于作者对《宗门改役账》（宗教调查记录）中五个村庄的研究。

[12] 关于“旗本”（高级武士）的领养情况的分析，参考山村耕造，《武士收入和工商企业的研究》，第 79—83 页。

们认为必须要亲生子才能拜祭父辈和守护先灵。[13]

既然不需要生很多孩子来延续这个“家”，养着多余的成年人又会给“家”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德川时代人就开始对此加以限制，只保留延续香火和家业所必需的人丁。因此，那些不会继承家业的孩子就必须离开这个家。女孩通常都会嫁出去，非长子的男孩要么被别人领养走，要么离家自行创业。即使是富有的农村家庭也依然遵循着单一子嗣继承制度，因为就算第一代人已将地盘坐稳，把土地分给多个孩子仍会削弱家族的经济和社会地位。曾经有很长一段时期，一个家族会让非长子、女儿或女婿在主家下面另立门户，但为了维持主家在村中的地位，这些别家只能得到少得可怜的地。

进入某一家族的人，通常都要直接继承家业，尤以女婿为多。家里娶新媳妇之日，往往也就是女儿出嫁之时。这样一来，干活的成年人就总能同样多。成亲的日子由家族决定，好让一定时间内只有一对要生孩子的夫妇；在这一系统中，每一代就只会有一对夫妇存在。通常一代人里不结婚的是最小的那个。如果一个非长子因故长留家中不走，那这个孩子就不会结婚，除非适逢极其特殊的经济环境。有时在家族内部遭遇不幸或身处诸如瘟疫等殃及全村的社会灾难时，家族会过继一个成年人入门，这时过继就起到了挽救和重建家业的作用。[14]

由此可见，主干家庭成为德川时代的理想家庭模式。这种模式与核心家庭不同，因为它随直系子孙上下延伸，所以会出现三代甚至四代同堂，而每一成员都是家业的直接继承者，除了未成年的最

---

⑬ 与之相反，在日本，一个家族的任何成员都可以拜祭祖先，而且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的灵牌位可以置于同一佛塔中。参考罗伯特·J. 史密斯，《当代日本的祖先崇拜》（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4），第164—183页。

⑭ 参考韩利与山村耕造，《日本前工业化时代经济与人口的变化，1600—1868》，第9、10章。

幼子会等到长大了才离开这个家以外。然而，在平均余命只有40岁左右的前现代社会，一个家族里的世代是有上限的。最老的一代往往只有一个人还活着。大多数家庭世代更替，同时存在的总是只有两代人，在家庭结构上和现代核心家庭倒仿佛如出一辙。

令人吃惊的是，日本的这种家庭模式和我们所见的西欧家庭模式非常相似。[15] 大多数西欧家庭都是主干或核心式的（至于是前者还是后者尚存争议）。女性往往会在20多岁时结婚，有时会拖到年近30，而很大一部分人终身未婚。相对于日本来说，西欧要极端得多，但比起东欧、亚洲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日本的情况更符合这种模式。在中国，一般是人人结婚并且早婚，同时大家庭——每一代都有不止一对夫妇——就算不是标准，也是理想的家庭模式。日本平民通常20岁以后结婚，而女人虽然在近40岁时大多已出嫁，却绝不是人人皆婚。最重要的是，无论是在武士还是平民家，极少出现一代人中有多对夫妇的现象，只有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才会破例，比如某家办了一个大企业，这就需要很多人手来运作，同时也能养活多个小家。

凭借对进入家庭的新人的限制，又确保了多余的人会离家而去，前现代时期的日本人就能很好地控制家庭的规模和结构。但他们是怎么控制孩子数量的呢？首先，在控制婚姻的同时，他们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子女人数。速水融研究过某村外出工作数年后于20多岁时返乡成亲的妇女，推测她们因此会至少少生2胎。[16] 在冈山，很明显，人们对家里谁结婚是有制约的，尤其是在经济衰退或萧条期。虽然30多岁时已婚妇女的比例很高，但20多岁的已婚妇女比例，尤其是20到24岁之间的，则视该村的经济状况而上下波动。这

---

⑮ 参考苏珊·B．韩利与阿瑟P. 沃尔夫编，《东亚史中的家庭和人口》序言（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5），第1—12页。

⑯ 速水融，《前工业化社会的劳工移民》，见《庆应经济研究》10，第2期（1973）。

是家家户户都存在的现象。(表4) 在1782年天明大饥荒前夕的西方村，20到24岁之间的女子有50%结了婚；1796年就只有25%了。调控女子出嫁时间的最终结果是，正值生育年龄的已婚妇女人数得到限制，从而也就限制了新生孩子的数量。(表5)

表4　不同年龄段已婚女性的比例

藤户村（冈山）							
年龄段	1775	1794	1810	1825	1837	1844	1863
15—19	7.7	4.5	0.0	0.0	6.1	13.0	2.6
20—24	38.5	20.0	32.0	44.4	53.6	38.2	47.6
25—29	81.3	84.2	66.7	70.6	75.0	70.8	62.1
30—34	92.9	82.6	84.6	96.1	91.7	78.9	64.0
35—39	93.3	100.0	72.7	77.8	94.1	84.2	88.2
40—44	83.3	90.0	73.6	93.3	72.4	73.3	87.5
合计	56.9	59.7	49.1	63.0	57.6	56.0	52.6
取样数	109	124	112	127	139	134	154
吹上村（冈山）							
年龄段	1683	1702	1730	1773	1801	1821	1860
15—19	26.3	0.0	7.1	3.2	6.3	9.8	5.9
20—24	37.5	21.0	50.0	38.9	21.9	34.1	45.5
25—29	100.0	92.3	72.0	71.4	57.1	70.3	43.8
30—34	71.4	81.8	83.3	75.6	75.6	76.3	53.8
35—39	60.0	76.0	88.5	74.1	86.1	75.0	75.0
40—44	90.0	70.0	84.2	84.6	85.7	79.3	61.5
合计	57.5	56.6	62.2	56.6	55.3	55.0	47.2
取样数	73	106	148	182	190	225	176
沼村（冈山）							
年龄段	1780	1801	1831	1861	1871		
15—19	9.1	0.0	5.0	7.1	0.0		
20—24	81.8	29.4	55.6	40.0	14.3		
25—29	66.7	84.6	66.7	37.5	50.0		
30—34	100.0	90.0	80.0	80.0	77.8		
35—39	100.0	90.9	90.0	83.3	50.0		
40—44	83.3	100.0	85.7	83.3	90.0		
合计	72.6	61.6	56.2	51.7	43.9		
取样数	62	73	73	60	66		

续上表

西方村（三河—爱知）		
年龄段	1782	1796
15—19	27.3	0.0
20—24	50.0	25.0
25—29	60.0	55.6
30—34	69.2	90.9
35—39	85.7	80.0
40—44	66.7	62.5
合计	57.6	60.4
取样数	59	48

资料来源：《日本前工业化时代经济与人口的变化，1600—1868》（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7），第249页。

表5　有育龄已婚女性的家庭的比例

年	家庭数	有15—44岁妻子的家庭百分比	平均每户的15—44岁妇女人数
藤户村（冈山）			
1775	110	56.4	0.99
1794	111	66.7	1.12
1810	111	49.5	1.01
1825	112	71.4	1.13
1837	119	67.2	1.17
1844	118	63.6	1.14
1863	132	61.4	1.17
吹上村（冈山）			
1683	65	64.6	1.12
1702	78	76.9	1.36
1730	134	68.7	1.10
1773	190	54.2	0.96
1801	210	50.0	0.90
1821	240	51.7	0.94
1860	255	32.5	0.69

续上表

年	家庭数	有15—44岁 妻子的家庭百分比	平均每户的 15—44岁妇女人数
沼村（冈山）			
1780	58	77.6	1.07
1801	63	71.4	1.16
1831	70	58.6	1.04
1861	69	44.9	0.87
1871	73	33.7	0.90
西方村（三河—爱知）			
1782	67	52.2	0.88
1796	68	42.6	0.71

资料来源：《日本前工业化时代经济与人口的变化，1600—1868》（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7），第251页。

谁结婚，什么时候结婚，都由家里说了算，这样，一个家族的规模就能得到控制。甚至在结了婚以后，养多少孩子也是有限定的。首先，大多数我们采样的德川时代的村庄都显示出很低的出生率。在我手里的样本中，[17] 最低的是平均每1000个女性有18.5次分娩，发生在三河的西方村；最高的是冈山的吹上村，有26次。在所调查的4个村里，平均每个母亲生育的孩子数从不到3个至3到4个之间不等。这个数目在前现代社会里算是少的，而且由于那时的死亡率比今天高，母亲养大的孩子往往比生出来的要少一个。如果一个社会群体的平均余命达40岁以上，女人在20出头时出嫁，并于40岁前生孩子，那么对这个群体来说，上述出生率怎么都属于较低了。[18] 我认为——其他学者也赞同——虽然身处太平盛世，德川时代的家

---

⑰ 参考韩利与山村耕造，《日本前工业化时代经济与人口的变化，1600—1868》，第8—10章。

⑱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平均余命是一个平均值：婴儿和幼童的死亡率越高，值就越低，即使大多数人出生后会活到60岁甚至更老（一个两岁夭折的孩子和一个78岁死的老人合起来的平均余命是40岁）。大体上一个群体的儿童夭折率越高，更年老的人的死亡率必也越高。

庭仍然实行了计划生育。[19]

史学家通常用“堕胎间引”来称呼当时人的流产和杀婴行为。所谓“间引”就是“修剪”的意思，类似于人们给草木剪枝好让剩余部分长得更茂盛。在天明大饥荒期间，盛传东北地区有人杀婴，但不知是否属实，同时很多地方颁布了禁止“堕胎间引”的法令，通常会勒令孕妇进行登记。堕胎在德川时代颇为流行。对打胎手段最早详加记载的书出版于1692年，所载手段很多都是要么无效，比如在孕早期吃鲤鱼，要么有害，比如服食水银化合物。[20] 虽然佛教戒杀生，日本的僧人似乎更“理解”堕胎和杀婴行为，并通过行各种仪式来慰藉那些因“奉还”了胎儿或新生儿而自责不已的人。[21] 究竟有多少新生命被扼杀了？想不生孩子的人又占多大比例？这些都不得而知。但我们可以从分析孩童的性别比例和妇女生最后一胎的年龄这两个方面来看当时日本人限制家庭规模的成效如何。

为了考察当时的妇女是否计划生育，我们首先需要作出下列假设：首先，我们假定家家户户都是重男轻女的，尤其是那些处于贫困线上的人家，因为他们需要有个继承人。在这类家庭中，头胎不管是男是女，都会生下来，但当这个家达到或接近预期规模时，下一胎如果是男孩就会留下来，女孩则不会。其次，如果一个母亲觉得自己已经生了足够多的孩子，她就不会再生，如果

---

⑲ 这方面研究最主要的相关学者是速水融。参考他的《德川时代美浓地区农村婚姻和生育力的阶级差别》，见《庆应经济研究》17，第1期（1980），以及他的《近世浓尾地方的人口，经济和社会》（东京：创文社，1992）。托马斯·C. 史密斯在他研究某村的《中原》（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7）一书中也极为赞同此论。

⑳ 西岛实，《江户时代的性生活》（东京：雄山阁，1969），第241—242页。

㉑ 威廉·R. 拉弗勒，《流体生命：日本的堕胎和佛教》（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2），第103—118页。

又生了，那就“奉还”给老天爷。因此，高龄母亲即使还能生不少孩子，实际上也不怎么去生了。

在藤户村，女人的平均婚龄超过了20岁，而且往往过了35岁就不会再打算怀孕。考虑到她们的平均余命，这个现象是异乎寻常的。女人生最后一胎的平均年龄是34.1岁，但生了5个以上孩子的母亲最后分娩的平均年龄则是38.1岁。这说明很多女人到35岁左右就会开始采取措施来限制家庭规模了。[22]

藤户村的女人限制家庭规模的方法之一是杀婴。在90年间，我所采样的1336个藤户村出生的孩子的性别比例是1.24，就是说124个男孩:100个女孩。正常性别比应是104:100，因此上述比值是比较反常的，也从统计上证实，藤户村的现象是违反自然规律的。最可能的情况是，生了男孩，村民就留着，如果是女孩，便就地窒息而死。不但所有婴儿的性别比偏离常态，在1825年至1841年间结婚且家有3到6石田地的女子所生的婴儿性别比更是离谱，竟达2.23，这就意味着平均生了9个男孩才生4个女孩。样本不大，但由此得到的数据已经显示出当地人口比例的失调。

4村的最后一胎的性别比例证实了前述假设的正确，即母亲会采取措施控制家庭规模，并确保后继有人。（表6）藤户村所有婴儿的性别比和母亲群体H（1841年后结婚或生孩子，并于1863年前就超过了44岁或婚姻终结了的妇女）所生孩子的性别比都从统计数据上大大证实了我们的假设：母亲们往往会设法处理掉女婴。很多其他群体的性别比例更离谱，不过因为样本都比较小，可能只是个别现象，而样本背后的千家万户实际上也许并不离谱，也就是说性别比总体上是正常的。沼村的性别比呈现出女孩比男孩

㉒ 韩利与山村耕造，《日本前工业化时代经济与人口的变化，1600—1868》，第236页，表9.5。

表 6　最后一胎的性别比例

村庄		性别比例	取样数
吹上村（1683—1730）			
	I[1]	1.41	82
	II[2]	1.36	104
沼村（1814—1832）			
	I	0.83	22
	II	0.90	40
沼村（1860—1871）			
	I	0.67	10
	II	0.85	24
西方村（1782—1796）			
	I	1.83	17
	II	1.50	30
藤户村[3]			
	A	1.20	33
	B	2.60	18
	C	1.75	33
	D	1.45	54
	E	1.15	43
	F	1.00	38
	G	1.30	76
	H	1.70[4]	60
藤户村合计		1.40[4]	355

[1]：与丈夫同居至44岁的已生育妇女

[2]：婚姻维持至39岁的已生育妇女，或在39岁前因夫妻一方去世而婚姻终止的已生育妇女

[3]：藤户村的各类群体

A：1775年时39岁以上但尚未55岁的已婚妇女

B：仅1775年至1778年间记录在案的39岁以下育龄妇女

C：1794年的记录确认的、1775年18—39岁（或1778年18岁）的育龄妇女

D：1794年23—44岁、1794年前结婚的妇女（1775—1778年未记录在案者）

E：1794年至1810年间结婚的妇女

F：1825年31—45岁的已婚妇女（之前未记录在案者）

G：1825年至1841年间结婚的妇女

H：1841年后结婚（或生育孩子但丈夫不详），但在1863年前已44岁或婚姻终止的妇女

[4]：该性别比例在95%的置信区间外。

资料来源：《日本前工业化时代经济与人口的变化，1600—1868》（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7），第240页。

多的状态。这个村的家庭规模都较小，人口数量稳定，或者说略有递减，那么该村妇女控制家庭规模的办法可能是：如果怀上了不该怀的孩子，无论男女一律打掉。

藤户村的355个最后一胎的性别比是1.4，这个数字无论如何都在95%的置信区间以外，因此用统计学的话来说，我们可以推翻如下假设：当地妇女杀婴并不根据性别作选择。更可能的是，该村妇女在意识到已经有了足够多的孩子时，下一胎往往就会只想保存男婴。这种态度不但影响了最后一胎孩子的性别比，也影响了全体孩子的性别比，以及妇女生最后一胎时的平均年龄——也即最后一次分娩成功，孩子活了下来并登记在簿的。

很多研究德川时代的学者都从人口分析中得出一个结论：农民在限制人口。速水融的研究最为深入，他认为出生率之所以呈下降的形势，是由于计划生育。[23] 托马斯·C. 史密斯在他的研究专著《中原》中也认为，中原村的人并非等到家室达到所需规模的时候才控制孩子的性别比例，而是一开始就如此。[24] 尽管史密斯的样本非常小，结论也待商榷，当时百姓以堕胎、杀婴以及操控婚姻大事来限制家庭规模，却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其手段恐怕比所知的还要多。尚存争议的是，在居民较为富有、经济兴旺的村庄，人们是否依然要限制家庭规模呢？

当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都认为多子多福的时候，为什么日本人要限制子女数量和家庭规模呢？答案尚未完全明了。不过，日本村庄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无疑助长了这种观念。一个家庭的社会地位如何，极大地左右着人们对各个收入水平的家属的人数限制。为了维持生活标准和社会地位，每户人家都想获得最大限度的人均收入。尽管经济

㉓ 速水融，《通过宗门改账所见信州横内村之长期人口统计》，见《产业研究所系列》202（东京：庆应义塾大学产业研究所，1967—1968）。

㉔ 史密斯，《中原》。

实力并不是反映社会地位的唯一因素，但社会地位基本上总是和权势联系在一起，而权势则部分地来自于经济实力。地位，决定了谁能执掌村内的行政大权，甚至还决定了全村年会的座次。在一个狭小封闭的社会里，如果只有亲戚、邻居或村官能给你家带来救济或福利，那么这样一个在收获季节前无法完成村中的纳税责任、难以自给的穷困户就不得不靠他人的施舍过日子，这种日子是不会过得舒坦的。㉕

与地位相伴随的，既有义务也有特权。一村之长一般会有份俸禄或一块免税的稻田，但也要担负一些需要自己掏钱的职责。有官员来视察，他要鞍前马后地接待。村里欠了外债需偿还，负全责的也是他。许多有钱人平时放高利贷，比如藤户村的日笠家族，然而一旦粮食歉收，他们又不得不开仓放粮，赈济灾民。因此，村中身居高位的那些家族仗着祖上的功业虽能名正言顺地高高在上，但要长久坐得稳，还是财富说了算。光像过去那样过日子是不够的，他们还得让自家在村里的地位始终不能落后别人才行。

不但村里的富户为维持自家的社会地位感到压力，其他人家一样时刻担心地位不保，并且尽可能地往上爬。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家庭压力大概是最大的，因为他们基本上没有什么余钱可以依赖。同时，当越来越多的商品涌现村中，却都落入一小撮人家里时，其他人就渴望自己也能拥有同样的东西。"二战"后的土地改革结束后，有人问农民他们是否致富了，答曰：基本上没有。腰包里的钱是更多了，但花销也更大了。"总的来说和以前差不多。"㉖ 收入增加了，对生活标准的要求也随之增加了。在农村社会打破闭塞状态已经

㉕ 儿玉幸多，《近世农民生活史》（东京：吉川弘文馆，1957），第226—227页。关于社会地位及其决定性作用的讨论之英语著述，参考托马斯·C. 史密斯，《现代日本的农业根源》第5章；别府春海，《义务，报酬，赏罚和权势：德川时代村政府的四只角》，见《现代日本领导层：过渡和改变》，伯纳德·S. 希伯曼与哈利·D. 哈鲁图尼安编（图森：亚利桑那大学出版社，1966），第25—50页。

㉖ R. P. 多雷，《日本的土地改革》（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59），第206页。

很久以后的今天，如果村民尚且普遍持有这种生活态度的话，不难想象在19世纪中期时，添扇拉门或一块榻榻米，甚至从村里的铺子买点小奢侈品，对一家人会是怎样的压力。

但也存在与之截然相反的趋势：即使在收入下降的时候，依然维持着以前的花销水平。这种被称为“棘轮效应”的趋势在经济衰退期尤其显著。那时，一家人为了维持他们惯常的生活水平，就会动用储蓄来支付当下的花费。㉗ 但是无论在哪种情况下，孩子多了都会降低家里的生活标准或削弱财力，因为孩子小的时候得抚养他们，大了又要给嫁妆或者分田地。富人家也好穷人家也好，都是如此。冈山县藤户村的一项研究表明，在经济衰退期，死亡率如果还正常的话，人们就会迟迟不成亲，㉘ 同时格里菲斯·费尼和滨野清发现有史料显示出，在19世纪大米涨价的时期，出生率会下降。㉙

关山直太郎认为，在德川时代，武士、町人和农民都觉得小家庭更好，这一观念遍及全国。㉚ 从土佐的史料里我们看到，人们选择堕胎或杀婴有诸多缘故：如果儿媳怀孕了，婆婆就不宜也怀孕；离婚后出生的孩子被证明对再婚不利；在有些地方，家里生了多于3个孩子据说就会被人取笑。㉛ 我们无法从数量上明确上述种种观念究竟对人们选择小家庭有多大的影响，但这些看法的大行其道，无疑证明了大家庭在18、19世纪的日本并不是人们的理

㉗ 詹姆斯·S. 杜森贝利，《收入消费关系及其意义》，见《收入，就业与公共政策》（纽约：W. W. 诺顿，1948），第54—81页。

㉘ 韩利与山村耕造，《日本前工业化时代经济与人口的变化，1600—1868》，第247、249页。

㉙ 格里菲斯·菲尼与滨野清，《德川时代晚期的米价波动和生育能力》，见《日本研究杂志》16，第1期（1990年冬），第1—30页。

㉚ 关山直太郎，《近世日本的人口构造》，第301页。

㉛ 津下刚，《论农村问题之一的“间引”》，见《经济史研究》15，第2期（1936年2月）。

想，而晚婚之类遏制怀孕的习俗得以盛行于世，也绝非巧合。

学者们在德川时代日本人控制人口这一点上没有异议，但对其动机则有不同说法：是为了维持和提高生活标准，还是出于对大饥荒的恐惧，以至于百年之内都因前车之鉴而对添丁有所忌惮？阿尔纳·卡兰和乔·彼得森认为，18世纪30年代的享保大饥荒之后，北九州地方的人民便开始爱惜资源和限制人口，以免将来歉收时再次受苦。然而，在享保大饥荒发生之前的几十年里，那里的人口增长率也出现了下滑，这一史实使他二人的说法受到质疑。尽管如此，不可否认民众控制人口是由于一些消极的原因。[32] 难点在于，我们很难判断人们之所以要控制需要抚养的家属数量，究竟是为了防患于未然，还是为了保持他们当前的生活标准，抑或是为了过得更好。答案因时因地甚至因人而异，但最终都指向了同一结果：由于大家能吃得更好，住得更宽敞舒适，于是生活标准开创了新高，身体健康水平也因此飞升。

如果德川时代日本人的平均余命比同时代的西方人更长，生活方式也更健康，正如第四章所讨论过的，那么我们不难设想他们必定拥有强健的体魄。但是除了平均余命值以外，我们又如何衡量体魄呢？手段之一是测量身高。在旧时很多国家为了征兵会有一些这方面的记录。[33] 以身高为凭不可贸然下结论，一方面因为还要考虑体重，另外身高也有遗传因素，有些群体的平均身高天生就比其他人矮，但身高肯定和青少年时期的营养脱不开干系，也和人均死亡年龄密切相关，这一点即使对某一群体内部而言也是毋庸

---

[32] 阿尔纳·卡兰与乔·彼得森，《德川时代福冈县的饥荒和人口》，见《日本研究杂志》10，第1期（1984年冬）。

[33] 通过身高来看营养状况的有关讨论，参考詹姆斯·C. 瑞利，《身高，营养以及死亡风险之再探讨》，见《跨学科历史杂志》24，第3期（1994年冬），第465—471页。

置疑的。

德川时代没有留下关于身高的记录，因为无人保存这类记录。人死了大多火化。不过据东京一个老墓地的考察表明，埋葬在那里的成年男子平均身高大概是157厘米，女子是148厘米。也即男子约5英尺2英寸，女子刚好4英尺10英寸。[34] 明治时代早期开始有了军队的系统记录，但那时去应征当兵的年轻男子显然是出生于德川时代末期。1883年至1897年间应征入伍的男子的平均身高是156.5厘米，也就是刚好5英尺1.5英寸。这比1933年至1937年间入伍者要低4厘米（1.5英寸）。[35]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8世纪奥匈帝国应征入伍者均高于160厘米（大多数是162—164厘米），瑞典人更是高于170厘米。[36] 意大利的入伍者身高从1871年至1880年间的163.1厘米增至1891年至1900年间的163.8厘米。[37] 美国的入伍者身高从19世纪20年代的173.0厘米下降至70年代的171.0厘米。[38]

解释这些差异的形成，需要慎之又慎。大多数研究都是猜想多过实证。不少知名研究者都认为身高意义重大，但也存在很多个子矮存活率却很高的群体，也不乏个子高死亡率也高的例子，所以大

---

[34] 另一实例为群马县的藤原村考古发现的两具女尸骨架。二人均为1783年浅间山火山爆发时被埋。其中一具断定为135至145厘米高，另一具要矮10厘米。对此例和文中之例的讨论皆见于《身材矮小之江户时代庶民》一文，见《每日新闻》，1980年7月21日。

[35] 此二数据来自厚生省1968年出版的《国民营养现状》，转引自卡尔·莫斯克，《日本的生殖力，杀婴和食品消费》，见《经济史研究》15（1978），第279页。

[36] 马西莫·李维·巴奇，《人口与营养：论欧洲人口史》（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1），第110页。数据皆来自J. 科姆勒斯，L. G. 桑德博格和R. H. 斯特科尔的研究。

[37] C. A. 柯西尼，《意大利男性入伍者身高的长期趋势》，见《营养和生活标准的长期变化》，R. W. 福格尔编（伯尔尼：国际经济史协会第九届大会，1986），第18页。

[38] 约翰·科姆勒斯，《西点军校学生的身高和体重：南北战争前美国的饮食变化》，见《经济史杂志》47，第4期（1987年12月），第901页。

家一直争论不休。[39] 卡尔·莫斯克以明治时代入伍者个子矮作为19世纪日本人营养不良的证据。[40] 事实上，在“二战”前的半个世纪里，入伍士兵的平均身高是略有增加的——从19世纪80年代末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增高了3.6厘米也就是约1.5英寸。最近的研究表明，身高的决定因素是复杂的，营养只是其中之一，此外还有该群体在劳作时能量的耗费程度、疾病史、遗传以及其他很多尚不可测的条件。[41] 史实表明，明治时代日本人的身高变化很小，尤其是在和“二战”后几十年内身高发生的飞跃相比较时。

营养会影响生育力。很多研究显示出，成年女性的月经初潮和生殖力都与体内脂肪的比重有关。罗斯·E. 弗雷斯克及其同事证明，女人体重中至少17%必须是脂肪才能有月经，不仅如此，脂肪的分布也是保持正常月经周期不可或缺的因素。[42] 1935年前的研究显示出日本的人均初潮年龄是15岁，[43] 这意味着当时日本女性进入生育年龄很可能比当今要晚两年甚至更多。由于她们的营养水平也比战后的女性更低，生孩子后她们闭经也可能要更早。但并没有证据表明18、19世纪的日本女人在生育年龄期的不孕是由于营养低下造成的。而在所谓“饥荒”的年月，分娩数反而超

---

[39] 关于以身高衡量健康，参考罗伯特·W. 福格尔、罗德里克·福楼德和约翰·科姆勒斯的研究，转引自詹姆斯·C. 瑞利的《身高，营养以及死亡风险之再探讨》一文。瑞利认为身高并不是健康的唯一决定因素。

[40] 莫斯克，《日本的生殖力，杀婴和食品消费》，第280—282页。

[41] 汉斯-乔亚吉姆·沃斯，《身高，营养和劳动：改写“奥地利范式”》，见《跨学科历史杂志》25，第4期（1995年春），第627—636页。

[42] 罗斯·E. 弗雷斯克，《女性生殖力的生物决定因素对人口的影响》，见《社会生物学》22（1975年春），第19页。随后的研究进一步证明上述关系的存在。参考罗斯·E. 弗雷斯克等，《运动员体内总脂肪和局部脂肪，雌激素代谢以及排卵的磁共振成像之对照试验》，见《临床内分泌与新陈代谢杂志》77，第2期（1993），第471—477页。

[43] 雷蒙德·珀尔，《人口自然史》（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39），转引自乔金德·库玛，《对近期月经初潮年龄和营养水平以及初潮的社会经济学意义的比较研究》，见《东方人类学》28，第2期（1975年4—6月），第110页。

出平均值。那时人的平均余命40岁，有的地方有时还要更长，可见营养应该说是足够的。

第四章的史实已经证明，德川时代末期日本平均每天的膳食应该提供近2000卡热量，起码是超过了1800卡的。欧洲的膳食热量固然更多，但据李维·巴奇估计，在身高比今天矮、体重比今天低的情况下，“冬天摄入1800卡，夏天摄入2200卡热量……在若干世纪以前，对这个群体来说应该足够了，至少从能量的角度来说如此”。[44] 目前对人类营养需求的研究都是以工业化国家为基准的，然而安瑟尔·肯斯在20世纪40年代的那个著名的对“良知反战者”所进行的研究发现，在连续6个月平均每天摄取1570卡食物（基本为素食）以后，“那些饱受各种症状煎熬的小伙子们，在能量相对平衡的状态下，比平常少摄取了55%的热量，居然都好好的活着”。[45] 这一研究结果，加上战争时期和饥荒情况下以及第四章提及的永平寺僧人的例子，表明人类的自我调适能力远比我们预想的要强得多。肯斯的上述营养和健康研究几乎完全以高加索人为对象，也许并不能生搬硬套于别的人种。日本医生进行了一项涵盖整个战后期的研究后提出质疑：体重并不是月经初潮的关键因素，而是相信“初潮年龄为测量发育速度提供了一种便捷方式”。[46]

另一组日本研究者认为，日本人的体型已经达到了最大值，至于为什么这个最大值比美国人或欧洲人都要小，却原因不明。[47] 在某一群体中，身高可能关系到寿命，但对不同群体而言显然并

---

[44] 李维·巴奇，《人口与营养：论欧洲人口史》，第27页。
[45] 同上书，第42页。
[46] 津崎佐由美等，《论日本儿童发育的长期变化中月经初潮年龄与身高、体重的关系之不足》，见《人类生物学纪事》16，第5期（1989），第435页。
[47] 村田光范与日比逸郎，《营养和发育的长期趋势》，见《荷尔蒙研究》38，增刊（1992），第94页。

非如此，因为身材矮小的日本人在20世纪90年代是世界所有民族中最长寿的：1993年，日本女性的平均余命是82.51岁，男性是76.25岁。[48]

德川时代的日本人是非常健康，还是非常不健康？史料的不足使我们仍然难下定论。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和其他20世纪之前的族群相比较，他们的营养水平从长远来看并未对其生育力、死亡率或平均余命产生消极的影响。像日本人这样长寿的民族，几乎不可能遭受过严重的、以至于使生育力低下的营养不良。德川时代日本人摄取的热量就他们的身高而言应该说已经足够多。这并不是说他们像“二战”后的人那么健康，也不是所有的地区都不存在营养不良问题。但这就是说，之所以形成相对低下的生育水平，务必要在日本人的生活态度上找原因，而不是归咎于他们的身体条件。

19世纪和德川时代后半期的经济发展以现代的标准来看是迟缓的，但生产力和产量的渐升，结合低至近乎于零的人口增长率，使得18至19世纪日本农村人的生活标准大为提高。由于放弃了大家庭，日本很多地方的人民——冈山就是典型——在19世纪中期时就已经可以奢侈地出门旅游观光，还可以模仿城里人的生活方式。更重要的一点也许在于，19世纪中期的一个两岁的农村小孩，已经可以和同时代的西方小孩活得同样长了，尽管那时的日本距离工业化还有好几十年。

[48] 《日本人仍为世界最长寿者》，见《朝日新闻》，1994年7月15日，第1页。

第七章　平稳过渡——从德川时代到明治时代

明治维新后最初几十年里发生的变化是如此深刻，以至于一位外国观察者在介绍自撰的一本关于日本的书时竟说："经历了现代日本的整个过渡期的人，会感到异乎寻常的衰老：因为他身处摩登时代……可又分明能切实地回忆起中世纪。"① 令外国观察者、日本人自己以及后来的史学家大为惊叹的，是明治时代的发展给所有日本人带来的巨变——不仅是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巨变，也是日常生活上的巨变。短短几十年里，生活就和幕府倒台之前出现天壤之别，这种反差是极为强烈的。

然而，日本的普通老百姓在日常生活里究竟面对着怎样的变化？农民，甚至是城里人，是否都像"二战"结束25年后的人那样，纷纷感受到了几十年里生活方式的变化？变，是大多数明治时代研究的重点——政治、经济、思想、制度、技术和文化之变。

① 王堂（B. H. 张伯伦），《日本诸事》（1891；再印刷，拉特兰，佛蒙特；查理士・E. 塔特尔出版社，1971），第1页。

从这些研究和教科书里看到，此番巨变仿佛浸透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此概括明治时代，是否准确？既然学者们总是聚焦于有问题之处，那么日常生活方面的资料和研究的缺乏，是否说明大多数日本人其实是从容地从一种生活过渡到了另一种生活？或者说，这是否意味着，大多数家庭的生活在过渡时期变化不大？如果生活确实有变，那改变的又是些什么呢？

我认为，明治时代的生活变革始终没有脱离传统的框架。明治时代创立了一个全新的政府系统和相应的机构，同时也启动了工业化的进程，这一切都是以西方模式为基准的，但直到进入20世纪，大多数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就是物质文化——才开始明显地西化或者说现代化。去一趟东京，能见识到新型食品、服饰和住房，要么是海外进口的，要么是仿西方风格的。这些东西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它们和其他那些日本本来的物质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它们醒目的原因，是由于日常生活的西化是自上而下、自门外而门内发生的。当生活真的开始出现变化时，也是从家门外变起的，关起门来，日子还是按老规矩过。这让日本人感到踏实和安全，他们需要这种感觉来面对外界的日新月异。

本章首先分析明治时代物质文化的三大要素——住、食、衣——接着讨论物质文化的其他方面。

住

由于房子是大多数家庭最昂贵的购买品，又能传给后代，因此，在明治时代，房子就成了物质文化中变化最为迟缓的一项。让千家万户翻修房子，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人们如果发觉新式建筑风格和技术反倒让他们住得不自在的话，就不愿贸然做这些又贵又麻烦的改动了。

明治时代早期的建筑很明显是德川时代风格的再现。明治时

代在东京和其他城市建造起来的新式西方风格建筑十分引人注目，但这类建筑其实屈指可数，而且与其说是本土建筑的范本，毋宁说是被视为一种异国风情的舶来品。银座的砖房非常潮湿，其封闭式前门也被视为做生意的大忌。三菱的岩崎家族在本乡地方修建了一栋极为气派的大洋楼，但此楼主要是用于社交，这家人自己还是住在日本式的房子里。明治时代修洋楼的人都是巨富，这些房子也并不是他们自己日常起居之处，而是给外人住的客房之类。

明治时代住房的变化主要有二：对德川时代或更早期之物比如拉门的全面更新，以及用新式材料来改造老屋风格，比如用玻璃来代替纸。由于建筑史总是着眼于新事物，人们就容易忘记，其实一种新风格或新技术的兴起并不意味着全体人民都会趋之若鹜。

19 世纪各种类型的房子的流行情况都是怎样的？我们无法一一了解。然而，1871 年在金泽地方对 24446 所住宅所进行的调查显示出，20.2% 的房子有“玄关”，18.8% 的是从一个“土间”进入房中（因此属于乡村住宅风格），而有 61% 的是窄长型房屋，一侧有条过道直通后部（“通庭”）。上述的类型分布代表了幕末时期一个大的城下町中各类住房的比例。同是金泽，对明治时代后期所建房屋又曾做过一个采样较少的调查。结果显示出，28.9% 的有玄关，只有 12.6% 的是乡村风格，也只有 51.8% 的建了一个典型属于德川时代金泽的城市特征的“通庭”。② 以玄关作为正门的人家越来越多，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建造的房子是武士住宅风格，或者汲取了这种风格的主要特点。

② 岛村升，《关于住空间的历史性·风土性的建筑计划方面之研究》（自家出版，1979），第 65 页。

在明治时代，城市居民往往会采用德川时代中下级武士住宅的样式。工薪族人数大增，其中很多人都是武士出身，同时公务员和其他白领人士也发现，这种风格的房子非常符合他们的生活方式，也能恰好满足他们对自己身份象征的诉求。城市工薪族并不想在家里有一个很大的工作室，但他们确实需要——或者至少是梦想——有一个适于亲友娱乐的空间。于是，他们造出来的房子就具有德川时代武士的书院风格，包含了这种风格的所有独特之处，比如有“床间”、“违棚”以及“付书院”（固定的桌子）。这间囊括了所有书院特色的屋子，就成了家中最大最好的一间，被称为“客间”。[3]

正当城市中产阶级因职业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而纷纷转向武士风格住房的时候，其他日本人修房子也逐渐采用起德川时代精英宅邸的种种风格特色。那些铺不起地板的乡下人如今有了木地板，而那些本来只能铺木地板的如今更铺上了榻榻米。较冷地区的人家以前靠房子中央的开放式火炉作为唯一的热源，既用它做饭又用它御寒，有时还是家里唯一的光源。到了明治时代，越来越多的人买了陶瓷做的火钵，木炭加得越来越多，其他屋子在冬天里也能待得住了，特别是用来招待客人已经不在话下。明治时代出现的新式灯具是煤油灯，它们比菜油灯更亮，更便于干活或读书。

修在房子靠庭园一边的走廊“缘侧”成为明治时代住房日益常见的特色。它延伸了起居空间，提供了一个新天地，使人们不必将访客正式引入内室也能和他们说话，这样也就进一步减少了室内装潢。现在，即使外面的木门卸下来，内部房间也完全不会被雨水打湿，又能抵挡日光的直射。然而，真正让房子变得明亮

③ 平井圣，《日本住宅的历史》（东京：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74），第174—175页。

的原因，是“障子”拉门的增多，以及玻璃“障子”的兴起。很多买不起玻璃或新式纸的人就拿报纸糊在门框上。在20世纪80年代——足以令史学家惊骇——乡下还有人家的纸拉门糊的是明治时代甚至更早期的报纸。

德川时代许多平民住房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室内很暗，而且可能还挺脏。“土间”的地面是硬实的脏土；火炉的烟是从房顶的洞里排出，但不少还是出不去，反而熏黑了屋顶的横梁和四壁。室内日光甚少，尤其是装不起障子拉门的人家，因为如果天气好，打开木制拉门后，无论什么光都会被拉门上的条子遮挡住。城镇里的住宅一栋栋鳞次栉比挨在一起，内部光线也很不足。在最老旧的、只有德川时代晚期的穷人才住的房子里，睡觉和起居之处铺着席子，席子下面是茅草谷壳；如果不清空所有东西再换上新的，根本没法打扫干净屋子。木地板和榻榻米普及后，生活变得更整洁舒适了。因此，明治时代的诸般变化——更好的采光、高出土地面的地板——都让房子变得更干净、更卫生，而不再下地耕作的人民也能享受到更多的日光。[④] 然而，上述的改进，都既非从西方传入，也不是明治时代的创举。相反，它们都可说是德川时代建筑风格的进一步普及。

食

正如第四章所述，要弄清楚德川时代的人吃的什么、吃了多少，是极其困难的，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明治时代，尽管从19世纪70年代以来全国已有各项统计调查。人们的主食是谷类。西川俊作从大米产量和人口数估计出，长州地方在19世纪40年代和1887

④ “二战”以后，人们发现在栃木县足利市郊，住在不朝南的房子里的人患肺病的比例极高，包括支气管炎和肺结核。这些房子逐渐被改建于较低处，以便更多的阳光照进室内。

年，大米占主食的54%，其他为大麦、小麦、小米和红薯。[5] 这刚好超过了1886年全国平均数53%。鬼头宏认为，德川时代后半期大米占主食的60%。[6] 但这并不是说，每个人每顿饭吃的都是60%的大米混合40%的其他粮食。哪些人吃了多少大米，仍然是个未知数。

显然，精英阶层吃的是精白大米。第十四代幕府将军德川家茂1866年去世时年方21岁，其妻11年后于32岁时也去世了。据说二人的死因都是脚气病。另有史料表明，这位将军及其全家的膳食都不是很平衡，不但主食只有白米饭，而且因为种种迷信忌讳，他们从不吃洋葱、海藻和苹果等食物。[7] 然而，普通老百姓并没有那么多钱可以挑食，俗话说得好："肚子饱了万事足。"[8] 但大家还是更爱吃精米。随着人们钱越来越多，大米在他们膳食里的比重也越来越大；至于那些不可能天天吃大米的人，就只有在过节时和重大日子里打牙祭才能享受到了。

和德川时代一样，明治时代作主食的谷物种类也是因地而异。在最西部地区，平民吃的饭里麦子（大小麦）和红薯的比重更大，而山里人吃的更多是小米和稗谷。只有在日本海沿岸的平原地区——比如秋田、山形、新泻、富山和石川诸县——大米是唯一的主食。[9] 虽然西川俊作的材料显示出在19世纪40年代和80年代，大米在主食中所占的比重几乎相同，但随着精米加工技术的提高，很可能越来越多的人都改吃精米了。脚气病的增多就是佐证，尽管这种病的病因直到20世纪初才水落石出。19世纪晚期，

⑤ 西川俊作，《粮食消费：长州的个案》，第443页。
⑥ 鬼头宏，《江户时代的米食》，第43—49页。
⑦ 渡边实，《日本食生活史》，第227页以下。
⑧ 大塚力，《"食"的近代史》（东京：教育社，1979），第112页。
⑨ 渡边实，《日本食生活史》，第283页。

很多日本人以为脚气病的滋长和当时大量农村人进城不无关系，觉得是移民带来了病源，使之四下传播开来。[10] 脚气病在大都市及其周边发病率最高。回顾当时，可以很清楚地看出病因在于大家都吃精米导致维生素 B1 不足。具讽刺意味的是，由于新科技和生活标准的提高，人们才能吃上精米，可是吃上精米后，又沦为脚气病的牺牲品，健康水平降低，寿命也大减。

尽管大家都关注到明治时代社会对吃肉的认可，同时还出现了很多西餐馆，但是当时大多数日本人的膳食和德川时代其实相差无几。之所以如此，一个原因在于，家庭主妇——负责买菜和做饭的人，很少外出就餐，因此也就鲜有机会见识到新型食品；或者有所耳闻，却又不知道如何烹饪。因此，明治早期的大多数膳食变化，都不离德川时代的根基。我们视之为传统日本料理的菜式，比如天妇罗、荞面、寿司和鳗鱼烧（浇以某类酱汁的烤鳗鱼），都是发端于德川时代，但在明治维新以后才风行全国的。

明治时代早期膳食的主要变化是：德川时代上流社会的吃喝习惯成了追求的风范。人们越来越爱喝茶，吃水果、砂糖和酱油，外出晚餐者也大增。由于人们吃白米饭越来越多，也就越来越讲究调味。混合而未经加工的粮食比白米饭味道更重，所以在整个德川时代，味噌（佐以泡菜）作调味料已经足够，也足可提供蛋白质和其他营养元素。但吃精米越来越多以后，对酱油的需求增加了。在德川时代，“酱”和“酱油”并没有明显区别。[11] 因此，

---

[10] 威廉·C. 布雷斯特德，《向美国海军军医署长所作关于日俄战争中日本海军医疗和卫生特点之报告》（华盛顿：政府印务局，1906），第 43—44 页。有趣的是，日本海军为防止脚气病，改变了伙食，到日俄战争结束前，竟非常有效，而陆军因并未改变伙食，脚气病依然频发。

[11] 渡边实，《日本食生活史》，第 202 页。

柳田国男认为酱油是在明治时代才出现的,[12] 但其实这是一个渐变的过程。

很多与现代化有关的新式食品其实在明治时代之前很早就传入日本了。不少新植物是18和19世纪早期由荷兰人带到日本的,其中有些就可食用或作调料,包括18世纪传入的芦笋、菜豆和墨角兰,19世纪传入的薄荷、鼠尾草。柠檬进入日本是在幕末时期,绝不会晚于1864年,但一直未能像美国那样成功栽培,只能靠进口。红云豆也在幕末就已传入,但只有北方人吃,在较暖和的西部则不能结果,人们种植它就只是为了赏花。不过,这些新东西在19世纪还不能完全融为日本人日常膳食的一部分,更多是被视为新奇之物。[13]

明治时代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是素食向部分肉食过渡。德川时代一直有人吃肉——相扑手、武士、贱民和各色乡下人等——但在19世纪,肉食卷土重来,而且势头更甚。不过肉食的复兴虽然是受西方饮食习惯影响,但吃肉并不是幕末西方人所传,其实研究西方的日本本土学者在半个世纪以前甚至更早就已大力提倡了。

19世纪早期,专门的肉店开始出现,研究荷兰的专家——兰学家们对吃肉极为推崇,认为有益健康。但当时所卖的都是野猪肉、鹿肉、狸肉和猴子肉,[14] 这些东西即使是最爱吃肉的西方人都会觉得腥臊无比,初尝肉食的日本人觉得难吃就毫不奇怪了。尽管在19世纪80年代风行一种不吃肉就没文化的说法,但从食谱可以明显看出,肉卖得可不便宜,而且佐料很重,与其说是使之更

⑫ 柳田国男编,《明治时代日本人的风俗习惯》(东京:旺文社,1957),第38页。
⑬ 关于这类新食品的论述,参考安达岩,《日本食物文化的起源》,第333—417页。
⑭ 渡边实,《日本食生活史》,第268页

加美味，不如说是为了掩盖腥臭，比如咖喱饭里的咖喱、鸡素烧里的酱油。在这两种菜式里，肉本身的分量可以很大，但也可以只有一星半点。

在明治时代，配菜的作用是给主食增味，其自身并不是基本食物。一次就餐就叫吃一顿“饭”。直到今天，米饭仍然是核心食物，其地位相当于美国人的肉或蛋白质，虽然今天日本人一顿饭的营养已经和西方差不多平衡了。明治时代的主食要么是纯大米，要么是大米和一到几种其他粮食的混合饭。不过从许多参考资料和日记里看到，平民和低级武士家庭最常见的每日主食似乎应该是大米和某一种杂粮的混合饭。德川时代晚期和明治时代的确传入了许多新食品，但明治时代膳食最重要的一点还是对旧时代的因袭。普通一顿饭的式样常被称为“一汁（汤）一菜”。这就是一般所谓一碗米饭、一碗味噌汤和泡菜，有时再添点别的。镰仓时代的武士阶级就是这样吃饭的。后来的富商们也便如法炮制，接着是普通的町人老百姓，包括劳工。大塚力认为，“一汁一菜”普及到上述最后一个阶层，是在德川时代，但直到明治时代，才成为包括农民在内的绝大多数日本人最家常的吃法。至此，煮一锅大杂烩不再时兴，人们将饭菜分门别类盛在碟子里来吃。[15]

明治时代的菜单看上去和德川时代非常相似。通常我们一说起“传统”日本料理，首先想到的是一些称之为“肴”的下酒菜。[16] 从德川时代晚期和明治时代早期的菜单来看，和今天我们吃到的所谓传统日本料理仿佛是一回事。在 1856 年关东地区的旅馆里，供应的早饭大概包括米饭、味噌汤、白萝卜、豆腐、煎蛋和味噌泡白萝卜。[17]在某幕府官员随便抄录的菜单上，往往有米饭、

⑮ 大塚力，《“食”的近代史》，第 14 页。
⑯ 同上书，第 35 页。
⑰ 速水融，《幕末期〈检见日记〉所见的旅馆饮食》，第 80—87 页。

汤、某种蛋白质，加上杂蔬和泡菜。所谓蛋白质，多为豆腐或蛋，偶尔会有一碟鱼。这位美食家能够不厌其烦地把饭菜内容写到日记里，可见还是花样繁多，颇有些别致之处的。看起来，这些料理和今天日本旅馆里所供应的实际上是近乎一模一样。

至于明治时代的膳食出现向西餐菜式的过渡，倒是一个尚无明证的疑问。小木新造研究明治维新后最初几十年的东京时，发现膳食仍是以米饭为本，中、上层阶级吃纯米饭，其他阶级吃大米和某种杂粮的混合饭。[18] 除了主食，人们早上喝味噌汤，中午吃"菜"（诸种配菜），晚餐是"煮物"（炖煮的菜）或"汁物"（汤）。1884年编于东京的一份最受欢迎食品的名单上，位列前茅的是各种豆腐类料理，接着依次是以红薯、茄子和百合根做的料理。名单上罗列了各式各样的蔬菜，海藻等海产品，但提供蛋白质的主要还是豆腐，鱼只提到了两三处（包括做生鱼片的金枪鱼和味噌腌鱼）。

为了看清明治维新后数十年里的食品变化趋势，小木新造考察了东京食品店的数量和种类。他发现，单卖某一种食品的专门店明显减少，比如盐铺、味噌铺、醋店、各种面粉店，唯有专卖"鲣节"（鲣鱼干）和"佃煮"（酱油饭）的店铺数量变化不大。从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初，卖大米、鲜鱼和蔬菜的店铺增多，这要得益于城市人口的上涨。同时增多的店铺还有卖新式食品的，比如牛奶店、肉店和面包店。[19] 卖鸡蛋的铺子只略有增多，显示出在明治维新前，鸡蛋的销量想必也不小。数量大增的店铺是卖糖的，这一方面说明砂糖已经在市面上唾手可得，另一方面也说明人们的收入已经够多，可以买些小奢侈品了。各种店铺的具体数

---

⑱ 小木新造，《东京庶民生活史研究》（东京：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79），第149页。

⑲ 同上书，第147—148页。

量见表7。

表7　东京1881、1891和1900年的店铺数

店铺销售类别	1881	1891	1900
米	2,197	1,874	2,746
其他粮食		241	247
日本酒	1,418	824	2,128
洋酒		246	335
牛奶		239	452
糖果	1,016	4,247	4,183
鸡肉	30	121	160
蛋	185	233	234

资料来源：小木新造，《东京庶民生活史研究》（东京：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79），第148页。

尽管东京能看到新的"西洋食品"，但明治时代早期访日的外国人发现，如果他们要去东京以外的地方，又不愿吃传统日本料理的话，还是必须自带或从家乡邮寄食物。直到1883年日本桥的"偕乐园"开店以前，东京甚至连一家中国餐馆都没有。即使是那些在餐馆里吃外国菜的日本人，回家了吃的也是日本菜。小型锅煲炊具那时已随处可得，连城里的小家小户也可以做出昔日上流社会吃的那些传统料理了。在乡间，蒸饭的锅继续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喜欢用盛行至今的这种方式蒸饭吃，而不是在开放式火炉上用铁锅煮饭。⑳

真正令食品消费样式发生变化的，是日俄战争和"一战"。在明治时代，军队在其他方面虽然迅速西化，伙食却一直是传统式的。直到日本和外国打仗，人们才感到军中务必采用新炊事。行军途中或作战时，即使有条件，要停下来煮或蒸饭也是一件难事，

⑳　柴久庵宪司，《厨具的历史》，第171—180页。

军官还察觉吃白米饭的士兵们多易罹患脚气病。在甲午中日战争时期，饼干被引入军中，日俄战争后得到大量生产。军队还吃上了牛肉，美其名曰“大和煮”，以此来克服农村出身的士兵对红肉的反感情绪。啤酒 1868 年始从英国传入，10 年之内便有本土生产，消费者是官僚和军人。

农村士兵退伍后，便带着对新食品和新烹饪的新品味返乡，普通日本人饮食习惯的变革正是由此迈开了第一步。㉑ 但这一切都是世纪之交才发生的事。而即使到那时，所谓的西方食品，也还是带着异国情调的新鲜事物，在大都市以外是十分罕见的。兵库县的一个富商家庭决定外聘一名擅长法国菜的厨师给家里的千金培训西餐知识。这堂培训课实在可以说是劳民伤财。那位受培训的学生小姐晚年回忆时，只觉十分荒诞可笑，因为所学的内容只有一项——煎鸡蛋。㉒

到了大正时代（1912—1926），普通百姓的膳食才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和“一战”后的经济飞跃尤其有关。正是在这一时期，咖喱饭（关西人呼之为“饭咖喱”）才成为饭桌上的一道主食。牛奶、红肉和面包成为大众消费品，也是自大正时代开始。日本翻版的伍斯特郡辣酱油（喼汁）甲午中日战争时期左右在国内开始就有售，但翻版中最红火的一种——猪排酱，是 1926 年才问世的。日式大排，特别是猪排，是“一战”后才家喻户晓的，而西式牛肉末历来是一种奢华食品，一直到“二战”结束很久以后都是如此。㉓

一个外国人可能会觉得，幕末和明治早期日本人膳食文化最惊人的转变是引进了西洋食品，同时出现了中国、西方及其他出售肉食的外国餐厅。然而，日本大多数民众的膳食受到冲击和发生变化，其实

㉑ 大塚力，《“食”的近代史》，第 80 页以下。
㉒ 据鸣门教育大学的胁田晴子教授口述。
㉓ 安达岩，《日本食物文化的起源》，第 333—417 页。

是渐进和持续的。德川时代，新的饮食习惯从武士阶级逐步传播到富商和城市居民。之后，膳食并没有全盘西化，而是在全国发展成为一种更加统一、具有鲜明日本特色的“和食”。明治时代正是“和食”问世的见证者。

衣

在19世纪后半期，西洋货虽然在大城市里卖得非常火，大多数日本人的穿着却没有什么大变化。即使是城里人，工作和家居时衣服的式样和材料依然是传统风格的。西式服装到处都不难买到，但那时西方所流行的裙装在日本式房子里极不实用——女人们根本不可能穿着它们在日式厕所里大小便，因为厕所都是蹲式的。西式皮鞋穿的人也不多，因为在日式房子里一进门就得脱鞋，而那时的高跟纽扣鞋穿脱都很麻烦。明治时代的鞋履确实有了一些变化，但和吃的一样，这些变化都是德川时代风格进一步普及的结果。越来越多的人脚上穿了东西：很多人不再赤脚，而是穿草鞋，而以前穿草鞋的人则穿上了木屐。越来越多的女人系起了腰带。腰带同样是德川时代的产物，但也是20世纪以后才广泛被穿用起来。

明治时代人们外观上最大的变化可能要算是发型和化妆了。男人很快都改成了西式发型，早在1869年时，13%的东京男人就剃掉了他们的长发；到了19世纪90年代，城里已经很难见到留着旧式发型的男人了。[24] 女人也一样面貌一新：早在1873年，明治皇后就以真眉毛和未涂黑的牙齿露面；然而，即使有这些变化，传统风格在乡间仍然盘踞了几十年。

许多新式服饰在明治时代遍及大街小巷。男人们理发后，纷纷

㉔ 柳田国男，《明治时代日本人的风俗习惯》，第28页。

戴起了各式帽子，还携带西洋伞和洋表。不过他们最基本的衣服，仍然是和服。有了进口羊毛衣料，男人就穿起了羊毛大衣外套，甚至直接罩在和服外面，女人在冬天则穿上了羊毛披肩。最终，一种特别用于和服及和服腰带外面穿着的外套出现了，并大受欢迎。人们在寒冷时节显然感觉舒适多了。但为了和传统日本衣裙搭配，他们便将西式材料和服装加以改造。不过，19 世纪时羊毛的使用非常有限：进口羊毛非常昂贵，而20 世纪初之前，唯一一家比较大的日本羊毛生产者只是东京千住区的一个作坊。[25]

明治时代早期的官僚精英人士就已开始穿西装。1871 年天皇下令，所有高级官员都要穿西式服装，在中央政府就职的官员们便开始穿西装上班和出席特殊活动；在家里，他们又换回日本装。这种习惯一直延续到今天。[26] 军队和其他集团使用制服以后，西式服装开始被广泛穿着。女人还是会穿和服，甚至到了大正时代也依然如此，虽然那时她们的发型已经改成西式的了。明治时代学校女生的校服也还是根据和服风格裁剪而成的。考虑到 20 世纪 20 年代之前西式女装的特点，结合日本人喜欢席地而坐的传统，完全可以想象明治和大正时代的日本女人穿上西洋裙后，只怕是别扭得无以复加。[27]

可见，明治时代无论男女着装风格都发生了改变，但改变的具体内容则多为配饰方面；新式衣料及其制造技术都在很大程度

---

[25] 中川敬一郎与亨利·鲁索夫斯基，《和服衰亡的个案：时尚变化对日本羊毛工业发展的影响》，见《商业史评论》37，第 1—2 期（1963 年春夏）。

[26] 平野健一郎，《服装的西化与明治日本的国事》，见《从东亚角度看国事与文化变革》，平野健一郎编（东京：联合国大学出版社，1993），第 123—124 页。

[27] 关于西式女裙以及生活方式等方面的论述，参考安泽美祢，《日本生活方式的变化：现代消费的模式和结构》，见《现代经济中的消费者行为与经济发展》，亨利·鲍迪特与亨克·冯·德缪伦编（伦敦：克鲁姆·海尔姆出版社，1982），第 179—205 页。

上被改造以迎合传统服饰类型。而新型纺织业和传统式的、经营良好的作坊相结合，意味着消费者从此买得起更多质量更上乘的衣料，比如棉布以及限量供应的羊毛。

生活方式的其他变化

明治时代早期所发生的种种变化，主要是沿着德川时代物质商品之路向更纵深扩展，但生活方式在明治维新后最初的几十年里，却实实在在地发生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改变——这些改变最终令所有日本人的生活旧貌换新颜。西方的技术融入物质文化，开始了对生活方式的改造。1887 年，东京第一次有了电。到 1893 年，在新桥和日本桥之间的地区，164 家用的是煤油灯，113 家用电灯，只有一家还在用菜油灯。[28] 这种新式照明很快就传遍了所有的城市，渐渐让人们过上了不同的日子。从此以后，夜里读书更加方便，于是人们不但睡得更晚，而且开始分房睡觉。

现代交通设施在明治时代早期进入了城市。据说人力车发明于 1869 年的东京，但具体不详。人们不再靠水路或步行进行交通，不出几年，东京的人力车就已有 5 万辆之多。接着马车出现了。天皇在 1871 年首次坐马车游行。东京有了马拉的公车和缆车。很快，京都在 1895 年、东京在 1903 年都有了电车。人们在城里出门越来越方便，也就可以住在距离工作地点较远的地方。郊区逐步发展起来，人们修建武士风格的住宅也就更不成问题，因为这种住宅比局促的城市楼房需要更大的空间。

日本的第一条铁路是从品川（在东京）到横滨的，自 1872 年夏天开始通行。到 1891 年，从上野（在东京）已有铁路可以直达青森（在日本东北部）。虽然最初只有富人可以每天坐火车，铁路

㉘ 柳田国男，《明治时代日本人的风俗习惯》，第 54 页。

交通的发展却是迅速的。到1903年时，每天有超过15000人出入于东京涉谷的火车站。明治时代人的交通和旅游比以前无疑方便得多了。德川时代人们绝非足不出户，只是，此时旅行起来要快捷得多。[29] 然而要注意的是，现代形式的公共交通得到普遍的使用，以及随之而来的种种变化，都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左右才发生的事，而不是明治早期。

中央政府和电报等全国性通信系统的建立，破除了地区间的障碍，于是乡下人开始生产手工商品拿到市场上去卖，人们以前在家里自己做吃的，现在也改为买了。以前那些买昂贵礼服穿的人，开始转向租借了。德川时代出现的购买日用品（味噌、酱油、油、棉布、靛青等）的世风，在明治时代愈加热烈起来。

如果说这种种新发展有什么模式的话，那就是：受影响的主要是城里人，而对农村的冲击则不是太大。乡下人为城市市场供应手工制品，而且有了电报以后，全国各地都联络了起来，这些对他们肯定都有些影响，但大多数人的日子却基本上一成不变。那些每天坐火车上下班，穿洋服，有时外出吃肉，如今住在有电灯的屋子里的人，统统都聚居于大城市。[30]

明治时代早期的生活标准究竟如何呢？关于这一时期的量化数据大量存在，但却不易评说。从平均值来看，民众的实际收入增加

㉙ 爱德华·塞登斯蒂克，《低级城市，高级城市》（纽约：阿尔弗雷德·A. 诺普夫，1983），生动描绘了东京从德川时代末到1923年大地震前的变化。

㉚ 色川大吉在《明治的文化》（东京：岩波书店，1970）一书中，以优美的散文形式描述了明治时代乡间的变化——禁止奢侈令被撤回，人们种起了西洋进口的花，盛开时姹紫嫣红（第33、39页）。令人遗憾的是，他并未提及任何社会经济方面的史料，而这恰恰是史学家最想了解的。这类对过去的诗意怀念，揭示出日常生活史研究的一个内在问题，即我们无法知道这些变化究竟有多普遍。但从我们对大正时代的了解可知，明治时代的乡间可能并没有那么大的变化。少许花色就令人眼花缭乱，只是因为前所未有而已。总之，色川大吉的描述透露出一种观点，即明治时代的变化大多并不涉及根本，而是一种流行。色川大吉此书的英译本1985年于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

了，尽管增速缓慢。但是，平均值这个概念并不能明确表示出收入分布的具体模式。随着政治上的新旧交替和相应的经济变革，一些人固然能先富起来，但另一些人的生活标准实际上反而下滑了。可见，从社会经济来看明治时代，可以见仁见智。不难理解某优秀地方史料的编集者在解析明治和大正时代部分时，完全语焉不详，只是说："由于诸学者在社会和经济变化的解释上存在歧见，我们无法对这一时段进行系统编辑以准确反映其经济上的变动。"[31]

明治时代物质文化上对过去的延续进一步证明，这个时代的生活标准或者是健康水平都很难说出现了根本变化。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多避而不谈。如果人们吃得更好，接着营养也会跟上，但这肯定不是朝夕之间的事。不要忘了一个事实：从19世纪80年代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20岁的入伍男兵的平均身高每隔5年就会增加半厘米。[32] 诚然，这些数字是否说明了什么重要变化，取决于样本是否来自同一地方。不过从表面上看，这些数字说明日本男性到明治末期开始长高，而这意味着膳食从70年代开始可能出现了缓慢的进步。

明治时代的日本人把大笔钱用在了吃上，直到大正时代都是如此。明治早期，吃占了个人收入的整整三分之二。1874年至1883年，比重慢慢降至67.5%，到1896年至1906年降至63.7%，1917年至1926年再降至58.9%。[33] 随着收入增加，人们在吃的上面的开销还是一样多，只不过他们的选择面越来越广，蛋白质也吃得越来越多。

㉛ 二户郡编，《二户郡史》（盛冈：二户郡，1968），第463页。

㉜ 卡尔·莫斯克，《日本的生殖力、杀婴和食品消费》，见《经济史研究》15（1978），第279页。

㉝ 篠原三代平，《个人消费支出》，见《日本1868年以来长期经济统计量之估计》卷6（东京：东洋经济新报社，1967），第5页。

有人可能会问，继续以传统方式过日子的日本人是乐意如此，还是收入使然？一方面，确实只有少数人才能买得起时髦的新式西洋食品或盖洋楼。20世纪时，在一些人均收入约低于明治时代日本的国家，食品花销也要占收入的55%—63%。[34] 另一方面，在日本，收入中用于食品方面的那部分波动很小，不仅1878年至1922年间如此，1922年至1940年间也是如此。这意味着对食品的需求并未随着收入的增长而出现大变化。[35] 日本人对传统食品的偏好，加上收入增长较缓慢令消费模式难以发生巨变，对明治时代实现工业化倒是好事。人们大可以一如既往地过日子，这样在整个经济上很大一部分GDP就能用于投资，而如果大众生计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情况断不会如此。

上述数据均为平均值，个人的具体实际情形是看不到的。同时，这些平均值虽然显示出生活标准的渐进，但我们不可忘记，事实上在这一过渡时代，人民的生活远不是宁静而祥和的。在19世纪30年代，日本经历了德川时代三大饥荒之一，40年代开始又有政治上的动荡和统治危机，1854年和1855年江户发生了较大的地震，1866年至1869年经历了大规模的粮食歉收，1867年至1868年又有明治维新以及新政府的建立和社会经济上的激变，接着是80年代的松方通缩。[36] 武士这个阶级既失去了对国家的垄断，又不再能坐享闲职，尽管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他们大多数人凭闲职根本填不饱肚子。据闻一些昔日的武士在明治时代落得个一贫如

---

[34] 西蒙·库兹涅茨，《消费水平和结构的各种趋势》，见《经济发展：明治时代以来日本人的花销》，劳伦斯·克林与大川一司编（霍姆伍德，伊利诺伊州：理查德·D. 埃尔文出版社，1968），第226—227页。

[35] 金田弘光，《日本食品消费模式的长期变化》，见《农业与经济发展：日本的经验》，大川一司等编（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9），第426页。

[36] 译者注：松方通缩，即1881年任日本财政大臣的松方正义在19世纪80年代实行一系列财政改革后出现的通货紧缩现象。

洗，但还是有不少人在各级政府里捞到了铁饭碗，薪水按当时的标准来看还很可观。这些人比起在德川时代反而富裕了许多。明治时代新的税收制度打击了部分地区的农民，但其他地区的税务倒是减轻了。很多农民发现自己在19世纪70年代大为致富，但到了松方通缩时期却又受害匪浅。从总体上来看，新制度对农民究竟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则尚无定论。㊲

我们难以完全摸清19世纪晚期日本人生活标准的变化，也同样难以确定他们的健康水平是否真的得到了提高。在这段时期，日本人史无前例地较易感染上霍乱。随着东京在明治维新后的最初十年里发展起来，旧式的下水道设施已经无力处理日益增加的垃圾粪便。有人怀疑在明治维新以后，肺结核越来越多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病在整个明治时代都较猖獗。㊳ 然而，新式住房更明亮开放的空间，加上保暖的羊毛大衣的传入和以可洗棉布制成的服装大量面市，生活质量的改善是显而易见的。工业化，进一步的城市化，两次战争以及一次通缩，更不用说还有政治和社会上的诸多更替，上述种种的综合影响，是使民众生活更健康了，还是相反？

不可忽视的是，在健康水平上，明治日本人已经不再仰望西方。当自己的物质文化好端端的时候，又何苦大费周章改用又贵又折腾的新商品新制度呢？明治时代的日本人转而把进口和新建设的焦点放在了那些在原有传统下并不令人满意的机构和技术上面：蒸汽和电动机器，以及他们认为对发展成为现代技术国家不

㊲ 参考山村耕造，《明治土地税改革及其影响》，见《过渡中的日本》，杨森与罗兹曼，第377—399页，以及安妮·瓦斯沃，《日本地主：乡绅的没落》（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77）。

㊳ 雷内与让·杜博斯，《白色瘟疫：肺结核，人类和社会》（波士顿：利特尔，布朗出版社，1952），第189页起以及附录B；威廉·约翰斯顿，《现代传染病：日本肺结核病史》（剑桥，麻州：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会，1995）。

可或缺的社会机制诸要素。对西方文化中不符合国情的内容所进行的改造的结果大都是换汤不换药，昙花一现，直到20世纪之后数年都是如此。例如，明治政府高层在19世纪70年代尝试将和服西化，80年代又建造了大办西洋舞会的鹿鸣馆。这两项壮举都效果不佳。穿西服普及到各级官员是19世纪80年代末才有的事，[39]而围绕着鹿鸣馆及其活动的那种肤浅的日本式西化，公众舆论可谓恶评如潮。

对明治时代的研究几乎总是聚焦于新事物，借用西方的、“摩登”的和新颖的东西。再加上政府是完全新建的，国家蓝图也焕然一新，这些都让学者们忽略或轻视了物质文化在维新前后几十年里存在着的延续性。对生活方式、消费模式和物质文化的研究对我们了解德川时代是如何过渡到现代日本的，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些现象显示出过渡进程的速度，变革的广度，新技术、新商品和新观念要多久才能普及。对过渡期间物质文化的一个小小的考察，能揭示出维新运动对日本老百姓的影响有多大，变革又是如何渗透到草根阶层的。

所有史实证明，从德川时代末到19、20世纪之交这半个世纪的过渡期间，生活方式是稳定的。真正的变化（住房、饮食、服饰、休闲方式等）都是世纪之交日俄战争至大正年间才开始发生的。明治时代早期生活方式的变化——撑洋伞、在传统和服外着西式披肩以及以玻璃替代纸进行家装——主要都是造型风格上的变化，并未形成文化上的激变。像面包、红肉之类的新式食品都是奢侈品，不属于家常料理内容。

由于生活方式因循守旧，消费模式亦然。生活标准的提高，导致对传统商品的需求总体而言更大了。这更有助于经济的稳定，

㊴ 平野健一郎，《服装的西化与明治日本的国事》，第124—125页。

意味着传统商品的生产者不会骤然失去工作或在技术上过时。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纺织业。新式的大规模纺织工厂生产的布料对和服来说太宽大了，这样一方面棉布消费大增，但同时生产和服面料的传统作坊也得以存活下来。并且，消费者倾向于传统商品，说明国家在工业化早期阶段并未将宝贵的外汇用于消费品。这对日本来说是意义深远的，因为它不仅使日本可以在人均收入低于西方国家的条件下开展工业化，而且能在落后英国一个世纪之久后迎头赶上。

新生活方式和新商品最终普及全国赢得市场，要归功于军队。正如战国时代的战乱改变了16世纪人民的生活，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日甲午和日俄战争也改变了明治时代人民的生活。棉布被战国大名用于军服之后大为普及，成为人们喜爱的衣料。与之相似，明治时代的军士接触了西式军装和食品，从中国和俄国战毕返乡后也产生了对这些产品的需求。

新生活方式和消费品的传入可以追溯至19世纪早期，它们在明治维新后迅速引起了人们的兴趣。但直到世纪之交，众多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才有了西洋货，而生活方式最显著的变化则发生于“一战”以后。无论是维新前后还是20世纪初的情形，都和“二战”后的巨变在性质和速度上大有差别。“二战”后短短几十年里，每个日本人都脱胎换骨到一个更“摩登”或者说更西化的生活方式，同时生活标准也急剧上升。从德川时代到明治政府的这个动荡的过渡期则与之不同。此时，在几乎所有日本人的生活中，起码还有一种重要的因素稳定不变——他们过日子的方式。

重申上文，对19世纪的日本人来说，生活中的任何变革，恐怕都比不上传承旧式物质文化和生活方式来得更重要。托夫勒认为，当人们生活中牢牢存在着某种稳定不变的因素时，他们就能

更有效地应对剧变。[40] 明治时代的日本人面对的剧变无处不在，从政府、经济到教育以及生活的其他许多方面，但大多数人并不需要面对日常家庭生活的变化。正如福泽谕吉，他从事的工作在极大程度上是西方式的，但仍然固守传统家庭价值观，服从日本老式的包办婚姻。明治时代那些身着洋装的官僚们每天乘坐现代化交通工具回到他们的传统式家中，然后换上和服，吃日本料理。

日本守旧的日常生活为人民从容应对迎面而来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变化提供了稳定的基础，让他们可以接受和改造他们需要的东西，而不会被全新的事物冲昏头脑——果真如此吗？我认为这尚属假设。这种稳定性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当其他很多国家的现代化和工业化难以立竿见影时，日本却能。纵观整个过渡时期，生活方式可以说确实有所改观，但大多数变化都很难说是触及了根本的。只有 20 世纪“二战”后的数十年里，平民百姓的生活方式才彻底变了样。我也并不认为明治时代物质文化的变革引发了日后的太平洋战争，但这些变革最终有可能进一步加深了因经济、政治和国际发展令日本人感受到的对平稳生活的失落。

---

[40] 阿尔文·托夫勒，《未来的冲击》（纽约：兰登书屋，1970）。

第八章　从比较的视角看身体健康

在1871年至1873年间出访西方各国的岩仓使节团的正式报告总结道：19世纪70年代的欧洲和40年前相比已是天上地下。40年前的欧洲，没有火车、蒸汽船和电报，陆地交通靠马车，送信靠邮车一个驿站一个驿站地传递。岩仓大使的这份报告可谓语带乐观：如果欧洲只用40年就能面貌大变，日本又如何不能？[①]然而，置身于已经工业化一百年的世界，日本人何以认为自己仅仅落后了40年？正如本书所示，答案就在于德川时代两个半世纪的繁荣发展。我们普遍认为日本人在那个时代基本上是按照一成不变的方式在过日子[②]，但实际上从17世纪早期到19世纪，生活在

① 岩仓使节团的报告文转引自马林·梅约，《明治维新中的理性：岩仓大使》，见《现代日本领导层：过渡和改变》，伯纳德·S. 希伯曼与哈利·D. 哈鲁图尼安编（图森：亚利桑那大学出版社，1966），第357—358页。

② 例如查尔斯·杜恩，《传统日本的日常生活》（路特兰，佛蒙特：查尔斯·E. 塔特尔，1969）。人类学家理查德·K. 比亚兹莱1955年评道："史前时代晚期的生活方式最令人震惊之处在于其与15个世纪之后的日本乡村生活方式是如此相似。"见《史前日本：考古记录概述》，再印刷于约翰·A. 哈里森编，《日本》（图桑：亚利桑那大学出版社，1972），第165页。根据沃尔特·爱德华兹对静冈登吕考古遗址的分析，这一对

许多方面都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将 19 世纪中叶日本人的种种生活方式视之为落后，多只是看到了表面，或者也可能因为 19 世纪西方上流社会人士去看一个和他们截然不同的社会时，往往将所有阶层的生活一览无余，故有如此印象。

人们长期认为日本的生活水平远逊于西方，另一个原因在于西方工业化革命对大众生活所产生的影响。新技术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火车、电报、电，以及使用蒸汽或其他机械动力的工厂。但是工业化最初的几十年里，大多数人的生活质量是变好了还是变糟了？这个问题至今仍被忽视和争议着。新技术是否是西方经济和环境的福音？这已经不好回答，再追问它是否是人民身体健康水平的福音，就更难了。德川时代日本人的健康水平出现了怎样的变化，同样是一个难以考察的问题。变化缓慢而平静，并非全无痕迹，但 20 世纪的史学家显然对其视若无睹。少数研究德川时代物质文化的人也是着眼于文化史方面，而对经济史学家来说，这些物质文化的财富是完全被遗忘了。

正如第二至五章所述，总的来说对身体健康水平有所影响的种种物质文化在德川时代都得到了长足进展。17 世纪时，住房粗制滥造，只有泥土地面，没有基石，后来有了工艺精良的实木房子，除了一些落后地区还是泥土地面，室内基本上都铺着木地板，大多数还有榻榻米。16 世纪早期人们睡的是炉火边的茅草席，或是挤在屋子一角，到了 19 世纪中期，大多数人家都有了封闭的卧室，棉被也风行全国。房子不再只是为了遮风挡雨防备外来者，窗户也一改少而窄小的面貌，到 19 世纪时，住起来已经舒服多了，

有延续性的强调，根源可能在于，日本人希望能在战后时代早期找到“对承自过去、难以动摇的国粹之延续”。参见爱德华兹，《被埋葬的记述：登吕考古遗址与日本战后早期的国家认同》，见《日本研究杂志》17，第 1 号（1991 年冬）：21。

了能放进阳光和流通空气的拉门。如今人们日常穿棉布衣服，勤洗澡，有便携式取暖器。日本人自身技术的进步，使他们可以利用较少的燃料和金属来烹饪和取暖，以木炭和封闭式火炉取代开放式火炉和柴禾，以吊在铁环下的陶土锅代替铁锅。这些变化都做到了能源利用更高效、卫生、健康和舒适，身体健康水平也就自然得到了提高。

上流社会第一个尝到了能源变革的甜头，但久而久之，普通老百姓也过上了这般生活。物质文化的许多新元素发端于室町和战国时代，包括以榻榻米代替木地板，棉布服装，带拉门的、更开放的书院式住房，天妇罗等食品，以及泡澡。随着德川时代经济的发展，能够享受到这些便利的人越来越多，这也导致了诸如荻生徂徕（1666—1728）等武士因不满平民用蚊帐、吃味噌、饮清酒、穿买来的成衣而非自制亚麻布袍子等而心怀抱怨，觉得他们本是些“吃大麦、小米和稗草之类下等粮食”并砍柴烧火的人。[③] 经济好了，生活标准也就高了，这样一来，先是城市居民，次及农民，许多老百姓都能享受本属武士精英的消费了。这实际上是日本物质文化上的一次“武士阶级化”，到了 19 世纪，一种完全迥异于工业化西方世界的民族文化就从中产生了。

与之相反，西方到 19 世纪中期时，工业化进程中的人民生活至少从表面上看都完全是新技术的天下。最显而易见的就是通信和交通的新手段，包括电报、蒸汽船和火车。1860 年时，美国的铁路已超过了 30000 英里；1871 年，德国超过了 12000 英里，法国也多达德国的四分之三。[④] 1854 年，英国火车的客流量超过了 1 亿

③ J. R. 麦克伊万，《荻生徂徕的政治著述》（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62），第 44 页。

④ 乔纳森·休斯，《美国经济史》，第 2 版（格伦维尤：斯科特，弗雷斯曼出版公司，1987），第 165 页。

人次。比起马车，火车不但能让人更快到达目的地，还更便宜，于是人们开始以坐火车为消遣，同时搬离了城市中心，也就形成了后来的郊区。[⑤] 现代邮政系统加上电报，加速了个人和商务通信。令上述种种得以实现的基础——工厂，造就了城镇的巨大繁荣，将昔日的乡下变成了喧嚣、污染的工业都市。

新技术是否改善了西方人的健康水平呢？显然，工业化对大众的冲击是缓慢的，很多工业技术对人们的体质和健康的改善也只是微乎其微。[⑥] 随着人们，尤其是那些本来就很富或新富起来的中产阶级收入的增加，大家都买得起扶手椅、沙发、窗帘、地毯以及无数家居用品，但当众人坐在家里越来越备感享受的同时，窗帘和堆积如山的家具这些温馨的装潢也让屋子更暗更积灰。家装丰富以后，人们真的更健康了吗？很难说。而更快捷的交通旅行，是否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

直到19世纪中期，大力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新事物终于在西方冒出了水面。廉价的肥皂第一次面市，人们这才对清洁的重要性有了崭新的认识，接着，泡澡常见起来。到19世纪60年代，每天洗澡成了英国上流社会人士的习惯，而中产阶级一周洗一次就心满意足了。浴室的普及要等到20世纪初，在此之前，人们的洗澡水都是用炉子烧好后再倒满浴缸的。[⑦] 穷人还是很少或从不洗澡。19世纪30年代的法国人每天只洗脸；一周仅用一次肥皂。在农村，公共浴室是不存在的。[⑧] 反观19世纪的日本，无论城乡，

---

⑤ 弗朗索瓦·贝达里达，《英格兰1851—1975年社会史》，A. S. 佛斯特英译（伦敦：梅图恩出版社，1979），第32页。

⑥ 参考理查德·贝瑟尔，《交通》，见《1870—1950年的科学，技术以及日常生活》，柯林·钱特编（伦敦：劳特里吉，1989），第162页。

⑦ 弗朗索瓦·贝达里达，《英格兰1851—1975年社会史》，第32—33页。

⑧ 伊芙琳·贝纳特·阿克曼，《1800—1914年巴黎乡间的保健》（新布鲁斯维克：罗格斯大学出版社，1990），第19页。

处处可见人们洗澡。

处于令人神往的工业化中的西方，辉煌的巨宅和富裕中产阶级的阁楼平地而起，然而工业革命同时孕育出的，也有臭名昭著的贫民窟。“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曼彻斯特的埃瑞克河岸边观察到的凄惨绝望，雅各布·里斯（Jacob Riis）在纽约市樱桃街的经济公寓目睹的景象，安德鲁·米尔斯（Andrew Mearns）和乔治·希姆斯（George Sims）在伦敦中央区的见闻，以及古斯塔夫·施穆勒（Gustav Schmoller）在柏林所窥探到的……19世纪晚期的社会批评家们对城市和城市居民生活方式的指责几乎完全一致。”⑨ 19世纪后半期德国鲁尔盆地的工业化，将此地从乡镇变成了工业城市，住房变得紧张，因此生出了贫民窟。这成为1886年一项特别调查的主题。多特蒙德、埃森和波鸿是此项住房危机调查报告的焦点。杜伊斯堡附近的城市禁止大规模修建经济公寓，但最终，令人看到的仍然是一番“全德国最糟糕的生活条件”。⑩ 法国城市同样拥挤不堪，生活条件出了名的恶劣。在19世纪的图卢兹市中心，居民们依然在家里饲养鸡鸭、山羊或猪，马路上通常是各种粪便堆积如山。在19世纪中叶的土伦，一个市镇中心平均每所房子住着30到40个人，富人区则只有10到12个人，对比鲜明。而直到19世纪60年代，这些城市才开始设法提供日常饮用水。⑪

足以证实19世纪西方国家清洁卫生之不堪的事例，可谓不胜枚举。比如，在1832年曼彻斯特的棉厂，有人发现工人们用各自

---

⑨ 詹姆斯·H. 杰克逊，《过于拥挤和家庭生活：19世纪晚期杜伊斯堡的工人阶级家庭和住房危机》，见《德国家庭》，理查德·J. 埃文斯与W.R. 李编（伦敦：克鲁姆·海尔姆出版社，1981），第194页。

⑩ 同上书，第202页。

⑪ 柯林·海伍德，《在19世纪法国度过的童年》（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8），第165—166页。

的勺在同一个盘子里就餐。[12] 抽水马桶是19世纪50年代以后才得到广泛使用的。至于之前大小便的收集处理，则往往任由各家自行解决，手段大多不力。粪便垃圾对城乡均有不小的污染。在法国，农民们一贯将垃圾堆在自家大门外。1832年的巴黎，因警察局下令清除捡破烂的人赖以为生的垃圾堆，这群人掀起了一场暴动。[13] 那些和动物混居的穷人的家里，地上自然多是肮脏不堪，可在那些对地面清洁标准要求甚高的人家里，蟑螂、臭虫之类同样挥之不去。可见，19世纪晚期旅居日本后为生活环境感到苦恼的洋人们，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一样回避不了脏乱差的问题——只是，日本的街道要比他们自己国家的干净得多。[14]

西方人吃得有多好？这个问题必然关系到另一个问题：在工业革命最初的几十年，生活标准是升还是降了？[15] 尽管英国的富人开始享受起前所未有的丰富美食，19世纪60年代的一名妇人仍然注意到，那些从英国移民到新西兰的人，移居后立刻一扫以往"半饥饿"和"忧郁"的精神面貌，变得"吃饱喝足"又"健康"起来。[16] 我们所知的英式早餐和下午茶，都创始于维多利亚时代，再由上流社会自上而下流行至中产阶级。不过，这两餐都是充满淀粉和油腻的。19世纪中期以后，工人阶级的日常饮食固然有所

---

⑫ J. P. 凯－沙特沃斯，《受雇于曼彻斯特棉产业之工人阶级的道德和身体状况》（伦敦：J. 里奇韦出版社，1832），第23页。

⑬ 阿兰·柯尔宾，《乌烟瘴气与黄色水仙：18至19世纪社会的恶臭与想象》（巴黎：奥比耶·蒙田出版社，1982），第249页，转引自让－皮埃尔·古伯特，《水之征服》，安德鲁·威尔逊英译（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出版社，1989），第58页。

⑭ 对日本和西方作出相应比较的最佳著述者是伊莎贝拉·露西·博尔德。她出生于英国，游遍包括夏威夷在内的美国各地以及明治时代早期的日本。

⑮ 对此所作的简评，参考N. F. R. 克拉夫茨，《工业革命期间不列颠的经济发展》（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985），第89—94页。

⑯ （玛丽·安妮·）巴克女士，《新西兰的牧场生活》（1883；再印刷，波士顿：毕肯出版社，1984），第41页。

改善，但消费得越来越多的，是糖、啤酒和烟草这些东西。某份膳食分析显示，即使是到了19世纪90年代，仍然有很多英国人是“营养不足”的；面包和土豆是这些人家里不变的主食。[17] 今天我们看到，在美国，19世纪前半期，收入上升了，生活标准也随之提高，然而与此同时，健康，或者说身体健康水平，却变差了。[18] 若干资料表明英国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19]

我们不可能知道谁在19世纪究竟都吃着些什么，但到19世纪中期时，在工业化进行中的国家，人民的膳食确实有了进步。比如在法国，最后一次严重的面包供应危机发生在19世纪40年代，到19世纪后半期，工人阶级平常买奶、糖、水果以及新鲜蔬菜都已掏得起腰包，于是膳食内容也逐渐不再像过去那样完全以淀粉为主了。不过，并非所有的变革都能马上带来好处。有史实表明，牛奶消费增多后，其营养对人的健康虽然起到了更积极的作用，但因奶质污染，导致一些疾病传播开来，反而弊大于利。[20] 总之，在西方，身体健康水平有显著提高是在工业化开始很久以后，也并不是明治维新和日本启动工业化之前的事。[21]

影响19世纪日本和西方精英阶层的物质生活方式的文化和经济是如此不同，可两地穷人过日子的情形却是惊人地相似。比较日本和英国就会发现，两国的穷人家里都是土地面，家具寥寥，

---

⑰ D. J. 奥蒂，《19世纪晚期不列颠工人阶级的膳食》，见《经济史评论》，第2辑，23，第2期（1970年8月），第322页。

⑱ 朵拉·L. 科斯塔和理查德·H. 斯特克尔，《美国健康，福利，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

⑲ 保罗·哈克，《工业革命期间英国工人群体的婴儿死亡率和生活标准》，见《经济史杂志》55，第3期（1955年9月），第528—550页。

⑳ P. J. 阿特金斯，《白色污染？牛奶消费对社会的深远影响，1850—1930》，见《医学社会史》5，第2期（1992年8月），第207—227页。

㉑ 柯林·海伍德，《在19世纪法国度过的童年》，第169页。

甚至做饭方式都差不多。[22] 饭菜是在火上架锅烧出来的一锅烩，区别无非在于英伦群岛人民烩的是粥，日本人是煮一锅谷米加点蔬菜。英国人的一锅烩甚至可以做得很细致，用熏肉加水作底，烹制时再来各种蔬菜和一块布丁。这是 19 世纪晚期很普遍的做法，直到 20 世纪 20 年代都还可以见到。实际上，英国有一种炖炉，外观和日本的灶几乎一模一样。英国工业化以后，有钱人的钱越来越多花在了日用消费品享受上，然而即使是到了 19 世纪，贫寒人家最值钱的东西，仍然是一床被子。[23]

上述关于健康水平的例子并不能证明 19 世纪的西方百姓总体上比日本人过得好还是糟，但当今西方观察家指出的一些问题，政府报告和政策的应对措施，以及证明了工业发展导致大部分人民生活恶化的诸多史料，都巩固了一个事实：在工业化中的所有国家，都有大量身体较差的群体。尽管他们的生活标准，也即收入，并未出现缩水，他们膳食的内容、拥挤而肮脏的生活环境以及城市污染，都降低了生活品质和身体健康水平。算一下城市贫民窟和工厂工人的死亡率就可以证明这一点。而在乡下，情况更是糟糕得可怕。[24]

日本则是另一番天地。19 世纪中期时，城市居民并不住多层公寓，也没有一家人、几家人以及借宿者同居一室的现象。江户的供水和伦敦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下水道系统也要好得

㉒ 关于英国的生活，参考卡罗琳·戴维森，《一个女人永远有干不完的活》（伦敦：查特与温达斯出版社，1986）。

㉓ 安东·舒曼与罗蕾娜·沃尔士，《物质文化：消费，生活方式，生活标准（16 至 19 世纪）》序言，舒曼与沃尔士编，（米兰 1994 年 9 月第 11 届国际经济史大会预备会之物质文化讨论组，瓦赫宁根－阿纳姆，1993），第 9 页。

㉔ 约翰·博纳特，《住房与死亡率的下降》，见《欧洲死亡率的下降》，罗杰·斯科菲尔德，戴维·雷埃尔与阿兰·比多编（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1），第 158—176 页。

多，虽然用的还是原始的技术。日本各地清洁卫生情况也是如此。膳食和住房方面，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日本不如西方丰足。在工业化过程中，日本人依靠的不仅是其前现代社会结构，还有各种社会习俗。到德川时代晚期，泡澡已经是一种坚不可摧的习惯，最盛行的饮料是茶，衣服常常换洗，入室定会脱鞋以防弄脏屋子。日本的社会习俗促使环境干净整洁，极尽卫生之能事。

之所以说19世纪中期日本人的身体健康水平不亚于西方，一个强有力的证据就是，二者的平均余命是差不多的。19世纪40年代西欧男性的平均余命是39.6岁，60年代是41.1岁[25]；19世纪50年代美国的男性平均余命是37岁，女性是39岁。[26] 这和许多采自同时代日本乡村的样本十分接近。在推算平均余命时，我们必须谨慎比较。安·简妮塔和萨缪尔·普雷斯顿从应现寺的记录中发现了“很高”的死亡率，因为1816年至1835年间该记录中1岁男性的平均余命是46.1岁，女性是42.2岁。而我发现，在1830年至1835年间的藤户村，1岁男性的平均余命是43.6岁，女性是40.9岁，但我并不认为该村的死亡率高。[27] 我和上述二位学者发现了相似的现象，但结论却如此相左，原因在于，如果拿应现寺或藤户村的数据和今天的日本做比较，自然会觉得当时的死亡率很高，但在前现代社会或19世纪就另当别论了。我认为，日本到19世纪中期时看上去虽然较为落后，但在最关键的一些方面却已经和西方不分上下。岩仓使节团那番“只差40年”的乐观论调，在

㉕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老龄化及其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第54页。

㉖ 迈克尔·R. 海因斯，《美国1850—1900年间的寿命估计值表》，见《关于长期发展的历史因素之工作论文系列》，史论第59篇（剑桥，麻州：国家经济研究局，1994），表2。

㉗ 参考本书表6的平均余命表。

我看来倒是很有道理的。

问题在于，我们究竟应不应该把19世纪中期的日本和同时代的西方相提并论？或者，更适合比较的其实应该是二者各自工业化进程中的类似阶段？如果我们讨论的是各国工业化开始数十年前的情况，那就是英国的18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期，美国和德国的19世纪20年代中期至50年代，而日本则是19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期。如果比较各国人民在这个阶段的生活，工业化对身体健康的种种积极影响，例如生活标准的上升等等，或者消极的影响，比如肺结核发病率、工业污染、拥挤的都市生活之类，就都不会涉及到。对婴儿死亡率、平均余命以及发病率的估计结果表明，西方在工业化初始阶段，人们的身体健康水平很可能下降了。直到19世纪后半期，健康才出现了转机，因为公共卫生发展起来并开始造福大众，医疗也有很大进步，有了天花疫苗，人们也具备了越来越多的病理知识。欧洲人吃得更好了，生活条件也得到改善，这些都使他们的平均余命延长了。[28]而如果拿19世纪中期的日本和同时代的西方做比较的话，就等于是把一个尚且处于工业化前夕的国家和已然饱受工业化早期种种有害健康的消极因素之苦的国家放在了一起。

然而，本研究表明，将19世纪中期的日本和同时代的西方国家做一番比较仍是有意义的。不仅如此，日本和那些处于经济发展类似阶段中的国家同样很具可比性。西方人19世纪中期的健康水平固然反映出很大一部分民众的生活在几十年里一度出现恶化，但通过计算死亡率等，我们看出，其实在工业化开始之前，西方人也并不见得就更健康，起码不是更健康许多。例如，根据英国

㉘ 罗杰·斯科菲尔德与戴维·雷埃尔，《欧洲死亡率的下降》，见《欧洲死亡率的下降》，第1—7页。

的一项估计，18世纪后半期的概约死亡率是2.7%，到19世纪以后，则每隔20多年呈递减之势。[29]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欧洲其他国家。[30] 无论是看它们在工业化类似阶段的各自情形，还是将它们在同一时代做横向比较，西方的清洁卫生、医疗和饮食的观念习俗都未必在日本之上。

不过，上述比较分析的时间定位说明，在看待工业化之前日本人的生活究竟如何健康这个问题上，我们依然保持着模糊不清的“观念”。对日本官方人口普查数据的比较分析是20世纪以后才有的事情，而那时日本的初步工业化已经接近尾声，死亡率应该比以前有所上升，或者说起码没有下降——具体如何不得而知。[31] 我们已知的是，1920年至1925年的日本人初生时的平均余命是：男性仅42岁，女性仅43岁。[32] 这和10年前的欧洲比起来，差距都很大：那时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各国人民的平均余命已有57岁，英格兰和威尔士是53.5岁，法国50.4岁，德国49岁。[33] 直到“二战”后的1950年，日本人的初生平均余命才达到了57岁，[34] 也就是确实落后了欧洲三四十年。

然而，为什么迄至19世纪中期，日本人却拥有相当高的平均余命？我们可不要低估了民俗信仰和迷信中的清洁卫生观对民众健康的影响力。19世纪以前的西方人往往对生活中诸多不卫生之

---

[29] 阿尔弗雷德·皮尔诺德，《死亡危机的弱化和死亡率的下降》，见《欧洲死亡率的下降》，第25页。

[30] 雅各斯·凡林，《1720至1914年欧洲的死亡率：以年龄和性别为模式的长期趋势和变化》，见《欧洲死亡率的下降》，第38—67页。

[31] 大渊宽，《日本工业化过程中的人口变迁》，见《日本的工业化与其对社会的影响》，休·帕特里克编（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76），第329—361页。

[32] 艾琳·B. 托伊伯，《日本的人口》（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58），第228页。

[33] 雅各斯·凡林，《1720至1914年欧洲的死亡率：以年龄和性别为模式的长期趋势和变化》，第47页。

[34] 艾琳·B. 托伊伯，《日本的人口》，第294页。

处满不在乎，而在日本，自有史可考之日起，不纯、不洁以及不健康这些意识就已深深扎根在人们心里。[35] 神道教的许多仪式都和净化有关，人们还将仪式中的清规戒律活用到日常生活中，比如以盐作为清洗剂，在进入神社前或做了任何所谓“污秽”之事后都要洗手。盐并不能真的消毒，用水洗手也除不了菌，但重要的是这种坚持清洁卫生的态度。日本人入室脱鞋，不直接用手取食，避免接触任何腌臜龌龊之物，种种讲究，都远在他们知道微生物和病菌的存在之前。

这种清洁意识在19世纪之前的欧洲是罕见的。就在大革命爆发前夕，法国的屠夫们还认为，他们身体之所以很棒，要归功于宰杀动物的血污、油脂和内脏散发出的腥臭。革命大约40年后，某垃圾场的工人依然深信屎尿的熏陶有益身心。甚至到了1852年，卫生专家巴杭·杜沙特雷（Parent-Duchatelet）仍在为肮脏唱赞歌，称其可治病；人们认为有些痨病和风湿可以通过吸入臭气来治愈。[36] 16、17世纪的法国人不洗澡甚至不洗脸，因为觉得皮肤有很多毛孔，一洗毛孔就全打开了，疾病特别是瘟疫极易乘机钻入体内。18世纪才开始流行洗澡，特别是洗冷水澡以刺激身体，增强抵抗力。但即使到了19世纪，人们平时还是不怎么洗澡。某项调查计算1835年巴黎人在洗澡上花了多少钱，结果发现，他们平均每年大概只洗三到五次澡。

直至欧洲人认清空气中弥漫的“瘴气”或毒气是致病的罪魁祸首之时，才是他们着手改善清洁卫生之日。臭烘烘的露天下水道终于得到清理。微生物学兴起之后，洗澡才为大家喜闻乐见，

---

[35] 玛格丽特·M. 洛克，《日本城市中的东亚医学》（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80），第23—26页。也请参考大贯惠美子，《当代日本的疾病和文化》，第21—40页。

[36] 让-皮埃尔·古伯特，《水之征服》，第58页。

而这是19世纪70年代以后的事，此时的日本，明治维新已经结束。[37] 19世纪中期，是日本人，而不是法国或其他西方人，坚定不移地认为，人人都要远离致病的垃圾污染，保持洁净。此时，西药对强身健体和延年益寿都还没什么效果。西医固然比亚洲的传统大夫更精通人体知识，但其疗法对身体的侵害往往比救治更甚，尤其是在麻醉学、消毒学和病理学问世之前。[38]

德川时代以来日本人的身体健康水平一直能居高不下，还有赖于社会组织。在16世纪甚至更早，日本就形成了组织严密的社区，其内部有条不紊，不需外力就可以高度自治。这类社区以地方行政机关的形式存在于德川政府系统的统治之下。[39] 来自"上面"的统治固然很强大，但要切实贯彻它，却需通过社区对社会准则的严格制约。禁止乱丢垃圾和保持街道、下水道清洁畅通这些规则的强化，靠的与其说是官方命令，毋宁说是民间舆论监督。一份美国人的关于日俄战争中日本海军的医疗卫生条件的报告书，明白道出了德川时代的这种社区精神。报告发现日军"存在着一种无与伦比的纪律……日本整个国家都具有某种爱干净的特征，既包括身体也包括环境，因此可免于各种由污染导致的疾病"。[40]

19世纪访日者的亲身感受也进一步证明当时日本人的健康水平不低于西方。这些人旅日时自然怀念家乡的亲切舒适，但并不是说日本的遭遇因此就难以恭维。事实上，难以恭维的倒是19世

---

[37] 乔治·维加瑞洛，《清洁观：法国中世纪以后观念的变化》，让·比瑞尔英译（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8），第8—9页。

[38] 科特里·丹顿，《专业化时代》，见《不列颠遗产》2，第2期（1981），第55—65页。

[39] 约翰·W. 霍尔，《德川日本的阶级统治》，第39—49页。

[40] 威廉·C. 布雷斯特德，《向美国海军军医署长所作关于日俄战争中日本海军医疗和卫生特点之报告》，第7页。

纪50至70年代英格兰和美国的健康和卫生状况。据为爱德华·莫尔斯立传的多萝西·韦曼记述，19世纪50年代的某个冬天，莫尔斯"吃的全是新英格兰式的饮食，即早餐——馅饼和面包圈，夜宵——饼干牛奶，晚餐——'炒作'好的红肉和烤豆子"，结果很可能患上了或濒患坏血病。[41] 南北战争中他想应征入伍，却因扁桃体和牙齿太糟而被拒。[42] 莫尔斯对日本的垃圾和下水道处理设施赞誉有加也是有缘故的，因为他第一次在西方看到室内管道工程，得到1858年的波士顿。他对冷热水兼备的浴缸一番形容之后，声称："我打算每星期都要洗一次澡。"[43] 伊莎贝拉·博尔德记述她19世纪50年代在芝加哥住过的一家旅馆，比旅居日本的任何地方都要糟糕。她先是被带至一间屋子，内有4张床、5个女人和1个生病的孩子。她坚称自己需要单间，于是那位"邋遢的女服务员"指给她一间黑黝黝的小屋，"里面有张小床，床上铺着一张肮脏的水牛皮，揭开这皮，掉出来一窝虫子，爬得整个地板都仿佛蠢蠢欲动起来"。[44] 餐厅环境和上菜的过程也都极其龌龊，令她着实咽不下去。看起来19世纪中期美国的健康和卫生水平绝难和她印象中的日本相媲美。

日本人的健康水平和同时代的亚洲各国尤其是最大最具影响力的邻居——中国相比，又如何呢？日本从中国大陆借鉴了大量的物质文化和思想——宗教、孔孟之道，比较中日两国自然是合乎情理的，然而中国是个巨大的国家，而对其20世纪前的物质文化、清洁卫生系统、饮食品质和平均余命的研究少之又少，因此

---

[41] 多萝西·韦曼，《爱德华·希尔维斯特·莫尔斯传》（剑桥，麻州：哈佛大学出版社，1942），第121页。

[42] 同上书，第198页。

[43] 同上书，第41页。

[44] 伊莎贝拉·露西·博尔德，《英国女人在美国》，第148页。

中日无法进行日本和西方那样的比较。[45] 据估计，中国的人口从1700年的1亿5千万暴增至1850年的4亿5千万，对照同时代的日本很可说明一些问题，不过目前我们能假设的只是：中国人的健康水平高到足以令人口保持增长——但人们多半也并不宽裕，攒不了很多余钱。[46]中国人追求大家庭，因为相信多子多财，但日本人认为多子散财。[47] 为什么两国的家庭经济观如此相左，我们还不清楚。但有一个事实是很清楚的：无论在亚洲还是欧洲，那些盛行晚婚和小家庭的地区往往走在工业化的前列。

即使在工业化之前，日本的经济和其他亚洲国家包括中国也至少有一个地方是很不一样的。日本在明治时代起步之时，农业生产力远超亚洲其余各地。据官方统计，日本1878年至1882年间的稻米产量为平均每公顷2.36吨。詹姆斯·中村认为这一数据严重低估了实际情况，应为3.22吨。尽管实际产量无法确证，大多数学者都同意官方数据应更正为2.53吨。上述所有数字都比其他任何亚洲地区1953年至1962年间的产值要高。“二战”后数十年里，菲律宾稻米产量仅为每公顷1.17吨、印度1.36吨、印尼1.74吨、马来西亚2.24吨、韩国2.75吨、中国台湾地区2.93吨，而此时的日本已经跃至4.73吨。可见，明治早期日本的稻米产量高过了70年后的亚洲其他地区。[48] 稻米在上述亚洲国家经济中均属于主食，由此断言，19

---

[45] 对中国人口史研究的详细讨论，参考伊芙琳·S. 罗斯基，《明清社会经济史的诸研究主题：学术动态》，见《亚洲研究杂志》50，第1期（1991年2月），第93—95页。

[46] 詹姆斯·李，《中国西南的食品供应与人口增长，1250—1850》，见《亚洲研究杂志》41，第4期（1982年8月），第743页。关于近代中国的人口和农业发展的分析，参考德怀特·珀金斯等，《中国农业发展，1368—1968》（芝加哥：阿尔定出版社，1969）。

[47] 参考苏珊·B. 韩利与阿瑟·P. 伍尔夫编，《东亚史中的家庭与人口》（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5）。

[48] 上述各项估计值均转引自亨利·罗索夫斯基，《稻田轰隆》，见《亚洲研究杂志》27，第2期（1968年2月），第347—360页。

世纪晚期日本的生活标准应该超过了这些国家。

19 世纪的日本人不仅身体颇为健康，而且由于生活标准不低，大量的儿童得以接受教育。据估计，当时儿童的入学率非常之高。父母可以送子女上学，意味着他们买得起体面的衣服给孩子穿，放弃让孩子打工得到的薪水或帮家里干活省下的钱，还要支付得起上学所需的各种花销——小到给老师送礼，大到学费。德川时代晚期和明治时代早期儿童的入学率不一，但都很高。一种估计值为，两个时期 6 至 13 岁的男孩入学率为 54%，女孩为 19%。[49] 另一估计是 1854 年至 1867 年间，男孩入学率为 79%，女孩为 21%，而 1873 年男孩入学率为 75%，女孩 25%。武士阶级男性的识字率几乎是 100%，而偏僻地区的农民则只有大约 20%。[50] 1848 年至 1860 年间江户的入学率从 70% 到 86% 不等。反观英国，在 1837 年时的主要工业城市，四五个孩子里只有一个在上学。[51] 法国呢？1877 年，一个法国人写道："日本的基础教育水平之高，已经足以令我们脸红。"[52] 显然，很多日本人，包括农民，都有足够多的钱送孩子去读书。对不同社会间的跨区域分析得出，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当代，识字率水平的最低下限都是 40%。[53] 所有数据表明，19 世纪的日本起码是达到了这一标准的。

考察日本 19 世纪的物质文化之后，我们发现，就身体健康而

㊾ R. P. 多尔，《德川时代日本的教育》，第 318 页。

㊿ 赫尔伯特·帕辛，《日本的社会与教育》（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出版社，1965），第 44、57 页。

(51) B. 西蒙，《教育史研究，1780—1870》（1959），第 170 页，转引自多尔，《德川时代日本的教育》，第 291 页。

(52) G. 布斯盖，《当代日本》（1877），卷 1，第 337 页，转引自多尔，《德川时代日本的教育》，第 291 页。

(53) C. 阿诺德·安德森，《由一些历史个案探讨发展对识字和学校教育的最低要求》，见《教育与经济发展》，C. 阿诺德·安德森与玛丽·简·鲍曼编（芝加哥：阿尔定出版社，1965），第 347—362 页。

言，那种认为当时的日本人过得比西方悲惨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不可否认我的论据仍有不足，而且很难扩展，但日本到明治维新时，绝对不应再被视为一个“落后”的国家。

日本在19世纪工业化中最缺的是工业技术，于是明治在位者立刻着手改变技术上的落后状况。政府建立了实验工厂，通过购买机器、雇用外国专家培训日本人等手段引进技术，最重要的是成立了交通、通讯以及金融系统的机构，于是广大市民可以私人办厂，开展现代工业。发展是如此神速，在1895年，京都街上已经出现了第一辆电车，仅比美国在维吉尼亚州里士满市驶出第一辆电车晚了8年，比柏林市郊启动那条区区2.5公里的路线晚了15年而已。[54]

可以说，新技术的推广对普通老百姓生活品质的改善，在日本和西方是同步的。白炽灯发明于1840年，但电厂的出现要到几十年后，此时千家万户才真正用上了电灯。日本的民用电是1887年问世的，比爱迪生电力公司在纽约创立世界首家发电厂仅仅晚了5年。日本在京都建立了“蹴上”民用水力发电厂，仅比美国晚了9年。[55] 日本人改造城市供水系统也不费事，将管道换成金属的即可，而工业革命后金属是唾手可得的。由这些小例子我们可以管中窥豹地看到，日本政府下定决心之后，师西方之长技以追赶西方是何其迅速。

如果说19世纪晚期日本的诸多物质文化都可以和英国不分伯仲，那么到了20世纪以后，和完成了工业化的其他西方国家比起来，为什么日本的基础设施，比如住房、下水道系统等，反而有所滞后？那些影响生活品质的便利设施，比如公园、图书馆之类，

---

[54] 理查德·贝瑟尔，《交通》，第166—167页。

[55] 南亮进，《日本工业化中的电力革命：1885—1940》（东京：纪伊国，1987），第162—164页。

就更不用说了。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一点是日本政府奉行的一项决策："赶超"西方，让日本成为和西方并驾齐驱的工业化强国。

赶超西方，意味着必须火速实现工业化，这需要资本。于是，政府实施了各种政策，直接或间接地促使人们多存钱：利润税和物业税极低甚或没有，降低或放缓消费增长率。[56] 政府资源被用于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基础建设，而不是为百姓生活谋福利。这些政策的确见效了：20 世纪 70 年代，日本真的变成经济大国。但为了这一目标，日本人民付出了代价：经济飞奔了，消费水平的提升为此却成了龟速。

日本政府有能力缔造一个工业大国，弥补那个"40 年"的差距，但因此也作出了牺牲。20 世纪初，日本人的平均余命增长幅度小于西方，而且"二战"前后人民的健康和生活显然备受折磨。然而，到 80 年代时，日本人的平均余命又成了世界之冠。1994 年，日本女性的平均余命高达 82.5 岁，比法国、瑞士和瑞典女性都要多 1 岁以上。[57] 显然，在经济蓝图得以实现的今天，他们的生活福利、身体健康都还损失不大，然而从物质文化的角度来说，生活品质反又落后于西方国家。在许多日本人看来，这是铁的事实。[58]

日本人能够同时完成国富和民强这两件矛盾的事情，我认为德川时代的遗产功不可没。维新后的明治政府有足够的实力，不必在基建上大费精力也能投入工业化建设，因为德川时代的基建

---

[56] 影响消费的基本政策包括经济膨胀（从而降低薪水的购买力），对盐、烟草和酒等消费性商品征税，对外国进口消费品征收高关税，镇压工会。

[57] 《日本人的长寿再创新高：男性平均 76.25 岁，女性 82.51 岁》，见《日本时报》，1994 年 7 月 15 日。

[58] 猪口邦子，《无基础设施之繁荣》，见《日本研究杂志》13，第 1 期（1987 年冬），第 125—134 页。

大都功能完好，可以继续使用。城区依旧沿用德川时代的各种下水道处理系统，就是一例。除市中心以外，一般城市的废水仍是沿着街边的露天阴沟排走，大多数日本人还是和以前一样收集大小便作为肥料，而不是安装昂贵的公共下水道系统。这些老规矩一直保留到了20世纪末。公共下水道和供水系统在20世纪中期只普及到全国的一半，按照现行的管道接通速度，要让全体人民都享受到真正的西式系统，想必也还有若干年的路要走。[59] 即使是在首都东京，1988年时也只有88%的人家里接通了下水道；136万居民家里的大小便仍然需要一种人称“真空车”的巨型卡车收集，此车有吸管，可将积存的大小便抽入车内。尽管如此，日本人的长寿却是有目共睹的。这告诉我们，技术上的高水平和身体健康的高水平，并不一定能划等号。

依赖旧系统和手段在19世纪晚期对工业化初级阶段的发展起着积极作用，却造就了今天这一“无基础设施之繁荣”的矛盾局面。由于在改善人民生活的公共建设上没什么大手笔，公共设施的水准就和私人生活方式相去甚远。酒店大堂和其他公共建筑个个宏伟壮观，可是人们住的还是都市里拥挤不堪的小公寓。国家对公共事务花的钱都集中于建立一个能在世界市场获得成功的经济，但这一成功，与道路、学校、下水道和供水系统及其他公共设施之间的差距也是惊人的。一个当代日本人要享受欧洲人或美国人般的生活品质，必须从自己腰包里掏出大量银子来购买一些基础设施，而这些东西在西方都是由政府提供的。正由于在生活方式上对昔日辉煌的依赖太久所造成的这种反差，致使日本的很多学者之类的人士视德川时代的生活水平为陈腐落伍之物。

---

[59] 《下水道、供水系统达到全国人口的49%》，见《日本时报》，1994年8月31日。当时计划在1994年末，51%的人家可接通下水道。

另一个低看德川时代遗产价值的原因可能在于我们观察日本社会建设的角度有误。过去几十年里，在比较日本和西方的时候，我们总是抱着这一观念：为人民提供现代化设施，西方是遥遥领先于日本的。于是，大家也就不可避免地着眼于讨论日本在下水道系统、铺路等方面如何地跟不上时代，实为大谬。1940 年美国有将近 3700 万住户向国家人口普查局报告供水情况，其中近 70% 的人家中没有自来水，5% 的人家在方圆 50 英尺找不到任何供水。不到三分之二的人家有抽水马桶，很多家和别人家共用马桶。近三分之一的人家是户外厕所，2.8% 的根本没有任何厕所。[60] 1950 年，4200 万记录在案的居民中，就算住的不是年久失修的破屋，也只有 70.7% 的人家有单独的厕所、浴缸和热水，10.9% 的甚至没有自来水，6% 的连电灯都没有。至于那些住破屋的，就只有 1.4% 的有这些设施了。[61]纵横看来，今天的日本人在清洁卫生系统方面并非还活在 19 世纪的世界里，更合理的看法是他们停留在了 20 世纪中期的水平线上——恰好又落后了西方大约 40 年。

百年来对社会基础建设方面的投资的忽视，在日本人的生活中造成了很多变态矛盾之处。比如，尽管全国只有一半人家里通了下水道，很多边远城镇的公共建筑里只有旱厕，日本人却是最新式马桶的狂热消费者。他们拥有最先进的消费性电器，却住狭小的公寓，装修也都是旧式的。也不是他们都偏偏喜欢老派装修，实在因为无处搁椅子、床和其他家具而不得不如此。[62]随着公共资

---

[60] 美国商务部人口普查局，《美国第 16 次人口普查：1940，住房，卷 2，概述，第 1 部分：美国摘要》（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务局，1943），第 14、21 页。

[61] 美国商务部人口普查局，《住房普查：1950，卷 1，概述，第 1 部分：美国摘要》（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务局，1953），第 1—4 页。

[62] 苏珊·B. 韩利，《传统住房与独特生活方式：日本土地政策意想不到的后果》，见《日本的土地问题：一个失败的政策?》，约翰·O. 韩利与山村耕造编（西雅图：日本研究会，1992），第 195—222 页。

金越来越多地被用在了桥梁、隧道以及1998年长野冬奥会之类工程而不是民众个体的私人需求上，公共设施和个人享受之间的失衡也白热化了。遗产不会永世长存，德川时代的老本，日本人也不可能再一味吃下去了。

以往人们总是聚焦于日本的国家经济发展、政府的兴国之计以及被视为非工业化国家转型之“楷模”的辉煌成果，无论这成果是功还是过。本书的意图之一，就是谋求以另一种视角来考察日本工业化的得失，以纠正这种一边倒。如果只拿19世纪80年代以后的统计资料来说事，一边倒是不足为怪的。然而即使一个国家只盯着经济和工业化而不顾其他，对国家和人民生活而言，除了这些方面，也还有很多别的东西需要考虑。德川时代的变化并不那么夺人眼球，要研究清楚也非易事，但从身体健康水平这一点来看，人民生活普遍在往好的方向变。死亡率变低了，平均余命变高了，物质文化进步了，生活也能更好地维持下去——人们为维持生活所下的工夫，比如人口观，也在进步——靠的是更有效的资源利用和更健康的生活方式。这些进步，为明治政府飞速实现工业化奠定了基础。

这么看为什么很重要呢？首先，这证明一个群体的身体健康水平并不一定由技术水平或按收入和财富来衡量的生活标准决定。其次，这表明在工业化初始时期，日本人的身体健康水平并不比西方人处于同一阶段时差多少。在当时的外来者眼里，更多见到的是技术的不足和西式建构的缺失，但日本并非他们所见的那样是一个落后国家。那时他们的国民健康和教育水平已足以在全国开展工业化，而同时农业和传统手工业又能保持不倒，还为工业化建设提供了大量的税金。这一事实，对我们关于工业化的前提条件的看法是一个挑战。

这些发现也影响到长期以来的一个讨论：谁为日本工业化负

责？也就是说，日本的工业化是自上而下的，还是自下而上的？德川时代人的生活越来越好，是政府的努力和普遍社会习俗综合作用的结果，也是人们向往过好日子的本性使然，在很大程度上还有运气的成分。说运气，是因为政府的初衷其实并不是为百姓谋福利，而是征税和稳定，但为此目的所采取的措施，最后倒有助于百姓身体健康水平的提升，比如禁止有田产的家族分家以维护可耕田不受削弱，控制城市的供水系统和有关粪便收集的法令，对伐木的制约，以及地方政府系统积极鼓励——也可以说是迫使——各地行政机关自力更生的做法。政府自上而下的压力，加上层层社会舆论的巨大力量，不但令民强，也为社会走向工业化做好了准备，而工业技术的发源地西方反而相形见绌了。

日本想要“赶超”的，无非是新能源和改变国家经济和工业结构的新技术的开发。尽管早期的明治政府一度提倡大家过西式生活，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人民收入增长后，他们真正过的却是德川时代武士阶级式的生活。而德川时代几百年发展出来的这种武士阶级生活方式和物质文化，偏巧和19世纪的西方大异其趣。

物质文化在日本的转变，完全不同于西方。欧洲发展出椅子、沙发，更不用说高高的床；日本发展出的则是榻榻米这种地板兼座席的天才设计。这两种物质文化却在19世纪不期而遇了。西方的工业科技为日本所用后，面临的便是一个和产生它的本土完全不同的文化。之所以洋舶来品和旧时代承袭下来之物的对立如此鲜明，而两种文化的混合物在西方观者的眼里常常又是那般怪异，原因主要就在于此。由于西方技术是完全“借用”，然后自外而内、自上而下地附加上来，本国的家庭生活习俗和物质文化就有可能得到保留。如果家里只是新装了个电灯，人们为什么连吃的东西都要改？拉门用玻璃换下纸糊的就行了，房子的风格架构都

不需要动。日常生活在物质内容上从传统里走出来，基本上是20世纪以后若干年的事了。

根据可计量的标准指标，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对明治以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传统产业在日本工业化早期的历史角色都在进行价值重估。他们的研究表明，新技术一旦被引进之后，日本的发展水平及其经济结构便立刻令其走上快速工业化的轨道。日本的现代化实现得又快又好的一个关键原因，是前现代时期已有充分的准备。我的研究则对这一论点提供了新鲜的视角。日本人的身体健康水平完全可以和绝大多数西方发达工业国家比如英国做一番比较，事实上也并没有被比下去。从其他诸多要素，比如识字率、住房的健康度、膳食的充足与否以及平均余命等来看，日本和西方也是旗鼓相当的。

一个不具备西方那样的前提条件的“落后”社会要进行工业化，往往会走一条曲折离奇的道路。然而，如果日本的经济发展和物质文化水平比预想的要高，就意味着这个国家走的并不是这样的道路。要找到日本现代化的根源，不应盯着明治时代，而应追溯至更早。我们关注的焦点应该是，一个近乎完全与世隔绝达两个多世纪的国家，在人口众多、资源相对匮乏且罕有国际贸易的情况下，为何、又如何使其居民过上了如此高水平的好日子？这个社会的资源利用之高效，使其人民生活简朴自律而健康，创造出一种以朴素为美的文化。这些，对现代化建设其实是最功不可没的。

我们对日本的现代化和工业化存在着偏见，是因为我们总是去看日本人在19世纪还没有什么，而不是他们已经有的是什么。我们总是去看日本和西方之间有多不同，而不是二者有什么共通之处。于是，我们看到的是日本的经济和社会中似乎直接对经济产生影响的那些方面，用的也是经济史学家的研究工具。由于经

济理论及其工具的局限性，我们注重的就只是那些所谓现代经济发展的构成要素：资本、劳动力和技术。于是唯有技术和经济基础建设仿佛才至关重大，而家庭组织、物质文化和身体健康水平却微不足道。这种观点直到最近才有所改变。我始终认为，在日本，这些被忽略的因素恰恰构成了日本工业化成功“秘诀”的很大一部分。实际上，“秘诀”恐怕主要就来自于日本的人力资本和合理利用资源的能力，而不是经济史学家死盯着的技术之类因素。

当我们试图去理解一个国家的历史进程，如果对其社会文化特征视而不见，在解析改写这个国家历史的不可抗力时，就会过于倚重某些片面甚至是不准确的因素。我的研究不是完全解释，也不是终极解释，但我相信，史实，尤其是在和其他国家的比较之下，已经充分说明日本 19 世纪以来经济的成功，根源在于德川时代留下的社会文化遗产。探索这份遗产，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本书提供了丰富的见解和信息……韩利向学者们提出了挑战——如何纠正英语世界中长期以来忽视工业化前后普通日本人日子过得究竟如何的研究的倾向。与此同时，对那些迷恋于发现如何建造住宅、如何洗涤和缝补衣物、如何准备膳食、如何处理粪便的人来说，这本书也可以令人手不释卷。

——美国《经济史评论》

要找到日本现代化的根源，不应盯着明治时代，而应追溯至更早。我们关注的焦点应该是，一个近乎完全与世隔绝达两个多世纪的国家，在人口众多、资源相对匮乏且罕有国际贸易的情况下，为何、又如何使其居民过上了如此高水平的好日子？这个社会的资源利用之高效，使其人民生活简朴自律而健康，创造出了一种以朴素为美的文化。这些，对现代化建设其实是最功不可没的。

消费者倾向于传统商品，说明国家在工业化早期阶段并未将宝贵的外汇用于消费品。这对日本来说是意义深远的，因为它不仅使日本可以在人均收入低于西方国家的条件下开展工业化，而且能在落后英国一个世纪之久后迎头赶上。

在德川时代，……人们并不将全家所有的艺术藏品都展示出来，而是依照时令或场合，将某一具代表性之物悬于龛内，并伴之以一两件其他东西，比如花瓶。关注的焦点就落在那件具代表性的东西上面。这家人以之为傲，于是将它展示给客人。家里的每样藏品可能都很华贵，但只有独赏其中的一件，而不是将别的东西也罗列出来争奇斗艳，才更能体现出奢侈的精髓。这种以清寂行奢侈的作风在很多传统艺术形式中都得到了体现，而德川时代的有钱人正是非常热衷于这些艺术形式。

——摘自本书


ISBN 978-7-108-03456-4
9 787108 034564 >

定价：18.00元